

出版说明

《作家参考丛书》是为满足作家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之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而推出的一个系列。

《作家参考丛书》将把世界社会科学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介绍给大家。书中的观点不尽是我们同意的，但它有利于读者管窥各种艺术态势和文学发展的流向，从而得到适当的启迪和借鉴。

对于捷克和斯洛伐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字，中国读者并不陌生，我们曾出过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等三部小说，现应读者的要求，将作者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玩笑》列入《作家参考丛书》出版，以飨读者。

小说的思想观点有其偏颇之处，有心的读者自会分辨的。小说的叙事方式，音乐对位式的艺术手法将给人以启益。

作家出版社

自序

1980年，为我的作品举办了一次电视公开讨论会，会上当有人称《玩笑》是“对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有力控诉”时，我当即插嘴说：“请不要把你们的斯大林主义来难为我了。《玩笑》是一部爱情小说。”

早在1962年我就开始写这部小说，那时我三十三岁，发生在一个捷克小镇的事件激发了我的灵感：一个姑娘由于从公墓里偷花，把花作为礼物献给她的情人而被捕。当我认真思索这件事时，一个人物形象在我眼前形成了，这个形象就是露西，对她来说，性欲和爱情是截然不同、互不相容的两码事。接着，在我的头脑中，她的故事与另一个人物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这个人物就是卢德维克，他把自己一生中积聚起来的仇恨都集中在一次性行为中发泄。于是便形成了《玩笑》：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

《玩笑》的故事情节本身就是一个玩笑。不仅仅是它的故

事情节，甚至还有它所表达的“哲理”也是一个玩笑：一个人陷入了玩笑的圈套而遭到飞来横祸，然而他个人的灾难在外界看来却是荒谬可笑的。他的悲剧在于这玩笑剥夺了他悲剧的权利。他被迫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构成海伦娜故事结尾的悲伤与构成厄勒克特拉^①的悲伤属于完全不同的编法。

然而，假如一个人被迫在个人生活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他能避开历史的舞台吗？不能。我一直相信，历史的悖论与个人生活具有相同的基本特性：海伦娜陷入了卢德维克为她设的圈套；卢德维克和其余的人又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的玩笑的圈套；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拚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假如一个人失去了未来的天堂，他还拥有过去的天堂，失去了的天堂。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一直被民间传统“国王们的骑马”所吸引，这是一种异常美丽的民间仪式，其含义早已不为人所知，仅仅保留了一系列含糊不清的动作。这个仪式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这是一个有关遗忘的结构。昨日的行为被今天所掩盖，把我们与被遗忘不断吞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最牢固的链环便是怀旧。惆怅的怀旧与冷峻的怀疑是赋予这部小说平衡的两个天平秤盘。

1965年12月，我把《玩笑》的手稿交给布拉格一家出版社，编辑们虽然答应要尽力使它出版，但他们从未真正相信他们会成功。此书的精神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然而，两年

^① 厄勒克特拉：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悲剧《厄勒克特拉》中之女主人公，阿伽门农之女，帮助弟弟杀死其母与奸夫，报杀父之仇。

后《玩笑》竟然问世了——没有受到任何审查！在“布拉格之春”前一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怎么可能呢？

今天，这事态也已变得模糊不清，斯大林主义在中欧的瓦解已难以解释。俄国的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存在任何别的共产主义）对中欧（波兰，匈牙利，捷克）的传统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当时大多数人都本能地拒绝它。在共产主义的外表后面，发生了一个逐渐自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目睹了许多杰出的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尽管没有谁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但也没有谁认真地对待它）。

《玩笑》很快即连续出了三版，印数多得惊人，一下子便抢购一空，仿佛人们意识到自由的时刻将是短暂的。果不其然，俄国人不能容忍在一个自从1948年以来一直被视为他们的地方苏维埃的国家出现自由的气氛，于是在1968年，他们对捷克发动了一次军事入侵。此后《玩笑》（与许多其它书一起）便遭到了查禁，从所有公共图书馆中拿掉，从捷克文学史中抹去；它的作者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作是“反革命”的发动者之一，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最后被迫移居国外。

得到全世界的默认（美国政府只提出过一次强烈抗议——是当俄国士兵在美国大使馆的花园里摘梨被抓住时），俄国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月后，《玩笑》在巴黎出版，路易·阿拉贡在前言中称此书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引起了世界性轰动的这篇前言，是此书荒谬的命运的另一方面。阿拉贡不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大小说家，而且还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高高在上的行政官。

记得1968年秋天在我逗留巴黎期间，我曾与他会面。我到达时，他正在接待两个来自莫斯科的客人，萨哈罗夫的朋友。他们极力劝说他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关系。阿拉贡对俄国入侵捷克极为愤慨，他断然告诉他们，他将永远不再踏上俄国的土地。“即使我想去，我的腿也不会同意。”他一边说，一边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就象一部高乃依^①悲剧中的人物在法国国家剧院的舞台上踱来踱去一样。我当时很钦佩他。四年后他的腿却同意带他去莫斯科接受勃列日涅夫颁发的一枚勋章；十四年后他的腿又把他带到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坛，那次大会既宽恕了在阿富汗的暴行，又宽恕了波兰的奴役。然而，正是这同一个阿拉贡曾经对俄国入侵捷克写过一篇也许是迄今最雄辩、最尖锐的文字：他为《玩笑》写的前言。

“有朝一日，僭居历史学家的神话作者们将写出他们对捷克历史的看法……而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将以胜利者的眼光来写它……人们将找不到对我们曾亲眼目睹的事情的真实解释。”几页之后他写道：“啊，我的朋友，难道一切都失去了吗？”接着又写道：“我不愿相信一个精神上的比夫拉^②即将发生。然而在暴力之路的尽头，我看不见一线光明。”

乍读之下，我发现这番话所含的悲观主义有点夸张。我仍然坚持天真的民主主义幻想（美国人是非常了解这个幻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挡人民的意志。但是阿拉贡比我更了解共产主义和俄国。他知道他所讲的话。他知道极权势力的

①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悲剧诗人。

② 比夫拉：1967年宣布脱离尼日利亚而独立的西非国名。主要为伊博人。北部豪萨人曾于1966年屠杀几万伊博人，1969年战败后不复存在。

手段。他知道极权势力的神话作者的力量，他们组织遗忘的能力（“人们将找不到对我们曾亲眼目睹的事情的真实解释”）。他知道如果文化在一个“精神上的比夫拉”遭到屠杀（让我提醒那些觉得这个隐喻深奥难解的人，比夫拉当时是非洲部落发生种族灭绝的地点），那么“在暴力之路的尽头将没有一线光明。”

阿拉贡当时所知道的——后来他不再希望知道的——是这个世界其余的人没有看见的东西。戴高乐政府把对捷克的进攻看作不过是“共产主义大家庭内部”的一次局部纠纷。好象处在危急之中的是一个“家庭”！实际上在政治术语（革命，反革命，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的烟幕后面，处在危急之中的不只是两个文明之间边界的改变：俄国的统治已经永远征服了西方的一部分，欧洲的一部分，最好是看着这部分的文明与中欧其它国家的文明一道垮掉（这些国家早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前六、七百年就已属于西方历史，这个事实已被遗忘）。这就是阿拉贡所说的“精神上的比夫拉”。有朝一日，俄国的神话作者将把这一事件写成是历史的新曙光。我却把它（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看作是欧洲灭亡的开端。

在1968年和1969年，《玩笑》不仅被译成法语，而且被译成未被俄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被译成了日语和希伯来语。它还被译成了波兰语，波兰的情形象1968年以前的捷克一样自由，以及匈牙利译本，尽管此书在1968年9月一经出版就遭到禁止，从未由官方发行，但它却在私下流传，为匈牙利知识界所熟知。

还有英译本的出版。英文本使我大为吃惊。章节的数目改

变了；章节的顺序也改变了；许多段落都被删掉。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抗议信，要求读者不要接受《玩笑》的英译本，不要把它看作是我的小说；出版商向我道歉，并认可了一本恢复了章节顺序的平装本。与此同时，英译本却在纽约出版——但更加简略，更加残缺不全！我无能为力。在被占领的布拉格，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愈来愈困难，一方面是抄家，一方面是逮捕，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一位年轻的美国文学教授由于对《玩笑》的残缺不全感到愤慨，遂把被删掉的那些最重要的段落翻译出来，在一本美国杂志上发表了它们。

歌德在创作《威廉·迈斯特》时，曾让他的秘书爱克曼为他校对，删去多余的词或为一些句子润色，尽管他决不会把他的诗歌委托给秘书。在歌德时代，散文还不可能提出诗歌的那样审美要求；也许直到福楼拜的作品，散文才消除了审美上低等的污点。自从《包法利夫人》以来，小说艺术就一直被视为与诗歌艺术平起平坐，小说家（配得上这一名称的所有小说家）把他散文里的每一个词都赋予了诗歌里那种词的独特性。

一旦散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小说翻译便成了一门真正的艺术。一位其作品在自己国家遭到禁止的小说家无疑会意识到这方面的困难。三年前，重读《玩笑》最初的法译本，我发现它的风格与我的不符，于是我亲自从头至尾改写了一遍，利用这次机会在原文中加了一些修改。《玩笑》还出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新译本，现在，那位十年前将英译本删掉部分予以发表的美国文学教授首次把一本讲述强奸的书，一本

自身也时常遭到强奸的书正确可靠地翻译了出来。

Habent sua fata libelli^①。书籍自有书籍的命运。这本名为《玩笑》的书的命运与那个时代是相符的，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独裁（在东方国家）和新闻界的过于简单化（在西方），这二者的共同愚妄都能妨碍一部艺术作品用自己的话语讲出自己的真实。布拉格的理论家们把《玩笑》看作是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因而禁止它；外国出版商把它视为在出版几周后就变成了现实的政治幻想作品，因而改写它。

今天，在一个加速遗忘的世界里，布拉格早已失去了它的地区性。那儿的美国大使馆里肯定已没有任何人还知道十四年前俄国士兵在花园里偷梨的事件了。然而，正是由于遗忘（这就是《玩笑》的终极悖论），这部小说才最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仅仅是一部小说而已。

米兰·昆德拉

一九八二年六月

① 拉丁语：意即书籍有自己的命运。

目 次

自 序	1
第一章 卢德维克	1
第二章 海伦娜	11
第三章 卢德维克	23
第四章 雅罗斯拉夫	123
第五章 卢德维克	165
第六章 科斯特卡	213
第七章 卢德维克 雅罗斯拉夫 海伦娜	247
译后记	317

第一章 卢德维克

哦，到了，多年以后我又重返故里。站在广场上（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曾无数次打这里走过），我没有感到任何激动；我只是觉得，这块平地看上去象一个巨大的阅兵场，高耸在众多屋顶上的市政厅尖顶，就象是一个戴着古代头盔的士兵；这个摩拉维亚城市曾经是抵御马扎尔人和土耳其入侵者的堡垒，往昔的战争在它的外表上刻下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丑陋的痕迹。

多年来已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吸引我的了；我对自己说，对这个地方我没有留下任何感情，这似乎十分自然：我离开这儿已有十五年，我的朋友或熟人几乎都已离去（包括那些我想避开的人），我母亲葬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个我从未光顾过的坟墓里。可是我一直都在欺骗自己：我以为这是冷漠，事实上却是嫌恶；我没有看出这种心理，因为同在别处一样，在这儿我既有愉快的经历，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但仅此而已；

正是这次旅行使我意识到：把我带到这儿来的使命在布拉格也可以轻易完成，如果在这里，在我的家乡，我才突然觉得不可遏制地看清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整个念头是如此玩世不恭、卑鄙无耻，以至于我是出自对往事伤感的依恋而回到这里的任何怀疑都受到了嘲弄。

我最后讥讽地看了一眼不雅观的广场，转身背朝着它，动身去我在那儿订了一个房间过夜的旅馆。看门人从木牌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我，说：“二楼。”房间实在不怎么样：靠墙有一张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和椅子，床边是一个外观华丽、带有镜子的桃花心木衣柜，门旁有一个破旧的小脸盆。我把皮包放在桌上，打开窗户；窗户面朝着一个庭院和比邻楼房光秃肮脏的背面。我关上窗子，拉下窗帘，走到脸盆前，那儿有两个龙头——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我拧开它们，冷水从两只龙头里流出来。我打量了一眼桌子，还不算太差；至少可以放一个水瓶，两只杯子；问题是只能坐一个人；只有一把椅子。我把桌子推到床边，试着坐下来。可是床太低，桌子太高；此外，床在我的重量下陷得那样低，以至于我顿时就意识到，它不但作为一个座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作为一张床也不能起到它的作用。我用拳头撑住床，然后躺下去，小心翼翼地抬着腿，以免弄脏毯子。床凹陷得很厉害，我简直觉得我是躺在吊床里。真不能想象什么人能和我共享这张床。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瞪视着半透明的窗帘，开始想心事。这当儿，从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两个人，一男一女，正在谈话。我能听懂他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叫彼得的男孩从家里逃走了，他的婢娘克拉娜是一个傻瓜，惯坏了这孩子。

接着把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动，门开了，谈话声仍在隔壁房间继续；我听见那女人在叹气（是的，甚至她的叹气也能听见！），那个男人决定给克拉娜一个最后的忠告。

等我站起来时，主意已定；我在脸盆里洗了手，用毛巾擦干，然后离开了旅馆，虽然我并不清楚到哪儿去。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不想破坏这次旅行（漫长而艰辛的旅行）的成功，除了得到一个本地熟人周密的帮助，我没有别的选择，尽管我很讨厌这个想法。我头脑里掠过从青年时代起所有的熟面孔，把他们一一都否决了，只要由于所提供的帮助的机密性质需要我越过这道鸿沟，说明我为何多年在外——一种我不愿做的事。但是，接着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新来的人，这个人我曾帮他找过工作，要是我真了解他，他会非常高兴以德报德的。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既审慎地严奉道德，又古怪地浮躁不安，反复无常，就我所知，几年前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因为他从来不同她和儿子在一起生活。我有点紧张：如果他再婚了，这将使事情变得相当复杂。我尽可能快地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当地医院是一个由楼房和分隔部组成的综合建筑群，散布在一大片绿化地区；我走进大门旁边的传达室，要门卫为我接通病毒室；他把电话往工作台边沿一推，说，“02。”我拨了02，结果得知科斯特卡医生刚刚离开，到外面去了。我在大门附近一张板凳上坐下来，以便不会错过他，一边瞧着穿着蓝白条纹的医院长袍在四处闲荡的人们。然后我看见了 他：他沉思着走来，又高又瘦，引人注目地没有吸引力；是的，正是科斯特卡，没错。我站起身，照直迎向前去，仿佛

有意要碰撞他；起初，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接着他就认出了我，随即张开了臂膀。我觉得他的惊喜超过了他的愕然，他那毫不做作的欢迎很给人鼓舞。

我解释说我刚来不到一小时，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事要在这儿耽搁两三天；他立刻对我说，我首先想到来看他，他是多么惊讶和感激。突然，我感到自己别有用心，并且出于算计而又不是真正的兴趣提出我的问题（我快活地问道：“怎样？又结婚了吗？”）是很不对头的。他告诉我（这使我宽慰）他仍是单身一人。我提出我们有许多话要谈。他表示同意，但抱歉说他只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然后他得回医院当班，夜里又要离开城镇。“你是说你不住在这里？”我失望地问。他让我放心，他住在城里，他在一个新村有一个单身房间，但是，“独身生活是没有益处的”。原来科斯特卡有一个未婚妻，住在十五哩外的另一个城镇，她是一个教师，有一套两个房间的寓所。“那么，你最后将跟她搬在一处？”我问。他说他未必能在那儿找到一个好工作，象我曾帮他找过的一样有趣，而他的未婚妻要在这儿找到一个工作也很麻烦。我开始（十分真挚地）咒骂官僚主义的失职，不能将夫妇安排住在一起。“冷静点，卢德维克。”他带着温和的宽容说，“象这样也并不太坏。来回旅行当然得花时间和费用，可是我却保持了我的独处不受影响——还有我的自由。”“你的自由对你干嘛就那么重要？”我问他。“那么你的自由对你干嘛就那么重要？”他反问道。“我喜欢和女人交往。”我回答。“我需要自由不是为了女人。”他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喏，到我的住处去，直到我离开，怎么样？”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离开医院区不久，我们来到一处建筑物前，楼房鳞次栉比地矗立在一块凸凹不平、满是尘土的场地上(没有草坪，小径或道路)，在城市和远处的平野之间形成一道可怜兮兮的屏障。我们走进一道门，爬上狭窄的楼梯(电梯出了故障)，到了三楼，在那儿我看见了科斯特卡的名牌。当我们从门道走进主房间时，我愉快地看到角落里有一张宽大舒适的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安乐椅，琳琅满目的书籍，一架唱机，和一台收音机。

我赞扬了这布置，并问起浴室。“一点也不奢华。”科斯特卡说，对我的兴趣感到高兴。他引我回到门道，打开一扇门。这是一间小而舒适的浴室，浴缸、淋浴和脸盆样样俱备。“看到你这个好地方，使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说，“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做什么？”“很不巧，明天我要工作到很迟。”他歉意地回答，“我要到七点钟左右才回来。你晚上有空吗？”“也许有，”我回答，“不过你能把这个住处借给我一个下午吗？”

我的要求使他感到诧异，但他立刻(好象担心我会认为他不乐意)回答说，“我很高兴让你享用它。”接着，他审慎地试图避免猜测我的用意，加了一句，“如果你今晚需要一个地方睡觉，尽管留在这儿好了。我要到早晨才回来。不，甚至那时也不会回来。我会直接去医院。”“不，没有必要。我在旅馆有一个房间。问题是，旅馆房间不是很舒适，而明天下午我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当然。”科斯特卡说，垂下眼睛。“我也这样想。”他顿了一下，然后补充说，“我很高兴能够帮你忙。”又顿了一下：“提供它的确是一桩好事。”

然后我们在桌边坐下(科斯特卡倒了咖啡),聊了一阵(我试了试床,满意地发现它很结实,既不凹陷,也不吱嘎作响)。不久,科斯特卡说他该回医院去了,他很快教给我主要的家务事项:浴缸的龙头需要格外拧紧,与通常采用的程序相反,热水只有从标着C符号的龙头才能得到,收音机的插座藏在床下,食橱里有一瓶新开的伏特加。他给了我两把串在一起的钥匙,告诉我哪一把开楼房的大门,哪一把开他的寓所。在屡屡换床的一生中,我已养成一种对钥匙的个人迷信,于是我窃喜地把科斯特卡的钥匙揣进我的口袋。

在我们往外走时,科斯特卡表示希望他的寓所会有助于“一些真正美好的事。”“是的。”我说,“它会帮助我做一桩美好的毁灭工作。”“那么你认为毁灭会是美好的。”科斯特卡说。我暗自笑了,在他的反应中(不动声色地表达一个异议),认出了我十五余年前初次遇见的那个科斯特卡。虽然我喜欢他,但我也发现他有点可笑,于是我回答说,“我知道在上帝永恒的建筑工地上,你是一个温和的工作者,不喜欢听到有关破坏工作的事,但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恰恰不是一个上帝的泥瓦匠。喏,如果上帝的泥瓦匠修筑了真正的墙,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毁坏它们。但是我所看到的却不是墙,而是幕布,是布景。而布景是肯定能毁坏的。”

这番话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九年前)我们分手的地方。然而,这一次,我们的争论却带有一种明显抽象的性质:我们都十分清楚它的具体基本点,觉得用不着重申它们。我们只需注意我们改变得是多么少,我们彼此保留的不同是多么相似(尽管我必须说,正是我们的区别使我喜欢他,喜欢我们

的争论；我把它们作为一个检验我是谁，我在想什么的试金石)。但是为了明确阐明他的立场，他回答说，“就算你说得对，但是告诉我，一个象你这样的怀疑主义者怎么能如此肯定，他知道怎样区分一个布景和一堵墙？你难道没有怀疑过你所嘲笑的幻觉是幻觉吗？如果你错了怎么办？如果你如此起劲要毁坏的是真正的价值又怎么办？”他接着又说，“一个贬低的价值和一个没有标记的幻觉有着相同的可怜的外表。它们是同一的。没有比把其中一个当作是另一个更容易的了。”

我陪着科斯特卡穿过城镇回到医院去，在口袋里玩弄着钥匙，想到同一个随时随地，甚至此时此刻在穿过一个新村凸凹不平的路面时，愿意跟我开诚相见的老朋友一道回去是多么愉快。由于科斯特卡知道明天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待一晚上，他把奥妙的哲理探讨转到更现实的事情上：他想弄清楚我是否会一直等到他明日七点回来(他没有别的钥匙)，并问我是否真的没有别的事需要他帮忙。我用手摸着脸说，“只是要去一次理发店。”因为感到胡子拉碴的不爽快，“把这事交给我。”科斯特卡说，“我要让你得到第一流的修面。”

我接受了科斯特卡的好意，让他把我带到一个小理发店，里面有三把大转椅耸在三面镜子前。两把椅子占着人，头朝后仰着，脸上满是肥皂；两个穿白罩衣的女人俯身在她们上面。科斯特卡走到一个女人身边，附耳低语了几句，那女人在一块布上擦擦剃刀，对店后面叫了几声，又出来一个穿白罩衣的姑娘。新来的姑娘接过被丢开手的男人，那个与科斯特卡说话的女人朝我点点头，示意我坐到空着的椅子上。科斯特卡跟我握握手，他一走我就在椅子上坐下，把头朝后

靠在头枕上。由于多年的经历教会我不要瞧自己的脸，我避开直对着我的镜子，抬起眼睛，让视线游离在污渍斑驳的白色天花板上。

我凝视着天花板，感到那姑娘的手指把白布单塞进我的衬衫领里。然后她走回去，我只能听见剃刀在皮革上上下下滑动的声音。我沉浸在一种惬意的懒洋洋中。感觉到她那润滑的手指在我脸上涂抹肥皂，我冥想着被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如此轻柔地抚摸着，而她对我却毫无意义，我对她也毫无意义，这是多么奇特和可笑。接着（由于内心甚至在安宁时也从不停止恶作剧），我想象我是一个完全任凭那女人用剃刀摆布的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由于我的身躯已在空间溶解，我能感到的只是她的手指在我脸上触摸，我想象那双温柔的手捧着（转动，抚摸）我的头，就象它没有连结着我的身躯，就象它独立存在，而在旁边桌上候着的尖利剃刀只是为了使这种独立臻于完善。

然后这抚摸停止了，当我听到姑娘走回去，真的拿起剃刀时，我对自己说（由于我的内心还没有停止恶作剧），我一定得看看她长得象什么样子，这位我头颅的保管员，我温柔的暗杀者。我把视线从天花板移到镜子，顿时感到一股寒气透过脊梁：我正在玩的游戏已经突然地、可怕地变成了现实；那女人正在镜子里俯向我——我感到我认识她。

她用一只手按住我的耳垂，小心地用另一只手刮掉我脸上的肥皂；当我瞧着她工作时，一分钟前使我如此惊讶的影像开始慢慢溶化和消失。她俯在脸盆上，两只手指沿剃刀滑动抹去肥皂沫，重新直起身子，轻轻转动了一下椅子；我们

的眼光顿时又相遇了，我再次感到我认识她。的确，这张脸有点不同了，是一张老女人的脸：灰暗，憔悴，微微凹陷；但我已经十五年没有看见她了！在此期间，时光已在她真实的脸上添加了一个面具，但幸运的是，这面具的两个孔使她真正的眼睛，真实的眼睛露了出来，这正是我所认识的眼睛。

然后这残像重又变得紊乱了：一个新来的顾客走进来，坐在我后面傍着轮子；他开始同这位姑娘谈起话来，谈到这个美好的夏天，他们正在城外修建的游泳池；当她应答时（我注意她的声调胜过注意她的话，她的话毫无意思），我相信我认不出这声音；它听起来干巴巴的，神不守舍，漠不关心，几乎是粗声粗气；这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在她给我洗脸，用双手紧搓我的脸时（尽管她的声音很陌生），我开始再一次相信我认识她，十五年后她在这里，重又抚摸我，长久地轻柔地抚摸我（我已完全忘记她是在给我洗脸，不是在抚摸我）。她跟那位饶舌的顾客絮絮叨叨发出陌生的声音，可是我拒不相信它；我愿意相信她的手，从她的手认出她；我想要从她触摸的温柔程度来确定我是否认识她，她是否认出了我。

她拿起一张毛巾，擦干我的脸。那位饶舌的顾客正在为自己的一句戏谑而大声发笑，我注意到我的姑娘没有响应。也就是说，她可能没有听见他说的话。这使我兴奋：我觉得这是她认出了我，并受到震动的证明。我决定从椅子里一出来，就跟她说点什么。她从我脖子上拉掉罩布。我站起身，在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克朗的钞票。我等待着我们的眼光相遇，以便我能叫出她的名字（那位顾客还在絮叨着什么），

但是她把头转开去，很迅捷地，与己无关地接过钱，以致我忽然觉得自己象是一个被幻觉折磨的疯子，找不到勇气对她说点什么。

我感到万分丧气，离开了理发店。我所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能认出一张曾经亲切可爱的脸，这是一个极度冷漠的征象。

我匆匆回到旅馆（在路上我瞥见一个老朋友，雅罗斯拉夫，我们民间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但是我避开了他的眼光，就象在逃离他那响亮、急促的音乐一样），给科斯特卡打电话。他还在医院里。

“你让她给我修面的那姑娘——她的名字叫露西·塞贝特卡吗？”

“她现在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不过这正是她。你在哪儿认识她的？”科斯特卡问。

“哦，好多年了。”我回答，甚至也没有想到吃饭，我又离开了旅馆（天色正在转晴），开始在全城漫游。

第二章 海伦娜

1

今晚我想早点睡，也许我睡不着，但我想早点睡，巴威尔今天下午去了布拉迪斯拉发，明天一早我要飞到布尔诺，余下的路途乘公共汽车，小兹德娜有两天将要独自一人过，她不会在乎的，无论如何她并不太在意我们的陪伴，至少不在意我的陪伴，她崇拜巴威尔，巴威尔是她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他知道怎样控制她，他知道怎样控制所有女人，过去知道怎样控制我，现在仍然如此，这星期他又象以前一样，抚摸着我的脸，答应我从布拉迪斯拉发回来途中，在摩拉维亚停留，他说我们应该好好谈一下了，~~但他不是意识到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希望他是想回复原状，但是他为狂爱，定要等到现在，既然我已经遇到了卢德维克，噢，这一切是多么痛苦，但是不，我决不向悲哀屈服，但悲哀永远不要玷污~~

我的名字，正如伏契克所说，他的话是我的座右铭，甚至当他们折磨他，甚至在绞刑架的阴影下，伏契克也从不丧失信心，我才不在乎他现在合不合时尚，也许我只是一个白痴，但是他们就有时髦的怀疑态度也是白痴，我干吗不可以用我的愚蠢同他们的愚蠢交换，我不想让我的生活分裂为二，我愿意它始终一贯，这就是我对卢德维克如此坦率的原因；当我跟他在一起时，我无需改变我的理想和趣味，他十分正常，坦率，快活，对一切都很明确，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这正是我一直所喜欢的。

我并不为我的现状感到羞耻，我只可能是我的老样子，直到十八岁时，我所知道的全部生活只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布尔乔亚家族的秩序井然的寓所，还有功课，功课，功课，我几乎脱离了真正的世界，当我四九年来到布拉格时，那就象一个奇迹，我是那样快活，我永远不会忘记它，这就是我决不能把巴威尔从我心头抹去的原因，即使我已不再爱他，即使他伤害过我，不，我不能，巴威尔就是我的青春，布拉格，大学，集体宿舍，伏契克歌舞团的大部分人，如今已没有人知道它对我们的意义了，正是在那儿我遇到了巴威尔，他唱男高音，我唱女低音，我们举办了上百场音乐会和表演，我们唱苏联歌曲，唱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歌曲，当然还有民歌，我们喜欢那些最优秀的民歌，我是那样地爱上了摩拉维亚民歌，它们成了我生存的主旋律。

至于我怎么爱上了巴威尔，我现在决不能告诉任何人，它就象一篇童话故事，解放一周年纪念日，在旧城广场举行了一次大示威，我们团也在那里，我们一伙到处走，几万人

中的一小群，检阅台上坐着各种各样重要的政治家们，捷克的和外国的，传来了各种各样的讲话和欢呼，然后陶里亚蒂^①本人走到麦克风前，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话，整个广场象，刚才一样报以欢呼、鼓掌和喊口号，我听见巴威尔在人声喧哗中自顾自地高嚷着什么，好象有点与别人不一样，当我盯着他的嘴唇时，我意识到他是在唱歌，更确切点说，是在尖叫着一首歌，他试图让我们听见他，加入他，他在唱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在当时十分流行：
Avanti popolo, a la riscossa, bandiera rossa, bandiera rossa……^②

这正是十足的巴威尔，他从不满足于独自的感受，他一定要撩起人们的情绪，这是多么美妙，我想，在一个布拉格的广场上，以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向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领袖致敬，我非常希望陶里亚蒂象我一样被感动，于是我尽量大声地加入了巴威尔的歌声，其他人也加入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我们，到最后整个歌舞团都唱起来，但是欢呼声太大，我们不过是一小群，与至少五万人的他们相比，我们只有五十人，这个差异太悬殊了，我们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因为我们心想，整首歌曲的第一节我们不会成功，我们的歌声不会被人听到，可是接着一个奇迹发生了，渐渐地，更多的声音开始唱了起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歌声慢慢升起在广场的人声鼎沸之上，象一只蝴蝶从一个嗡嗡作响的巨大蛹里钻出来。最后，这蝴蝶，这歌声，或至少这

① 陶里亚蒂(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领袖。

② 意大利语；大意是，让我们高举战斗的红旗前进。

最后几小节，飞向了检阅台，我们热切地注视着那位意大利人发白的脸，当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他挥了挥手，表示听到了这歌声时，我们高兴极了，我敢肯定，尽管我离得太远不能辨清，我肯定我看见了 he 眼里的泪花。

在极度的热情和兴奋当中，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突然抓住了巴威尔的手，他也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当这一切平息下去，另一个讲话人走到麦克风前时，我担心他会松开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们直到示威结束始终都拉着手，甚至后来也没有松开，人群散去了，我们一连几小时在春意盎然的布拉格街头漫步。

七年以后，当小兹德娜五岁时，我永远不会忘记，巴威尔告诉我说，我们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我们是由于党的纪律而结婚的，我知道这是他在一次气头上说的话，我知道这是一句谎话，巴威尔是为了爱情才和我结婚的，他直到最近才改变，但说这样的话仍然是多么可怕，他不就是那种人吗，总是告诉每一个人，现在爱情不同了，爱是战斗中的支持而不是对世界的逃避，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如此，我们甚至腾不出时间吃饭，带上两个干卷饼去共青团办公室后，我们也许整天不再见面，我常常要等巴威尔到半夜，这时他才从那些没完没了的、六小时、八小时的会议中回到家里，在我空闲时，我抄下他在各种会议和政治培训班的发言，他对它们非常重视，只有我知道政治表现的成功对他是多么重要，在消除公众生活与私生活的区别方面，他从不厌倦地反复说新人与旧人不同，而现在，多年以后，他却抱怨道那时同志们总是干涉他的私生活是多么落后。

我们恋爱了将近两年，我变得有点不能忍受了，不足为奇，没有一个女人能永远满足于热恋，巴威尔十分满足，他喜欢这种不必承诺的便利，每个男人都具有自私的德行，女人应该为了自己和她作为女人的天职站起来，不幸的是，巴威尔较之我们团的其他人，尤其是跟我亲近的几个姑娘在这个问题上更少一致，她们同别人谈过一次，结果是她们在委员会面前指责了巴威尔，我不知道她们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事，但是她们准是对他有点粗暴，在那些日子里，道德是相当严格的，人们的确做得过分了点，但是，在道德上做得过分也许比我们现在这样道德败坏要好得多。巴威尔很长时间不搭理我，我觉得我把一切都毁掉了，我很绝望，我打算自杀，但他后来又回心转意了，噢，我的膝盖抖得多厉害，他要我原谅他，并给了我一个上面刻有克里姆林宫的项链垂饰，这是他最珍贵的财物，我从未把它解下来过，何况它不只是一个巴威尔的纪念品，我快乐得流出了眼泪，两星期后我们结了婚，全团的人都来参加婚礼，又唱又跳，几乎闹了一天一夜，我告诉巴威尔，如果我们互相背叛了，那就等于背叛了婚礼上的每个人，背叛了旧城广场示威中的每个人，包括陶里亚蒂，当我回顾我们终于背叛了的一切时，我不由得感到好笑……

2

让我们想想，我明天穿什么好，那件粉红色的毛线衫，那件塑料雨衣，它们最能显出我的身材，我没有过去那样苗条了，但我还有某种东西来弥补这些缺陷，某种年轻姑娘们

所没有的东西，一个完全成熟的生命的魅力，把金德雷吸引到我身边的正是这一点，这个可怜的孩子，当我告诉他，我将乘飞机而他得单独走时，我仍能看见他脸上的失望神情，他为每分钟都能和我在一起，并显耀他那十九岁的男子气概而感到幸福，仅仅为了给我留下印象，他会打破所有速度记录，噢，他长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他的技术不错，是一个出色的驾驶员，电台里的人都喜欢带他去干不重要的工作，为什么不呢，知道周围有人喜欢我总是很惬意的，这几年我在台里特别不受欢迎，人们称我是一个持强硬路线者，一个狂热分子，一个教条主义者，一个党的警犬，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但是他们决不会使我因热爱党，把我的余暇全都献给党而感到羞耻。我还能为了什么而活着？巴威尔有别的女人，我甚至都不愿再调查他们，小兹德拉崇拜他，十年来我的工作完全是例行公事，特辑，采访，计划完成的纲要，模范谷仓和模范挤奶女工，在家里的处境是无望的，只有党从未损害过我，我也从未损害过党，甚至在几乎所有人都企图背弃它的日子里，在五六年人人都在议论斯大林的罪行时，当时人们变得放肆起来，开始否定一切，说我们的报纸谎话连篇，国营商店毫无益处，文化衰退，农庄决不应该集体化，苏联没有自由，最糟的是，甚至共产党员也到处这样讲，在他们自己的会议上，巴威尔也这样讲，而且他们全都为他鼓掌，巴威尔总是在受到赞扬，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开始了，他是一个独子，他母亲把他的照片放在她的床头，她的神童，小时了了可大却未佳，他不抽烟，不喝酒，但他没有赞扬就不能活，这是他的酒精和尼古丁，在这个拨动人们心弦的新机

会中，他是何等兴奋，他如此动感情地讲到那些可怕的司法凶手，以至于人们光是哭泣，我可以断定他是多么欣赏他的义愤，我恨他。

幸亏党严厉谴责了这些兴风作浪者，当他们安静下来时，巴威尔也安静下来了，他并不想在马克思主义上面以大学舒适的讲师职位去冒险，但某种东西却留了下来，一种冷漠、怀疑和令人担忧的病菌，一种悄悄地、秘密地繁殖的病菌，我不知道怎样反击它，我只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依靠党，党几乎象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我可以告诉它所有最隐秘的思想，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巴威尔或别的什么人已无话可说，其他人也不喜欢我，当我们不得不处理那件讨厌的事情时，这一切全都显露了出来，我在台里的一个同事，一个已婚男人，同技术科的一个姑娘有暧昧关系，这个姑娘单身，不负责任，玩世不恭，他的妻子在绝望中转向我们的党委求助，我们花了几个钟头调查这案子，我们会晤了那个妻子，那个姑娘，单位里各方面的证人，我们试图让事情获得妥善圆满的解决，并且做到完全公正，那个男的受到了党内处分，姑娘受到了警告，两人都向党委保证不再互相见面。不幸的是，他们言行不一，他们同意断绝关系只是为了让我们安静下来，实际上却偷偷地继续见面，可是事实总会暴露，我们很快就察觉了这事，于是我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我提议应把那个男人开除出党，因为他故意欺骗和损害党，说到底，如果他对党说谎，他算什么共产党员，我恨撒谎，但是我的提议未获通过，那个男人由于另一个惩戒而未受处罚，至少那姑娘不得不离开台里。

为此他们把怨恨发泄在我身上，他们使我显得象一个怪物，一个野兽，这是一个十足的诽谤运动，他们开始探听我的私生活，而这正是我唯一致命的弱点，没有一个女人能过毫无感情的生活，如果她能够，那她就不会是一个女人，那么干吗要否定它呢？由于在家里没有爱，我就在别处寻求它，不是我发觉了什么，而是他们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斥责我，说我是个伪君子，试图使他人因婚姻破裂而当众受辱，试图驱逐、开除、毁灭他人，而我自己却一有机会就对丈夫不忠，这就是他们在会上说的，在背后他们甚至更加恶毒，他们说，我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仿佛他们看不到我对别人如此苛刻的唯一理由是，我知道一个不幸的婚姻意味着什么，使得我这样做的不是恨，而是爱，对爱的爱，对他们家庭的爱，对他们孩子的爱，我想要帮助他们，我也有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我为他们担忧！

虽然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我确是一个怀有恶意的老巫婆，人们应该自由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有权把鼻子伸到他们的私生活中去，也许我们所设想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完美，我的确是一个卑鄙的政委，爱管别人的事，但是我做事就是这样，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行事，现在这已经太迟了，我一贯相信人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只有小布尔乔亚才把自己虚伪地分成公众的我和私下的我，这就是我的信条，我从来都是据此行事，哪一次也绝不会例外。

至于说我怀有恶意，我十分愿意承认我不能忍受那些年轻姑娘，那些小淫妇，她们对自己和青春如此自信，对年纪大的女人如此缺乏同情，她们有一天也会三十岁，三十五岁，

四十岁，我不想听什么她爱他的话，她懂得什么爱情，她会和任何男人在头一夜就睡觉，毫无禁忌，毫无羞耻感，啊，当他们把我比作这样的姑娘时，我感到屈辱，因为我，一个已婚女人，虽然有过几次风流韵事，但区别在于我始终在寻求爱情，如果我看错了人，如果我没有找到它，我总是厌恶地转身走开，去别处瞧瞧，尽管那样会简单得多，忘掉我少女般的爱情之梦，忘掉它们并越过这道界限进入那畸形自由的领域，在那儿羞耻、禁忌和道德都不复存在，那无耻、畸型的自由，在那儿一切都是允许的，唯一最强烈的力量是男人心中野兽般的性冲动。

可是我知道，如果我越过这道界限，我将不再是我自己，我会成为另一个人，我不知道会是谁，我对这可怕的变化感到恐惧，因此我一直在寻求爱情，不顾一切地寻求爱情，一个我恰好能接受的爱情，带着我全部的旧梦和理想，因为我不愿意我的生活分裂为二，我想要它始终保持统一，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们见面时，你使我惊喜万分的原因，卢德维克，亲爱的，亲爱的卢德维克……

3

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时的确非常有趣，他甚至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立即着手工作，说明为了那篇报道，我需要从他那里了解什么，以及我怎样描述那个结果，但是，当他开始对我说话时，我突然感到迷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他注意到我很不自在，便立即换了更平常的话题，问我是否已经结婚，我有没有孩子，我在哪儿度假，说我看上去

多么年轻，多么漂亮，他真好，他想使我不要怯场，我想到我见过的所有好吹牛的人，他们从不让你插话，与卢德维克不能相比，巴威尔总是一味谈他自己，但是这的确有趣，我和他在一起待了整整一个小时，竟不比来时更加了解他的基本准则，一回到家我立即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可是这完全不对，也许我很高兴，这给了我一个借口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肯赏光读读我写的东西。我们在一个咖啡馆会面，我的报道只有可怜巴巴的四页长，他读了一遍，对我殷勤地笑笑，说它写得好极了，他从开头就分明表现出他对我作为一个女人比作为一个记者更感兴趣，我不能肯定是感到了恭维还是侮辱。可他确实对我很好，我们互相理解，他不是所谓的书呆子类型，他们实在让我倒胃，他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他甚至曾在矿井工作过，这正是我真正喜欢的那种人，我告诉了他。但最使我激动的是，他是摩拉维亚人，他甚至在一个辛巴隆乐队演奏过，我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就象再次听到了我生命中的主旋律，看到我的青春从阴影中复返，我的整个心都向着他。

他问我整天做些什么，当我告诉他时，他说（我还能听见他的声音，半开玩笑半带同情），这决不是你这样的人过的生活，该改变一下了，他说我应该翻开新的一页，把更多的时间献给生活的欢乐。我告诉他这对我太对了，欢乐一直是我的一部分信条，没有比今天的怨恨和厌倦更让我憎恶的了，他说信条并不意味着是一个行为，那些从屋顶上高呼欢乐的人往往是最悲伤的人，啊，多么真实，我真想叫起来，接着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点也不兜圈子，明天四点钟他将在

电台前面接我，我们一块开车去乡间。可我是一个已婚女人，我反对说，我不能就和一个陌生男人跑到树林里去，卢德维克开玩笑地回答说，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学者，但当他这样说时他显得是多么悲伤！看到他这样，我浑身感到发热，多么快活，他想要我，在我提醒他我已结婚后他越发想要我，因为这使我更难到手，男人们最渴望他们认为难到手的东西，我吮下他脸上的全部悲伤，意识到他爱上了我。

第二天我们听到伏尔塔瓦河在一边呢喃，看见森林在另一边陡然升起，这一切是多么浪漫，我喜欢生活浪漫，我敢说我的举动就象一个傻丫头，同一位有个十二岁孩子的母亲也许不相称，可是我不能自己，我又笑又跳，把他拉在我身边，当我们停下来时，我的心怦怦乱跳，我们面对面站着，卢德维克微微俯下身，给了我一个轻轻的吻，我挣脱开他，但接着又抓住他的手，重新开始奔跑，我的心脏时时有点不适，经过一番最轻微的努力，它开始狂跳起来，我必须跑上一段阶梯，于是我放慢了一点，以便缓过气来，蓦然我听见自己在哼着我最喜爱的歌曲的头两节，啊，我们的花园里，阳光多明媚……感觉到他听出来了，我开始放声唱起来，毫无羞赧，我感到岁月、忧郁、悲伤、上千个灰色鳞片从我身上脱落下来，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小客店，吃了一些面包和香肠。一切都很平常普通，粗暴的服务员，脏污的桌布，可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冒险，我对卢德维克说，你知道我要去摩拉维亚三天，搞一个“国王们的骑马”的特别节目吗？他问我在摩拉维亚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说那是他的家乡，又一个巧合，这使我惊喜万分，我要腾出一些时间跟你一起去，

他说。

我有点怕，我想到了巴威尔，想到了他在我心里燃起的希望火花，我并不对我的婚姻抱玩世不恭的态度，我打算尽力挽救它，只要是为了小兹德娜，不，这不是事实，主要还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过去，为了我青春的回忆，但是我没有力量拒绝卢德维克，我恰恰没有力量，现在木已成舟，兹德娜已经睡了，我感到害怕，此时此刻，卢德维克正在摩拉维亚，明天当我乘坐的公共汽车到站时，他将在那儿等候我。

第三章 卢德维克

1

是的，我信步漫游。我在横跨摩拉瓦河的桥上停了一会儿，凝视着下游。多么丑陋的河（这样褐，看上去就象粘土而不象水），它的堤岸多么令人压抑：一条有五幢呆头呆脑平房的街道；每一幢都象一个畸形的孤儿单独坐落在那里；显然它们原是为了组成一个宏大整体的胚胎，但是它后来却没有任何下落了；两幢房子装饰着陶瓷天使和水泥小浮雕；不用说，它们雕刻粗陋，破碎不堪；天使们失去了翅膀，浮雕许多地方已经剥落得露出砖头，弄不清它们的意思。在孤儿似的房子那边，街道渐渐消失在一排铁塔和高压线中，然后是散布着几只鹅的草地，最后是田野，无边无际的田野，田野伸展到不知道的地方，田野掩饰了摩拉瓦河粘滞的褐土。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呈现它们自身形象的倾向，这个看法（我从童年起就知道了这点，但它当时对我毫无意义）突然使我想起俄斯特拉发，一个到处是废弃的房子，肮脏的街道显得空荡荡的矿城，那宽大、低廉的寄宿舍。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就象一个机枪流弹的靶子立在桥上。我不忍继续瞧那条有五幢孤寂房屋的愁眉苦脸的街道，因为我不忍想到俄斯特拉发，于是我转过身，开始往上游走去。

我沿着堤岸上一条小路走去。小路的一侧是一排粗大的白杨，右边丛生的杂草向水面倾斜，河的对岸，坐落着一些仓库、工场、几个小工厂的院子；小路的左侧，在树的那一边，有一堆散乱的垃圾堆，再远些，旷野被更多的铁塔和高压线遮断。走在这条小路上，我感到自己在通过一座宽阔水域上的小桥。如果我把这个景致比作一片水域，这是因为，首先，它使我战栗，其次，我时常处在坍塌的小路边缘。我十分清楚这景致梦魇般的幻觉效应不过是遇见露西之后不愿回忆的往事的隐喻；我似乎把压抑的回忆投射到周围看见的一切中去了：田野、院落和仓库的孤寂，河流的阴沉，以及与风景相协调的弥漫的寒气。然而我明白我无法逃避那些回忆；它们围绕着我。

2

那些给我带来最初的大灾难的事件（我与露西的相识，就是它无情干预的一个直接后果），也许可以用一种超然的、甚至轻松的语调来描述：这全都要追溯到我对愚蠢的玩笑那种不幸的嗜好，以及玛格塔对理解任何玩笑的那种不幸

的无能。玛格塔是那种把一切都看得很认真的女人（这使她完全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人）；她天生的主要才能就是容易轻信；此刻，我并未把轻信用作愚蠢的委婉语；一点也不：她比较活泼，而且很年轻（十九岁，大学一年级学生），因此她那信任一切的天真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可爱，事实上伴随着这种天真的是一种自然本性的不可否认的可爱。大学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她，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认真地对她下过功夫，这并没有使我们（至少其中一部分人）放弃文雅地、全然无害地跟她开玩笑。

但是，就玛格塔的反应而言，那类玩笑都开得不是很成功，没有说出一点时代精神。那是1948年2月以后的头一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一种真正崭新和不同的生活，它的种种特征——它们铭刻在我记忆里——是严肃而庄重的。奇怪的是那些特征的严肃性却构成了一种笑的形状，而不是皱眉蹙额的形状。是的，那些年头告诉世界，它们是最灿烂的岁月，任何不会欢乐的人都会突然被怀疑是在悲叹工人阶级的胜利，或者（这同样是犯罪）是在向个人主义的内心悲伤屈服。

我不但没有内心悲伤的负担，而且有幸具有相当多的玩笑感。尽管如此，我却不能说我具有欢乐的时代特征：我的玩笑感太轻浮。不，流行的欢乐没有嘲讽和恶作剧；正如我说过的，它是一种高度严肃的种类，所谓胜利阶级的历史乐观主义，一种庄严和禁欲的欢乐——简单说，一个大写的欢乐。

我记得那时我们全都被组织成“学习小组”，在一起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对每一个成员做出正式评语。象那

个时代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我有许多职务（我在学生会里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而且，由于我还是一个优等生，我颇可以指望得到一个积极的评语。如果对于我对祖国的忠诚，我的努力工作，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的群众鉴定通常是如下这句话“有个人主义的表现”，我是没有理由惊慌不安的；甚至在最积极的评语中也惯常包含一些批评意见，责备某个人“缺乏对革命理论的兴趣”，另一个人“缺乏对人际关系的热情”，第三个人“缺乏谨慎和警惕性”，第四个人“缺乏对妇女的尊重”。但是，这样的评语一旦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当它与另一个因素联系起来，或者当我们跟一个同事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怀疑和攻击），那些“个人主义的表现”，那些“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就可能播下毁灭我们的种子。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党员档案中都装着最致命的种子；是的，我们每一个人。

有时（玩笑多于认真）我针对个人主义的指责为自己辩护。我要求我的同事们向我证明，我为什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由于缺少具体的证据，他们总是说，“因为你的举止象一个个人主义者。”“我的举止怎么啦？”“你有一种奇怪的笑。”“那我怎么办？这是我表达欢乐的方式。”“不，你的笑象是你在思考自己。”

当同志们在我的举止和笑容上打上知识分子（那个时代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的标记时，我真的相信了他们。我不能想象（我没有大胆到竟敢想象）大家会错，革命本身、时代精神会错，而我个人会是对的。我开始监视我的笑，很快我就感到在我原来的人和应该成为（按照时代精神）及

试图成为的人之间出现了一点小裂缝。

然而，哪一个是真正的我？让我十分坦率地说：我是一个多面的人。

这些面孔不断增多。大约在夏日前一个月，我开始接近玛格塔（她就要读完第一学年，我读完第二年），象所有二十岁的青年，我试图戴上一副面具，故作老成（在思想上和经验上），以便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做出一副超然和冷淡的神气；我假装有一层特别的外壳，看不见，穿不透。我认为（很正常地）我会靠玩笑确立起我的超然，但尽管我一直擅长它，我对待玛格塔的举止却似乎总是不自然的，做作的，令人生厌的。

谁是真正的我？我只能重复说：我是一个多面的人。

在会上我认真、热烈，有所约束；在朋友们中间——一个挑逗的多嘴的人；和玛格塔在一起时——玩世不恭，妙语横生；独自一人时（以及想到玛格塔时）——对自己不能确定，象一个中学生那样激动。

最后那副面孔才是真正的面孔吗？

不。它们都是真的：我不是一个伪君子，有着一副真面孔和几副假面孔。我有几副面孔因为我年轻，不知道我是谁，或想要成为谁（我因一副面孔和其它面孔之间的不同而感到害怕；它们好象都不太适合我，我笨拙地在它们中间摸索着走）。

爱情的心理和生理机制是如此复杂，以致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年轻人必须在生活中集中全部精力去理解它们，并且常常忽略他那情欲的对象；他所爱的女人（在这点上他颇

象一个年轻的小提琴手，直到演奏所需要的技巧自动到来，他才能全神贯注在一首乐曲的情绪内容上)。由于我已说到我对玛格塔中学生般的迷恋，我应当指出，我所感觉到的激动与其说是由于我在恋爱，不如说是由于我那尴尬的缺乏自信；它沉重地压迫我，对我的思想和感觉施加的影响比玛格塔本人还要大得多。

为了减轻我窘迫的负担，我夸耀我的知识，一有机会就跟她意见不合，取笑她的所有看法。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尽管她有头脑（而且美丽，象所有的美一样，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气息），她仍是天真单纯，信任一切的。她生性就不能看到事物的背后，她只能看到事物本身；她对植物学很有悟性，但往往不能理解一个同学开的玩笑；她让自己沉浸在时代的狂热中，但当面对一个根据结果证明方法正确的原则的政治行动时，她却总是象听到一个玩笑那样困惑不解。因此，同志们决定她需要以革命运动的战略战术的具体知识增强她的热情，并在暑假送她去参加一个两星期的党员培训班。

培训班显然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本来打算同玛格塔一起在布拉格单独度过这两个星期，以便使我们的关系（到那时为止，这关系只是包括散步，谈话和几个接吻）进入一个更加具体的状态，而且由于这是我唯一的两个星期（我下四个星期要在一个学生农业队度过，并得到允许在最后两个星期去摩拉维亚看我的母亲），因此当玛格塔不仅不分担我的情绪，没有显出一点懊恼，甚至还告诉我她盼望着它时，我的反应既痛苦又妒忌。

从培训班（它在中波希米亚的一个城堡举办）她寄给我

一封信，这正是十足的玛格塔，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诚挚的热情。全都是那样新奇：早晨的健美体操、谈话、讨论，甚至他们唱的歌；她赞扬充溢着那儿的“健康气氛”，还不厌其烦地加了几句，大意是西方的革命不久就会到来，等等。

我的确很赞同她的话；我甚至相信西欧即将发生一场革命；只有一样事我不能接受：面对我的情欲她那幸福快活的情绪。于是我买了一张明信片（为了伤害她，使她震惊，使她慌乱），写道：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气氛有股愚昧的臭气！托洛斯基万岁！卢德维克。

3

玛格塔对我那挑衅性的明信片的回答是一封简短而俗套的便笺，并对我暑假寄给她的其余信件不予答复。我正同我的学生队一起在山里叉干草，玛格塔的沉默对我来说是很难忍受的。我几乎每天都给她写信，信中全是恳切悲哀的迷恋之辞：在这个暑假的最后两个星期，我们能不能至少看到彼此间的一些什么，我恳求她；我愿意放弃回家去看我那可怜的孤单的母亲；只要和玛格塔在一起，我愿意去任何地方。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爱她；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是我视野里唯一的女人，我发现没有姑娘的男孩的状况是无法忍受的。但是玛格塔没有给我回信。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八月间回到布拉格，我设法在她家里截住她。我们象往常一样，沿着伏尔塔瓦河散步，穿过帝国草坪（一个忧郁的白杨岛屿和荒芜的游乐场），玛格塔不但声称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改变，而且行为照旧。问题

是，这一切僵硬、坚决的相同（相同的接吻，相同的谈话，相同的微笑）给人的压抑胜过了我的极度恐惧。当我问第二天能否能见到她时，她叫我打电话，定一个时间。

我果真打了电话；一个不熟悉的女人声音告诉我，玛格塔已经离开了布拉格。

我闷闷不乐，就象一个没有女人的二十岁人，一个很少懂得性爱短暂而笨拙的交锋，老是一心想着它的相当腼腆的年轻人那样。那几天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漫长和无聊；我不能看书，不能工作，一天看三场电影，一场接着一场，只是为了消磨时间，为了压抑住我体内深处发出的夜猫子的枭鸣。虽然由于我处心积虑的企图，玛格塔总认为我是一个沉湎女色的登徒子，但我却不能鼓起勇气同在街上走路的姑娘们说话，她们美丽的大腿使得我内心作痛。

因此，当九月份终于到来时我真高兴，又要开始上课以及（开学前几天）应付学生会的工作了，在学生会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各种各样的事可以使我忙个不停。然而，在我回来的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召我去区党委办公室。当时的一切我还记得非常详细。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我走出学生会楼时，我感到整个夏天一直折磨着我的痛苦都渐渐消散了。我怀着一种惬意的好奇感动身。我摁了铃，校党委主席把我让进屋。他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有着一头金发和一双冰冷的蓝眼睛。我向他致以当时标准的党员问候：“劳动光荣”，但他没有回答，而是说，“马上往回走。他们在等你。”在最后一个房间，我又看到了三个党委成员。他们叫我坐下来。

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认不认识玛格塔。他们问我是不是一直在跟她通信。我说是的。他们问我是否记得我写的东西。我说不记得了。但那张带有挑衅性文字的明信片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不能回忆起什么吗？他们问。是的，我说。好吧，那么，玛格塔给你写了些什么？我耸耸肩，表示她写的是我不可能当众谈论的私事。她没有写有关培训班的事吗？他们问。写了，我说。她说了些什么？她说她喜欢那里，我回答。还有呢？说谈话挺有益，我回答，还有小组的风气。她谈起过健康的气氛很盛行吗？是的，我说，我想她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她提到她正在发现乐观主义的力量吗？是的，我说。你对乐观主义怎么看？他们问。乐观主义？我问。呃，没什么特别的看法。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他们继续问。当然，我不安地说。我喜欢快乐的时光，快乐的笑，我说，试图缓和这种讯问的语气。一个虚无主义者也喜欢快乐的笑，其中一个人说。他嘲笑受苦的人民。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也喜欢快乐的笑，他继续说。你认为没有乐观主义能建设社会主义吗？另一个人问。不能，我说。那么你是在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人说。你是什么意思？我抗议道。因为你认为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他们说，开始发起进攻。人民的鸦片？我采取守势问。不要企图回避这个问题。这就是你所写的话。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你却认为我们的乐观主义是鸦片！这就是你写给玛格塔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突击手，如果得知激励他们去超额完成任务的乐观主义是一剂鸦片，他们会说什么。另一个人加了一句，

对一个托洛斯基分子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只不过是一剂鸦片。而你就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天哪，你怎么能这样想？我抗议道。你写了还是没有写？我也许写了一些玩笑话，可那是在两个月前，我记不得了。我们很乐意让你重新记起，他们说，于是大声给我朗读我的明信片：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气氛有股愚昧的臭气！托洛斯基万岁！卢德维克。这些话在小小的党委办公室听起来是那样可怕，吓得我呆若木鸡。我意识到它们有一种我无力抗拒的毁灭性力量。可是，同志们，这只是开玩笑，我说，知道他们不可能相信我。你们觉得好笑吗？一个同志问其他两个。他俩摇摇头。你们得了解玛格塔，我说。当然了解，他们回答。那么你们看不见吗？玛格塔对什么事都很认真。我们常常对她开一点玩笑，试图吓唬吓唬她。挺有趣，一个同志应道。你的其它信件并未显出你对玛格塔不认真。你是说你们已看了我给玛格塔的全部信件？因此，你取笑玛格塔的理由，另一个人说，是她对什么事都很认真。那告诉我们，她对什么很认真？象党，乐观主义，纪律这类事，对吗？这些都是使你好笑的事？要知道，同志们，我说，我甚至记不得写过这几句话，我准是匆匆忙忙就写下来了，这只是几个句子，一个玩笑，我都没有再想一下。如果我怀有什么恶意，我不会把它寄到一个党员培训班！你怎么写的这无关紧要，你写得很快还是很慢，在你的膝盖上还是在书桌上，你只能写出你的内心话。没有别的。要是你把事情想一遍，你也许不会写它。事实上，你写出了你的真实感受。事实上，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了。我们知道你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对着党，一副面对

着这个世界的其余部分。我感到我已理屈词穷，反复申说那些个老理由：这全是在开玩笑，这些话没有任何意义，我当时的情绪应受谴责，等等。我完全失败了。他们说我在一张公开的明信片上写了我不得不说的话，正是为了给那儿的每个人看的，我的话具有一种不能以当时的情绪来解释过去的真实意义。接着他们问我读了多少托洛斯基的书。一本也没有，我说。他们问我是谁借给我这些书的。谁也没有，我说。他们问我会见过哪些托洛斯基分子。一个也没有，我说。他们告诉我，他们要解除我在学生会的职务，立即生效，并要我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他们。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他们。然后他们说，我的问题将由自然科学部党组织按照党员标准给予处理。他们站起来，也不看我。我说了“劳动光荣”，然后离开了。

后来，我想起我在学生会办公室有许多东西。我的办公桌抽屉里有私人文件，还有袜子，在食橱里还有一块啃了一半的朗姆蛋糕，是从我母亲在档案材料旁边的炉子里烘出来的。虽然我刚把钥匙交给了党委，可楼下的看门人认识我，给了我房间钥匙，它和别的钥匙都挂在一块木板上。我记得一切，直到最末的细节：这钥匙用结实的细绳系在一块小木板上，上面用白色漆着我的办公室号码；我开了门，在办公桌前坐下；我打开抽屉，把我的东西取出来；我慢慢吞吞，心不在焉；在这段短暂的较安静的时间里，我极力想面对我所发生的事，对此我应该怎么办。

不一会儿，门开了，进来三个党委办公室的同志。这次他们一点也不冷淡和克制；这次他们的嗓门大而激动，尤其是

其中最矮的那个负责党员干部的行政人员。我怎么到的这儿？他厉声对我说。我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我想要他让保卫人员把我拉走吗？我在办公桌抽屉里乱翻什么？我告诉他我是来拿朗姆蛋糕和袜子的。他说，我根本没有权利在这儿，即使这地方到处都是我的袜子。然后他走到办公桌前，仔细检查里面的一份份文件，一本本笔记本。由于它们的确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他终于允许我把它们放在一只手提箱里，而他在一旁看着。我把它们同肮脏、褶皱的袜子一起塞进去，然后用垫在食橱里接碎屑的油腻纸把朗姆蛋糕包起来，设法塞进手提箱。他注视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当我离开时，他的临别之言是：别再在这儿露面。

刚从区党委同志们的咒语中解放出来，从他们审讯的不可战胜的逻辑中解放出来，我就感到我是无辜的，我的话里决没有如此可怕的东西，最好是去找同玛格塔很熟的人，我可以信赖的人，会告诉我整桩事全属荒唐的人谈。我探访了一个同学，一个共产党员，当我把这桩事从头至尾告诉了他时，他说区党委素以固执己见、一本正经而出名，他了解玛格塔，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我去访晤的这人叫泽曼尼克，他即将担任自然科学部的党小组主席，并且非常了解我和玛格塔。

4

我一点也不知道泽曼尼克已被选为党小组主席，这似乎是运气；事实上，我不仅很熟悉他，而且我相信，仅仅由于我的摩拉维亚背景，他也会持同情态度的。泽曼尼克喜欢唱

摩拉维亚民歌，那时唱民歌是很时髦的，当然不是象小学生那样唱，而是扯开喉咙唱，一只手臂还伸向上方，说得更精确些，身着那些平民的装束，他们的父母刚离开舞场就把他们生在辛巴隆琴下的那些平民的服装。

作为自然科学部唯一一个真正的摩拉维亚人，我获得了某种特权：在每一个特殊的场合，开会，庆祝活动，五·一节，我都被邀请拿起我的单簧管，加入到由我同学中两三个业余爱好者临时凑成的摩拉维亚乐队。两年来，我们三个（单簧管、小提琴和低音提琴）总是行进在五·一节游行队伍里，而泽曼尼克，这个长相漂亮，喜欢成为人们注意中心的人，穿上借来的民间服装，加入到我们中间，载歌载舞，手臂在空中挥动。尽管他生长在布拉格，从来没有踏进过摩拉维亚，可他却喜欢扮演乡村青年，我不由得挺喜欢他。我很高兴，我生长的那个地区远古以来一直是民间艺术的乐园，它的音乐如今是那样受到欢迎，那样被人赞美。

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泽曼尼克了解玛格塔。我们三人经常参加同一个学生集会。有一次（当时我们有一大群人），我编造了一个生活在捷克山区里的矮人部落的故事，从一篇据称专门研究这一题目的学术论文中引用了一些话来予以证明。玛格塔因从未听说过这些部落而感到大为惊奇。这并不值得奇怪，我说。资产阶级学术故意隐瞒了这些矮人的存在，因为他们被资本家当作奴隶任意买卖。

但是，应该有人把这件事公诸于世！玛格塔叫道。为什么人们不写它？它将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事实！

没有人写它的原因也许是，我忧郁地说，这桩事相当微

妙。你知道，那些矮人有非同寻常的性爱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需求量很大，为什么我们的共和国要输出他们以换取硬通货，尤其是把他们输往法国，在那里他们被人老珠黄的资本家太太们雇来当佣人，尽管他们明明是被用作完全不同的目的。

其余的人忍俊不禁，这不完全是由于我诙谐的虚构，更是由于玛格塔聚精会神的表情，她赞成（或反对）正在谈论的这个问题的热情；他们咬住嘴唇，以便不扫玛格塔学到新东西的兴致，他们中一些人（特别是泽曼尼克）还加入进来，进一步证实我对矮人的讲述。

我记得，当玛格塔问起那些矮人象什么模样时，泽曼尼克带着一副坦率的神情告诉她，塞丘雷教授，这位玛格塔和在场的人有幸经常看到在讲台上的人，就属于矮人血统，也许他的父母双方都是矮人，但有一方是矮人则是确切无疑的。泽曼尼克宣称是从塞丘雷的助教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这位助教曾经与教授和教授夫人在同一个旅馆度过了一个夏天，他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教授夫妇加在一起还没有十呎长。一天早晨，他不知道他们还在睡觉就走进了他们的房间，他惊奇地发现他们不是肩并肩地躺着，而是头对脚地躺着：塞丘雷教授蜷在床的下半端，教授夫人蜷在床的上半端。

是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说，这太清楚不过了，塞丘雷教授和他夫人都有矮人血统。头对脚睡觉是那个地区所有矮人的遗传习俗，古时候，他们把自己的棚屋修在长方形的地址上，而不是修在圆形或正方形的地址上，因为不仅丈夫和妻子，而且整个家族都成一长串地睡在一起，头靠脚地一个

接一个。

回忆我们当时的捏造，即使在这个阴暗的日子我也感到了一线希望。泽曼尼克，这位将对我的案子有决定权的人，是了解玛格塔和我的幽默感的，他会理解，那张明信片不过是针对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又好戏谑的姑娘的一次愚蠢的逗弄。因此一有机会我就详细地对他讲了我的不幸遭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一直皱着眉头，然后说他将看看能做什么。

这期间，我一直处在神思恍惚的状态中，象往常一样听课，等待着。我被召到好几个党的委员会面前，他们的工作便是确定我是否属于一个托洛斯基集团；我试图证明，我对托洛斯基的主张确实一无所知；我迎着那些讯问者的目光；我在寻找信任，有几次我发现了它，我愿把这种目光长久地保留在我心中，滋养它，耐心地设法从这种目光里燃起希望的火花。

玛格塔继续回避我。我知道还是因为那张明信片的缘故，我太骄傲，太敏感，不愿向她打听任何事。后来有一天，她自己在大学的一条走廊里叫住我，说：“我想跟你谈一谈。”

于是，在几个月的破裂之后，我们又一次在一起散步。那时已至秋天，我俩都穿上了长长的军用胶布夹雨衣——是的，很长，抵达膝盖下面，这是那个最粗放的年代的时装。天下着蒙蒙细雨，河堤上的树木光秃而又黯淡。玛格塔告诉了我整件事的始末。还在培训班时，她就被负责的同志叫去，问她是否一直都在收到信。她说是的。谁的，他们问。她说她母亲写给她的。还有别的人吗？噢，偶尔还有一个朋友，

她说。你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吗？他们问。她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扬同志在信中写了些什么？她耸了耸肩，不想引述我的明信片。你给他回过信吗？他们问。我回过，她说。你写的什么？他们问。噢，没写什么，不外乎是关于培训班之类的事。你喜欢培训班吗？他们问她。噢，是的。我喜欢它，她回答。你在信中对他这样说了吗？是的，我说了。她回答。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继续追问。他的反应？顿了顿她问。啊，他有点古怪，你们得了解他。我们当然了解他，他们说，我们想了解他写了些什么。你能把他的明信片给我们看看吗？

“你不生我的气，是吗？”玛格塔说，“我不得不给他们看那张明信片。”

“你不必道歉。”我说，“在跟你谈话之前，他们已经全都知道了。否则他们就不会找你。”

“我不是在道歉。”她抗议道，“我并不因为把明信片交给他们而感到羞愧。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你是一个党员，党有权了解你究竟是谁，你想的什么。”我写的东西使她感到震惊，她告诉我。毕竟，谁不知道托洛斯基是我们所主张的一切、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的首要敌人。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要她告诉我后来所发生的事。

后来，他们读了那张明信片，惊骇万分。他们问她对明信片有何看法。她说它是可耻的。他们问她为什么不主动把它交给他们。她耸耸肩膀。他们问她是否知道提高警惕的意思是什么。她垂下头。他们问她是否知道党有多少敌人。她说是的，她知道，不过她决不会相信扬同志……他们问她对

我了解多少。他们问她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我有点古怪，我确实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有时我会说出一些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说的话。他们要她举个例子。她说她回忆不起任何具体的事，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他们说从我的明信片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她告诉他们，我们经常争论许多事情，我在会上说的是一套，与她在一起时说的是另一套。在会上，我热情洋溢，与她在一起时，我嘲谑一切，使一切都显得荒唐可笑。他们问她，她是否认为象这样的人配得上党员的称号。她耸耸肩。他们问她，当党的成员四处宣称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时，党是否还能鼓励社会主义建设。她说不能，象这样决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告诉她，她可以走了，但有关这一切不要告诉我任何话：他们想看看我还会写些什么。她对他们说，她决不想再见到我。他们说她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应该继续给我写信，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到我更多的情况。

“那么你把我的信也给他们看了？”我问玛格塔，一想到我在信中那些热烈的倾泻，脸上不由得变得通红。

“我还能怎么办呢？”玛格塔说，“只是在发生了这件事后，我不可能再继续与你通信。我不能只是为了使你堕入圈套而写信。所以我又给你寄了一张明信片就停止了。我不想见你的原因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任何事，我害怕你会问我，而我将不得不当着你的面撒谎。我不喜欢说谎话。”

我问玛格塔，那么今天是什么鼓励她来见我的呢。

她告诉我是泽曼尼克同志。他在大学的走廊里碰到她，把她带进一个小房间，那里是自然科学部党组织的办公室。

他告诉她，他已听说我曾给她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一些反党言论。他问她这些言论是什么。她告诉了他。他问她对这些言论有何看法。她说她谴责它们。他告诉她，这样做是正确的，并问她是否还在跟我见面。她感到窘迫，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他告诉她，部里从培训班收到一份高度赞扬她的报告，党组织是信赖她的。她说听到这话她很高兴。他告诉她他并不想干涉她的私事，但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看他所交的朋友，而我并不是她最理想的朋友。

以后几周，她告诉我，他的话一直在她头脑中打转。既然我们几个月前就已不再见面了，泽曼尼克的劝告基本上是多余的。然而，正是这个劝告促使她思考：仅仅因为一个人犯错误就鼓励他的朋友与之断交，这是否太残忍，从道德上讲是否允许；她这方面首先与我断交，这是否不公平。她去看望了管理培训班的那位同志，问他是不是仍不准同我谈那桩明信片事件，结果得知没有理由再保密了，因此她叫住我，希望能谈一谈。

接着她向我吐露了一直困扰着她、折磨着她的心事：是的，她决定不再见我的这一行为是很不好的；不管一个人的错误有多大，他都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她回想起苏联电影《名誉法庭》（当时这部影片在党的圈子里颇受欢迎），一位苏联医学研究者把他的发现先于本国交给其它国家自由支配，这种行为近似于叛国。电影的结尾尤其使她感动：尽管这位科学家最后受到了同事们的名誉法庭的谴责，但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弃他；她极力鼓起他的勇气去弥补他的严重过错。

“那么，你已决定不离开我了。”我说。

“是的。”玛格塔拉住我的手说。

“但是，请告诉我，玛格塔，你真的认为我犯了严重罪行吗？”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玛格塔说。

“那你认为我有权留在党内吗？有还是没有？”

“没有，卢德维克，我认为你没有权留在党内。”

我看出来了，如果我进入玛格塔当作是现实的这场游戏中，我就会得到几个月来徒劳以求的一切：正如蒸汽赋予了汽船动力一样，要拯救我的激情也赋予了她动力。她愿意把她的一切都献给我，肉体 and 灵魂。唯一的条件是她那福音的精神得到满足。为此，她所拯救的对象（哎，即我本人）将必须承认他骨子里的罪。可我不愿意这样做。我渴望已久的肉体此时唾手可得，但是我不能以这样的代价来得到它；我不能承认一桩莫须有的罪；我不能维护一个无法忍受的判决；我不能容忍听见一个本应亲近我的人认定这样的罪，这样的判决。

我没有向玛格塔让步，于是我失去了她。不过，我真的认为我是完全无罪的吗？当然，我不断地使自己确信，整桩事全是荒唐可笑的，但尽管如此（说到这里，我们会感觉到凭着事后的认识我现在所产生的那种最令人烦恼最明白不过的感受），我还是开始用我的审问者的眼光来看明信片上的那三句话；我开始感觉到他们的恐惧和惊慌，在我幽默的表层后面的的确确隐藏着某种严重的东西，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与党合为一体，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我

“投靠到革命者一边”，仅仅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认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个——我该怎么讲呢——本质问题，而不是一个选择问题；一个人要么是一个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与运动结合成一个共同的统一体，要么不是，于是只能希望成为一个革命者，这样他就因不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断受到负罪感的折磨）。

回顾我当时的心境，我不禁想到基督教凭藉它的巨大力量使教徒相信它具有与生俱来、万劫不复的罪过的相似之处。因为我（象其他人一样）永远低着头站在革命及其政党面前，我也就逐渐安于了这种看法，即我的话尽管的确是为了开个玩笑，但仍然是一种犯罪，痛苦的自我批评的狂澜在我头脑里翻腾起来。我对自己说，那些想法出现在我脑子里决不是偶然的，同志们早就批评我有“个人主义的表现”和“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们是多么正确）；我对自己说，我一直对我所受的教育，我在大学里的地位，以及我作为知识界一员的未来而感到沾沾自喜，我的父亲，战争中死于集中营的一个工人，是绝不会理解我的玩世不恭的，我指责自己居然让他的工人精神在我身上丧失殆尽；我尽可能从各个方面来责备自己，最后终于承认有必要受到某种惩处；我只反对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事：把我开除出党，以及随之而来的把我称为敌人。作为我从小便拥护并且至今仍坚持的一切的敌人而活着，那真是难以忍受的凄苦。

这样的自我批评（以及恳求宽恕）我对自己背诵了一百遍，对各种委员会至少背诵了十遍，最后又对自然科学部的全体会议背诵了一遍，在全体会议上，泽曼尼克致了开场白

（雄辩有力，才华横溢，令人难忘），以委员会的名义建议把我驱逐出党。我当众作了自我谴责后，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一致反对我：没有人为我说话，在场的每个人（约有一百个人，包括我的老师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是的，每一个人都举起手来赞成不仅把我开除出党，而且（这完全使我意想不到）把我开除出大学。

当晚，我便乘火车回到摩拉维亚。在家乡我寻求不到一点安慰：好几天我都鼓不起勇气把这消息透给我母亲，她对我的学习一直非常自豪。我回来后的第二天，雅罗斯拉夫，一位同我一起在辛巴隆乐队演奏过的校友，顺便造访我家，发现我在家时他非常高兴：原来他过两天就要结婚，于是马上邀请我做他的男傣相。由于我不能拒绝一个老朋友的请求，这样我就发现自己在用一个婚礼来庆祝我的毁灭。

何况，雅罗斯拉夫是一个十足的摩拉维亚爱国者，本地传统的专家，怀着对民俗的热爱，他把婚礼变成了一个传统仪式和风俗的展览：辛巴隆乐队，“族长”及其华美的讲演，引新娘跨过门槛的仪式，歌曲，化装服，以及填满这一天的许多细枝末节，这一切更多的是根据人种史的教材而不是活的记忆设想出来的。有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我的朋友雅罗斯拉夫，一个兴旺的乐队的新头儿，虽然恪守着这一切旧风俗，但（大概是没有忘记他的职业以及屈从于当时的无神论口号）却对教会敬而远之，尽管一个传统的婚礼没有牧师和上帝的祝福是难以想象的；他让族长作了全部仪式的讲演，但却祛除了讲演中一切圣经的主旨，尽管正是圣经的象喻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悲哀使我无法加入到醉醺醺的婚礼聚会

中，并使我对渗进这些民间仪式的清水中的氯仿佛很敏感，因此当雅罗斯拉夫要我（以此唤起我和他一块在乐队里演奏的那个时光的感伤回忆）抓起单簧管，加入到其他演奏者中时，我拒绝了。我蓦然看见我自己在最后两次五一游行中演奏着，而出生在布拉格却穿着摩拉维亚服装的泽曼尼克就在我身旁唱呀，跳呀，挥动着手臂，我拿不起这只乐器。突然间，所有这些带有民间风味的尖声尖叫都使我感到厌恶，感到恶心……

5

由于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权利，我也就失去了缓服兵役的权利，这个秋天我肯定会收到通知书的。为了消磨时光，我签约参加了两个长期劳务队：一个是在哥特瓦尔德夫附近修路；另一个是将近夏末时在一家水果加工厂帮忙干些季节性的活计；然而，秋天终于到了，于是一天清晨（在火车上一夜未睡后疲倦不堪）我来到了俄斯特拉发一个丑陋、陌生的边区兵营所报到。

我和分队里其他年轻的新兵站在一个院子里，大家都不认识；在最初互不知名的阴郁气氛中，人们一下注意到的往往是粗野和任性；我们当时的情形正是这样；我们之间唯一的人类联结便是我们不可预知的未来，猜测是五花八门的——有些人声称我们将发给黑色徽章，有些人拒绝相信，还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非常明白这一切，对这种展望感到十分恐惧。

接着一个中士走来，把我们带到一所营房。我们涌进过

道，沿着过道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挂满了巨幅标语、照片、粗劣的图画。一幅题着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条幅是用大红纸剪贴而成的，覆盖了正对我们那堵墙的大部，使站在那下面一把椅子旁的一个干瘪的小老头益显矮小。中士指着我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叫他去坐在椅子上。那个老头把一块白布单系在小伙子的脖子上，把手伸进靠着椅腿的一个公事皮包里，取出一把电动推子，然后把它插入小伙子的头发。

这把理发椅开始了一条欲将我们变成士兵的流水作业线：剃掉头发以后，我们被驱入隔壁房间，在那里脱得精光，把我们的衣服裹在一个纸袋里，用绳子拴牢，从一个窗口递进去；然后，裸着身子、光着头皮的我们穿过过道来到另一个房间，在那里领了长睡衣；穿着长睡衣，我们继续走到隔壁，在那里领了军靴；穿着军靴和睡衣，我们排队穿过院子来到另一所营房，在那里领到衬衣，衬裤，绑腿，皮带，和军服（上面有着惩戒营的黑色徽章）；末了我们来到最后一所营房，在那里一个军士大声念我们的名字，将我们分成班，指定我们的房间和床铺。

当天我们再次列队去吃晚饭，然后上床睡觉；早晨我们被叫醒，带出营房去矿井，到了矿井口，由班分为作业组，分发了工具（钻子，铁锹和安全灯），这些工具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样使用；然后罐笼把我们送到井下。当我们带着浑身酸痛的身子回到地面上时，等候着的军士叫我们集合起来，把我们押回营房；中饭后我们出去操练，然后接受政治教育，强制唱歌，打扫个人卫生。我们唯一的清

净地方便是一间有二十个床铺的房间。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在最初那些日子里，这种失去个性的半阴暗在我看来仿佛是一团漆黑；我们所执行的那些无人格的命令代替了一切人的感情；当然，这种漆黑仅仅是相对而言；它不仅源于环境本身，而且还源于调整我们的视觉所遇到的困难（就象从光天化日下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视觉改善了，即使在半阴暗中我们也开始看见了人身上的个性。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是最后才作这种必要的调整的人之一。

因为我整个身心都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佩带黑色徽章的士兵们，与我命运相同的士兵们，经受的只是最马马虎虎的操练，不发任何武器；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在矿井干活。虽然他们的劳动有报酬（在这个方面他们比其他士兵的经济状况好一点），但我觉得那是一种可怜的安慰物；毕竟，他们完全是由这样一些分子所组成：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愿把武器交给他们掌握，把他们视为她的敌人。这意味着他们受到的是更加粗暴的待遇，而且随时还得提心吊胆会延长他们强制性的两年服役期。然而，最使我恐惧的是，终生被打上烙印，被我的同志们永远地、最后地判为我视作死敌的那伙人。最初的那些日子，我象一个顽固的隐士生活在这群佩带黑色徽章的士兵中，拒绝同我的敌人交朋友，拒绝使自己适应他们。那时要获准请假是很难的（任何士兵都不得随便请假，只是作为特殊的优惠他才能得到一次准假，这实际上意味着只准他每隔一周外出一次——在星期六），但即使当士兵

们成群结队涌出去，在酒吧间寻找姑娘们时，我也宁愿孤独；我常常躺在铺上，试图读点甚或学点什么，从这种独行其事中吸取点营养；我坚信我只需要完成一件事：为我“不是一个敌人”的权利，为我离开这里的权利而斗争。

我几次走访连队的政委，试图使他相信，我来到这里纯属误会，我是由于理智主义和玩世不恭，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被开除出党的。我再次（已经无数次）重述了那桩荒唐可笑的明信片事件，但不幸的是，这件事看上去似乎不再是好笑的了；事实上，由于给了我黑色徽章，它听起来反而越发可疑，仿佛在掩盖某件更为严重的事。我必须公正地指出，政委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话，并对我要求得到公正的愿望出乎意料地流露出一点理解。他的确到某个上级那里（噢，深奥莫测的地形学！）打听了我的案子，但他最后把我叫去时，却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他们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一个有名的托洛斯基分子！”

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我本人在决定人的命运的最高法庭里留下的形象了，这个值得怀疑的形象（尽管它一点也不象我）比实际的我还要真实得多；我是它的影子，而不是相反；我没有权利指责它不象我，因为我对这种不相象负有罪责；这种不相象是我的十字架，压在我自己的身上。

可我还是不肯屈服。我的确想承担我的不相象，成为他们已判定我不是的那种人。

我用了大约两周时间才多少习惯了矿井里的艰苦劳动，习惯了风钻，它的震动即使在我睡着时也能感觉到在我身上

抖颤。我发了狂似地拚命干活。我想打破所有的纪录，很快我就如愿以偿了。

问题在于没有人把它当作是我政治上服罪的一种表示。由于我们全都按计件取酬（确实，尽管他们扣除了住宿和伙食费，但仍然还有许多钱剩下来），别的许多人，无论政治态度如何，也都很卖力地干活，以便能从这个荒废的年月里至少捞到一点划算的东西。

尽管人人都把我们看成是这个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仍被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的公共生活中的所有形式：我们这些敌人，害人虫，也要参加时事讨论（在政委警惕的目光下），每天听鼓励士气的政治讲话，把社会主义政治家们的照片和宣传光辉未来的标语贴在布告栏上。最初，我坚持自愿做这一切，可是同样没有人把它看作是我政治上成熟的一个标志；其他人为了晚上请假需要引起连长注意时也是很自愿的。他们都不把这种政治活动看成是政治；它只不过是当局要求他们做的一个过场。

不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抵抗是行不通的，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我的“不相象”，别人是看不见它的。

在可以随意摆布我们的军士中间有一位身材矮小，黑不溜秋的下士，他是斯洛伐克人，举止温和，毫无虐待狂，这使他有别于其他军士。大家都很喜欢他，尽管有人恶意地声称他的好心肠比什么都傻。当然，军士们与我们不同，他们有武器，还时常去打靶。一次，那位黑不溜秋的下士在射击中得了第一名凯旋归来，我们几个人兴高采烈地向他祝贺（一半是出于好感，一半是出于嘲弄），但下士只是红了红

险。

那天过后不久，我碰巧与他单独在一起，为了找话说，我便问他是怎样成了一名好射手的。他抬起头来疑惑地盯了我一眼，说：“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诀窍。我把靶心假设为帝国主义者，于是我便变得很疯狂，总是弹弹命中。”我正准备问他的帝国主义者象什么样子，他用严肃、沉思的口吻补充说：“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祝贺我什么。如果发生战争，你们正是我要射击的对象。”

听到这个可爱的小战士（由于他不能对我们大声呵斥，不久他就被调走了）嘴里说出这番话来，我明白了，把我与党和同志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已经无可挽回地断掉了。我已经离开了本来属于我的生活道路。

6

是的。所有的纽带都被切断了。

一切都中断了：学业，为革命工作，友谊，爱情，以及对爱情的追求——整个富有意义的一生都中断了。留给我的只有时间。我前所未有地与时间密切起来。它与我过去理解的那个时间不同：一种变形为工作、爱情和努力的时间，一种非常谨慎地隐藏在我的行动后面因而我不假思索就接受了的时间。现在的它则是赤裸裸的时间，是自在和自为的时间，是处于最基本、最原始状态的时间，它迫使我称它的真实名字（因为我现在度着纯粹的时间——纯粹的、空白的的时间），好让我片刻也不忘记它，使它不断地处在我面前，感觉到它的重量。

每当奏起音乐，我们听到一首旋律，便忘记了它仅仅是时间的一个面孔；每当管弦乐队在乐谱里的一个休止符中保持静默时，我们便听到了时间，纯粹的时间。噢，我正活在一个休止符中，但其长度不是由通常的符号所限定的；我正活在一个无尽的休止符中。我们不可能学其它部队的样，把皮尺一点一点地剪去，来表示两年的限制一天天在减少；佩带黑色徽章的士兵可能要无限期地呆下去。二连四十岁的安布罗茨在这里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

在那时服兵役，家里还有一个妻子或未婚妻，那的确是一个悲惨的命运：这意味着要从远处不断防范着她那不设防的存在；这意味着要经常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在她难得的一次探望中指挥官会取消答应过的假，让她在兵营门口空守。带着象他们徽章一样黑的幽默感，士兵们常常讲一些军官们埋伏着等待那些沮丧的女人，以便捞点油水的故事，而这些油水按理是属于那些禁闭在兵营的士兵们的。

然而，这些家中有女人等待的男人毕竟还有一条线延伸过乐谱里的那个休止符。不管它是多么细，不管它细得多么令人痛苦，一碰即断，它总还是一条线。我却没有这样的线；我已同玛格塔断绝了一切关系，我收到的唯一来信是母亲写来的……哎，那算不算一条线呢？

不，那不是一条线。如果家仅仅是父母的家，那它就不是一条线；它只是过去。父母的信是来自我们正在摒弃的一个海岸的音讯；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漂离启程的港口有多远了，我们被裹在亲人们无私的挚爱之中。是的，他们的信在说，港口还在，带着它那全部令人慰

藉、质朴的美还在那里；可是回去的路，返回的路却失去了。

我逐渐习惯了这个想法：我的生活已经失去了它的持续性，它已从我的手中被夺走了，我别无选择，只有放弃我一直实实在在地、无法逃避地生活于其间的外在现实，去体验它的内在现实。于是我的眼睛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失去个性的半阴暗，开始注意起我周围的人们——迟于他们之间的相互注意，但幸运的是，还没有迟到与他们完全疏远。

第一个从半阴暗中出现的人是昂扎，他讲一口布尔诺街头难懂的俚语，因殴打一个警察而给他戴上了黑色徽章。按照他的说法，他是那位警察的老同学，因私人不和痛打了那人，但是法庭不象他这样看待这件事，于是在监狱里关了半年后他便直接来到了我们这里。他是个第一流的机械工，但对再次干机械工的活或干别的什么活，都显得完全无所谓；他没有任何依恋，也不关心未来，这给了他一种无忧无虑，目空一切的自由感。

我们中间唯一另一个具有内心自由感的人是彼得里奇，他是我们营房二十个人中最古怪的一个。在充军者通常九月份的聚集之后两个月，彼得里奇才来到我们中间。最初他是分到一个步兵营，但他由于严格的宗教理由，顽固地拒绝带武器，接着当局又截获了他写给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信件，信中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名义慷慨激昂地呼吁遣散所有军队。当局对他困惑不解，甚至让他参加操练，尽管他是那里唯一不带武器的士兵，他经受了泥泞中的行军，并且非常正确地做持枪立正姿势；他也参加政治学习，猛烈抨击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但是，当他自作主张写了一幅要求全面裁军的标语，

并把它张贴在营房里时，他因兵变的罪名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法官们被他那和平主义的长篇大论搞得仓皇失措，下命令让一组精神病医生对他进行检查，拖延了很长时间后，撤消了他们的指控，把他调到我们这里。彼得里奇十分高兴：他是唯一一个故意挣来黑色徽章的人，并且以佩带它为荣。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到自由的原因——虽然他不象昂扎那样赖皮赖脸，而是以静修和勤劳来表示他的独立。

其余的人都因恐惧和绝望而苦恼不堪：瓦尔加，一个来自南斯洛伐克的三十岁的匈牙利人，对民族偏见毫不在意，战争中参加过好几个部队，在前线双方的战俘营都进出过；红发皮特兰，他的兄弟逃出了边境，逃离时射死了一个哨兵；斯塔纳，来自布拉格工人阶级居住区杰士卡夫的一个二十岁的浪荡子，他的胡闹引起了当地议会的愤怒，他不仅在喝得烂醉的状态下参加五·一游行，而且还故意当着欢呼的市民在路边撒尿；巴威尔·佩克尼，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在共产党二月政变的时候，曾与一伙同学一道示威反对共产党人，他很快就发现我和那些在政变后把他踢出大学的人属于同一阵营，一想到我们俩竟以同样的结局收场，他便流露出一种恶意的满足了。

我可以讲出许多与我命运相同的其他士兵的事，但我只准备讲讲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昂扎。我还记得我俩最初的一次谈话：那是发生在井下巷道的一个断层，我们碰巧肩靠肩坐在一块，嘴里嚼着面包口粮。突然昂扎在我膝上拍了一下，说：“嗨，喂！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干吗不讲讲你是怎么落难的？”由于我当时的确又聋又哑（只是在没完没了地想着

为自己辩护)，我不得不费力地解释（我随即便感觉到我的措词在他听来准是多么勉强、做作）我是怎样来到矿上的，我为什么实际上不属于这里。“嗨，你这个该死的杂种！你是说我们就属于这里？”我试图把我的看法表达得更清楚（选择听上去更自然的话语），可是昂扎吞下最后一口面包，打断我说：“你知道，要是你的个子也和你的愚蠢一样高，太阳会在你脑袋上烧一个洞。”这点不带恶意的粗俗的挖苦话使我很难为情，我竟然放任自己对失去的特权忧心忡忡，不能自拔——而我自己却一直坚决反对特权和自我放任。

随着时间的流逝，昂扎和我成了忠实的朋友（由于我擅长心算，而受到了他的尊敬；在发薪日我迅速的计算使我们不只一次避免了故意少给我们的找头）。一天晚上，他说我是个笨蛋，竟在营房里度过自己的休假，然后便拖着我与这帮人出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事。我们这伙人还真不少，总共有八个，包括斯塔纳、瓦尔加，还有一个从前学应用美术的学生塞勒克（塞勒克被弄到我们这伙人中，是因为他在学校坚持画立体派绘画；现在，他偶尔会被恩准用特大炭笔在兵营的墙上画满中世纪的武士，胡斯运动，^①派成员最后还画上连枷和带钉的棍棒）。至于去哪里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城中心是禁止进入的，即使在允许我们去的区域也限止我们到某些场所。可是那天晚上我们碰上了好运：附近一个娱乐厅正在举行舞会，到那里去我们是不受限制的。我们只付了一点入场费便一涌而进。大厅里有许多桌椅，但人却不多：只

^① 胡斯运动：十五世纪捷克人在宗教改革家胡斯领导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有十个姑娘，约三十个男人，有一半是本地炮兵营的士兵；他们一看见我们，马上就警觉起来；我们感觉得到他们的目光投向我们，点着我们的人头。我们在一张空长桌边坐下，要了一瓶伏特加，可是那位难看的女服务员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宣布，这里不供应任何含酒精的饮料，昂扎只好给每个人要了果汁水；然后他从我们每个人那里把钱收集起来，隔了一会便拿着三瓶朗姆酒转来，我们立即在桌子下面把它对到果汁里。我们的动作不得不极其小心，因为我们知道那些炮兵们正在盯着我们，一旦发现我们违章喝酒精饮料，他们便会毫不迟疑地告发我们。据说，那些武装部队的人对我们特别敌视：一方面，他们把我们看作是可疑分子(罪犯、凶手、恶棍，正如那些宣传性间谍小说所描写的那样)，随时可能割断他们可怜无辜的家庭成员的喉咙；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因我们挣的钱比他们多五倍而妒忌我们。

这一切使我们的状况很不寻常：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沉闷和疲劳；我们每隔一周就要把头剃光，以便去掉头脑中一切自尊的思想；我们被剥夺了尘世的权利，对生活再没有什么可希冀的了；但是我们有钱。噢，钱不太多；可对于一个每月只有两晚上自由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一笔财富：在那几个小时中(在那几个不被禁止的场所里)，他可以表现得象一个百万富翁，尽情地弥补所有那些无止境的日子里长期的失意。

台上，一个蹩脚的乐队在为舞池里几对舞伴交替伴奏着波尔卡和华尔兹，我们一边冷淡地盯着姑娘们，一边呷着饮料，饮料里的酒精成分很快就把我们抬举到舞厅里所有人之

上。我们的情绪很好。我能感觉到一种令人陶醉的欢乐攫住了我，一种自从我最后一次与雅罗斯拉夫和辛巴隆乐队的小伙子们一起演奏后就再也没有体验过的友谊感。这时，昂扎想出了一个从那些炮兵手中把尽可能多的姑娘带走的主意。这个主意简单得令人叫绝，我们马上便把它付诸行动。塞勒克，这位性格外向的丑角，在这方面最有劲头，令我们满意地充分扮演了他的角色：与一位浓妆艳抹的黑发姑娘跳过舞后，他把她带到我们的桌前，倒了两杯我们的混和饮料，然后说：“好极了，让我们干杯吧。”姑娘点了点头，他们碰了杯。这时，一位穿着佩有两道杠的炮兵服的矮子走到姑娘身边，用最粗鲁的口气对塞勒克说：“她空吗？”“嗨，当然，乖小子，”塞勒克说，“她完全是你的。”当姑娘与那位害相思病的下士伴随着空洞的波尔卡节奏翩翩起舞时，昂扎离身去打电话要出租汽车。出租汽车一到，塞勒克就走过去站在出口处；姑娘跳完舞后对下士说，她要上厕所，几秒钟后我们便听见了出租汽车开走的声音。

下一个得分的是B连的安布罗兹（他带走的姑娘年龄肯定要大一些，而且谈不上有魅力，但仍有四个炮兵整个晚上拥在她周围）。十分钟后，安布罗兹，那个姑娘，以及瓦尔加（他确信没有姑娘愿意跟他走）爬进了出租汽车。加速开到镇上另一头的一个酒吧间去与塞勒克会面。不一会儿，我们这群人中又有两个拐走了一位姑娘，于是只剩下了斯塔纳、昂扎和我。现在那些炮兵愈来愈不祥地注视着我们：我们人数的减少与三位姑娘从他们兽穴里的失踪之间的联系终于使她们有所觉察。我们极力显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但很明显，

一场战斗即将来临。“再来一辆出租汽车和一次光荣的撤退，怎么样？”我说，眼睛渴慕地盯着一位金发姑娘，这天晚上我曾设法同她跳过一次舞，但却鼓不起勇气建议她与我一道离开；后来我一直希望另找一个机会，可是那些炮兵是那样热忱地保卫着她，以至于我再也没有靠近她。“我们只能这样干。”昂扎说，起身去打电话。可是，当他穿过舞场时，炮兵们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迅速地过去围住了他。这场殴斗似乎已迫在眉睫，斯塔纳和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得从座位上站起来，朝我们受到威胁的同伴走去。有一阵子，这群炮兵只是站在那里，保持着不祥的沉默。突然，一个醉醺醺的炮兵（他可能也在桌子下面对酒）开始发表长篇的激烈演说，说他父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何一直失业，站在一旁瞧着这些佩带黑色徽章的资产阶级臭小子们使他感到恶心，要不是他的同志们拦住他，他也许就会在那个杂种（指昂扎）下颚上狠狠来一拳。在这位炮兵的长篇演说一停顿下来，昂扎就彬彬有礼地询问，炮兵同志们想要他做什么。我们要你立刻离开这里，他们说。昂扎回答说，这正是我们想做的事，请他们允许他叫一辆出租汽车。到这光景，那个炮兵眼看就要暴跳如雷了。这些混蛋，他尖声尖气地嚷道，这些该死的混蛋！我们没日没夜地在这里拼命干活，什么报酬都没有，而这些资本家，这些外国代理人，这些卑鄙的杂种却乘着出租汽车兜风！哼，这次就算了，我告诉你们；要不我真想就用这双手把他们扼死！

很快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进来，老百姓和士兵，而舞厅的工作人员则竭力想避免一场事件。突然，我瞥见了我的金发

姑娘。她一直单独留在她的座位上(远离这场混乱)，现在正朝厕所走去。我尽可能不让人注意地离开人群，跟着她进了前厅，衣帽间和厕所都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被投进深水区的初学游泳者；管它害臊不害臊，我都得行动起来；我在口袋里四处翻寻，掏出几张揉皱了的一百克朗的钞票，对她说：“同我们一道走怎么样？你会玩得更快活的。”她眼光朝下看着钱，耸了耸肩膀。我告诉她我在外面等候；她点点头，消失在女厕所里，不一会儿就穿着她的外套出来了；她冲我嫣然一笑，说她立刻就看出来我与其他人不同；这话使我感到很愉快，于是我挽起她的胳膊；我们走到街对面，在拐弯处等候昂扎和斯塔纳出现在大厅门口（那里照着一盏街灯）。金发姑娘问我是不是一个学生，当我回答是学生时，她告诉我，前两天在工厂衣帽间里，她的一些钱被人偷了，由于这些钱是属于工厂的，所以她非常害怕他们会把她送上法庭：我能不能借给她一百克朗？我把手伸进口袋，给了她两张皱巴巴的钞票。

过了一会儿，昂扎和斯塔纳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出来了。可是，我刚对他们吹了声口哨，三个炮兵(没戴帽子，没穿外套)就紧跟在他们身后从大厅里冲出来。我只能听见他们询问的语调，可我无需听见他们的话也能猜到他们的意思：他们追寻的正是我的金发姑娘。接着，一个炮兵朝昂扎扑去，这场殴斗开始了。斯塔纳只对付一个，昂扎要对付两个。他们正要把昂扎击倒在地，这时我冲过去痛打其中的一个。炮兵们刚才还以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可一旦双方人数相等，他们马上就失去了威风；当其中一个人在斯塔纳的拳头下彻

底败北时，我们便趁着他们的混乱，匆匆地撤退了。

金发姑娘在拐角处顺从地等待我们。昂扎和斯塔纳一看见她，就高兴得发狂。他们说我是最了不起的人，并试图紧紧拥抱我，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是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幸福的滋味。昂扎从外套里掏出一瓶朗姆酒（我无法知道在殴斗中他是怎样使这瓶酒完整无损的），在头上挥舞着。一切都完美，只是我们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从一个地方被赶出来，其余的地方又禁止进入；狂怒的对手已经切断了我们的出租汽车供应，随时都可能发动一场新的战斗，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迅速沿一条两边是房子的小胡同奔去；走了没多远，房子没有了，一边现出一堵墙，另一边现出一道栅栏；靠着栅栏，停着一辆干草运货车，还有一个象拖拉机似的机械，上面有一个马口铁座位。“你的宝座。”我说，接着昂扎让金发姑娘坐在座位上，座位离地面有几英尺高。那瓶酒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我们四个都对着瓶子喝酒；金发姑娘很快就变得滔滔不绝起来，对昂扎说：“嘿，我敢说你不愿借给我一百克朗。”于是昂扎塞给她一张一百克朗的钞票，接着她解开外套，拉起裙子，脱下内裤。她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向她身边，可是我害怕极了，从她身边挣脱开，把斯塔纳推上前去补缺。斯塔纳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疑虑不安，径自移到她的大腿之间。他们在一起持续了不到二十秒钟。我本来打算下一个该轮到昂扎（部分是因为我想扮演主人的角色，部分是因为我还在害怕），但这次姑娘更加坚定了，紧紧地拉住我不放，她的抚摸激起了我的情欲，当我终于准备满足她时，她在我耳边柔声低语：“我只是为了你才来的，傻瓜。”然后开

始叹息起来，突然间我真诚地感到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爱上了我，也值得我爱，她不断地在叹息，于是我放纵地和她干起事来，但这时昂扎突然说出几句猥亵话，我再次意识到我一点也不爱她，于是我没有达到高潮就从她身上脱出来了，她几乎是惊恐地抬眼望着我，说：“嗨，出了什么事？”可这时昂扎已经占据了我的位置，叹息声重又开始了。

那天夜里直到早晨近两点钟我们才回到营房，四点半钟我们就起床去上星期日的义务加班，这样做能使指挥官得到一份奖金，使我们得到两周一次的星期六休假。我们头昏眼花，醉意未消，象还魂尸一样在阴暗的水平巷道里移动，但我仍沉湎在对那个愉快度过的夜晚的回味之中。

我们两周后的休假根本没有实现。昂扎的休假由于出了某桩事被取消了，我也因另一个排的两三位不速之客而脱不开身。我们立即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有把握的东西——一个女人，她那异乎寻常的身高为她赢得了“烛台”的绰号。她长得丑，可我们有什么办法？供我们使用的女人极其有限，而且还要受到时间的压力。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每一次休假（它们是那样短暂，那样得之不易），这意味着男人们全都宁愿要易接近的女人而不要有魅力的女人。通过互通有无，这些士兵逐渐集中了一伙可怜巴巴、多少容易接近的（即：没有魅力的）女人，供大家通用。

我不在乎“烛台”是那伙女人中的一个；斯塔纳和昂扎不停地开玩笑，说什么她简直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说什么等那个时刻到来时，我们将不得不找一块砖头站在上面，但我实际上喜欢这个玩笑；它加剧了我对女人的狂烈的欲望；任何女

人；愈不具有个性，愈没有人格，就愈好，无论什么样的女人。

可是，尽管我喝了许多酒，但当我的眼光一落在她身上，我那炽热的欲望马上就平息了。一切都似乎令人作呕和乏味，因为不管是昂扎，斯塔纳还是其他我所喜欢的人都没去那里，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隔夜的宿醉还是那么厉害，以至于我对包括上一次休假发生的事也产生了疑虑。

我也许是受到了某种道义上的困扰？废话：那仅仅是十足的反感。但是，几小时前我还因对女人的炽热欲望而变得憔悴，那个欲望的剧烈程度与我不知道那女人是谁密切相关，我的反感又来自何处呢？我也许比别人更加敏感？我是不是讨厌娼妇？废话：我不过是十分沮丧罢了。

我感到沮丧是因为突然意识到，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我选择干这种事不是由于吃饱了撑的，不是由于任性胡闹，也不是出于想知道一切经历一切（崇高的和可鄙的）的人迷欲望，它仅仅成了我生存的准则而已。它恰恰限定了我的机运的界限，它实际上描出了我此后爱情生活的地平线。它没有显示我的自由（一年前我也许会这样看），而是显示了我的屈服，我的限制，我的判决。我感到恐惧。恐惧那个黯淡的地平线，那个命运。我感觉到我的心灵在收紧，在退却，接着抖缩起来，因为心灵意识到它已被完全包围住，无路可逃了。

7

因我们性爱的地平线的黯淡而产生沮丧情绪几乎是我们

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彼得里奇(和平宣言的作者)为了抵抗这种沮丧，靠退到内心深处去与他的神秘的上帝谈心，这种以宗教的转向内心来弥补性爱的不足乃是一种自我刺激的恪守仪式的养生之道。其余的人则表现出更大程度的自我欺骗，用最伤感的浪漫主义来补充他们玩世不恭的情场冒险：许多人家里都有自己的恋人，并把他们的回忆磨得晶莹透亮；许多人把他们的信心寄托在无限忠诚和忠实期待上；还有许多人暗暗地试图使自己相信，他们在酒吧间喝得烂醉时结识的姑娘为他们燃起了圣洁的激情。斯塔纳入伍前跟布拉格的一位姑娘谈过恋爱，她来看望过他两次，他以前从没有认真地对待过这件事，可现在他突然深深地爱上了她（完全符合他那冲动的本性），而且迫不及待地要跟她结婚。他声称他对两天的婚假做好了通盘打算，可我却能看穿他那玩世不恭的外表。指挥官准许他的假是在三月初，他动身去布拉格结婚正好是一个周末。这一切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斯塔纳婚礼的那天结果也成了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天。

那天我也获得了一次准假，由于对上次休假浪费在“烛台”身上仍然感到懊恼，我避开了其他伙伴，独自动身了。我爬上一辆老式的窄轨电车，一辆连接俄斯特拉发远郊的慢车，让它把我带走。我在一个随意选择的站上下来，又随意换乘了一辆另一条线路的电车；一望无际的郊区，奇妙地混杂着工厂和田野，自然美和垃圾堆，树林和熔渣堆，公寓和农舍，既吸引着我又困扰着我；我再次下了电车，但这次却漫步了很久，怀着某种类似恋爱的感情去欣赏这块独特的景致，极力想弄清是什么使它形成了这个样子，试图解释是

什么使它繁杂多样的各个部分显得协调和有秩序的。当我走过一幢覆盖着常春藤的田园小屋时，我想到它之所以属于这里的原因就是，它与周围那些破旧的房屋大相径庭，也与构成它背景的那些庞大的井架、烟囱、高炉的轮廓迥然不同；我走过那些矮墩墩的临时棚舍，看见不远处有一幢房子，一幢肮脏、灰色的旧房子，但却有花园、铁栏和高大的垂柳，在这样的环境中的确显得有点怪异，我对自己说，这准是它之所以属于这里的原因。我被所有这些不相协调的景致搞得心烦意乱，这不仅因为在我看来它们表现了周围地区的共有特性，而且还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我在这里充军的形象；当然，把我个人的历史投影在一个完整城市的客观背景上也使我得到了某种解脱：我明白了我同那株垂柳，那幢覆盖着常春藤的小屋，那些通向乌有之处，通向虚无的小街，那些排列着的每幢房屋似乎都来自不同地方的街道一样不属于这里；我同那些丑陋不堪的临时住房区一样不属于这个一度质朴怡人的地区，我意识到我不得不待在这里，待在这个不相协调、令人困窘的城市，这个不加选择容纳一切的城市，其真正的原因在于我无所归属，格格不入。

最后我沿着一条长街走去——这里本来是一个天然的村庄，现在已成了城市的近郊——停在一幢大平房前面，平房的一角竖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电影院”。我就象偶然过路的人惯常做的那样，漫不经心地推究着这招牌为什么只写了“电影院”三个字而没有任何名字。我四处搜寻这幢房屋的外部（它看上去一点也不象它所号称的那样），但是没有发现别的招牌。我只发现一条约五英尺宽的巷子，把电影院与比邻

的建筑物分开，我循着这条小巷来到一个院子，看见电影院的背后还加了一个一层楼的边房，沿墙的橱窗里贴着电影广告。我走上前去，仍然没有发现一个名字^的表示。我环顾周围，看见比邻后院的铁丝栅栏后面有一个小姑娘，便向她打听电影院的名字，可是她惊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她不知道，我终于只好听任它的无名：在俄斯特拉发这个流放地，甚至连电影院都没有名字。

我信步回到(没有任何特殊原因)橱窗前，首次注意到由一张海报和两张剧照预告的当天的电影，那不是别的正是苏联影片《名誉法庭》，影片的女主角玛格塔曾经提到过，当时她自告奋勇要在我生活中扮演仁慈的天使；影片中更为严酷的方面同志们曾经提到过，当时学院党组织正要起诉我。这部影片给我带来过太多的悲哀，我一直希望永远不要再听到它的名字，但是不能，甚至在俄斯特拉发这个地方，我也没能逃脱它那指着的手指……但至少这次我可以别过脸去不理它。于是，我真的朝着小巷走去，准备回到街上。

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看见了露西。

她正朝着我的方向，朝着院子的方向走来。为什么我当时没有直接从她身旁走过去呢？是因为我只是在漫无目的地闲荡，还是因为院子里不寻常的夕辉使我留连忘返？或者是她身上具有的某种东西？但是她的外貌十分寻常呀。的确，后来打动我、使我迷恋的正是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寻常的特性，可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她，马上就被她吸引住，并且停下来了呢？难道在俄斯特拉发的街上我还没看够寻常的姑娘吗？她的寻常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

当时站在那里望着她，望着她缓缓地走，不慌不忙地朝玻璃橱窗走去，停在《名誉法庭》剧照的前面，然后转身走向入口处，经开着的门进入门厅。对了，一定是那缓慢的步态把我迷住了；她身上有一种缓慢显露出顺从：没有任何地方值得匆匆奔去，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为它烦恼。是的，也许真的是那种忧郁的缓慢使我跟在她后面，她走到售票处，拿出一些零钱，买了一张票，朝礼堂里看了看，然后转身出来回到院子里。

我不能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她背对着我站在那里，眼光越过院子朝一排花园别墅望去，每一幢都围着栅栏，一直延伸上一座小山，直到一个石矿的轮廓把它们截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院子；我还记得它的每一个细部，记得把它与那个后院隔开的铁丝栅栏，那个小姑娘就坐在那边凝望着天空，记得她坐着的阶梯侧面是一堵矮墙，墙上有两个空花盆和一个灰洗衣盆，记得烟色的夕阳怎样徐徐斜向石矿）。

差十分钟到六点，也就是说电影要十分钟后才开映。露西转过身来，慢慢地穿过院子，走到街上。我跟在后面，将我身后遭到蹂躏的俄斯特拉发田园画面换成了一个更有都市味的景致。五十步开外是一个怡人的小广场，保持得十分整洁，在一幢带有一个伪哥特式钟楼的红砖建筑物前面有一个小公园和几条长凳。我跟着她；她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她的缓慢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她看上去几乎是在缓缓地坐着；她没有左顾右盼，没有任她的目光漫游；她坐着的姿势就象我们通常坐着等候作一次手术，等候某件完全吸引住我们、驱使我们进入内心、远离周围一切的事情一样。一定是这种内心的关注使我得以逗留在她附近，上下打量她，而没有被她所注意。

关于一见钟情早已是老生常谈了，我完全知道人们在回顾爱情时，总想使它本身成为一个传说，把它的开端变成神话，所以我宁愿克制自己，不把这称做是爱情；但是我毫不怀疑当时有一种洞察力在起作用：我立刻就感到了，悟到了，抓住了露西生存的本质，说得更确切点，她将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露西把她展现在我面前，就象神祇呈现在他人面前一样。

我看见马虎的电烫把她的头发弄成一团乱蓬蓬的卷发；我看见一件褐色外套，破旧不堪而且也不太长；我看见一张脸蛋，既不引人注目地迷人，又迷人地不引人注目；我看见一种天生的宁静、质朴和端庄；我感到我是多么需要它们；我看到我们有多么相似：我只需走上前去，跟她交谈，她就会露出笑容，仿佛一个失散很久的兄弟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她抬起头望了望钟楼（即使这个微小的动作也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一个没有手表，本能地面对钟楼坐着的姑娘的动作）。她站起来，开始回电影院。我很想走到她面前，但与其说是缺乏勇气，不如说是缺乏话语；我的心是溢满的，可我的头脑却是一个空白；因此我只是跟在她后面进了那个小门厅。突然，一伙人冲进来，径直奔向售票处。我抢在他们前面买了一张电影票，而这个电影却是我极为反感的。

此时她已经进去了；在几乎空荡荡的礼堂里，寥寥可数的几张电影票失去了一切意义，我们想坐哪儿就坐哪儿；我走进露西那一排，在她旁边坐下。这时，刺耳的喇叭声在大厅里吼叫起来，灯光黯淡下去，广告开始出现在银幕上。

露西肯定已意识到这个佩带黑色徽章的士兵并不是偶然

地坐在她旁边，她肯定一直都知道我，感觉到我的存在，因为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她身上，一点也不关心银幕上正在发生的事(享受一次显然是可笑的报复：当那些卫道士们经常向我提及的这部影片在我面前闪现时，我却根本不予理睬)。

电影终于结束，灯光亮了，寥寥无几的观众站起身来，伸着懒腰。露西也站了起来，她从膝上拿起那件折叠的褐色外套，把一只手臂伸进袖子里。我迅速戴上帽子，掩饰住我的光脑袋，然后一声不响地帮她穿上另一只袖子，她抬起头，缄默地瞅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可是我说不上来这是一个感谢的表示还是一个纯粹本能的动作。然后她慢慢从那排座位往外移。我立即披上我的绿大衣(它穿在我身上太长了，可能不很适合)，跟在她后面。当我第一次跟她搭话时，我们还没有走出礼堂。

坐在她身旁并想着她的这两个小时，肯定已把我置于她的波长上：从一开始我就能象非常了解她一样跟她谈话；只有这一次我是自然地开始谈起来，没有一句玩笑或讽刺话，我很惊奇，经过了所有这些藏在面具后面的经历之后，这样的谈话是多么容易。

我问她住在哪里，是干什么的，是否经常看电影。我告诉她我在矿上工作，那是个苦活，我很少有假期。她说她在一个工厂干活，住在集体宿舍，必须在十一点钟之前回去，她经常看电影，因为她不喜欢去跳舞。我告诉她只要她有空，我什么时候都乐意和她一道去看电影。她说她宁愿一个人去。我问她是不是因为生活太压抑了。她说是的。我告诉她

我也过得不怎么快活。

没有什么能比共同的忧郁更容易、更迅速地（尽管往往是虚假地、骗人地）使人们贴近的了；一个人人能之的同情的气氛可以使所有疑惧和戒备都化为乌有，不论是高雅的人还是粗俗的人，有学问的人还是一字不识的人都易于领会这种气氛，它是使人们贴近的最简单的方式，但它却很少发生。它要求个人丢开由文化导致的“心理抑制”，由修养带来的姿态和面部表情，显露出他的真实自我。我这个总是藏在这样或那样的假面具后面处处谨慎行事的人，怎么竟完成了这个伟绩，我不知道（突然之间就成功了，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不知道，可是它就象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个奇迹般的解放。

我们互相告诉对方关于自己的最平常的事情；我们的表白简短扼要。当走到露西的宿舍时，我们在外面一盏街灯下站了一会儿，露西浸浴在灯光里，我发现自己不是在抚摸她的脸颊或头发，而是在抚摸她那件破旧的令人感动的褐色外套。

我现在还记得那盏晃动的街灯，那些在回宿舍途中笑语喧哗从我们身旁走过的姑娘们；我记得我抬起头来望着露西住的那幢房子，望着光秃秃的灰墙和一无遮蔽的窗户；我记得我瞧着露西的脸，这张脸（不象我在相似的情形下认识的其他姑娘的脸）是平静的，几乎是没有任何表情的，很象一个站在黑板前面（毫不机灵或狡诈），谦卑地背诵她所知道的东西，既不追求高分也不追求表扬的女学生的脸。

我们约好，我将寄给她一张明信片，让她知道我下次的

休假在什么时候，何时可以见到她。我们道了晚安（没有接吻也没有抚摸），然后我走开了。走了几步我回过头来，看见她站在门口，没有推开门，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我。既然我已经走开了，她就可以抛掉她的矜持，任凭她的眼睛（在此之前是那样胆小）久久凝视着我。然后她抬起手臂——就象一个从来没有挥过手的人，不知道怎样挥手，只知道当一个人离开时另一个人要挥手一样——尽力地笨拙地做着手势。我停下来朝她挥手，我们站在那里互相凝望。接着我又往前走，再次停下来（露西的手还在挥动），又往前走，走走停停，直到最后我转过街角，互相从对方的视野中消失。

8

从那个晚上起，我的内心便迥然不同了；我又被占据了，我心灵的场所是干净和整洁的；有个人居住在那里。挂在墙上数月不响的钟突然开始滴答滴答地响起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时间，在此之前就象一条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溪流缓缓流淌着，没有路标，没有拍号（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无限期的休止符中），而现在又开始呈现出人的面孔，把自己标出来，把自己划出来。我现在是为了休假而活着，每一天都是攀往露西那里的梯子上的一级。

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把这样的思念，这样的全神贯注奉献给一个女人（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多的时间来思念）。我从来没有对别的女人产生过这样的感激之情。

感激？为了什么？首先是为了把我从我们大家所面对的可悲而局限的性爱地平线解放出来。是的，斯塔纳这位新郎

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他在布拉格的家里有一个心爱的妻子。但是斯塔纳不值得羡慕。他靠结婚来使他的命运转起来，然而一旦他登上返回俄斯特拉发的火车，他就失去了对命运的一切控制。

靠了与露西的结识，我也使我的命运转了起来，但是我决不会让它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虽然我们不常见面，可我们的会面至少是有规律的，我知道她能够等待几周，然后就象我们前一天才见过面似地来迎接我。

然而，露西不只是在在我们黯淡的性爱冒险之后把我从意气消沉中拯救了出来。尽管这时我知道我已失去了斗志，对我的黑色徽章将永远无能为力，尽管我知道与我还要在一起生活两年多的人们疏远是愚蠢的，大肆吹嘘我为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正确是愚蠢的（隔了很久我才明白那是一个多么具有特殊权益的生活道路），我还是仅仅从理智上接受了这个变化，因而不能彻底消除我对“失落的命运”的痛切之感。露西对我这种痛切之感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我所需要的只是感觉到她在我身边，感觉到她的生活方式的温暖，这是一种在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争端之外，在警惕性和阶级斗争之外，在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要素之外的生活——一种超出了政治的全部范围，超出了政治的战略战术的生活。

这些我关心的事（它们仅仅是时代的一部分，因此很快将只成为不可理解的术语）曾经导致了我的毁灭，可我却不能放弃它们。对于委员会把我叫去，问我是什么原因使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是究竟是什么

原因把我吸引到这场革命运动中的，我却感到困惑，你也许会说，是因为感觉到(真实或明显地)站在历史车轮旁边的缘故。我们的确决定着人们和事件的命运，尤其是在大学里，在早期的那些年头，教职员中的党员很少，学生团体中的党员几乎是单独地管理大学，对学院的教员编制，教学改革和课程安排做出决定。我们当年所体验到的洋洋得意如今人人已知是权力陶醉，但是(持较为仁慈的态度)我愿意说得更婉转些：我们让历史迷住了我们，我们为跳在历史背上，感觉到它在我们底下的念头所陶醉，如果说，其结果多半成了对权力的丑恶贪欲，可是(假使人类一切事都有两种以上的解释)一个理想主义的幻觉仍然保留了下来(尤其可能是留在了我们年轻人心中)，这个幻觉就是：我们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人，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所有的人)不会再站在历史之外，不会再在它的脚踵下畏畏缩缩，而是指引和创造历史。

我那时坚信，远离历史车轮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生活的，只有植物，厌倦，流放，西伯利亚。而突然(在“西伯利亚”待了半年后)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机遇：我看见面前展现出一片久已湮没无闻的草地(湮没于历史的翱翔的翅膀下面)，日常生活的草地，在这片草地里，我看到一位贫穷、可怜的姑娘，但却完全值得我爱的姑娘——露西。

对于历史的巨翅露西知道些什么？她何时听到过它们的声音？她对历史一无所知，她生活在历史的底下；历史对她毫无吸引力，与她格格不入；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她生活中的问题是平凡而永恒的。突然之间，我得到了解脱；露西来把我带往她的灰色乐园，不久前似乎还是

不可想象的这一步，使我得以退出历史的这一步，突然间成了宽慰和欣喜的根由。露西羞怯地挽住我的胳膊，于是我让她引着我……

露西是我的灰色向导。若用更具体的话讲呢？

她年方十九，但看上去却要大得多，就象那些历经艰难，从童年一下子上升到成年的女人一样。她说她是西波希米亚人，读完中学后便当了一名学徒。她不喜欢谈她的家，要不是我逼迫她，她是什么都不会讲的。她在家里一直不幸福。“我的父母从来不喜欢我，”她说，为了证明她的话，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怎样再嫁，她的继父怎样酗酒，并且待她很残酷，他们有一次怎样指责她把一些钱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以及他们怎样经常殴打她。当她和他们的不和终于变得不堪忍受时，她便鼓起勇气离开了。她在俄斯特拉发已经生活了整整一年。哦，她有朋友，但她更喜欢独往独来，她的朋友们出去跳舞，把小伙子们带回宿舍，露西对此很反感，她很严肃，她宁愿去看电影。

是的，她认为自己是“严肃”的，把严肃与看电影等同起来。她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当时极为盛行的战争片，也许是因为这些片子令人激动，但更可能是因为这些片子中极度的苦难使她内心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她觉得这样的感情可以抬高和表示她如此看重的自己身上的“严肃”部分。

但是，如果说我仅仅是被露西异乎寻常的单纯给吸引住了，那是不确切的。她的单纯，她在教育上的空白，并没有妨碍她理解我，不过她的理解与经历、知识以及争论和奉劝的能力毫无关系；她的理解主要表现在她倾听我时善于接受的

方式。

我记得夏日的一天，我的休假碰巧开始在露西下班之前。我带了一本书，坐在一个花园的墙上阅读；我一直都在挤出时间来跟上我的读书；很少有时间，与我在布拉格的朋友们的通信又不多；幸好我来这里时在包里装了三本小诗集，这些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它们给了我安慰。它们是弗朗季谢克·哈拉斯^①的诗歌。

这三本书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奇异的角色，之所以奇异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酷爱诗歌的人，可它们却是我唯一真正喜欢的诗集。我发现它们刚好是我被开除出党之后，那段时期哈拉斯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公众的眼里：当时那个主要理论家认为应当指责这位新近去世的诗人的病态，消沉，欺诈，存在主义——换句话说，那年头带有政治诅咒意味的一切。（那位理论家在一本书中对整个捷克诗歌，尤其是哈拉斯的诗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被大量印刷发行，捷克所有学校都要读它）。

在遇到不幸时，我们往往把自己的悲伤与别人的悲伤联系起来，藉以寻求安慰，虽然听起来也许可笑，可我还是得承认，我当时之所以要找出哈拉斯的诗歌，是因为我想同另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谈心；我想弄清楚自己的心理是否与一个公认的背教者有任何相似之处；我想检验一下，当我处于类似的状况时，那位权威理论家声称有害、有腐蚀作用的悲伤对我来说是否具有某种欢乐（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是几乎

^① 弗朗季谢克·哈拉斯(1901—1949)，捷克诗人和散文作家。

不可能期望在欢乐中找到欢乐的)。在动身去俄斯特拉发之前，我从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同学那里借来了这三本书，后来又一再向他恳求，他才同意不把它们要回去。就这样，这些书陪伴着我开始了充军。

当露西发现我手拿一本书坐在约定的地方时，她问我在读什么。我把翻开的那两页给她看。“诗歌！”她惊奇地说。“我读诗歌你觉得奇怪吗？”她耸了耸肩，说：“不，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但是我想她当时的确是这样看的，因为她多半把诗歌和儿童读物看作是另一回事。我们在俄斯特拉发奇特的煤烟弥漫的夏天漫步。这是一个黑色的夏天，只见煤车沿着高架索道隆隆行驶，而不见朵朵白云在空中掠过。我注意到露西的心思还在那本书上，于是，当我们发现一片小树林并坐下来时，我翻开书，问道：“你感兴趣吗？”她点点头。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朗诵过诗；在那以后我也再没有这样做过。我有一个高度敏感的、内在的保险丝装置，它阻止我过分地展现自己，暴露我的情感，而朗诵诗使我觉得我仿佛在谈论自己的感情，同时又单腿立着一样；除非绝对孤独，否则每当我想到沉浸在韵律和节奏中时，那里面总有一种令我窘迫的东西。

但是，露西却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在她之后再没有人具有这种能力），绕过我的保险丝，卸掉我的踌躇的负担。在她面前，我敢显露一切：真挚，激动，悲怆。于是我吟诵道：

你的常躯是一穗细长的玉米

籽粒从上面落下来却不会生根
你的身躯象一穗细长的玉米

你的身躯是一束丝绸
每一卷里都写有渴望
你的身躯象一束丝绸

你的身躯是一片燃尽的天空
穹窿下编织着它的死亡之梦
你的身躯象一片燃尽的天空

你的身躯是多么宁静
我的眼睑下颤动着它的眼泪
你的身躯是多么宁静

我用胳膊搂住露西的肩头（她的肩膀只遮着薄薄的花衣服料子），我的手指能感觉到它们，我真愿意相信我正在吟诵的这首诗（一篇慢慢吞吞的祈祷文）说的就是这个身躯的痛苦：缄默，顺从，被判了死刑。我又给她读了一些诗，包括那首至今还在我心中唤起她形象的诗，那首诗是这样结尾的：

我不相信你的蠢话我相信沉默
胜过美胜过一切
那里有理解的欢乐

突然，我的手指感觉到露西的肩膀在颤动；她哭了。

是什么使她哭了起来？是词语的意思？是诗歌调子里流露出来的不可言喻的悲哀还是我嗓音的音色？也许是诗歌那种奥妙的庄严使她感到欢欣，而欢欣又使她感动得流泪？或者只是诗句突破了她内心的一个秘密障碍，解除了长期积郁在那里的那个重负？

我不知道。露西就象一个小孩缠着我的脖子；她的头紧贴在我穿着绿色军装的胸部上，她哭呀，哭呀，哭呀。

9

最近几年各种类型的女人多少次指责我（因为我不能回报她们的感情）自高自大。这全是胡说，我一点也不自负，但说句老实话，自从成年后我还从来没能与一个女人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正如她们所说，还从来没有爱上过一个女人。一想到这点我就感到痛苦。我不能肯定，我是否知道我失败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天生的缺乏某种感情，或者是由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我并不想夸大其辞，但事实就是如此：那个会议厅里一百个人举起手来，发出毁灭我生活的命令的印象，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心头。这一百个人不知道事情总有一天会开始变化；他们指望我终生当一个被遗弃者。与其说是出于对受苦的渴望，不如说是出于恶意的顽固，我对那个场面作过许多不同的虚构：例如，假若不是作出开除我党籍而是绞死我的判决，那情景会是什么样呢？不论我怎样推想那个场面，我还是只能看见他们再次举起手来，特别是如果泽曼尼克在开场白里娓娓动听地证明了我应被绞死的话。打那以

后，只要我一结识新的人，无论是有可能成为朋友或情人的男人或女人，我都要在心中把他们投回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然后自问他们是否也会举手；没有任何人通过了这个考验；每个人都象我的朋友们和同事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出于坚信不疑还是害怕）那样举起了手。你必须承认：与那些愿意流放你或处死你的人是很难在一起生活的，跟他们变得亲密是不容易的，要爱他们更是困难。

也许我太残酷了一点，竟让我所认识的那些人受到如此无情的考查，而他们很可能会与我和平相处，从来不会走进那种举手表决的会议厅。也许有人会说我做这样做只是为了一个原因：从我精神优越的高处俯视他人。可是，指责我骄傲是很不公平的；如果说我从未举手赞成过任何人的毁灭，那么我也完全明白，我在这种事上的优越是有前提的：在这场游戏中我很早就被剥夺了举手的权利。我一直试图使自己相信，假若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决不会象他们那样做。可是我的诚实足以嘲笑我自己。为什么我就应该是唯一一个不举手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呢？不，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保证我会表现得更好。那么这件事又怎会一直影响着我与所有人的关系呢？意识到自己的卑劣并没有使我对别人的卑劣安之若素。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在对方身上看到共同的卑劣而产生的兄弟般感情更叫人反感的了。我一点也不想加入标有兄弟关系印记的行列。

那么我怎么又能爱露西呢？幸运的是，我刚才发表的看法是后来才产生的，因此（一个十足的青年，更易于悲伤而不是思索）我当时还是能够以张开的双臂和信任的心怀接受

露西，把她作为一个礼物，一个天国（一个仁慈的天国，灰色的天堂）的礼物接受。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虽然精疲力尽，虚弱不堪，被折磨得半死不活，可我却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感与日俱增。真有趣：如果那些现在指责我做慢，怀疑我把人人都看作傻瓜的女人——如果那些女人知道露西的事情，她们将会把她称作一个傻瓜，会完全不理解我怎么会爱她。而我当时却是那样爱她，根本不能想象同她分离；的确，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结婚，但至少我对有一天会娶她是非常认真的。如果说我确实想到过这个婚姻不相称，那么这个不相称却更加吸引我而不是使我望而却步。

为了那几个月的幸福生活，我也要感谢我的指挥官；那些军士尽可能地欺侮我们，在我们的军服衣缝里搜寻污垢，如果发现我们的床铺上有点皱痕，就拆掉我们的床；可这位指挥官却是一个好人。他已开始出老相，是从一个步兵团调到我们这里的——据传降了一级。换句话说，或许是他也曾经经历过磨难，所以他才偏袒我们。倒不是说他不要秩序，纪律，以及偶尔自愿在星期天的加班（为了向上级证明他在政治上的积极），而是说他从不叫我们干劳累不堪的重活，并且在批准我们两周一次的星期六休假时，很少给我们制造麻烦；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个夏天我每月基本上能见到露西三次。

没有和她在一起时，我就给她写信，写了无数封信和明信片。如今回忆起来，我实在想不出我在信里写了些什么。但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给露西写了许多信，可她从来

没有给我写过一封。

我简直没有办法使她给我写信。也许我的信使她畏惧；也许她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或是怕犯拼写错误；也许她为自己笨拙的书写感到不好意思，我只是从她在身份证上的签名才知道她的书写的。我无法使她明白我实际上赞赏她的笨拙，她的无知。我并不是抽象地看重她的简单；我把它视为一个纯洁的标志，一块能使我在她身上留下更深刻、更持久印记的白板。

起初，露西只是对我的信羞怯地表示感谢，但不久她就找到了报答我的方式：她不是写信，而是送给我鲜花。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正在一块树林荫翳的地方踱步，露西突然弯下身，摘了一朵鲜花，把它递给我。我很感动；这一点也没有使我尴尬。但是下一次我们见面时，她却拿着一大束花站在那里等我，我开始感到有点不自在了。

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凡是可能引起对我的男子气或成熟产生怀疑的一切，我都极力地小心回避。我觉得手拿鲜花在街上散步很不自在；一想到买花我就感到畏缩，更不必说接受它们了。我窘迫地向露西指出，是男人送花给女人，而不是女人送花给男人。可是当我看见她眼泪盈眶时，我急忙补充说这些花是多么漂亮，然后接受了鲜花。

打那以后，她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每次我们见面，总有鲜花在迎候我，最后我屈服了，自发的送花以及这一行动对送花人的意义使我解除了武装。也许是不善言谈和不善表达使她把花看成是一种谈话方式——不是花通常那种严格的象征意义，而是更古老，更通俗，更本能的语言先导，也

许，由于总是少言寡语，她本能地向往那个不能说话，未有语言能力之前的进化阶段，那时人们用最少的手势来进行交流，比如，指着树，大笑，互相触摸……

不论我是否领会了露西送花的实质，反正我被她的行为深深感动了，要报答她的愿望油然而生。露西的全部服装就只有三件，由于她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变换这三件衣服，我们的约会也随之按照严格的四三拍子进行。我喜欢这三件衣服的磨损、破旧和不太雅观，我也喜欢她那件褐色短外套（袖口已经磨破），毕竟在抚摸她的脸之前我就先抚摸过它。可我还是决意要给露西买一件衣服，一件漂亮的衣服，许许多多的衣服。于是有一天我提议我们到百货商店去。

最初，她以为这个提议只是为了好玩，为了观看人们在楼梯上涌上涌下。可是到了二楼，我却在一长排挤得满满的衣服架前面停了下来，露西看见我饶有兴味地盯着那些衣服，便靠上前去，开始评论起来。“那件衣服真好看。”她说，指着一件图案复杂的红花衣服。好看的衣服寥寥无几，可还是有一些稍微比较中看的；我拉出一件，对售货员喊道：“这位年轻女士可不可以试一试这件衣服？”要不是因为那个售货员，露西很可能会表示反对，但在一位陌生人面前，她却不敢，她还没有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自己已经在更衣室里了。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把帘子微微拉开，想看看她穿上新衣服是什么样子；尽管她试穿的那件衣服并不怎么吸引人，我还是大吃了一惊：它那多少有点现代化的款式已经使她完全变了样。“我看一看好吗？”我听见那位售货员在我身后问，

接着他对露西和那件衣服大加赞美。然后他转过身来，盯着我的徽章，问我（预先就已经完全知道答案）是不是一个政治犯。我点点头。他朝我眨了眨眼睛，带着微笑说：“我可以给你们看几件好一点的货色。你们愿意看吗？”说完他立刻拿出一批时髦的夏装和一件绚丽的夜礼服。露西一件一件地试穿；它们穿在她身上都很好看，每一件都使她看上去不同；她穿着那件夜礼服时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一个关系发展中的转折点并不总是戏剧性事件的结果；它们往往起源于一些最初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我对露西的爱情发展中，衣服正是这样的一件小事。在去服装店的那天之前，露西对我来说一直意味着很多东西：一个孩子，一泓慰藉和温情的泉源，一帖止痛膏，一条摆脱自我的逃路——事实上是一切，只除了是一个女人。我们的爱情就这个词的肉体意义来讲还没有超出过接吻阶段，而且她接吻的方式就象她身上的一切那样稚气（我已经爱上了那些吻——长而纯洁，干燥的嘴唇紧闭着，当它们温柔地接触在一起时，互相数着对方的细纹路）。

总之，在此之前，我虽然钟情于露西，但她却没有任何肉欲；我已经逐渐习惯了缺乏情欲，以至于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它，我与露西的关系似乎是如此理想，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还缺少点什么。一切都是那样协调地配在一起：露西和她那修道院的灰色服装，我和我那修道院的清白想法。然而，当她一穿上别的衣服，这个平衡就打破了。蓦然，我眼前的露西与我想象中的露西失去了一切联系，我意识到她可能远远超过了我心目中那个楚楚可怜的乡下姑娘。我突然看见了

一位迷人的女人，身材优美匀称，漂亮的裙子诱人地衬托出一双美丽的大腿。她那暗灰色的防护罩一下子就消失在鲜艳雅致、做工考究的衣服里。我对她身体的展示感到大为惊诧。

露西与另外三个姑娘同住一间屋子。那幢宿舍每周只有两天允许来访，并且只有三个小时，从五点到八点；来访者需要签署他们到达的时间，交出他们的身份证，以及签署他们离去的时间。更糟的是，露西的每个同室都有自己的男朋友（或几个男朋友），每个人都需要利用房间来幽会，这就意味着她们相互间会不断发生口角，在背后指指戳戳，把某一个人侵占其他人的每一分钟都仔细记录下来。这一切如此令人不舒服，以致我从来没有想过去那里看望露西。但是，我碰巧得知那三个姑娘一个月后都要去一个义务农业大队。我告诉露西，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到她的房间同她约会。她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愁眉苦脸地告诉我，她宁愿在室外与我见面。我告诉她，我渴望能在一个没人打扰，完全属于我俩的地方同她待上一会儿；我告诉她，我想看看她是怎样生活的。她无法再拒绝了，至今我还记得，当她终于同意时我是多么激动啊。

10

那时我来俄斯特拉发已经快一年了，最初是那样难以忍受的兵役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当然，它仍然是令人讨厌，使人筋疲力尽，可我找到了忍受它的方法，交几个朋友，甚至也会很愉快；对我来说，那个夏天是绚丽多彩的（树木覆盖

着煤灰，但在我这个矿工的眼里看去，它们却似乎绿叶成荫）；然而，事物往往是这样，福兮祸所伏：那个绿叶成荫的夏天却孕育着秋天的一连串不幸事件。

这一切是从斯塔纳那里开始的。他在三月份结婚的几个月里，逐渐听到了一些关于他老婆在酒吧间鬼混的流言；他感到非常难过，一封又一封地给她写信；她的回信使他平静了一阵，可是不久（大约在天气开始变暖的时候）他的母亲来看望他；那个星期六他整天都和她待在一起，后来他脸色苍白，嘴唇紧闭地回到营房；起初，他羞愧得对任何人都没吐露一字，可是第二天他就对昂扎讲了，接着又告诉了别人，很快我们就都知道了；当斯塔纳发现我们全都知道了这事，他便越发谈个没完没了，象是着了魔；他老婆一直都在外面到处乱搞，他要去她那里扭下她的脖子。他想从指挥官那里得到两天的假期，但指挥官根本不愿意：他从矿上和营房听到的只是对斯塔纳的抱怨，埋怨他心不在焉，脾气暴躁。于是，斯塔纳只好请求得到二十四小时的假。指挥官起了怜悯之心，同意了他的请求。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我都是道听途说的：

他一到达布拉格，就抓住了他的老婆（我称她是他的老婆，但实际上她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她厚颜无耻地（也许还是急不可耐地）承认了一切；他开始打她；她便回手反抗；于是他掐她的脖子，把一个瓶子猛掷在她头上；她倒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顿时意识到他干了什么，惊恐万状地逃掉了；不知怎么他竟在山里找到一座空寂无人的夏日别墅，于是躲藏在里面，战战兢兢地等着因谋杀

罪而被抓起来，然后绞死。两个月后他们找到了他，以开小差而不是谋杀罪把他交付审判。原来他的老婆在他跑掉以后不久就恢复了知觉，这次历险除了头上起个肿块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宣示的了。在他服刑期间，她同他离了婚，如今她成了布拉格一个著名演员的妻子。我时常去看这位演员的演出，为的是使我想起了斯塔纳和他那不幸的结局：刑期结束以后，他继续留在那个矿上；一次偶然事故使他失去了一条腿，截肢造成了他的死亡。

听说那个女人是各种生活放荡不羁的圈子的骨干，她不仅使斯塔纳倒了霉，而且还使我们大家都倒了霉。至少我们是这样看的。当然，我们无法绝对肯定（象大家所假定的那样）围绕着斯塔纳失踪的流言与部长委员会事后不久视察我们的营房之间是否有一种因果联系。不管怎样，我们的指挥官被免了职，代替他的是一个年轻军官（他至多二十五岁）。从他到达那天起，一切都不同了。

正如我说的，他约摸二十五岁。不幸的是，他看上去年轻得多，事实上就象一个小男孩，因此要使我们对他肃然起敬，对他来说就益发重要。我们常常私下议论他在镜子前面排练他的讲话，把它们背诵下来。他是个冷冰冰的人，不喜欢喊叫，总是以非常沉着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他把我们所有人都视为罪犯。“我知道，如果看见我被绞死，你们全都会很高兴。”这位娃娃指挥官第一次召集我们时就对我们说，“但是，倘若这里真有人要被绞死，那就应该是你们，而不是我。”

初次的冲突很快就来临了。我记得最深的是画家塞勒克

卷进去的事件，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次事件太令人痛快吧。在服役的头一年，塞勒克画了大量壁画，这些画在前任指挥官统治下得到了它们应有的权益。如前所说，塞勒克特别喜爱胡斯派战士和他们的首领简·杰士卡^①，可是为了使朋友们愉快，他总要增添一个裸体女人像，在指挥官面前把她说成是自由或祖国的象征。新来的指挥官很想利用塞勒克为他服务，把他召去，要他为那间上政治教育课的教室画点什么。他趁便要塞勒克忘掉所有那些杰士卡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当前，表现红军以及它与我们工人阶级的联盟，表现红军在1948年2月社会主义胜利中的作用。”“是，长官！”塞勒克说，随即着手工作。他伏在地板上画了几个下午，然后沿房间那头的墙钉上许多张大纸。当我们第一次看见他完成的作品时（足有五英尺高，二十五英尺长），大家全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了。画的中央立着一位英姿焕发、穿着暖和的苏联士兵，肩上背着一支冲锋枪，一顶粗毛皮帽子往下拉到耳朵上，周围簇拥着八、九个裸体女人。身旁站着两个女人正卖弄风情地抬头盯着他；他的手臂一边搂着一个，正在喜气洋洋地大笑。其他女人搔首弄姿地望着他，朝他伸出双臂，或是仅仅站在那里（有一个是躺着的），炫耀她们漂亮的身材。

塞勒克占据了画前面的位置（我们在等待政治教官到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给我们讲解他的画：瞧这儿，在我们中士右边的是艾娜，她是我的第一个女人。那时

^① 简·杰士卡（约1376—1424），波希米亚军事统帅和民族英雄。

我只有十六岁，而她是一位军官的妻子，因此她在中士身旁应该感到非常自在。我是按照她当时的模样画的，你们可以相信从那以后她已经人老珠黄了。可那时她还很丰满，特别是这里（他用手指作为教鞭）大腿周围。由于她的臀部更具有魅力，我在这里又画了一个她的形象（他走到画的一个边缘，指着一个女人，她的光屁股好象快要退到房间里）。我也许把她庄严的臀部画得比实际大了一点，但这正是我们所喜欢的，对吗？不管怎样，那时我还很年轻，傻头傻脑，不知道她干吗老是要我给她屁股上来点“爱的轻拍”。一天，她感到厌倦了，便说，那不是我的意思。来呀，把小妇人的裙子往上拉，于是我不得不把她的裙子拉上去，把她的内裤拉下来，可我仍然象以前那样拍打她，她真的生气了，开始叫起来，打我呀，你这流鼻涕的小家伙，你！狠狠地打我呀！瞧，我当时真是个大傻瓜。不管怎样，这一位（他指着中士左边的姑娘），这一位是娜佳，我与她结识的时候已经很有经验了，她有一对小乳房（他指着它们），两条长腿（他指着它们），非常漂亮的容貌（他也指了指它们），她与我同一年级，是我们人体写生班的模特儿，我对她熟悉透了，我们都很熟悉她，我们所有二十个人，她常常站在教室中间，而我们使用她的身体来研究人体，但是我们没有人用手指碰过她：她母亲总是在那里等着，课一结束就把她急急忙忙带走，因此她可以展示自己而不承担任何后果。而这一位（他指着一位懒洋洋地靠在具有传统风格的沙发椅上的女人），这一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娼妇，请靠近一点（我们照办了），瞧瞧她肚皮上的那个小痕迹，据说那是烟头烧的，是一个与

她有暧昧关系的善妒女人干的，因为，是的，先生们，她两种方式都喜欢，顺便提一句，她有一个箱子，可以容纳你想塞进去的任何东西，这是一架真正的手风琴，啊，她可以装下我们所有的人，更不用说我们的老婆、儿女和家庭全体成员。

塞勒克显然正讲得起劲，但却被政治教员打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座位上。政治教员在老指挥官时期就对塞勒克的壁画习以为常，因此他甚至没有看一眼塞勒克的最新创作，便开始声音洪亮地读一本阐明社会主义军队与资本主义军队之间区别的小册子。正当塞勒克那番解说在我们头脑里逐渐淡化，我们开始沉溺于各自的幻想中时，娃娃指挥官走了进来，我们蓦地站起来。他是来检查政治教员的讲课的，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示意我们坐下，就被墙上画的东西惊呆了。他没让政治教员继续讲下去，而是冲着塞勒克咆哮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塞勒克走出队伍，站立在画前，开始慷慨激昂地演说：这幅画象征地表现了红军在我们国家最近进行的这场斗争中的重要性。这里（他指着那位中士）是我们的红军，红军的身旁（他指着那位军官的妻子）是工人阶级和（他指着他的校友）革命的二月。瞧，这些（他依次指着其他女人）象征着自由，胜利和平等，这里（他指着那位展示臀部的军官的妻子）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塞勒克刚一说完，指挥官就宣布这幅画是对红军的侮辱，并命令立刻把它去掉。他告诉塞勒克，他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为什么？我低声问。指挥官听见了，于是问我是不是有反对意见。我说，我喜欢这幅壁画。指挥官说，他并不感

到吃惊；对手淫者来说这幅画当然很完美。我提醒他，不是别人而正是米瑟贝克把“自由”雕刻成一个裸体，阿莱斯的名画《伊泽拉河》也是画成三个裸体，从古至今画家们都是用裸体来比喻各种事物。

娃娃指挥官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重申那幅壁画必须取下来。也许是我们设法使他失去了警惕，因为塞勒克没有受到惩罚，至少这次没有。但是指挥官却对塞勒克和我着实产生了反感，不久他就先使塞勒克，然后使我受到了惩戒性的看管。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天，我们连正在一个偏僻的营区用镐和铁锹干活。由于在一个昏昏欲睡，毫不戒备的下士看管下，我们多数时间都在倚着铁锹谈天说地，没有注意到娃娃指挥官正在远处监视我们。当他用命令的口气叫道：“士兵扬，立即到这里来！”，我们才意识到他的存在。我表现出精力充沛的样子抓起铁锹，走了过去，在他面前立正。“这就是你对工作的态度吗？”他问。我已不大记得我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可我知道我不会太无礼，因为我根本不想让我在军营里的生活变得更艰难，或者毫无必要地去冒犯一个能完全摆布我的人。可是，听到我那清白无辜，甚至怯生生的回答后，他的目光变得更严厉了。他走上前，抓住我的胳膊，用极为熟练的柔道绝技给我来了一个大背膀，然后在我身边蹲下来，把我压在地上（我丝毫没有企图自卫，因为我惊魂未定）。“还想试试吗？”他大声问，好让大家都能听到。我告诉他不想试了。他命令我站起来立正，然后对已集合好的连队宣布：“我要关士兵扬两天禁闭。不是因为他不服从。这

个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我已用我的手处理了。不，我要关他两天禁闭是因为他磨洋工。下一次你们其他人也可能遭到同样下场。”说完他转过身，风度翩翩地大步走掉了。

当时我对这个人简直是恨透了。但是，仇恨往往把事物照得太亮，使它们不能予人安慰。当时我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是一个报复心强，刁钻狡诈的混蛋；现在我把他看成是一个在扮演一个角色的年轻人。年轻人禁不住要扮演：他们正在以不成熟挤进一个成熟的世界，不得不扮演成熟。因此，任何对他们有吸引力的人，看上去很时髦的人，符合他们目的的人，他们就以这样的人为榜样，为典范——极力扮演得象他一样。

拿这位娃娃指挥官来说，他还不够成熟，也缺乏经验，但他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群他不可能理解的士兵的头儿。如果他能够对付这个局面，那仅仅是因为他读到和听到的大量东西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面具：廉价的令人害怕的冷酷英雄，具有铁石心肠的硬汉子，能够击倒一帮家伙，靠机智而不是靠言语生存的男人，对自己拳头的信任使他从整体上信任自己是男人。他愈是意识到自己孩子气的外表，就愈是狂热地扮演铁人的角色，他的表演也就愈不自然。

当然，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遇到青少年的角色扮演。在审讯明信片事件的时候，我刚满二十岁，我的审讯者们比我大不了多少。他们也基本上是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面具，冷酷无情的、禁欲的革命者的面具，来遮盖他们真实面目的孩子。玛格塔怎么样？她不正是在效仿某部B级电影里的女拯救者吗？泽曼尼克不正是突然被一种感伤的道德所攫住了吗？

那不也是一个面具吗？而我自己呢？我不也是在几个面具之间跑来跑去，直到被绊倒，失去了平衡吗？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装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①，年轻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时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

在我回忆所有那些期待着长大的孩子时，我不禁想起了亚历克夏。他也有一个大角色要扮演，一个他的理智和经验都无法胜任的角色。同那位指挥官一样，他也显得比他的岁数年轻，尽管他缺乏那位指挥官的魅力：他身材瘦小，近视眼从厚厚的镜片后面望外窥视，满脸黑头粉刺（一种可能是永恒的青春期的礼物）。他曾在步兵军官预备学校服役，可是突然被调到我们这里。结果是这么回事，那些臭名昭著的公开审讯即将开始，每天，在全国各地的党支部，法庭，和警察分局，人们在举手赞成剥夺被告的所有信心，荣誉和自由。亚历克夏是一位新近被捕的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儿子。

一天他蓦然就冒了出来，分到斯塔纳的空床铺。他对我

^① 尼禄（公元37—68），罗马暴君，在位期间公元54年—68年。

们表现出冷淡的态度，一如当初我对我的新伙伴表现得那样，当得知他是一名党员时（他还没有被开除出党），其余的人当他的面说话就开始注意了。

他一发现我曾经是一名党员，就跟我攀谈起来；他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决心经受住生活摆在他面前的最严峻考验，决不背叛党。然后他给我念了一首他写的诗（他的第一首诗），这首诗是他听到要调到我们团来时写的。其中几行这样写道：

同志们，随你们高兴干什么，
把我在泥浆里拖，还朝我唾沫。
可是同志们，尽管粘着泥浆和唾液，
我还是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的行列。

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一年前我也有过同感。但是随着时光消逝，我已不再为此烦恼不堪；露西，我的向导，把我引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使我离开了亚历克夏及其同类备受折磨的那个领域。

11

当那位娃娃指挥官正忙于建立他的新统治之际，我主要关心的却是得到一次休假；露西的同屋已经离开到乡下干活去了，而我也已有一个月没有获准出营房；指挥官已经详细记下了我的面孔和名字，在部队里这是一个士兵碰上的最倒霉的事。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明我生活中的每一小时都得随

他的喜欢而定。至于我的休假，景况是不妙的；从一开始他就宣布，只有那些经常自愿在星期天加班的人才能获准休假，于是我们大家都在星期天加班，但这样的生活太悲惨了，整月都在矿上干活，片刻都不能离开，即使谁得到了星期六的休假，早晨两点光景蹒跚着回来，第二天他又必须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去干活，好久以后都看上去象一个梦游者。

我与大家一起开始在星期天加班，尽管这样做并不能保证得到一次休假：星期天加班挣下的表现很可能因没有把床铺好或违反其它类似的规则而被抵销。但是（至少有时候），权力不仅以恶意的形式而且还以仁慈的形式来显示它的专横意志。娃娃指挥官对我表示了几周的恶意之后，他的自负准是得到了满足。他可以向我显示仁慈了，于是在最后的时刻，露西的同屋要回来的前两天，我终于得到了休假。

坐在桌旁的那位老女人记下我到达的时间，并告诉我上四楼，当我来到长长的过道尽头，举手敲门时，我激动得浑身发抖。门开了，可是露西躲在门后，映入我眼帘的是房间本身；乍一看，它一点也不象一间集体寝室；我好象步入了某座圣殿：桌上摆设着一束闪烁的金色大丽花，窗户两侧是两棵很大的橡胶植物，这里的一切（花瓶，床，地板，甚至画片）都用绿色的小树枝结成花彩（我立刻就认出是芦笋蕨类植物），仿佛期待着耶稣基督骑在一匹驴子上进来。

我把露西搂在怀里（她还躲在门后）亲吻她。她穿着我们去商店那天我给她买的黑色睡衣和高跟鞋。身穿黑色衣服站在为节日装饰的青枝绿叶之中，她看上去就象一个女祭司。

我们关上背后的门，直到这时我才辨出房间的本来模样，看到四张铁床，四个有缺口的床头柜，一张桌子，以及青枝绿叶下的三把椅子。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减弱我在露西开门那一瞬间所产生的喜悦：不仅是因为在一个月里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几小时，而且还因为在一年中我第一次处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舒适感真叫人陶醉。

每当我与露西一起去散步，空旷的户外总是使我受到营房和我在那里的命运的束缚；永世长存的空气流就象一根无形的锁链把我绑在营房的大门和大门上我们为人民服务的题词上；我觉得简直都没有任何一个我可以停止“为人民服务”的地方；整整一年我没有踏进过一个私人的小房间。

而突然之间我就处在了一个崭新的境地：我有三个小时的绝对自由；我可以无所畏惧地（违反所有的军纪）脱掉帽子和皮带，脱掉衬衣，裤子，靴子，脱掉一切，如果我愿意，甚至还可以在它们上面跳上跳下；我高兴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根本不用担心被人监视；除此之外，这房间还挺舒适暖和，温暖和自由就象滚烫的酒涌上我的脑际；我用手搂着露西，吻她，把她带到床边。床上的小树枝（床上另外铺着一床廉价的灰色毯子）使我深为感动；我只能把它们解释成婚姻的象征，我既吃惊又感动地想到，露西以她的天真复活了一种古老而受到敬仰的民间习俗，她希望用一切应有的仪式向她的童贞告别。

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尽管露西在回报我的吻和拥抱，但她却在踌躇。她的嘴唇虽然渴慕地吻着我，却又一直紧闭着；她的整个身子虽然紧紧靠着我，但当我把手滑到她的裙

子下面抚摸她那温暖的大腿时，她又脱身离开了。我开始明白了，我那忘乎所以、不顾一切的欲望并没有得到响应，我记得那个时刻（我进入房间后还不到五分钟）我的眼里涌出了失望的泪水。

我们相挨着坐下（压坏了我们屁股下可怜的小树枝），开始谈起话来。几分钟后（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我又试图搂抱她，可是她开始抵抗；于是我和她扭斗起来，但很快就意识到我们的扭斗完全不是爱情的扭斗，它会把我们爱的关系变成某种丑陋的东西，露西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斗，一场猛烈的、几乎是拚命的战斗。我唯一的选择就是退却。

我试图用话来说服她，于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记得当时我告诉她，我爱她，爱情意味着互相给予，毫无保留；当然，我并没有说出什么有独到见解的话（我的目的也并非特别新颖）；但是，即使我的论证谈不上高明，它也是无可辩驳的；露西也没有打算反驳，而是保持着沉默，要不就说：“请不要，不，”或者“现在不，今天不……”，并且试图（无能得令人感动）改变话题。

我换了一个方式：你该不会告诉我，你属于那类引诱男人只是为了取笑他一番的女人吧，你不会那样无情和残忍吧……我又一次去搂抱她，我们再一次进行了一次短暂而令人沮丧的搏斗，于是我再一次感到了搏斗的丑恶。

突然，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要如此抵抗的原因，我的上帝，我刚才干吗没想到这点？她不过是一个害怕爱的孩子，一个害怕未知事物的受惊的处女。我决定掩饰我的急不可耐——它准是把她给吓坏了——变得更温柔一点、钟情一点，

使爱的行为不过成为一种我俩彼此都熟悉的温柔、钟情的抚摸的发展而已。我不再强求，并且开始爱抚。我吻她（似乎吻了一个世纪），紧紧搂住她（不老实地，狡诈地），尽可能不引她注意地使她成斜卧姿势。我终于成功了。我抚摸她的胸部（对此她从不反抗），我告诉她，我要对她的整个身子温柔体贴，因为她就等于她的身子，我要对整个的她温柔体贴；我甚至设法把她的裙子往上拉了一点，在她膝盖上方五吋，然后八、九吋的地方吻起来；我没能再进一步；当我打算把头移到她的大腿之间时，她惊恐地挣脱我，从床上跳下来。她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痉挛表情。

露西，露西，是不是光线使你这样害臊？你宁愿在黑暗中吗？她就象抓住救生衣一样抓住我的问话。是的，她因为光线而感到害臊。我走到窗户跟前，打算拉上窗帘，可是露西叫起来：“不，不要这样！不要拉上窗帘！”“为什么？”我问。“因为我害怕。”她说。“你害怕什么，光线还是黑暗？”她没有回答，反而啜泣起来。

她的抵抗一点也引不起我的怜悯；在我看来，她的行为是愚蠢的，既过分又不公平，这使我痛苦，我不能理解。我问她作如此的搏斗是不是因为她是处女，是不是因为她怕痛。对我的每一个问题她都顺从地点头，希望某个提问会给她一条出路。我告诉她，她是一个处女，这真是太好了，她将从一个爱她的人那里了解到爱的全部含义。“你渴望成为我的，这不就得了吗？”是的，她渴望，她说。我再次搂她，而她再次反抗。我尽了最大努力才没让自己发脾气。“你干吗老是反抗我？”“下一次，”她说，“我愿意，我想要，但下

一次吧，在另外的时间，不要在今天。”“为什么不要在今天？”“不要在今天。”她回答。“可是为什么？”“请不要在今天。”她回答。“那么在什么时候呢？你很清楚这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机会。明天你的同屋就要回来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能单独在一起呢？”“你会找到一个地方的。”她说。“好吧，”我说，“我会找一个地方。但你要答应和我一道去。那地方可能没有这个房间舒适。”“没关系。”她说，“没关系。只要你喜欢就行。”“那么好吧，可是答应我，到了那里你要成为我的妻子，答应我，你不会进行反抗。”“好吧。”她说。“答应了？”“是的。”

我明白我目前只能从露西那里得到这个允诺。它虽然不能令人满足，但总比什么都没得到强。我抑制住愤怒，把剩下的时间用来谈话。离开的时间到了，我抖掉军服上的芦笋蕨类植物，拍了拍露西的脸，告诉她我将什么都不想只想着我们下一次的约会（我说的是实话）。

12

不久以后，一个霪雨绵绵的秋日，我们从矿井返回营房，步履艰难地走过一条满是水洼的路。我们身上溅着泥，浑身湿透，渴望能休息一下：我们中大多数人整整一个月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了。可是刚一吃完饭，那位娃娃指挥官就把我们叫出去，向我们宣布，在下午检查我们的营房时，他发现了一些违反规章的事。然后他把我们交给军士们，命令他们额外训练我们两小时，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由于我们没有武器，操练和格斗练习就特别显得毫无意

义；它们唯一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贬低我们的时间的价值。记得在这位娃娃指挥官的统治时期，有一次我们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把沉重的木板从营区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第二天下午我们又把它们拖回原处；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拖了十来天。然而，在矿井干了一天后的，我们在营区内干的一切活儿都是类似于拖木板的活儿。这一次，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来回拖来拖去的不是木板而是我们自己的身躯；我们使身躯向后转，向右转，我们把它们摔在地上，又把它们抬起来，我们带着它们到处跑，拖着它们穿过泥泞。三小时后，娃娃指挥官露面了，示意军士们把我们带去进行体育锻炼。

掩藏在营房后面有一小块可以用来踢足球、战斗演习或赛跑的田野。军士们决定让我们进行一场接力赛。我们连由九个班组成，每班十个人，因此我们组成了每队十人的九个队。即使把我们累得趴下，军士们也用不着感到内疚，但因为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所以禁不住一有机会就要表现一下，他们决定与我们对抗，并且组成了自己的队。

他们解释了半天才使我们明白了他们的打算。即头十个人从田野的一边全速跑到另一边，每一个人都会发现那里有人在等着他，接着这批人又全速跑回到头十个人起跑的地方，这时候又有另外十个人在等着他们，等等。然后他们不辞辛苦地点出我们，把我们分派到田野的两头。

在矿井里干完活，又进行了操练，我们已累得要死，一想到还得赛跑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我有了一个简单的主意：干吗不来一次决一胜负呢？我把计划告诉了一两个朋

友，它立刻就传了开去。随着这计划一个传一个，疲倦不堪的士兵堆里不时发出一阵窃笑。

最后我们各就各位，准备赛跑，这种赛跑在我们看来自始至终都是荒唐的：虽然我们将穿着军服和笨重的靴子赛跑，我们还是必须在起跑线上跪下；虽然我们以很不正规的方式传递接力棒（接棒的人要面对赛跑者），我们还是有真正的接力棒来交接和一把真正的手枪来给我们发出起跑信号。在第十队列中的那位下士（军士们的第一位赛跑者）以危险的高速射了出去，而我们（我在第一棒）却慢慢地直起身，移动着缓缓的步骤出发；跑了二十码后，我们拚命忍住才没有大笑起来：下士已经快跑到田野的另一头，而我们却一起落在后面，尽量做出气喘吁吁的样子。不久，田野两头的士兵开始对着我们喊叫起来：“加油！加油！加油！……”半途上我们遇到了军士队的第二棒，他正朝着起跑线飞奔。当我们终于到达田野的另一头，递出接力棒时，第三名军士已经接过接力棒冲了出去，正准备领先我们一圈。

今天我回顾那次比赛，把它看作是黑色徽章的最后一次反抗。伙伴们花样百出，各显神通：昂扎简直是一瘸一拐地前进，我们拚命为他加油，他终于比别人先到达两步而获得了英雄般的胜利，大家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吉普赛人马特洛斯在地上摔了八九次；塞勒克每跑一步都把膝盖抬起来碰到下巴（这样做肯定比正常的全速跑还要累人得多）；没有任何人拆我们的台：彼得里奇，这位恪守教规的（也很顺从的）和平宣言起草者没有使我们失望，他以别人同样的速度小步朝前跑，但仍保持着尊严；不喜欢我的巴威尔·佩克尼也没

有辜负我们；年长的安布罗兹直挺挺地跑，双手背在后面；红发皮特兰一边跑，一边发出尖利的叫声；瓦尔加，这位匈牙利人一直高喊着“乌拉！”——没有任何人破坏这个精采的小游戏，它使我们全都捧腹大笑。

这时，我们望见娃娃指挥官从营房朝田野走来。一位下士也看见了他，跑过去向他汇报。首长听他讲完后便走到田野边亲自观看比赛。军士们（他们的最后一棒早已冲过终点线）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对我们叫道：“赶快！快点！快点！”可是我们的喝采声完全把他们的声音淹没了。军士们不知道该不该停止比赛；他们跑来跑去地交换意见，拿眼睛望着指挥官，可是指挥官根本不朝他们的方向看一眼；他正在盯着比赛，眼里透出冷冰冰的目光。

终于轮到了我们的最后一棒。碰巧亚历克夏也在里面，我很想看看他会怎样表现。果不其然，他想破坏我们的兴致。他全力朝前跑在前二十米就领先了五米。但接着某种奇特的事发生了：他的步子慢了下来，他不再遥遥领先。一刹那间我意识到，不管亚历克夏多么想扫大家的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他病得很厉害，一点体力都没有了，两天以后他们就将不得不让他离开矿井里的重活。在我看来，正是这个意识使他的跑成为整个笑剧中最精采的部分。瞧，他跑来了，尽管他竭尽全力，但与落在他后面五步远，以同样速度懒懒跑着的伙伴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军士们和指挥官肯定相信，亚历克夏的轻快起跑与昂扎的佯瘸，马特洛斯的摔交，以及我们的欢呼一样，都是这场喜剧的一部分。亚历克夏的拳头完全象他身后的那些赛跑者一样紧握着；他们完全象亚历克夏一样在

使劲和喘气。所不同的是，亚历克夏感到真正的疼痛，克服疼痛的努力使真正的汗水从他脸上不断流下来，跑到田野的一半，亚历克夏的步子更加慢了，几个扮小丑的赛跑者逐渐赶上了他；离终点线三十米处，他干脆停止跑了，蹒跚着走到终点，一只手使劲按在腹股沟左侧。

指挥官命令我们集合。他问我们为什么跑得那样慢。“我们累了，首长同志。”他叫凡是累了的人举手。我们举起了手。我朝亚历克夏望去（他站在我前面的一排）；他是唯一没有把手举起来的人。指挥官没有注意到，于是说：“我明白了。你们所有人。”“不，首长同志。”“谁没有累？”“我不累。”亚历克夏说。“你不累？”指挥官盯着他问，“我可以问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亚历克夏回答。队列中起了一阵嘀咕和讪笑。“最后到达终点的那一位是你吗？”指挥官问。“是我。”亚历克夏说。“可是你不累。”指挥官说。“不累。”亚历克夏回答。“如果你不累，那么你是在故意破坏这场比赛。对于有预谋的反抗要关你两周禁闭。其余的人因为累了，所以可以原谅。但是，由于你们在矿井里的产量太低，你们必须在假日拚命干。出于对你们健康的关心，我要取消你们所有人下两个月的休假。”

在去禁闭室之前，亚历克夏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责备我表现得不象一名共产党员，并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问，我究竟是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我回答说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在这里，在兵营，两者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里的界线是另外划分的，唯一有效的界线是看你属于那些失去了对自己命运支配的人还是属于那些剥夺了他们的这种权利，可

以随心所欲处置它的人。但是，亚历克夏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与反动派之间的界线哪里都适用，我们营队的全部目的就是保护优秀的共产党员，而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我问他，娃娃指挥官把他亚历克夏送到禁闭室关两周，对待所有人就象成心要使他们都成为社会主义的宿敌，以此来捍卫社会主义而反对它的敌人，他认为如何。亚历克夏承认，他也不喜欢指挥官。可是当我说，如果我们这里有一条划分社会主义和反动派的界线，那么他就应该在指挥官那一边时，他粗暴地回答说，他正是属于那一边。“我父亲因间谍活动而被捕。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党怎么能信任我？不信任我正是党的职责。”

几天后我又与昂扎谈了一次话。话题却截然不同：我对我们两个月不放一次假牢骚满腹（心里想着露西）。“别发愁，卢德维克老兄，”他说，“我们出去的次数会更多的。”

对接力赛的成心破坏增强了我们的团结感，导致了一阵突发的活跃。昂扎组织了一个很小的委员会来寻求各种不请假外出的可能性。在四十八小时内，一切便都准备停当：设立了一笔行贿基金；收买了我们营房里的那两名军士；栅栏最关键地方的几股铁丝已被悄悄剪断，那地方在医务室附近，离村庄的头几幢小屋只有十五步；最近的那幢小屋属于一位我们在矿井认识的矿工；伙伴们没费多少周折就说服了他离家时不锁上大门；士兵只需悄悄地到达营房栅栏，从下面爬过去，全速跑过那十五步路就到了那幢小屋的大门口；一旦进入屋子，他便绝对安全了；他只要穿过房子，出去就到了大街。

尽管这条路比较稳当，可我们还是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不滥用它。要是太多的人同时溜出军营，他们的不在立刻就会被注意到。因此，昂扎的特别委员会不得不控制每天不请假外出的人数，并安排了一个长期的日程表。

但是还没轮到我，整个行动计划就惨遭失败了。一夜，指挥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住处，发现少了三个人。他找来负责的军士（他没有报告这些人不在），以非常自信的口气问他，我们给了他多少钱。这问题使下士很窘迫，他以为指挥官已经知道了内情，便丝毫没有打算隐瞒此事。当指挥官让他与昂扎对质时，他进一步确认给他钱的人就是昂扎。

这位娃娃指挥官按其所愿处置了我们。首先，他让那名军士、昂扎和三名不请假外出的士兵受到了军事审判。（我甚至没来得及向我最好的朋友告别；这一切发生在第二天早晨，而我们当时正在矿井；几年后我才听说他们全都被宣判有罪，昂扎被判关监一年）。然后，在下一次集合时，他宣布他要把对休假的禁令再延长两个月，并把我们都置于一个特殊纪律的统治下。他还要求修建了两个瞭望塔——建在兵营的两头——一组探照灯，要来两条受过专门训练的德国牧羊犬守护兵营。

指挥官的进攻是那样突然和有效，因此我们全都确信一定是有人告发了昂扎和他的计划。不是因为我们的营是告密者的温床（对这种行为我们一致表示蔑视），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始终都存在：为了改善我们的命运，按时获得赦免，得到表现好的证明，为某种未来打好基础，告密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有效的办法。尽管我们自己（我们绝大多数人）

抵制这种最令人憎恨的行为，可我们却仍然禁不住要怀疑别人会这样做。

这一次，怀疑就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很快就变成了集体判罪（尽管对指挥官的进攻的其它解释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并且无条件地栽到了亚历克夏身上。事情发生时他正在关禁闭，但他仍然得下矿井干活，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和我们一起，因此人人都断定他有足够的机会（“带着他那对训练有素的耳朵”）获知昂扎计划的一些情况。

可怜而瘦小的亚历克夏真正经受了磨难：领班（我们的一个人）开始分配给他最重的活，他的工具突然开始不翼而飞，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工资去买新的工具；他成了不断的侮辱和讥讽的对象，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恶作剧；他回到营房的那天，有人在他床铺上方的木壁上用黑色的机油写了四个大字：谨防密探。

昂扎和另外四个犯有过失的人被押送走后几天，我偶然在傍晚时分走进营房。除了亚历克夏，那里没有任何人，他正在重新理铺。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伙伴们每天都要把他的床铺搞乱好几次。我告诉他，他们都深信是他告发了昂扎。他含着眼泪抗议，说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也决不会告发任何人。“你怎么能说你决不会告发任何人呢？”我说，“你认为你自己是指挥官的同盟。你向他传递消息正是最符合逻辑的。”“我不是指挥官的同盟！”他声嘶力竭地说。“指挥官是一个破坏分子！”接着他向我倾诉了他坐在禁闭室里认真思索后得出的结论：黑色徽章是党为那些不能发给武器，但认为可以再教育好的人而设制的；可是阶级敌人决不

会睡大觉，他们竭尽全力阻止再教育的过程进行；由于他们把惩戒营的士兵看成是反革命的后备军，因此让这些士兵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刻骨仇恨就与他们利害攸关。那位娃娃指挥官如此对待这些士兵，不断向他们挑衅——这显然是敌人的阴谋之一。你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可能会潜伏在什么地方。指挥官肯定是敌人的代理人。但是亚历克夏知道自己的职责，他已经起草了一份有关指挥官活动的详细报告。我大吃一惊。“什么？你干了什么？你把它寄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他告诉我，他已把他的控告直接寄给了党。

我们走出室外。他问我怕不怕被人看见我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他，提这样的问题真是个傻瓜，如果他认为他的信会到达目的地，那他就是一个更大的傻瓜。他回答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都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他再次提醒我，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被开除出党)，应该表

历克夏也许是一个傻瓜，但他决不是一个告密者，然后我把亚历克夏对指挥官的怨恨告诉了他。塞勒克未受感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傻瓜，”他说，“可我绝对肯定他是个告密者。在我看来，凡是能够公开宣布与自己父亲脱离关系的人都是一个告密者。”我一时没有明白过来，他对我还没有听说此事感到很惊异；还是政治教员本人把那张登有亚历克夏声明的报纸给他们看的，那是几个月前的报纸，声明说：他已与他父亲脱离了关系，因为他父亲背叛和玷污了他生命中最神圣的东西。

那天晚上，探照灯在新建的瞭望塔上第一次照亮了兵营，一名卫兵由一条德国牧羊犬陪伴着巡查带刺铁丝网。突然之间，我感到孤独极了；我渴望见到露西，知道我还得等待整整两个月。我坐下来给她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我将有很长时间看不到她；我们不准出兵营，我很难过。她上次拒绝给予我那样渴求的东西，对这件事的回忆本来会支持着我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我把信发出去后的第二天，与往常一样：从矿井回来后，我们被迫做向后转、向前走和迅速卧倒，也象往常一样，我做这些动作时，几乎不去注意领队的下士，在我周围前进、卧倒的朋友们，也不去注意我们三面的营房，甚至另一面沿带刺铁丝网栅栏延伸的那条道路。时而有人会路过栅栏；时而有人会停下来（主要是孩子，或单独或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大人们会解释说我们是正在训练的士兵）。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背景，一种着色的麻织品（在带刺铁丝网那边的一切都是着色的麻织品），因此我

是决不会抬头望一眼的，要不是这时有人朝着那个方向轻轻地叫起来：“嘿，姑娘，你在那儿盯什么？”

于是我看见了她。是露西。她站在栅栏旁边，穿着她那件旧褐色外套(当我们购置夏装时，我们决没有想到冬天就要来了)，和我送给她的那双时髦的黑色高跟鞋(它们滑稽地显得很失调)，一动不动地站在栅栏旁边，朝我们这个方向瞭望。伙伴们开始评论起她身上那种不寻常的顺从神态，可是他们的话逐渐流露出那些被迫过着禁欲生活的男人的绝望。下士发觉大家的注意力不集中，很快就明白了原因，可是他无权命令这个姑娘离开栅栏。栅栏外的领域是一个比较

的一个缺口吻起来。

13

露西几乎每天都要来到栅栏边；我在矿井里上早班，因此下午就在兵营里度过。每天我都收到一小束鲜花（一次在检查士兵装备中，中士把花扔在地板上），跟她说上几句话（每次的话都一样，因为我们相互之间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既不谈新闻又不谈思想；我们只希望再向对方保证一句不断重申的真话），几乎每天我都要给她写信；那段时期是我们最热恋的时期。瞭望塔上雪亮的探照灯，夜幕降临时吠叫的警犬，统治我们大家的那位趾高气扬的小男孩——这一切很少占据我的思想，我全部心思都放在露西的探望上。

在由嗜杀成性的狗包围着的兵营里，在因风钻而震动的矿井里，我实际上感到非常幸福；我感到幸福和骄傲，因为从露西那里我拥有了不论是我的同伴们还是我们的军官们都得不到的宝贵东西：有人爱我，并且是公开而坦率地表露出对我的爱情。即使露西不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即使她表达爱情的方式在他们看来相当古怪，可这仍然是一个女人的爱，并且引起了赞叹，怀旧和嫉妒的感情。

我们与人世生活和女人隔离得愈久，女人在我们谈话中占的话题就愈多。每一个单项，每一个细节，都是意味深长的；我们回忆胎记，描出（用铅笔在纸上，铁镐在泥土里，手指在沙里）乳房和臀部的轮廓；我们争论哪一个不在场的躯体曲线最美；我们惟妙惟肖地表演性交过程中吐出的话和

呻吟声；然后我们又重新来一遍，每一遍都要更加添油加醋。当轮到他们时，他们显得越发好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见到我的女友，能够想象出她的模样，把她的实际外表和我的描述联系起来。我不能使朋友们失望；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不得不详述我从未见过的露西的裸体，我从未经历过的我们的爱情之夜。随着我的讲述，一幅她恬静之情焰的精确而又细致的画面展现在我眼前。

……我和她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样子？

在她宿舍的房间里。她在我面前脱掉衣服。既顺从，虔诚，又显然很害羞：她是一个乡下姑娘，而我又是第一个看见她裸体的男人。她虔诚与羞怯使我发狂。当我走向她时，她往后退缩，并用双手遮住她的下身……

……她干吗老是穿着那双黑色的高跟鞋？

我告诉他们，我买那双鞋是为了让她光着身子时穿；她虽然很害羞，但我要她做什么她都照办；我直到最后一刻才脱衣服，而她总是穿着那双高跟鞋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我多么喜欢看见我穿着衣服而她却光着身子的情景！）然后走到食橱边，取出酒来，依然光着身子替我斟满酒杯……

因此，当露西来到栅栏前时，盯着她看的人就不只我一个了；有十来个伙伴也加入了进来，他们非常了解她做爱时的样子（她说什么话，她是怎样呻吟），他们会对她穿的那双黑色高跟鞋说出各种含沙射影的话，并在头脑中想象她在那间小屋里光着身子散步的情景。

我的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回忆一两个女人，并与其余的人共同分享，但唯有我可以提供一个与话语相配的肖像；唯有

我的女人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看得见的。友爱的团结感曾使我十分详细地描述了露西的裸体和性爱动作，现在又令人痛苦地加剧了我对她的欲望。每次她出现在大门口时，他们都要说些猥亵的话，但这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他们决不可能把这些话表演出来（带刺铁丝网和警犬保护着她不受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伤害）；再者，实际上正是他们把她给予了我：他们使我对她的想象变得清晰起来，帮助我描绘想象的画面，增添各种令人陶醉的诱惑笔触；我们都满怀激情地想望着她。每当我朝站在栅栏前的她走去时，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我由于欲火中烧而说不出话来；我不明白自己怎么花费了半年时间才发现她身上的女人气质；只要能与她单独过一夜，我愿意牺牲一切。

并不是说我对她的态度已变得凶狠、粗暴，或者更少柔情。我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是我生平中唯一一次体验到对一个女人的全部欲望；它涵盖了我的整个生命：肉体与灵魂，欲望与感受，悲哀与放纵的活力，对安慰和对粗俗的渴望，对永久占有和对片刻狂欢的渴望。我完全投入了进去，全神贯注，今天我把那些日子看作是一个失乐园（一个奇异的乐园——由一群狗守卫着，并回响着一个下士的口令）。

我决心不顾一切安排一次与露西的约会；我有她的诺言，她“不会进行反抗”，并愿意在我选择的任何地方见我，在我们通过栅栏逃行的匆匆交谈中，她还多次重申了她的诺言，我需要做的只是采取断然行动。

不久我就想出了一个计划。昂扎的偷跑路线还一直没有被指挥官发现。栅栏仍然有一处难以觉察的缺口，与住在营

房对面那位矿工的协定只需要恢复就行了。当然，兵营看守得很严，要想白天溜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夜里，虽说要对付探照灯和警犬，但这些布置与其说是怀疑我们要偷跑，不如说是为了做做样子，使指挥官得到满足，因为企图偷跑意味着有可能受到军事审判；这样做太冒风险了。因此我觉得我有了一个机会。

我需要做的只是在离兵营不太远的地方，给露西和我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藏身处。住在这一带的大多数男人都和我们在同一个矿井里干活，因此不久我就找到一个人（一个五十岁的鳏夫），愿意按我定的价钱（仅仅三百克朗）把他的住处借给我。从兵营可以望见他住的那所房子；我通过栅栏把那所房子指给露西看，并告诉她我的计划；她毫不激动，只是恳求我不要为她去冒任何风险；如果她终于同意去完成这个冒险，那只是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拒绝我。

约好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开始就很奇特。我们刚收工回来，那位娃娃指挥官就象往常一样把我们集合起来听他训话。通常他总是讲战争即将爆发，以及一切反动派（这里他主要是指我们）就要面临的倒霉日子，试图以此吓唬我们。可是，这一次他增添了一些新观点：阶级敌人已经钻进了共产党的心脏，但我们要特地奉劝所有的叛徒和特务，那些藏在面具后面的敌人将受到比那些公开暴露他们思想的敌人还要严厉一百倍的惩罚，因为藏在面具后面的敌人简直就是十足的癞皮狗。“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个这样的癞皮狗。”他命令亚历克夏走出队列，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伸到亚历克夏的脸上。“你见过这封信吗？”“我见过。”亚历克夏说。

“你是一个癞皮狗，一个告密者，一个间谍。但是，当一条狗尖叫时，声音却没有传出去。”然后他把那封信撕成碎片。

“我还有一封你的信。”他接着说，递给亚历克夏一个拆开的信封。“大声把它念出来。”亚历克夏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扫了一下，但一声也没吭。“大声把它念出来！”指挥官重复他的命令。亚历克夏还是一声不响。“你打算念还是不念？”指挥官问，看到亚历克夏仍然沉默不语，他怒冲冲地喊道：“卧倒！”亚历克夏扑倒在泥泞里。娃娃指挥官严厉监督了他一会儿，我们都肯定他马上就要喊出一连串的“起立！卧倒！起立！卧倒！”那么亚历克夏就将不得不站起来，扑倒，又站起来，又扑倒。但是指挥官没有这样做，他让亚历克夏留在那里，自己转过身来，开始从队列前面慢慢走过，一边走一边细细检查大家的装备。当他走到队列的末尾时（这用了他几分钟时间），他又转过身来慢慢地往回走，来到亚历克夏仍旧趴着的地方。“现在念吧。”他说，于是亚历克夏从地上抬起沾满污泥的下巴，伸出右手（右手还紧紧抓着那封信），就趴在那里，大声念起来：“特此通知你，你已于1951年9月15日被开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籍。代表区委会签字人……”然后指挥官命令亚历克夏重新回到队列中，把我们交给一名下士去操练。……操练和政治教育结束后，在六点半左右（此时天已黑了），露西已站在栅栏边。我朝她走去时，她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便离开了。接着是吃饭，唱歌，打扫卫生，最后是熄灯，我在床上一直等到下士睡着，然后迅速穿上靴子，悄悄溜了出去，身上只穿着白色内衣裤和长睡衣；

我穿过过道来到院子，穿着这身夜间的服装实在感到有点冷。栅栏的那个缺口正好在医务室后面。这个位置真是太好了：如果有人拦住我，我可以说我感到不舒服，正准备去叫醒军医。可是没有人拦我；我顺着医务室的边缘走，在房子的阴暗处蹲下；探照灯懒懒地照在一个地点（显然，瞭望塔上的哨兵对他的工作已不再很认真），我还得通过的那段距离处在黑暗中；现在我唯一的问题是要避开那条整夜巡逻的狗；一片寂静（危险的寂静：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在那里大约一直站了十分钟，终于听见了一声狗叫；吠声来自后面，来自兵营的另一头；我一跃而起，冲向栅栏（这段距离不到五码），冲向铁丝没有完全触到地面的那个地点（多亏了昂扎的手工活）；我趴下身，从下面爬过去，跑过最后五步路，到达那位矿工房子的木栅栏。一切正如我们所计划的那样：大门开着，小院那头一扇窗户的窗帘背后亮着一盏灯。我轻轻敲了敲窗子，几秒钟后一个高大的男人打开门，大声请我进去（听到这样的音量我可吓坏了；我没有忘记这里离兵营只有五码远。）

门直接通向房间。我在门口迟疑了片刻，被看到的景象搞迷糊了：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另外五个男人，桌上有一瓶打开的酒；他们一看见我的打扮就大笑起来；他们说他们打赌，我穿着这身长睡衣肯定冻坏了，然后给我倒了一杯酒；我尝了尝：是威士忌，很浓；他们叫我一口喝完；我照办了，接着一阵咳嗽；他们又大笑起来，给我拉来一把椅子。他们问我是怎样设法“越过边境”的，对我滑稽的装束又开了一阵玩笑，称我是“飞跑的内衣裤”。他们都是三十多岁的矿

工，很可能经常在这里聚会；他们一直在喝酒，但还没有醉，他们愉快的兴致很快就使我从最初的惊异（不，应该说是震惊）中平静下来。我让他们又给我倒了一杯这种异常浓烈和刺激的饮料。这时，房子的主人闪进隔壁房间，拿出一套黑色服装。“你看它合身吗？”他问。他差不多比我高一个头，臀部比我宽得多，可是我说：“还可以。”我把裤子套在长内裤上，但我只有抓住裤腰才不会使它滑下来。“谁有皮带？”我的捐助者问。谁都没有。“一根绳子怎么样？”我说。他们果真找来一根绳子，它多少起了点作用。当我穿上甲克衫时，这些人断言（我不太肯定为什么）我只需要一顶圆顶礼帽和一根手杖，就会象查利·卓别林了。为了逗他们发笑，我把脚后跟并拢，足尖向外。裤腿在我的鞋背上微微拂动；他们很喜欢这个样子，并叫我不必担心；我的愿望将成为任何女人的命令。接着他们给我倒了第三杯酒为我送行，主人向我保证，我可以在当晚任何时候敲他的窗子，重新换回衣服。

我踏进灯光暗淡的街道，用了十多分钟才到达露西正在等候的那所房子。我不得不绕过整个兵营，径直从那些灯火明亮的大门前走过；结果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身老百姓的打扮真起作用，卫兵看也没看我一眼，我平平安安地到达了目的地。我打开外面的门（一盏孤零零的街灯照着它），凭记忆往前走（住在这儿的那个矿工告诉过我方向）：向左上楼，爬一节楼梯，正对着的门。我敲了敲。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动，露西打开了门。

我把她搂在怀里（自那位矿工去上夜班后，她就一直在这个房间里）；她问我是不是喝了酒；我说喝了，然后跟她

讲了我溜出来的经过。她说她一直都在发抖，她非常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此刻我才注意到她的确在打颤。)我告诉她，我多么盼望见到她，可是我能感觉到她颤抖得越来越厉害。“怎么啦？”我问她，“没什么。”她回答。“那么你干吗颤抖？”“我很害怕。”她说，轻轻挣脱我的怀抱。

我环顾四周。房间很小，布置得挺朴素：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被单有点脏)；床的上方有一幅宗教画，靠对面的墙有一个食橱，顶上存着几罐水果(这是这个地方唯一有点个人特色的东西)。一盏没有灯罩的灯吊在天花板上，灯光刺得我的眼睛很不舒服，把我那可悲而又可笑的身影十分清晰地投出来；它使我痛苦地意识到我那庞大的甲克衫和松弛的裤子，下面朝外窥视的黑色军用靴，以及最为痛苦的是，我那在白炽灯下就象苍白的月亮在发亮的光头。

“请原谅我这副模样，露西。”我说，然后又向她解释了一遍我这身打扮的必要性。她一再说这没关系；酒力的发作使我失去了自制，我宣称，不，我不能象这副样子站在她面前，于是脱下甲克衫和裤子；可是我里面穿着的睡衣和部队发的难看的长内裤，比我刚才抛掉的那套衣服还要可笑得多。我走过去熄掉灯，但是黑暗没能来解救我：街灯光直接照在房间里。由于我觉得这身可笑的衣着比光着身子还要更令人难堪，于是我干脆把剩下的衣服脱光。我把她搂在怀里(我再一次感觉到她在颤抖)，恳求她脱掉衣服，搬开我们之间的一切障碍。我用手抚摸她的全身，一再重复我的恳求，但是露西要我等一会儿，她不能，不要马上，不要那么快。

我拉住她的手，于是我们在床边坐下。我把头搁在她的

腰股之间，好一会没有动一下。我的裸体在街灯暗淡的黄光下微微发亮。当我意识到结果一切恰与我所幻想的相反时——不是一个裸体姑娘为一个衣着整齐的男人斟酒，而是一个裸体男人躺在一个衣着整齐的女人腰股之间——我突然看清了我的裸体太不适宜。我看见自己就象裸着身子的基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放在悲伤的玛丽亚怀中，我感到恐惧，因为我到露西这里来不是为了寻求怜悯和安慰，而是为了某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于是我再次采取强迫手段，吻她的脸和衣服，偷偷地把我能解开的地方解开。

我没能达到目的；露西又一次挣脱开；我失去了推动力和急欲求成的信心，也用尽了言语和爱抚。我只是伸长四肢躺在床上，裸着身子，一动不动，而露西则坐在我身旁，用粗糙的手指抚摸我的脸。我渐渐被痛苦和愤怒所压倒：我在内心提醒露西为了与她约会我冒的所有那些风险，以及我可能会遭到的所有那些惩罚。但这并不是真正使我烦恼的（所以我对她讲这个——即使只是在心里）；我愤怒的真正根源深深地隐藏在我自己的痛苦中（我羞于告诉她）：一个失败青年所感到的悲悯，无止境的挫折所引起的痛苦，未实现的愿望所带来的永恒的耻辱。我想起了对玛格塔徒劳的求爱；在拖拉机上与那位金发姑娘令人厌恶的交锋，对露西徒劳的求爱，我真想大叫：为什么我必须始终是一个成人——作为一个成人被审判，被开除，被打上一个托洛斯基分子的烙印，被送到这个矿上——而在爱情中却要因我的不成熟而被迫含垢忍辱呢？我恨露西，知道她爱我就越发恨她，因为这使她的反抗显得更加荒唐，更加不可思议，更加令人愤

慨。于是，闷闷不乐地沉默了半小时后，我又发起了新的进攻。

我压在她身上，用尽全身力气想拉起她的裙子，扯掉她的乳罩，抓住她的乳房，可是露西发狂地进行搏斗(一种隐秘的力量使她着了魔，就象我被同样的力量所缠住一样)，终于挣脱开来，跳下床，退到食橱边。

“你为什么要反抗我？”我冲她大叫。她咕哝着什么不要发火和原谅她之类的话，但是作不出任何解释，也说不出任何符合逻辑的话。“你为什么要反抗我？你难道不知道我爱你吗？你一定是疯了！”“那么赶我出去好了。”她说，仍然紧紧地靠着食橱。“我就是要这样做，我正是这样做！你一直在拿我当傻瓜！”我要给她下最后通牒，我叫喊道。她要么把她给我，要么我永远不想再见到她。

我再次走到她面前，把她搂在怀里。这次她没有试图阻止我，可是她显得软弱无力，仿佛整个生命都离开了她。“你的童贞就那么重要吗？你在为谁保全它？”没有回答。“说呀！”“你并不爱我。”她说。“我不爱你？”“不，你不爱。我原以为你爱我，可实际上你不爱我……”她突然哭了起来。

我跪下来，吻她的脚，恳求她。但是她不停地哭，不断地说我不爱她。

突然，一阵狂怒攫住了我。我感到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挡住我的道，不断地从我手中夺走我想要追求的一切，我渴望得到的一切，应该属于我的一切；我感到正是同样的力量抢走了我的党，我的同志，我的大学学业——我的一切，而且总是毫无道理，毫无缘由。我意识到这个超自然的力量此

刻正附在露西身上与我作对，我恨她成了它的工具。我给了她一耳光，因为我打的不是露西，而是那个邪恶的力量。我喊道，我恨她，永远都不想再见到她，永远，只要我活着。

我把她的褐色外套朝她扔去(它一直放在椅背上)，吼叫着要她出去。

她穿上外套，离开了。

我躺在床上，内心一片空虚。我想把她叫回来，因为我刚把她赶走就想念她了；因为我知道与一个穿着衣服，执拗不驯的露西在一起，也要比完全没有露西好一千倍；因为没有露西就意味着生活在绝对的孤寂之中。

尽管我明白这一切，可是我没有把她叫回来。

我光着身子在那张借来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我不能想象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那所房子，与矿工们开玩笑，回答他们和蔼可亲的猥亵问题。

最后(很晚了)我站起身，穿上衣服，离开了。那盏街灯还亮着。我再次绕过整个兵营，在那所房子的窗子上(现在已经没有灯光)敲了敲，等了大约三分钟，在那位打着呵欠的矿工面前脱掉衣服，当他问我过得怎样时，我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句，然后再次穿上睡衣和长内裤，动身回营房。我处在完全绝望，完全无所谓的心境中，一点也不去留意巡逻犬或探照灯可能会在那里。我从铁丝网下爬过去，心不在焉地朝住处的方向走去。正当我到达医务室的墙边时，我听见一声喝令“站住！”我停下来。一把手电筒射着我的眼睛。一条狗开始吠叫起来。

“你在那里干什么？”

“呕吐，中士同志。”我答道，用一只手扶着墙。

“哦，继续吐吧，伙计，把它吐得干干净净。”中士说，然后带着狗又开始了他的巡逻。

14

我没有再遇到什么麻烦便上了床，但是我睡不着，当听到指挥官发出“起床了！”的叫声时，我感到很高兴，可怕的一夜终于结束了。我匆匆穿上靴子，跑出去浇了一些清凉的冷水在身上。回到房间后，看见一群还没穿好衣服的士兵团团围在亚历克夏的床边，极力抑制住笑声。我顿时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亚历克夏(趴在毯子下面)还在酣睡。这使我想起弗朗特·彼得拉塞克，他为了报复指挥官，假装酣睡不醒，接连三个长官都没有把他摇醒；直到他们把他连人带床一起抬到院子，冲他打开消防水管，他才懒洋洋地揉了揉眼睛。然而，亚历克夏是不可能反抗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太虚弱了。我正想到这里，一个下士(管理我们的下士)提着一大桶水从走廊里进来；他周围拥着另一群人，很明显是他们在怂恿他；这是一个愚蠢的恶作剧，典型的指挥官的心理，具有所有时代和所有政权的特征。

看到这些士兵与他们的指挥官(通常是令人憎恨的人物)之间这种可悲的和解，看到对亚历克夏的共同仇恨一下子就消解了他们之间的宿怨，我感到非常气愤。他们显然把指挥官以那种方式讲到亚历克夏时的那番话看作是进一步证实了他们自己的怀疑，于是突然觉得非常赞同指挥官残忍的手段。我勃然大怒，对于所有这群人，对于他们愿意相信任何

控告，对于他们渴望用暴力来安慰被摧毁的自尊，感到一阵盲目的狂怒，我抢在下士和那帮人的前面，挤到亚历克夏的床头，大声说：“起来，亚历克夏！起来，你这个傻瓜！”

可是有人抓住我的胳膊，用力一拧，使我跪了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巴威尔·佩克尼。“谁要你来插手，你这个共产党员杂种！”他厉声骂我。我猛地挣脱他，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要不是别的人使我们平静下来，当场就会发生一场殴斗：他们担心在提着桶的下士走到亚历克夏床头之前我们就会把他闹醒。接着，下士走上前，吼道：“起来晒太阳！”然后把一桶水（足有两三加仑）全部倒在亚历克夏身上。

真奇怪，亚历克夏仍然没动。下士一时不知所措。然后他高声喊道：“起立，士兵！立正！”但是这位士兵没有动静。下士弯下身去摇他（毯子湿透了，整个床都湿透了，地板上正在形成一摊摊的水），费了很大劲才把他翻转过来。亚历克夏的脸下陷，苍白，一动不动。

“快，叫军医！”下士叫道。但是谁也没动：我们全都盯着穿着湿透的睡衣的亚历克夏。“军医！”下士又指着一个士兵叫。这位士兵跑了出去。

（亚历克夏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看上去比以前更小更虚弱，而且更年轻。他就象一个孩子，尽管他的嘴唇紧闭，一个孩子决不会这样紧闭嘴唇的。水珠不断从他身上往下滴。“下雨了。”有人说。）

军医来了，他拿起亚历克夏的手腕，说：“我明白了。”然后他拉开他身上的毯子，从两只湿淋淋的裤腿里伸出两条同样湿淋淋的脚。亚历克夏全身（小小的身子）平伸地躺在我们

面前。医生环顾四周，从他床铺旁边的桌上拿起两个塑料瓶，朝里面看看（它们是空的），说，“足够两个人。”说完从旁边的床上拉来一条被单盖住亚历克夏。

这一切延宕了我们的作息时间，我们赶紧吃完早饭，四十五分钟后我们就已经出发去矿井。在矿下干完了一天的活，照常是操练，政治教育，吃饭，唱歌，打扫卫生，上床，整个期间我一直都在想，斯塔纳离开了，我的挚友昂扎离开了（我再也没见过他，听说他终于服完兵役后，越过边境去了奥地利），现在亚历克夏也离开了。他勇敢地、盲目地演完了他的疯人角色，他突然不能继续演下去了，当他们把他在泥浆里拖，还朝他啐唾沫时，他缺乏力量继续保持坚定不移和坚守在他们的行列里，这不是他的过错。他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他那致命的信仰与我格格不入——可是他的命运使我感到我与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密切。我觉得他的死隐藏着一个责备：他想告诉我，一旦党把一个人赶出它的队伍，这个人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忽然为我从前没有喜欢过他而感到内疚，因为他现在已经死了，无法挽回地死了，我从来没有为他做点什么，而我是这里唯一能为他做点什么的人。

然而，我不仅是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亚历克夏和拯救一个同伴的机会。今天回顾这件遥远的往事，我明白了正是在那时，我失去与我的政治犯伙伴们有过的那种团结和友谊的温暖感，从而失去了恢复我对人们信任的任何可能性。我开始怀疑那种仅仅建立在环境的压力和自我保护的欲望上的团结的价值。我开始意识到黑色徽章的集体能够欺侮一个人

(使他成为一个被遗弃者，把他置于死地)，正如那个讲堂里的集体一样，正如任何集体一样。

我觉得我始终被一片沙漠覆盖住，我感到就象是沙漠中的沙漠，我想朝着露西叫喊。突然，我不能明白我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她的身子；她没有身子，她是一块永冻土地上的一根透明的温暖柱子，一根温暖的柱子，而我却让她走掉了，把她赶走了。

第二天操练时，我老是盯着栅栏望，期待她到来；可是只有一位老太婆在栅栏边停下来，把我们指给她那个拖鼻涕的小孙子看。当晚我给露西写了一封悲伤的长信，恳求她回来。我说我必须见到她，我不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我只想她到那儿来让我看看，知道她和我在一起，知道她在那儿就行了……

仿佛在嘲弄我似的，天气突然之间变得暖和起来，蔚蓝的天空，阳光明媚的七月。树叶色彩绚烂；大自然（可怜的俄斯特拉发的大自然）用欣喜若狂的典礼来庆贺秋天的离去。我感到受了嘲弄，因为我的信没有回音，停在栅栏边上的人（在傲慢的阳光下）全是些陌生人。大约两周后，我的一封信被退回来了。有人用难擦掉的铅笔把地址划掉，写上：迁走。转寄地址不详。

我恐惧万分。自从最后一次与露西会面后，我在心里一千次地反复思忖我对她说的一切，以及她对我说的一切；我一百次地咒骂自己，又一百次地为自己辩护；我一百次地使自己确信我已把她永远赶走了，又一百次地使自己相信她会理解我，原谅我。但是，信封上的通知仿佛就象是定论。

这种焦虑使我无法忍受，第二天我就着手进行另一个轻率的计划。尽管我说“轻率”，其实并不比我上一次的逃跑更加危险。“轻率”这个形容词主要表现在计划失败后的思考中。我知道昂扎在夏天与一个保加利亚女人（她的丈夫上午出去上班）恣意行乐时就曾多次成功地对付过去了。于是我把我的计划建立在他的计划上。我同大家一道来到矿坑附近，捡起我的衣服和安全灯，用煤灰涂脏脸，悄悄地溜走了。我径直跑到露西的宿舍，询问坐在桌边的那位女人。我所了解到的只是，大约两周前，露西把她所有的财产装在一个提箱里，带着它离开了此地；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简直发疯了：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那个女人望着我，轻描淡写地说：“你能指望什么呢？她们没有正式工作，来来去去，什么都不会对别人讲。”我去她工作过的地方，向人事处打听她的情况，但我一点消息也没得到。我在俄斯特拉发四处徘徊，直到快收工时才及时赶回去，混入走出矿井的人群中。但是，我准是漏掉了昂扎的技巧中某种基本的东西：整个事情招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两周后我被拖上军事法庭，因擅离职守被判了十个月的监禁。

是的，我失去露西的那一时刻标志着一段长时期的绝望和空虚的开始，此刻，在故乡这个泥泞的郊区滞留使我回忆起了那个时刻。是的，一切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当我在监狱里时我母亲去世了；我甚至不能去参加她的葬礼。十个月的刑期服满后，我又戴上黑色徽章，回到俄斯特拉发，服完最后一年的兵役。然后我签署了在矿上再干三年的合同，因为据说谁不愿这样做就必须在部队上继续待一年。因此，我

作为一个老百姓又在煤矿度过了三年。

我并不喜欢回顾这一切或者谈起这些往事；事实上，听到人们象我一样从他们发动和信赖的运动中被驱逐出来，并夸耀他们的命运时，我就感到令人作呕。的确，有一个时期我也以一个被驱逐者的命运为荣，但这是虚假的自豪。我不得不时常提醒自己，我获得黑色徽章并不是因为战场上很英勇，也不是因为说出了自己的思想来与别人的思想交战。不，我的倒霉并不是由真正有意思的事造成的；我更多是我的经历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因此（除非把不幸、痛苦，和无用视为美德是有意义的）我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

露西呢？噢，是的：我有十五年没有见过她了，甚至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的消息。我退役后听说她在西波希米亚某个地方。我没有去找她。

第四章 雅罗斯拉夫

1

我看见一条道路蜿蜒穿过田野，看见农民大车的窄窄轮子在路面上留下的辙迹，看见路两边的田埂，多草的田埂如此翠绿，我情不自禁地抚摸它们平滑的斜面。

我周围全是小块的田地，望不见一个集体农庄。这怎么可能呢？我穿过的这些土地属于另一个时代吗？它们是什么样的土地？

我继续往前走。田埂上的一丛野玫瑰呈现在眼前，开满小小的玫瑰花。我停下来，欣喜若狂。我在花树下的草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躺下来。我能感觉到我的脊背接触到多草的地面。我用脊背去感受它。我仰卧着支撑它，恳求它不要担心太重，把它全部的重量都放在我身上。

接着我听见得得的马蹄声。远处扬起一小团尘埃。随着

尘埃愈来愈近，它也就渐渐消散，现出一群骑手，一群穿着白色军服的年轻人。可是他们疾驰得愈近，那些服装的杂乱就显得愈清楚。一些人的外套由闪闪发光的扭扣扣住，一些人的外套却敞开着，还有一些人只穿着衬衫。有的人戴着帽子，有的人却光着头。不，这不是一支军队。他们是逃兵，这些人——叛徒，逃犯！我们的骑兵！我站起来，望着他们驰近。第一个骑手拔刀出鞘，朝空中刺去。骑兵们停了下来。

拔刀在手的那个人俯身在马脖子上，盯着我。

“是的，是我。”我说。

“国王！”那人惊诧地说，“现在我认出你来了。”

我点了点头，很高兴被人认出。他们已这样骑了几个世纪，可是还认识我。

“你的处境怎样，我的国王？”那人问。

“我很害怕，我的朋友们。”

“他们在追你吗？”

“比这还要糟。某桩卑鄙的事正在发生。我不认识我周围的人。我走进我的房子，发现寝室不是原来的，妻子不是原来的——一切都变了。我想我是搞错了，于是冲了出来，可是没有错，的确是我的房子！外面是我的，里面是一个陌生人的。我转向哪里都能看见它的痕迹。某桩卑鄙的事正在发生，我的朋友们，我真是怕极了。”

“我相信，你还没有忘记怎样骑马吧。”那人说。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战马旁边立着一匹装有马鞍但没有骑手的马。那人指着那匹马。我把脚放进马镫，跨了上去。马暴跳起来，

可是我稳稳地坐在马鞍上，欣喜地用膝盖紧紧夹住马的两侧。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面罩，把它递给我，说：“蒙住你的脸，他们就不会认出你！”我把它套在脸上，突然间就象成了瞎子。“你的马会给你引路。”我听见那人的声音说。

整个队伍小跑出发。我能感觉到骑手们在我两边缓缓行进，感觉到我们的小腿互相触碰，听见他们的马喷着鼻息。我们就这样行进了一个小时，然后停了下来。还是那个声音对我说：“我们已经到了，我的国王！”

“到了？”我问，“到了哪里？”

“你没听见大河的淙淙声吗？我们到了多瑙河畔。在这里你是安全的，我的国王。”

“是的，我感到我安全了，我想脱下面罩。”

“你不能，我的国王。现在还不能。你不需要你的眼睛。因为它们只会欺骗你。”

“可是我希望看看多瑙河。它是我的河，我希望看见它！”

“你不需要你的眼睛，我的国王。因为我会把一切讲给你听。这样做更好。我们的周围是平原，一眼望不到边。牧场。到处是灌木丛，一根木桩，那是一口井的辘轳。但我们却靠近水边，这里的草生长在沙里。因为这里的河床是多沙的。现在请下马吧，我的国王。”

我们下了马，坐在地上。

“那些人正在生火。”我听见那人的声音说，“太阳就要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寒气将侵袭这块土地。”

“我很想看到乌娜斯塔。”我忽然说。

“你会看到她的。”

“她在哪儿？”

“离这儿不远。你的马会把你带到她那里去。”

我跳起来，要求让我立刻到她那里去。可那人的手抓住我的肩膀，强迫我坐在地上。“坐在这里，我的国王。你先得休息，吃个饱。眼下我将对你讲讲她。”

“她在哪儿，请告诉我。”

“从这里骑一小时就到了一幢木头房子，房子盖着木瓦，围着一道木栅栏。”

“是的，是的。”我点头，我的心儿快活得要命。“都是木头。正是它原来的样子。绝对连一根钉子都没有。”

“是的。”那声音继续说，“栅栏是用粗糙劈成的木尖桩做的。人们仍能从尖桩里看出树枝。”

“所有木制的东西就象猫或狗一样。”我说，“它们比别的东西更有生命。我喜欢木头的世界。它是我唯一的家。”

“栅栏那边种有向日葵、金盏花、大丽花。还有一棵老苹果树。就在此刻，乌娜斯塔正伫立在门槛上。”

“她穿着什么服装？”

“穿着亚麻布裙子，有点脏，因为她刚从牛棚回来。她手中提着一个木桶，赤着脚。可她非常漂亮，因为她很年轻。”

“她很穷。”我说，“一个穷人的女儿。”

“可仍然是一个王后。由于是王后，她必须藏起来。也许你还是不到她那里去好，以免她被暴露。只有戴上面罩你

才可以去她那里。你的马会带路的。”

这人的话讲得真好，它使我陷入一阵甜蜜的倦怠之中。我躺在草上，聆听着他的声音，当他的声音沉默下去后，传来了淙淙的水声和劈啪的火声。太美了，我简直不敢睁开眼睛。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知道时间已到，我的眼睛必须睁开。

2

三床床垫把我与上漆的木头隔开。我不喜欢上漆的木头——或者这张床的弯曲的金属腿，就床腿而言。我的上方是一个有着三条白色条纹的粉红色玻璃灯罩，从天花板上吊下来。我也不喜欢这个球形玻璃灯罩。或者面对我的那个碗橱，它的玻璃显示出其它无用的玻璃。房间里唯一的木制品是角落里的那架黑色簧风琴。这是整个房间里我唯一喜欢的东西。它曾经是我父亲的。父亲一年前去世了。

我从床上站起来。我觉得还没休息好。现在是星期五下午，离星期天的“国王们的骑马”还有两天。一切都得由我决定。在我们这个地区，凡是与民俗有关的事都是我的事。我两周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一半就是由于所有这些差使、杂务和小争吵。

这时乌娜斯塔走了进来。我常常对自己说，她应该长胖一点。据说胖女人性情温和。乌娜斯塔长得很瘦，脸上已经布满细细的皱纹。她问我是否记住了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到洗衣店去一趟。我忘记了。“我就知道嘛。”她说，又问我是否打算在家里待一次，我不得不告诉她不行，因为我在城里有个会议，是地区会议。“你答应过帮弗拉吉米尔做家庭作业。”

我耸了耸肩膀。“有哪些人参加会议？”我开始报名字，但是乌娜斯塔打断我，“汉兹尼克太太？”我点点头。乌娜斯塔显得心烦意乱。我知道我要倒霉了。汉兹尼克太太名声不好。大家都知道她乱搞男女关系。乌娜斯塔并不怀疑我与她有瓜葛，但只要提到她的名字，乌娜斯塔就要发怒。凡是有汉兹尼克太太参加的会议，乌娜斯塔都会嗤之以鼻。要与她谈论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我宁愿马上溜出去。

会议自始至终都是专门在为“国王们的骑马”做准备。整桩事被搞得一团糟。区议会开始削减我们的预算。就在几年前，区议会还为民间活动提供大量的补贴。现在我们却不得不支援区议会。要是青年团无法再吸引团员，干吗不让它接管“国王们的骑马”？这会提高它的威信。用从“骑马”中获得的赢利去资助其它不大流行的民间活动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这一次，青年团可以得到这些赢利，并且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我们请求警察在“骑马”进行期间禁止车辆通行。我们刚受到他们的拒绝：仅仅为了“骑马”而使交通中断是不可能的。可是，汽车鬼怪般地出现在马的左右，这算哪门子“骑马”？真叫人头疼！

直到八点钟我才离开会议。然后在广场上我突然看见了卢德维克！他正朝相反的方向走来。我蓦地停住。他在这儿干什么？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盯了我一眼，接着转过头去，假装没看见我。两个同窗好友。在学校的同一条凳上坐了八年！而他竟然装作没看见我！

卢德维克是出现在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裂缝。至今已习惯了它。我的生活就象一所毫不坚实的房子。不久前在布拉

落，我去了一家小剧院，它属于那类在六十年代初开始涌现出来，因拥有那些刚从大学毕业才华横溢的新演员而很快盛极一时的剧院。他们演出的剧情很少，不过歌曲伶俐，爵士乐挺棒。可是突然之间，乐师们戴上有羽毛的帽子，象我们穿民间服装时戴的那种帽子，嘲弄地学着一个辛巴隆乐队。他们尖叫着，嚎啕着，模仿我们的舞步和我们把手举在空中的样子……他们的表演虽然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却使观众们捧腹大笑。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五年以前，还没有人敢这样丑化我们，也没有人会发出笑声。如今我们却成了笑柄。我们怎么会一下子就成了笑柄？

还有弗拉吉米尔，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为他烦恼。区议会向青年团推荐他作今年的国王。儿子被选作国王对父亲来说从来都是莫大的荣誉，今年他们打算给我这样的荣耀，以报答我为民间文化所做的一切。可是弗拉吉米尔却千方百计想摆脱这个任务。他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起初他说他星期天要去观看摩托车比赛。后来他又声称他害怕马。最后他说了实话，承认如果整件事是安排好的，他就不想当国王。他不想被人操纵。

我感到悲伤。他似乎想要把他生活中一切可能使他想起我的生活的东西全排除掉。他过去总是回避参加我和我们乐队共同发起的儿童歌舞队。甚至在那时他就很善于找借口。他声称他没有音乐才能。可他的吉它却弹得相当出色，而且喜欢与朋友们聚在一起唱最新的美国流行歌曲。

当然，他只有十五岁。而且他爱我。他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几天前我们谈过一次心。也许他理解了我。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转椅里，弗拉吉米尔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我的手肘搁在那架簧风琴的盖子上。那是我最喜爱的乐器。从小我就听到它的声音。父亲每天都要弹奏它。主要弹的是民歌，伴着简单的和声，就象远处的泉水叮咚声。要是弗拉吉米尔也能这样想多好。但愿他会极力去理解。

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捷克国家几乎已不复存在。事实上它在十九世纪才获得新生，是欧洲古老国家中的一个孩子。的确，它有着自己伟大的过去，可是两个世纪的鸿沟把它与自己的过去隔断了，在这两个世纪中，捷克语言退却到乡村，成了文盲们独占的财富。但即使在那段时期，捷克仍然继续创造着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朴实的文化，丝毫没有引起欧洲的关注。这是一个民歌、童话、古代风俗和仪式，谚语和格言的文化。一座横跨两百年鸿沟的狭窄的小桥。

唯一的桥，唯一的连接。一个未折断的传统的唯一脆弱的茎。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初从事复兴捷克文学和音乐的人们把它作为他们的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最初的捷克诗人和音乐家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收集民间故事和歌曲。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最早的尝试常常不外乎是对民间诗歌和民间歌曲的改写。

但愿你会极力去理解，弗拉吉米尔。你父亲对民俗的热爱并不仅仅是一种嗜好。也许包括有一点嗜好，但比嗜好更为深沉。他从民间艺术中听到的是使捷克文化免于干涸的那

种活力。

我对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那时他们企图使我们相信我们没有权利存在，我们只不过是讲捷克语的德国人。我们需要向自己证明我们过去存在，而且至今仍然存在。我们对我们的源泉作了一次朝圣。

那时我在一个业余爵士乐队演奏低音提琴，一天，摩拉维亚协会的一些成员突然来访问我们。他们说，支持他们新恢复的辛巴隆乐队是我们的爱国职责。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拒绝呢？我跟他们去了，去演奏小提琴。

我们把古老的歌曲从死一般的沉眠中唤醒。那些十九世纪的爱国者把民歌收集到歌本里正是时候。文明迅速地把民俗推到了背景。到本世纪初，我们需要民俗协会来使民歌从歌本里复活。首先在城里，然后在乡村。而且主要在我们这一地区。他们极力使象“国王们的骑马”这样的民间仪式复活，对民间歌舞团给予支持。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在打一场赢不了的仗。民俗学家们不可能象文明埋葬传统那样迅速地使传统复兴。

战争给予了我们新的推动力。在占领期间的最后一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国王们的骑马”。我们城里有一个军营，德国军官在街上冲撞本地居民。“骑兵”变成了一次示威游行。一群年轻人骑在马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挥舞着马刀。一个不可征服的捷克游牧民族。捷克历史的缩影。所有的捷克人都是这样看的，他们的眼睛被照亮了。我那时十五岁，他们选我作国王。我戴着面罩骑在两个侍从中间。我多么自

豪！我的父亲多么自豪！他知道他们选我作国王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是一个乡村教师，一个爱国者。人人都敬佩他。

我相信任何事物都有意义，弗拉吉米尔。我相信人们的命运都是互相联系的，由智慧的灰浆把他们凝在一起。我把你被选为国王看作是一个表示。我象二十年前一样自豪。更加自豪。因为他们希望通过选你作国王来给予我荣誉。为什么要拒绝接受它？我非常重视这个荣誉。我要把我的王国传给你。我要你从我手中接受它。

也许他的确理解了我。他答应接受当国王的提议。

4

但愿他会极力去理解这一切是多么有趣。我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有趣、更令人激动的事。

举例说吧，布拉格的音乐研究家们早就声称，欧洲的民歌起源于巴洛克时期^①，那时在贵族的管弦乐队里演唱的乡村音乐家们把他们的音乐文化介绍到了人民的生活中。他们由此得出结论，民歌不是自成一体的艺术形式。它只是艺术音乐的派生物。

在波希米亚也许是这种情形，可是我们在南摩拉维亚唱的那些歌却不可能用艺术音乐解释得过去。例如，瞧一瞧它们的调性。巴洛克音乐是用大调和小调写的，我们的歌曲却是用那些城堡管弦乐队从未梦想到的那种调式唱的！

^① 巴洛克时期，指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时代，大致为十七世纪，其风格特点庄严高贵，感情色彩强烈。巴洛克源出葡萄牙语，意为“不合常规”。

以吕底亚调式①为例，它那升高四度的音阶，总是在我心中唤起古代的田园牧歌，使我想起潘神②，听到他的箫声。



巴洛克音乐和古典音乐为了建立次序对大七度的力量表现出狂热的敬意。它导向主音的唯一道路是严格的、易感的七。它害怕从下面的大二度爬上主音的小七度。而小七度——如爱奥利亚，多里亚或混合利底亚调式③——正是我在我们的民歌中所最欣赏的。因为它是忧郁和沉思的。它靠此方式拒绝轻飘地推进到结束一切，结束歌曲和生活的主音：



但是在调式里也有一些非常古怪的歌曲，它们不受标准的教会命名法约束。这些歌曲简直使我着迷：



①③ 四者都是由两个非连接四音音列构成的希腊调式。

② 潘神，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牧神。

摩拉维亚歌曲表现出一种难以相信的宽广调域。它们的基本原理有时使人困惑。它们以小调开始，以大调结束，在中间转几次调。当我必须给这些歌曲配和声时，我常常觉得很难把握住它们的进行。

摩拉维亚歌曲在节奏上和调性上一样模糊不清。尤其当它们是为了节奏自由的唱歌，而不是为了舞蹈的伴唱时更是这样。贝拉·巴尔托克^①把它们称作是说话体裁的歌。它们的节奏根本不能被我们的乐谱体系记录下来。换句话说，从我们乐谱的优越地位来看，所有的民间歌手把他们的歌都唱得很差，毫无节奏。

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利奥斯·雅那切克^②坚持认为，使我们不可能公平对待节奏上的所有细微差异的复杂性在于歌手们各种转瞬即逝的情绪。他说，时间，地点，唱歌活动的气氛都需要考虑在内，民歌手在演出时对任何花的颜色、天气、总的环境都有所反应。

这个解释是不是太有点富有诗意了呢？我在大学的第一学年时，一位讲师给我们讲过他进行的一次实验。他曾要求几个民间艺术家分别演奏同一首节奏难定的歌曲。他把这些结果在高度精确的电子仪器上作了测量，发现他们的演奏百分之百地相合。

因此，歌曲节奏的复杂性不在于歌手的粗心，拙劣或性情。它遵循的是自身的神秘法则。比如，在一种摩拉维亚舞

① 贝拉·巴尔托克（1881—1945），匈牙利钢琴家、教师、民族音乐研究家和作曲家。

② 利奥斯·雅那切克（1854—1928），捷克作曲家。

蹈歌曲中，小节的后半总要比前半的历时长一点。那么，这怎么能记谱呢？艺术音乐使用的韵律体系是以对称为基础。一个全音符分为两个二分音符，一个二分音符分为两个四分音符。每个小节分成两个三个或四个相等的节拍。可是，一小节里有两个长度不等的节拍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把一首摩拉维亚歌曲的真正节奏记录在纸上。

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们的歌曲不是起源于巴罗克音乐。波希米亚歌曲也许是这样。波希米亚总是欣赏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和乡村、城堡和土地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一些。摩拉维亚也有它的城堡，但是乡村的原始使它们之间隔绝得多。摩拉维亚乡村音乐家在城堡管弦乐队里演奏是肯定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使我们能够保留最古老时期的民歌。它们起源于一个悠久、缓慢的历史的各个阶段。

所以，当你面对着我们整个民间音乐文化时，就好象《一千零一夜》中的舞蹈者当着你的面在脱掉一层又一层的面纱。

瞧，第一层面纱脱了下来。它的质地粗糙，装饰着琐屑的花样。这些是近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的歌曲。它们是从西方，从波希米亚铜管乐队传到我们这里的。老师们教我们的孩子唱这些歌。虽然它们有一点适应我们的节奏形式，但基本上还是普通的、大调的、西欧的民间音乐。

第二层面纱脱下来了。它的色彩鲜艳得多。这是起源于匈牙利的歌曲。它们伴随着马扎尔语的侵入一道传来。在整个十九世纪，吉普赛人把它们传遍了四方。人人都熟悉它们。恰尔达什舞曲以及有着特别的切分音节奏的征兵歌曲。

在这层面纱下还有一层。瞧，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期间的本地斯拉夫人的歌曲。

但是，第四层面纱还要美丽。它的歌曲甚至更加古老，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瓦拉几亚^①人从东方和东南方穿过喀尔巴阡山来到斯洛伐克牧场的时候。那些牧羊人和强盗唱的歌完全没有和弦与和声。它们在观念上纯粹是旋律的，这些旋律充分利用了古代调式的音阶，并靠演奏它们的管乐器和横笛而变得更加优美。

一旦这层面纱脱落下来，就没有别的面纱了。可舞蹈者不戴任何面纱还是继续跳着。这是最古老的歌曲。它们始于非基督教的时期，以最古老的众所周知的音乐体系，四音音列的体系为基础。割草歌，丰收歌。与古老村落的仪式有密切关系的歌曲。

巴尔托克指出，在最古老的这个层次，斯洛伐克，南摩拉维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②的歌曲都非常相似，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分辨开来。请想象一下地理区域。你看见了什么？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斯拉夫人领土，大摩拉维亚公国。它的边界在一千年前就被消除了，但是在最古老的民间音乐方面，它们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民歌或民间仪式是历史底下的一条隧道，这条隧道保存了许多被战争、革命和残酷的文明在地面上早已毁掉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望见遥远的过去。我看见了罗斯底斯拉夫和

① 瓦拉几亚，多瑙河下游的一个公国，1859年并入摩尔多瓦，形成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② 克罗地亚，南斯拉夫一个地区。

斯维亚托波尔克^①，最初的摩拉维亚公爵。我看见了古代的斯拉夫世界。

但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局限在斯拉夫人的世界呢？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弄懂一首谜一般的民歌歌词绞尽了脑汁。这首歌词曲用一种含糊不清的方式把蛇麻草与一辆马车和一只山羊结合在一起。有人骑在山羊身上，有人坐在马车里。然后赞颂了蛇麻草将少女变成新娘的力量。最先把它唱给我们听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它的含义。古老传统的坚韧保留了现在已完全不可理解的词的结合。最后的结果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古希腊的酒神节。一个萨提尔^②骑在公山羊身上，一个神祇手执缠着蛇麻草的神杖。

古典作品中的神话！我不能相信。但那时我修了一门音乐思想史的课程。我们最古老民歌的结构实际上与古希腊音乐的结构相似。同样是吕底亚的，弗里吉亚的和多里亚的那种四音音列。同样是从高音符而不是从低音符来推定音阶的倾向（低音符一直到音乐开始有了和声才占了优先地位）。所以，我们最古老的歌曲与古希腊歌曲属于同一个音乐思想的时代。它们为我们保留了古代的神话。

5

今天吃晚饭时，我仿佛老看见卢德维克的眼睛在回避

① 罗斯底斯拉夫，九世纪大摩拉维亚公爵统治者，执政期为公元846年—870年。斯维亚托波尔克，罗斯底斯拉夫的侄儿，执政期为公元870年—894年。在这两个公爵统治下是公国最强盛时期，后者去世后公国即在匈牙利人的入侵下解体。

② 萨提尔，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其形状为半人半羊，纵欲好饮。

我，于是我在任何时候都感到弗拉吉米尔对我是多么重要。突然我担心我一直都忽视了他。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地把她拉进我的世界。晚饭后，乌娜斯塔留在厨房里，我同弗拉吉米尔走进起居室。我试图跟他谈谈民歌，可是没有什么效果。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位小学教师。我不知道我是否使他厌烦了。当然，他坐在那里看上去似乎是在听我讲。他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他头脑里究竟在想什么呢？

我长篇大论地折磨了他很长时间，这时乌娜斯塔把头伸进房间，说该睡觉了。我能怎么办呢？她是家里的灵魂和心脏、日历和钟表。

我们不要争论了。去睡觉吧，我的孩子。晚安。

我把弗拉吉米尔和那架簧风琴留在了房间里。他睡在有金属腿的那张床上。我睡在隔壁卧室我们的婚床上，睡在乌娜斯塔的旁边，但我现在还不想上床睡觉。我会辗转反侧，担心会不会弄醒乌娜斯塔。不，我不想睡，我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们居住的这幢旧平房的花园充满了旧式的田园风味。那棵梨树下有一条木凳。

那个该死的卢德维克。他干吗一定要在今天出现？我担心这是一个坏征兆。我的好朋友！孩提时代我们就常坐在这里，就在这棵梨树下。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他，那时我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聪明得多，但却从来不炫耀自己。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学校和老师，凡是违反规则的事他都喜欢干。

我们两人为什么成了挚友呢？很可能是命运的缘故。我

们俩都是半孤儿。我母亲死于分娩，卢德维克的父亲，一个砌砖工人，被抓进了集中营。那时卢德维克才十三岁。他再也没看见到他的父亲。

卢德维克是长子，可是他的弟弟死了，只剩下他和他母亲。他们勉强才能使收支平衡。学费很高，有一个时期他似乎不得不退学了。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得救了。

卢德维克的父亲有一个姐姐，战前嫁给了一个富裕的本地建筑商。那以后她几乎与她的砌砖工弟弟断绝了来往。但当弟弟被抓走后，她的爱国心占了上风，于是主动提出资助卢德维克。她自己的女儿不是很聪明，卢德维克的才能使她感到嫉妒。她和她的丈夫不仅在物质方面帮助卢德维克，而且还邀请他每天到他们家去，并把他介绍给当地社交界的精华。卢德维克不得不做出很感谢他们的样子，因为他的学业得依靠他们的资助。他受不了他们。他们的姓是库茨基，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把这个姓用来指那些自命不凡的人。

库茨基太太瞧不起卢德维克的母亲。她一直认为她兄弟娶了一个有失他身份的女人。她兄弟的被捕也丝毫没有改变她的看法。她施舍的大炮是对准卢德维克的，而且只对准卢德维克。她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血肉，希望把他改造成她的儿子。她认为她弟媳的存在是个不幸的错误。她从来不邀请弟媳到她家来。这期间，卢德维克愤怒地咬牙旁观。他已经大到可以反抗了。可是他母亲总是眼泪汪汪地恳求他明智一点。

这就是他如此喜欢到我们家来的一个原因。我们俩就象一对双胞胎。父亲喜欢他甚至胜过喜欢我。看见卢德维克在

他的书房里耽读一本又一本书，他感到很高兴。当我开始在爵士乐队中演奏时，卢德维克也想参加进来。他在自由市场买了一只便宜的单簧管，很快就在这方面崭露头脚。我们一起演奏爵士乐，一起参加辛巴隆乐队。

战争快结束时，库茨基家的女儿结婚了。卢德维克的姑妈决定要大办喜事。她决定在新娘新郎身后要有五对男女傣相。她不但把卢德维克包括在内，而且还让本地药剂师十一岁的女儿作他的搭档。他受到很大刺激。在那家市侩的婚礼化装舞会上扮演丑角真是耻辱！他希望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成年人，而一想到胳膊被一个小女孩挽着他就觉得屈辱。他对自己被作为库茨基家的慈善事例来炫耀而感到愤怒，对被迫要在仪式期间吻人人的口涎弄湿的十字架而感到愤怒。那天晚上，他中途离开婚礼，来到我们在当地酒店的密室。我们一直在那里玩乐、饮酒，看见他来了就开始取笑他。他火冒三丈，宣称他对布尔乔亚怀有刻骨仇恨。接着他咒骂教会仪式，声言他蔑视教会，决定要抛弃它。

我们并没有把他的话说太当真，但是战争结束后几天，他实现了他的威胁。当然，他这样做使库茨基家非常生气。他毫不在乎。能够同他们断绝一切关系，他感到太高兴了。他成了一位共产党的热情支持者，参加共产党人主办的讲演，购买他们出版的书籍。我们这地区笃信天主教，我们的学校尤其如此。然而我们都愿意原谅卢德维克的共产党怪癖。我们给了他这种特权。

1947年我们毕业了。那年秋天我们考进了大学——卢德维克在布拉格，我在布尔诺。直到一年后我才又见到他。

那是1948年，一切都颠倒了。卢德维克回家过暑假时，我们不知道怎样迎接他。在我们看来，二月共产党政变意味着一个恐怖统治。卢德维克带来了他的单簧管，但没有摸它一下。我们辩论了一个通宵。

我们之间的不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吗？我不这样认为。事实上，那天晚上他几乎把我说赢了。他避开政治争论，只谈我们的乐队。他说我们必须从一个更广泛的继承发展关系来看我们的工作。仅仅使一个失去的过去复活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朝后看，我们就会象圣经中的罗得之妻那样完蛋^①。

那么，你认为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喊道。

当然要保护民间艺术的遗产，他回答说。但这样做是不够的。时代已经变了。新的地平线正在展现。我们需要清除我们的音乐文化中那些没有生命的流行曲调，那些布尔乔亚曾强使人们接受的陈词滥调。我们需要用一个新颖的、真正的人民艺术来代替它们。

真奇怪。卢德维克提倡的只不过是守旧的摩拉维亚爱国者那种古老的理想社会。他们也不停地谈论城市文化的邪恶与堕落。他们也从查尔斯顿^②的乐曲中听到了撒旦的歌声。但那又怎么样呢？这只是使我们觉得他的话可以理解罢了。

① 《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当主降灾于所多玛及蛾摩拉两城时，罗得带领家人逃出城外，他的妻子回头一望，就变成了一根盐柱。

② 查尔斯顿：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海港城市。

不管怎样，他的下一个观点听起来更新颖。它涉及到爵士音乐。爵士乐起源于黑人民间音乐，征服了整个西方世界。不管它事实上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商品。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民间音乐具有神奇力量的确证。民间音乐可以造成整整一个时代的音乐风格。

我们怀着既钦佩又反感的复杂心情听他高谈阔论。他的自信激怒了我们。他显出一副当时所有共产党人都有的那种神态，仿佛他与未来签定了一个秘约，因此获得了代表未来活动的权利。我们发现他如此令人讨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突然之间与我们过去认识的那个卢德维克判若两人。过去他一直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男孩，一个真正的乡巴佬。瞧他现在这副样子，恬不知耻地滥用过分的修辞和夸张的词汇。当然，我们也很气愤他随意地就把我们乐队的命运与共产党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然而，他的话里毕竟有某种吸引人的东西。他思考的方式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梦想是相合的。它一瞬间就把我们提到了历史的伟大领域。

我私下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匹得·皮帕^①。他只要一吹长笛，我们便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他的论点稍不完全，我们就马上帮助他。我还记得我自己的贡献。我当时正在考察从巴洛克时代起欧洲音乐的演变。在印象派之后音乐开始对自身产生了厌倦。一方面它在奏鸣曲和交响乐中失去了大量的活力，另一方面它失去了动人的曲调。这就是为什么爵

^① 德国传说中人物，以魔笛诱人，后比喻常以空言而使他人学其榜样的人。

爵士乐对它产生了奇迹般影响的原因。它贪婪地从百年来的爵士乐基础音中吸取新的活力。爵士乐不仅占领了欧洲的夜生活，而且还抓住了斯特拉文斯基^①，奥涅格^②，米约^③，他们的作曲全都接受了爵士乐节奏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比这还早十年左右，我们自己大陆的民间音乐就在欧洲古典音乐的血管里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而有力的血液。而没有任何地方象中欧那样使民间音乐保持着生气。想一想雅那切克和巴尔托克吧！因此，民间音乐与爵士音乐的比较可以直接从欧洲音乐的演变中得出。它们都对二十世纪严肃音乐的形成作出了同等的贡献。但当涉及到大众音乐时，情况就不同了。传统的欧洲民间音乐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爵士音乐取代了一切。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是的，说得对，我们说。我们民间音乐的基础音和爵士音乐的基础音里存在着同样的力量。爵士音乐有它自己旋律的特性，这一特性仍然带有早期黑人歌曲的基础六声音阶的痕迹。而我们的民间音乐也有它们自己的特性，总的来说，它们的旋律更富有变化。爵士音乐有它自己的节奏，它在节奏方面惊人的复杂还得归功于几千年来的非洲鼓文化。但我们的音乐在节奏上也是最早时期的。最后，爵士音乐以即兴创作为基础，而我们那些不识音符的乡村小提琴演奏者的杰出的合奏也是依靠即兴创作。

我们的民间音乐与爵士音乐之间只有一个区别。爵士音

①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国作曲家，后移居美国。

② 奥涅格（1892—1955），法国作曲家。

③ 米约（1892—1974），法国作曲家，后移居美国。

乐发展和变化很快。它的风格处在不断的变换中。它从早期新奥尔良^①的对位法出发，经过一段险峻的道路，发展到摇摆乐，波普^②，以至更远。新奥尔良的音乐决不会想到今天的爵士音乐里会采用和声。而我们的民间音乐却恰恰相反，她是往昔的一个昏昏睡去的睡美人。我们必须唤醒她。她需要与今天的生活相结合，随着它一道发展。要使自身继续存在下去，要保持它的旋律和节奏的特性，民间音乐必须形成它自身固有的风格发展阶段。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完成。

这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我们反对道。

他向我们解释，传统的乡村过着一种集体生活。公共的仪式划分出乡村的时令。民间艺术除了这些仪式就不知道任何活力。浪漫主义者想象一位割草姑娘突然产生了灵感。唱出一首又一首的歌，就象一股泉水从岩隙里涌出来一样。但是，民歌在起源上不同于有学问的诗。诗人写诗是为了表达自己，表达那些使他们显得独特、不同的东西。民歌却把人们引到一起。它们的产生很象钟乳石，一点一点地形成新的花纹和新的变化。它们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个歌手都给它们增加一点新的东西。每一首歌都有许多创作者，他们全都谦虚地消失在他们的创作后面。没有一首民歌仅仅为了自己而存在。它总有一个作用。有在婚礼上唱的歌，在收割时唱的歌，在忏悔节唱的歌，有为圣诞节，为翻草，为跳舞，为葬礼的歌。甚至情歌也存在于某些经常性的节日活动的组

① 美国南方首要商港和第二大城。

② 一种早期的爵士乐。

织中。傍晚的散步，在少女窗下的小夜曲，求婚——这些都是一种集体仪式的组成部分，在这种集体仪式中，民歌具有它确定的地位。

资本主义摧毁了这种集体的生活方式。民间艺术失去了它的立足点，它的自我感，它的作用。在人与人之间被隔绝开，人人都为自己而活着的社会条件下，企图复兴民间艺术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社会主义把人们从孤独的枷锁中解救了出来。他们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将合并起来。他们将再次被许多公共的仪式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集体风俗。前者将来自过去，收割，狂欢节，跳舞，劳动。后者将来自现在。五一节，集会，解放周年纪念日，各种会议。民间艺术将到处受到欢迎。它将得到发展，变化，更新。我们终于明白了吗？

不久，这种难以相信的事就开始实现了。没有任何人象共产党政府那样为我们的民间艺术做了那么多的事。它为新的乐队的创立拨了大量的款。小提琴和辛巴隆琴声每天从无线电扬声器里传出来。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民歌充斥了大学，五一庆典，青年庆祝活动和各个剧院。爵士音乐从我们国家的表面消失了。不但如此，它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颓废的象征。年轻人不再跳吉特巴舞^①，而是互相抓住肩，围着圈跳舞。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把它的努力基于斯大林对新艺术的著名定义上：用民族形式表达社会主义内容。而音乐，舞蹈，诗歌的民族形式只能来自

① 一种随爵士音乐节拍跳的快速舞。

民间艺术。

我们的乐队驾着这个政策的强劲波浪，很快就闻名全国。它增加了歌手和舞蹈家，成为一个主要的文化企业，在数以百计的舞台上表演，每年还到国外访问演出。我们不仅仅唱那些强盗割断情人喉咙的传统的短叙事诗，而且还创作我们自己的新作品：歌颂斯大林的赞歌，关于个体农场的崩溃和集体农业的胜利的群众歌曲。我们的节目不仅仅向后看，它充满了活力。它是当代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伴随着历史。

共产党给了我们热情的支持。我们政治上的保留很快就消融了。我自己在四九年初加入了共产党。我在乐队里的朋友们不久也跟着入了党。

7

那些日子卢德维克和我还是很亲密的。最初的阴影是何时降落在我们中间的呢？

好象我不知道似的。那是在我的婚礼上。

那时我一直在布尔诺读书——在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并在大学里学音乐理论。在第三学年我开始遇到了麻烦事。爸爸的身体渐渐垮了。他中了风。病虽然治好了，但从此以后他就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我不断地担心他的独自生活。要是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不能给我发封电报。每个星期六我都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每个星期一早晨我又带着新的忧虑返回布尔诺。最后我再也无法承受这些忧虑了。它们在星期一折磨我，在星期二越发折磨我，于是在星期三我把所有的衣物都塞进包里，付了房租费，告诉女房东不要期待我回

来了。

我从车站走回家的情形至今还记忆犹新。从城里到我们的村庄得穿过一片田野。时至秋天，正是薄暮时分。吹着风，一些孩子正在用长线放风筝。爸爸曾经给我扎过一个风筝。他经常和我一道拿着风筝来到这片田野，把它抛到空中，然后奔跑起来，直到风把它吹上天。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风筝，可是爸爸非常喜欢。那天，这件往事触动了我，使我加快了步子。一个念头兜上心头，原来爸爸是为了母亲才把风筝送上天空的。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一直想象母亲是在天堂里。噢，我信仰上帝，永生或类似的东西已经很多年了。我现在不是在谈信仰，我是在谈幻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放弃幻想。没有幻想我会感到象孤儿似的。乌娜斯塔说我是个梦想家。她说我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喔，她错了。我当然看得见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除了有形的东西，我还能看见无形的东西。幻想在生活中有它们的地位。幻想能使住宅成为温暖的家。

母亲去世后很久我才对她有所了解，所以我从来没有机会哀悼她。我一直喜欢想象她在天堂里既年轻又漂亮。别的女孩子的母亲都没有我的母亲年轻。

我喜欢幻想圣彼得坐在一条长凳上，从一扇小窗户俯视人间。我母亲经常去那里拜访他。彼得很乐意为她做任何事，因为她很漂亮。他让她也朝外看。于是母亲看见了我们。爸爸和我。

母亲的脸上从不悲伤。恰恰相反，当她在彼得的小房间

里从窗户俯视我们时，她总是在微笑。那些居住在永恒里的人是不知悲伤的。他们知道人间的生命只是瞬息即逝，很快就会团圆。但当我去到布尔诺，留下爸爸孤单一人时，母亲的脸上开始露出悲哀和责备的神情。而我希望与她和睦相处。

所以我匆匆忙忙赶回家。风筝飞得那样高，好象是从天上挂下来似的。我很高兴。我一点也不后悔我丢下的那些东西。并不是我不爱我的小提琴和音乐研究，而是我没有真正的野心。对我来说，无论什么，哪怕是最有前途的事业，也比不上回家的快乐更有意义。

当我告诉爸爸我不打算回布尔诺去了时，他感到很不安。他不希望我为了他而毁掉我的前程。于是我设法使他相信我是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开除的。这使他更加心烦意乱。但是我没有为此事烦恼。我回家不是为了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我继续在我们的乐队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并找到一个在本地音乐学校任小提琴教师的工作。我可以干我所喜欢的事。

与乌娜斯塔待在一起就是一件我喜欢的事。乌娜斯塔住在邻近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就象我自己的村子一样，今天已合并为城镇。她跟着我们的乐队跳舞。我是在布尔诺读书时认识她的，既然我现在回来了，我就希望每天都能见到她。但我是后来才爱上她的——完全意想不到，在一次排练中，她摔倒了，跌断了腿。我把她抱在怀中，往救护车走去。我能感觉到她的身子，多么纤细、虚弱。突然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几乎身高六呎两吋，重两百多磅，我可以当一个伐木者，而她却又轻又弱。

这是一个顿悟的时刻。在乌娜斯塔受伤的身躯上，我突然看见了另一个更熟悉的身影。以前我怎么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乌娜斯塔是所有民歌里的那种“穷人的女儿”！一个除了好名声便一无所有的穷姑娘，一个人人都要羞辱的穷姑娘，一个衣着褴褛的穷姑娘，一个孤苦伶仃的可怜的小姑娘。

当然，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有双亲，他们一点也不贫穷。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一度是富裕的农民——新时代正把他们逼到绝境。乌娜斯塔经常眼泪汪汪地来参加排练。他们家被迫把几乎所有的产业都交给当局。她父亲被定为富农。他的拖拉机和农具都被征用。他还受到追捕的威胁。我为她感到难过，把自己看作是她的保护人。我愿意保护这个穷人的女儿。

从那以后，我就以民歌传统的观点来看她，我觉得我仿佛正在重新体验一个经历过一千多次的爱情。我好象正在按照一个古乐谱演奏这个爱情。好象这些歌曲正在歌唱我。我沉湎于时间的共鸣的溪流中，幻想着将来的婚礼。

婚礼前两天，卢德维克蓦地冒了出来。看见他我很高兴，立刻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并对他说，作为我的挚友，他一定要做我的证人。他满口答应了，而且遵守了诺言。

乐队里的那些朋友们为我举行了一次地道的摩拉维亚婚礼。大清早他们就来向我们祝贺，演奏，唱歌，身穿民间服装。一位五十岁的辛巴隆琴手担任仪式的主持人“族长”。爸爸首先用烈性白兰地、面包和背溜肉款待他们。然后族长示意大家安静，用洪亮的声音朗诵起来：

正直的贵宾们，少女们，少男们，
女士们，先生们！
我召集你们大家于此所，
因为居于此所的这位年轻人不揣冒昧
邀请我们偕他同赴乌娜斯塔·内特，
哈尔的父亲那里，
这位年轻人已将彼淑女择为
他的新娘……

族长是整个仪式的主心骨。一直都是这样。近千年来都是这样。新郎从来就不是婚礼的主体。他是婚礼的客体。不是他在成亲，是别人在使他成亲。别人在利用结婚控制他，而他就象在一片巨浪上随波逐流。婚礼不是他行动和讲话的场所。替他行动和讲话的是族长。不，甚至也不是族长。是世代相传的古老传统，将他沿着它那温柔的溪流带走。

由族长带领，我们出发去邻近的村子。我们越过田野时，朋友们一路演奏。一群乌娜斯塔的人也穿着民间服装，在她家屋前等着我们。族长朗诵道：

我们是疲倦的旅行者
拜求你们
俯允我们入此篷屋，
因为我们亟需食物和饮料。

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汝等若相配，理当欢迎。”于是他邀请我们进去。我们默默地拥进屋。正如族长所说，我们只是疲倦的旅行者，不会首先透露我们的真实意图。但接着那位老人，新娘家的代言人，向我们挑战，说：

“汝等若有心事，就请道来。”

于是族长开始讲起来。最初他拐弯抹角地用譬喻讲，那位老人也以同样的方式作答。绕了许久族长才透出我们来此的目的。

于是那位老人向他提出下面的问题：

请告诉我，亲爱的朋友，
为什么这位诚实的新郎欲娶这位
诚实的姑娘为妻？
是为了花朵还是为了果实？

族长回道：

众所周知，花儿开时美丽又雅致，
惹得人心头阵阵欣喜，
可是花儿一凋谢
果实即成熟。

因此我们娶这位新娘不是为了花儿，
而是为了果实，报偿正是从那里来。

对答一直持续到新娘的代言人结束道：“那么，让我们把新娘叫来，听听她是否同意。”然后他走进隔壁房间，领着一位穿民间服装的女人转来。她又高又瘦，骨骼粗大，脸上蒙着一张头巾。“此即汝新娘。”

但族长摇了摇头，我们都吵吵嚷嚷地抗议起来。老人企图说服我们接受她，可最后还是不得不把那位蒙着头巾的女子带回去。直到这时他才把乌娜斯塔带出来。她穿着黑色靴子，红围裙，五颜六色的开口短上衣，头上戴着花环。她看上去漂亮极了。老人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中。

然后他转向新娘的母亲，用悲哀的声调对她叫道：“啊呀，母亲！”

听到这句话，我的新娘把手从我手中抽出来，扑倒在母亲的脚下，低着头。老人继续说：

亲爱的母亲，原谅我对汝做过的一切错事！

最亲爱的母亲，我恳求汝，原谅我对汝做过的一切错事！

最最亲爱的母亲，凭着基督的五个创伤，我恳求汝，原谅我对汝做过的一切错事！

我们不过是在模仿一首古老的民歌歌词。这首歌词非常美丽，令人激动，而且每一点都很真实。接着音乐再度响起，我们动身前往城里。正式的仪式在市政厅举行，即使在那里音乐也没有停止。然后是盛宴。宴会后是跳舞。

最后，入夜时分，女候相把迷迭香花环从乌娜斯塔头上取下来，郑重其事地递给我。她们将她松散的头发编成一根辫子，盘在她头上，然后把一顶女帽迅速放在上面。这个仪式象征着从处女变成妇人。当然，乌娜斯塔在这之前早就失去了童贞。严格说来，她已不配花环的象征。可是我并不把这事看得很重要。从更高更有约束力的层次来看，直到女候相把她的花环放在我手中的那一瞬间，她才失去了童贞。

哦，天啊，为什么对那个迷迭香花环的回忆比我们的第一次搂抱或乌娜斯塔真正的处女血还要更使我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事实确是如此。女人们唱起了花环漂过水面，波浪把它编织成红缎带的歌曲。歌声使我想要哭泣。我陶醉了。我只看见花在漂流，小溪把它们带到了小河，从小河到

支流，从支流到多瑙河，从多瑙河到大海。我看见花环漂走了，一去不复返。逝者不返。这就是我深切感受到的。生活中的各种基本状况不容复返。任何够格的人都必须直面逝者不返这一事实。尽量咀嚼它。不许自欺欺人。不要装作对它视而不见。现代人自欺欺人。他极力回避从生到死的途路上所有的路碑。传统人更诚实。他高唱着走进人生每一种基本状况的核心。当乌娜斯塔的血沾污了我放在她身下的那条毛巾时，我一点也没想到我正在对待逝者不返这一事实。现在已来不及想了。妇女们正在唱临别之歌。留一下，留一下，我多情的情郎，请允许我去向我亲爱的母亲告别。留一下，留一下，收起汝马鞭，请允许我去向我亲爱的父亲告别。留一下，留一下，勒住汝马匹，因为我还有一个亲爱的妹妹，我不愿离开她。别了，我的女友们，因为他们正把我从你们身边带走，他们也不会让我再回来。

黑夜降临，队伍陪伴着我们回家。

我打开大门。乌娜斯塔在门槛上停住，再次转身面对着房前的一群朋友们。蓦然，一个人唱起了最后一首歌：

她站在门槛上，
含苞欲放的纯洁处女，
最纯洁的一朵玫瑰。
接着她跨过门槛，
她所有的美都失去了，
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她的美。

然后门在我们背后关上了，只剩下我们俩。乌娜斯塔二十岁，我大一点。可是我禁不住想到，她已经跨过门槛，从这一神奇的时刻起，她的美就会象藤上的花儿一样凋谢。我从她身上看见了凋谢的未来。我看见这已经开始。她不只是一朵花，我心中暗想，她的体内要结果。我感到了这一切不可抗拒的秩序。我接受了这一切，并与之合为一体。我想到了弗拉吉米尔，当然那时我还不可能认识他，也不可能开始描绘他。可我的确想到了他，并进而想到了他的孩子。接着我和乌娜斯塔爬进高高堆着被子的床，就好象整个人类用它那无穷无尽的智慧把我们搂进了它温柔的怀抱。

8

在婚礼上卢德维克到底把我怎么啦？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他沉默寡言，十分冷淡。下午跳舞开始时，乐队的小伙子们试图把单簧管递给他，想让他演奏。他拒绝了。隔了一会儿他干脆走掉了。幸运的是，那时我已精疲力竭，没有对此事怎么注意。可是，第二天我意识到他的中途离去给婚礼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血液中变淡的酒精很不恰当地夸大了这件事。乌娜斯塔把此事看得更严重。她从来就不喜欢卢德维克。

当我告诉她，卢德维克将做我的证人时，她并不怎么感到高兴。第二天早晨，她便性急地提醒我他的行为。她说他整天走来走去，就象我们给他造成了许多不便。她还从来没见过这样自负的人。

当天，卢德维克来看我们。他给乌娜斯塔带来一些礼

物，并向我们表示道歉。我们愿原谅他昨日的行为吗？他告诉了我们他的遭遇。他已经被开除出党和大学。他不知道以后还会遇到什么。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可是卢德维克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很快就改变了话题。乐队过两周要出国演出。我们真是些土包子，迫不及待地想早点起程。卢德维克理解我们的心情，开始向我打听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可是我立即记起卢德维克从小就渴望出国，而如今他出去的机会已微乎其微。在那个时期以及后来的许多年，凡是档案里有政治污点的人是不允许出国的。我看出我们的生活已变得多么悬殊，现在该轮到我要改变话题了。假若我谈论这次出国演出，就会使我俩命运之间突然出现的鸿沟清晰地显露出来。我想让这条鸿沟掩隐在黑暗中，于是我字斟句酌，生怕某个词会使它显露出一点来。然而，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使它不显露出来的词。凡是我谈到的与我们的生活有一点关联的话，似乎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分道扬镳。我们有不同的机运，不同的未来。我们正在朝不同的方向驶离。我原想，要是只谈琐事，也许可以掩饰我们彼此的疏远。可这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我的逗趣显然很勉强，结果谈话很快就陷入了停顿。

不一会儿卢德维克说了声再见便离开了。他已自愿去某个劳务队，而我将随同乐队去见世面。几年以后我才又再次见到他。他在部队时我给他写了几封信。每次寄出一封信，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给我带来的不快都会留在我心头。我不能正视卢德维克的倒霉这个事实。我为我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功而

感到羞愧。我发现从我自鸣得意的高处向卢德维克施舍鼓励和同情的话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因此我假装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变化。我继续告诉他我们正在做些什么，乐队的新人新事，我们最新的辛巴隆琴手，我们最近的冒险。我试图让这些话听上去仿佛我的世界仍然是我们共同的世界。

后来有一天，我父亲收到了卢德维克母亲去世的讣闻。我们谁都不曾知道她在生病。卢德维克从我的地平线消失后，她也随他消失了。手里拿着这份讣闻，我意识到对那些即使稍稍偏离我的生活道路的人变得是多么冷漠。我的生活是成功的。我感到有罪，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过错。接着我注意到了有件使我震惊的事。这份讣闻是由库茨基夫妇署名的。上面根本没有提到卢德维克。

葬礼的日子到了。从大清早起，一想到又要见到卢德维克我就感到紧张不安。然而卢德维克根本没有来。只有几个人跟在棺材后面向墓穴走去。我向库茨基夫妇打听卢德维克在哪里。他们耸了耸肩，说他们不知道。送葬队伍停在一座大墓前，墓上有一个沉重的大理石和一个白色的天使雕像。

这位富裕的建筑商家里的财产已被没收，现在他们靠微薄的收入生活。他们留下来的唯有这个庞大的家族墓穴。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卢德维克母亲的棺材要放在他们家族的墓穴里。

后来我才听说卢德维克当时正在监狱里。他的母亲是城里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她死后，库茨基夫妇接收了这个败家子弟媳的尸体，宣布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终于报复了忘恩负义的侄儿，抢走了他的母亲，用一块沉重的大理石将她

盖住，由一个有着卷曲头发和手拿一根花枝的白色天使守护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天使，翱翔在一位朋友被毁掉的生活上方，他父母的尸体连同其它的一切都被从他手中夺走了。那是一个毁灭的天使。

9

乌娜斯塔反对一切无节制的方式。在她看来，夜里坐在外面院子里，仅仅因为你喜欢，这就是一种无节制。蓦然，我听见窗玻璃上一声重敲。在窗户那一边赫然现出了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的严厉身影。我生性就很顺从。我决不会对那些比我羸弱的人说个“不”字。因为我身高六呎两吋，能够举起比我体重更重的东西，我还没有发现可以和我对抗的人哩。

于是我回到房间，在乌娜斯塔身旁躺下。为了打破沉默，我便提起白天曾见到卢德维克。“是这样吗？”她用漠不关心的口气说。对此我毫无办法。她受不了他。她始终无法忍受他。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可抱怨的。自从我们的婚礼以后，她只见过他一次。是在一九五六年。那时我已经再不能掩饰我们之间的鸿沟了，即使对我自己也无法掩饰了。

卢德维克服过兵役，蹲过监，又在矿井干了几年。为了恢复学业，他正在布拉格作准备，那次回来是为了与警察局处理几项法律手续。一想到要见到他，我再次感到紧张不安。可是我所发现的完全不是象预料的那种颓丧不满。一点也不。然而他与我认识的那个卢德维克也不同了。他身上既有一种粗鲁无礼的特性，又有一种内在的平静。没有什么需要怜悯的。仿佛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跨越我如此害怕的那

条鸿沟。为了恢复旧日的友情，我邀请他来观看我们乐队的排练。我仍然把乐队也看成是他的。虽然辛巴隆琴，第二小提琴，单簧管已由另外的乐手接过去，老伙伴中只剩下我一个，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卢德维克坐在辛巴隆琴手旁边，从那里观看排练。我们首先演奏了我们最喜爱的歌曲，那些我们在学校里常常演奏的歌曲。接着我们演奏了我们在偏僻山村发掘的几首新歌。最后我们演奏了一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歌曲。它们不是真正的民歌，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带民歌味的歌。我们歌唱为了使大量的私人农田变成一片广大的集体农田用犁耕掉小块土地的旧边界，歌唱过去的穷人如今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歌唱拖拉机手在自己的拖拉机站总能得到尽力的帮助。这些音乐与真正的民歌音乐很难区别，但歌词却比报纸还要更切合时事。我们最喜爱的一首歌是关于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这位共产党英雄在占领期间曾备受纳粹的折磨。

卢德维克坐在那里，瞧着辛巴隆琴的木槌在弦上急速地跳来跳去。偶尔他给自己斟上一小杯酒。我从我的小提琴琴码上望着他。他陷入了沉思，始终没看我一眼。

妻子们开始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这是排练即将结束的一个表示。我邀请卢德维克去我家。乌娜斯塔给我们做了些吃的，然后就去睡觉，留下我们单独在一起。卢德维克天南海北地谈起来。但我能看出他之所以如此健谈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回避我想谈论的事。可是我怎么能不跟我最好的朋友谈谈我们最大的共同领域呢？于是我打断他漫无边际的闲聊。你觉得我们的歌怎么样？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喜欢它们。

但我不打算让他说一两句客气话就放过他。我要钉住他。他认为我们自己创作的那些新歌怎么样？

卢德维克不愿陷入争论。可是我步步紧逼，直到他终于说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发现的那些传统歌曲的确很美，否则他是不会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我们在迎合时兴的趣味。这不足为奇。我们为各种各样的观众演出，想要使他们全都满意。所以我们抹去了我们的歌曲中所有使它们显得独特的东西。我们去掉了它们无与伦比的节奏，代之以习用的节奏型。我们之所以从最近的过去中选择我们的歌曲，是因为它们更容易听懂，更容易理解。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想要民间音乐尽可能地受到欢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大众的趣味让步。最重要的是我们创作出了我们自己的当代民乐，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关的新民歌。

他又争执起来。那些新歌使他感到刺耳。它们是可怜的仿制品！赝品！

这句话至今回想起来还使我感到刺痛。究竟是谁曾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老是朝后看，我们就会象圣经中的罗得之妻那样完蛋？究竟是谁曾幻想民间音乐将孕育出时代的新风格？究竟是谁激励我们给予民间音乐必要的推动，使它跟上历史的步伐？

那全是一个空想的境界，卢德维克说。

空想的境界？可是歌曲就在那里！它们是存在的！

他当面嘲笑我。你可以唱那些歌，你和你的乐队，可是请告诉我，还有哪一个人在唱那些歌。请告诉我有哪一个集

体农庄庄员为了快乐而唱你们的那些集体农庄歌。他面带笑容地说。这些歌是那样不自然，那样做作。这种宣传就象一个缝制得很拙劣的衣领那样刺目。一首关于伏契克的伪摩拉维亚的伪民歌！你们居然能变得多么可笑！布拉格的一名共产党新闻记者！他与摩拉维亚的农民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表示反对，说伏契克属于我们大家，我们有权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歌唱他。

用你们自己的方式？你们并没有用我们唱歌的方式在唱！你们是按照宣传机关叫你们唱的方式在唱！瞧一瞧那些歌词。为什么要首先歌唱伏契克呢？难道只有他在干地下工作吗？只有他受到折磨吗？

可他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当然他是！宣传机构需要完美无瑕的烈士长廊里有一个主要的烈士坐头把交椅。

你干吗要这样冷嘲热讽？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象征。

对，但是谁成为象征？这是很有趣的地方。许多同样勇敢的人如今完全被遗忘了。其中也有著名的人。政治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成为象征。你不会看到他们的照片挂在学校和办公室。许多人还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事实上，正是那些功劳阻碍了他们。功劳不能修改，不能缩小，也不能重新赋予新的形式。这就是阻碍他们进入宣传机关的名人祠的原因所在。

但是《绞刑架下的报告》怎么讲？只有伏契克才能写出它！

而那些缄口不言的英雄又怎么讲？那些英雄不需要把他

们最后的时刻变成一个壮观。一次公开的讲演。伏契克，尽管那时根本没有名气，却认定把他在监狱里的所思所感和所经历的事告诉世人，给人类留下一些具有概括性的名言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在碎纸片上把这些话全都潦草地写出来，让那些把纸片偷带出狱，并妥善保存它们的人去冒生命危险。想一想他对那些思想和印象肯定会有的想法吧！想一想他对自己肯定会有的想法吧！

现在他说得太出格了。难道伏契克只不过是个自负的夸夸其谈者吗？

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卢德维克。不，他回答道，那不是驱使伏契克写作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的软弱。因为私下表现得勇敢，没有目击者，没有承认，只是面对着自己——这样做需要超乎寻常的尊严和力量。而伏契克却需要一个观众。他在单人牢房幽闭中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虚构的观众。他需要被人瞧见！让掌声来支持他。如果不是真的，那就虚构。他需要把他的单人牢房变成一个舞台，要使他的命运变得可以忍受，就得表演它，描绘它，而不是仅仅经历它！

我原以为会看到卢德维克消沉，甚至痛苦。但我没料到这般的刻毒或恶意讽刺。伏契克烈士把他怎么啦？一个人必须忠实于他的原则。我知道卢德维克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但那样做反而更糟！那样的话，改变原则后面的动因就太清楚不过了。一个人仅仅因为受到了侮辱就可以抛弃他信奉的一切吗？

我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这些话。但接着某种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他一点也没作出反应。仿佛他那愤激的情绪突然消

失了。他怪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要我不要生气。很可能是他错了。但是他的声音显得那样古怪，冷静，以致我完全能看出他说的不是真心话。我不想让我们的谈话以这种虚假的语气来结束。尽管我很恼火，可我还是不愿放弃原计划。我仍然想与卢德维克达成默契，恢复我们的旧情。尽管我们发生了正面冲突，我还是希望一旦我们的争吵平息下来，我们将会设法回到我们从前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的共同基础上。可是，我想使谈话继续下去的所有努力都归徒然了。卢德维克为他象往常一样夸大其辞，信口胡说而不断地向我道歉。他要求我忘掉他说过的一切。

忘掉他说过的一切？为什么要忘掉一次严肃的讨论？为什么不要牢记着它？直到第二天我才懂得了卢德维克这一要求的真正含义。卢德维克在我家过了一宿，并和我们一道吃早餐。早餐后我们又谈了半小时。他告诉我，为了获准读完大学最后两年的学业，他费了许多周折。开除党籍给他终生留下了印记。无论到哪里他都得不到信任。只是多亏几位二月政变前的老朋友，他才有了重返学校的机会。他谈起与他处境相似的几个朋友，他们被人跟踪，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下来。他们圈子里的人受到讯问，一条热心或恶意的证据都可能使他们的生活多受几年摧残。接着他突然把话题转到一些琐事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见到我他很高兴，并再次要求我忘掉他昨天说的话。

这个请求和谈到他朋友们的遭遇之间的关系太清楚不过了。我不能摆脱这个想法。卢德维克停止跟我谈话是因为他害怕！害怕我们的谈话会让人知道！害怕我会告发他！害怕

我！太可怕了。又一次完全出乎意外。我们之间的鸿沟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得多。深到足以阻止我们把我们的谈话谈完。

10

乌娜斯塔睡着了。时而发出一点鼾声，可怜的人儿。他们都睡着了。而我躺在这里，一个高大笨重的人，在沉思着，我是多么无力。与卢德维克的谈话使我真正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一直自欺欺人地相信情势掌握在我手中。卢德维克和我都从没做过伤害对方的事。只要我什么时候愿意，怀着一点善意就可以重修旧好。

结果证明，什么也没有掌握在我手中。不论是我们的争吵还是我们的和解。于是我开始希望这一点能掌握在时间手中。光阴荏苒，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又过了九年。卢德维克获得了学位，并在他喜爱的领域找到一份极好的工作。我从远处注视着他的进展。怀着友爱之情。我决不可能把卢德维克看作一个敌人或陌生人。他是我的朋友。不过他遭了殃。就象神话故事中王子的新娘被咒语变成一条蛇或一只癞蛤蟆一样。在神话故事中，王子总是凭借忠诚和耐心转危为安。

然而时间还没有把我的朋友从咒语中唤醒。这些年来我不只一次听说他回过故乡。可他从不来看我。而今天我遇见他时，他却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这个该死的卢德维克。

一切都是从我们上次谈话后开始的。我感到一片荒原在我周围逐年生长，苦恼在其中蔓延。更多的沉闷，更少的欢乐，更少的成功。乐队过去每年都要到国外演出一次，可那以后邀请开始减少了，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地方邀请我们。我

们不停地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可是我们却被沉默所包围。我正站在一个空寂无人的大厅里。我觉得是卢德维克命令我孤单。因为判你孤独的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朋友。

从那时起我开始到一条田间小路上去躲避。我愈来愈经常地到那里去，到田野边缘的一丛孤单的野玫瑰那里去。在那里我遇见了最后一个忠诚的人。一个逃兵和他的同伴。一个云游四方的行吟诗人。在地平线的那边有一幢小木房。小屋里住着乌娜斯塔，那个穷人的女儿。

这个逃兵称我是他的国王，并答应只要我需要就给我庇护。他说，我只须到玫瑰丛去，他就一定会在那里。

在幻想的世界中找到安宁是非常简单的。可我总是试图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不愿为了一个世界而放弃另一个世界。我没有权利放弃现实世界，即使我正在失去现实世界里的一切。如果我最终能设法办成一件事，也许这就够了。这最后一件事是：

使我的生活成为一个清楚明确的讯息，把它传给一个能够理解它，承传它的人。在完成这件事之前，我不会加入到那位驰向多瑙河的逃兵中去。

我心中的那个人，经过这一切挫折之后我唯一的希望，就躺在墙那边酣睡。后天他将骑上他的骏马。他的脸将被缎带遮住。他将被称为国王。到我这里来吧，我的孩子。我就要睡着了。你将叫我的名字。我即将入睡。我将梦见你骑在你的骏马上。

第五章 卢德维克

我睡了一个又长又香的觉，直到八点过后才醒来。记不得做了什么梦，是好梦还是噩梦，头倒不痛，可也不想从床上爬起来；于是我就躺在那里。睡眠在我自己和我星期五晚间的邂逅之间竖起了一道墙，一道使我感到（至少是暂时）安全的防风墙。这与其说是露西从我意识中退出去了，不如说是她又回到了她以前的抽象状态。

抽象状态？是的。当露西如此神秘和冷酷地从俄斯特拉发消失时，我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去追寻她。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已被免除兵役），我渐渐完全失去了追寻她的愿望。我对自己说，无论我是多么爱她，无论她是多么独一无二，她终究与我们相识和相爱的那个境遇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将所爱的人从初次相遇的环境，从他或她生活的环境中完全分割开来，处心积虑地去掉所爱之人的一切，只留下他或她本身，也就是说，去掉一对恋人共同经历的、

赋予他们爱情以形式的恋爱故事，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误。

说到底，我在一个女人身上所爱的不是她的本身，而是她给我提供的东西，她对我所具有的意义。我爱她是把她作为我爱情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艾尔西诺的城堡，没有奥菲利娅，没有要经历的具体情境，没有一系列相关的人或事，哈姆莱特会是什么样子？除了一个无声的、空洞的、虚幻的实体外还会剩下什么？同样，如果没有俄斯特拉发的景致，没有那些通过栅栏献上的玫瑰，没有那些褴褛的衣服，没有我自己那些无穷无尽的绝望日子，露西便将不再是我曾经爱过的那个露西。

是的，我就是这样看待我和露西的爱情，就是这样使它概念化的，随着岁月流逝，我渐渐变得几乎害怕再次碰见她：我知道我们终究会在一个地方见面，可那时露西已不再是露西；我将缺乏能力去重修旧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已不再爱她了，我已把她忘掉了，或者她的形象已经变暗淡了；恰恰相反，以一种平静的怀旧形式，她仍然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想望她就象一个人想望某种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的东西。

由于她已经成为不可挽回的过去的组成部分（某种生活在过去，可如今已经死亡的东西），她在我头脑中渐渐失去了所有的物质性、肉体性，变成了一种传说或神话，写在羊皮纸上，放进我生命基座上的一个金属匣子里。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真不能相信——我不能肯定理发店的那个女人是否就是露西，为什么第二天早晨（受了睡眠间歇的欺骗），我觉得这次邂逅不是真实的，它发生在传说、

预言或谜语的层次上。如果说星期五晚间露西的真实出现使我大为惊异，突然间把我驱送到一个曾由她统治的遥远的时光，那么，星期六早晨我所能做的只是窥视我平静（休息得很好）的内心，并自问：我为什么会遇见她？难道露西的故事免不了还要有一个新的连载吗？我们的邂逅意味着什么？它试图告诉我什么？

抛开事件和人，爱情故事还有什么内容？尽管我是个怀疑主义者，我还是一直怀有几个迷信——例如，我奇怪地深信，我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有一种超过它自身的意义，都意味着某种东西，生活通过它每天发生的事在向我们讲述它自己，在逐渐揭示一个秘密，它采取一个寓意必须译解的画谜的形式，我们生活中的故事构成了我们生命的神话，在这部神话书中存在着一个揭示真理和神秘的线索。这完全是幻觉吗？也许是，很可能是，但是我似乎无法摆脱不断地去译解我生活的这种需要。

我躺在吱嘎作响的旅馆床上，心里想着露西——到现在为止，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问题。床开始吱吱嘎嘎地响起来，这吱嘎声一进入我的意识，我的思路就转向了（迅速地，冷酷地）海伦娜。这张吱嘎作响的床就象责任的号令：我长叹一声，把脚伸下床，坐起来，伸伸懒腰，很快地按摩了一下头皮，望望窗外的天空，然后站起来。星期五与露西的相遇，在晨曦下尽管显得虚无飘渺，然而还是使我对海伦娜的兴趣大减。就在几天前这个兴趣还是如此强烈，可现在剩下的只是对兴趣的意识，对一个失去的兴趣的义务感，我的内心向我保证这个失去的兴趣会完全恢复它的强烈

程度。

我走到脸盆跟前，脱掉睡衣裤的上半部，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我用手捧着水，迅速把水浇在脖子上、肩膀上和身上；我用毛巾摩擦全身，我想让血液在血管里循环流动。突然我感到不安起来，对海伦娜的到来无动于衷使我不安，担心我的漠然（暂时的漠然）会破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决定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用一杯伏特加把饭咽下去。

我下楼去咖啡厅，可是我发现的只是许多凄凉无告的椅子，椅腿朝上，搁在光光的桌上，一个系着脏围裙的老妇人在桌椅中间无精打采地踱来踱去。

我走到旅馆接待处，向深陷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昏昏欲睡的守门人打听，我能不能在旅馆里用早餐。他动都没动一下，告诉我星期六咖啡厅不开门。我走出旅馆。这是一个美好的天气，云彩在空中疾驰而过，微风使街上的尘埃打旋。我匆匆朝广场走去，经过一群站在肉店前面的各种年龄的女人；她们提着购物袋和网兜，耐心地、死气沉沉地在排队。有几个漫步或匆匆走过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们象举着小火炬一样拿着顶上饰有红色的蛋卷冰淇淋，高高兴兴地舔着。不一会儿我走进了广场。在我面前立着一幢杂乱的平房建筑，一个自助餐馆。

我走进去。这是一个大房间，地上铺着砖，桌腿都很高，人们就站在桌前吃三明治，喝咖啡或啤酒。

我不想在那里吃早餐。从一大早起，我就决心要吃一顿丰美的早餐，要有蛋、薰肉和一杯酒，以便恢复我失去的元气。我记起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广场有一家饭馆，广场上还

有一个小公园，一个巴罗克式的鼠疫受难者纪念碑。那家饭馆也并不特别吸引人，可我所需要的就只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侍者，就一个，无论上点什么现成的饭菜都行。

我从纪念碑前走过，基座上是一个圣徒，圣徒上是一朵云，云上是一个天使，在那个天使的云上还有一个天使，最后一个天使。我久久地凝望着这个圣徒、云彩和天使的生动的金字塔，用石头装点成的天堂，尔后又望着真正的天堂——一片淡淡的（早晨的）蓝色无望地远离这块尘埃弥漫的大地。

我穿过有着整洁的草坪和长凳的公园（尽管公园空得足以保持满是尘埃的空寂气氛），试着想推开饭馆的门。门上了锁。我开始意识到，我那个梦想的早餐将仍是一个梦，一个令人惊恐的念头，因为怀着一种稚气的固执，我认定一顿丰盛的早餐是这一整天取得成功的关键。我意识到这个外省城镇并不会为那些希望坐下来吃早饭的古怪人作任何特殊的安排，他们的饭馆要很迟才开门营业。因此我不再继续找地方吃饭，而是转过身往回走，穿过公园。

我再次走过那些拿着顶上饰有红色的小蛋卷冰淇淋的人，我再次觉得它们就象火炬，但这一次我想知道在它们的形状里是不是有些更深的含义，因为那些火炬并不是火炬，而是火炬的拙劣模仿，他们如此庄严地显示出来的那点极度的高兴，根本不是愉快，而是愉快的拙劣模仿，这种模仿似乎能抓住这个满是灰尘、死气沉沉的小地方里所有火炬和愉快的不可避免的模仿的实质。接着我突然想到，只要我不断遇见这些贪吃的持火炬者，我就在朝着一个糕点店的方向

走，在那里我就能找到桌椅，也许还能弄到一些浓咖啡和一点吃的东西。

结果我来到了一个冷饮店而不是一个糕点店。人们排着长队在等可可或牛奶面包，在同样高的桌上吃喝，后面虽有几张正规的桌椅，但都被占据了。于是我加入了队列，缓缓移动几分钟后终于买到了一杯可可、两个面包，并找到一张桌子，尽管这张桌子堆满了五六个空杯子，但总算有一处没有溅上液体。

我闷气地三下两下把早餐吞下去：不到三分钟我已回到了街上，此刻是九点钟，我还有两小时的时间；海伦娜乘坐从布拉格起飞的早班客机，然后从布尔诺乘公共汽车，应在十一点钟左右到达。我看出这两小时等于是白白浪费掉了。

当然，我可以到我孩提时代常去的地方走一走，带着感伤的沉思从我出生的那幢房子，我母亲生前一直居住的那幢房子前面经过。我常常想起母亲，但是在这里，在这个镇上，她的遗体被骗去葬在外人的大理石下面，我所有的回忆似乎都被玷污了：这些回忆会与我当时产生过的无能和痛苦的感觉混杂在一起，我不愿意勾起这些感觉。

因此我百无聊赖，在广场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商店橱窗前，扫了一眼书店里的图书书名，在报摊买了一份《红色权利报》，回到长凳上，浏览枯燥乏味的大标题，阅读外事专栏里两三条还算有趣的报道，然后再次从长凳上站起来，折起报纸，还是崭新的就把它扔掉了；接着慢步走向教堂，在它前面停下，抬头凝视它的两个高塔，登上宽大的台阶，进入走廊，然后胆怯地进入教堂内，这样

当新来者没有在胸前划十字时就不会有人感到震惊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教堂，我开始觉得自己就象一个不知道怎样处置自己，怎样低头或怎样紧握十指的闯入者，于是我走了出去，看了看钟，还剩下很多时间。我试图使自己的思想集中在海伦娜身上，把多余的时间消磨掉；可是思想不肯出来，不肯移动；我最多只能追忆起她的视觉形象。说到底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个男人在等一个女人时，他发现要想她是非常难的，除了在她凝固的肖像下踱来踱去外什么也做不了。

于是我踱起步来。在教堂对面，我注意到十辆空婴儿车排成一排摆在旧市政厅（今天是市议会的大楼）外面。我正在想那些婴儿车放在那里干什么时，一位气喘吁吁的年轻小伙子又把一辆车推到已经放在那里的那些车跟前，跟随他的那位妇女看上去很紧张，从车里抱起一个白色缎带的包（显然包着一个婴儿），他们一起匆匆走进大厅。想到还有一个半小时要消磨，我便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去。

宽宽的楼梯两旁站着瞧热闹的人，我上了楼，看见更多的人，大多数都在二楼的走廊里（通向三楼的楼梯上没有人）。他们聚在一起要看的事显然将发生在二楼，很可能就在走廊尽头那个开着的门上挤满了人的房间。我也走了进去，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不太大的会堂，七八排椅子上几乎都坐满了人，他们似乎是在等待一场演出开始。房间前面的台上有一张覆盖着红布的长桌，桌上的花瓶里有一大束花；很艺术地折叠起来的国旗装饰着台子后面的那堵墙；紧靠台前（离第一排观众约十英尺）有八张椅子成半圆形面对台子；在会

堂的另一头，在后面，有一架小簧风琴，一个戴眼镜的秃头老人俯身坐在打开的键盘前。

会堂里还有几把空椅子；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过了好久什么也没有发生，可那些人一点不厌烦，仍然倾斜着身子，带着热心的期待交头接耳。这期间那些留在走廊上的人也慢慢挤了进来，占据剩下的几个座位，沿墙排成一溜儿。

活动终于开始进行：台子后面的一道门打开，现出一位身穿褐色服装、戴着眼镜的女人。她的眼光从长长的瘦鼻子上投进会堂，抬起右手。周围的人安静下来。接着她转身朝着她刚离开的房间，显然是为了给那里的某个人示意，但转眼间她又面向我们，靠着墙，漾出一种固定的、礼仪的微笑。一切都似乎配合得很好，就在她露出微笑的同时，簧风琴开始在我背后呼哧呼哧地响起来。

几秒钟后，一位亚麻色头发的红脸孔少妇出现在台子后面的门上，她精心制作的头发式样和化装与她眼里的惊恐神情和怀中的白色襁褓形成了鲜明对照。戴眼镜的女人往墙上贴得更紧，好让抱着婴儿的女人通过，并以微笑示意她继续往前走。那女人紧紧抱着婴儿，慢慢地前进，对自己缺乏信心；接着，又一位怀抱婴儿的女人出场了，她身后（排成单行）是一支女人的小分队。我盯着领头的那个女人：起初她凝望着天花板，然后她的眼光落下来，与观众里某个人的目光相遇；那目光激怒了她，于是她移开眼睛，微笑起来，可是那微笑（人人都看得很清楚，她费了很大劲才做出这微笑）很快就消逝了，只留下一个僵硬的嘴形。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内（从门口走十五或二十呎所用的时间）；可是由于她直端

端地朝前走，到了半圆形的椅子跟前时也没有转过来，戴眼镜的女人不得不离开墙(微微皱着眉头)，赶紧走到她跟前，在她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提醒她应该往哪走。这位母亲很快纠正了路线，领着别的母亲绕椅子前面走了一圈。她们一共有八个人。她们的行进终于结束了，每个人站在一把椅子前，背对着观众。穿褐色服装的女人指着地板；那些女人渐渐懂了这个意思(仍然背朝观众)，抱着她们的包裹在椅子上坐下来。

不满意的阴影从穿褐色服装的女人脸上消失了，她又微笑起来，朝半开着的门走去，进了后面的房间。在那里站了几秒钟后，她轻快地走回来靠着墙。一个大约二十岁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身穿黑色西服，白色衬衣，塞满一根花领带的衣领，紧紧卡住他的脖子。他目视着地板，走路时有些摇晃。他的后面跟着七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全都穿着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衣。他们走到那群抱着婴儿的女人被安置的椅子后面，然后停下来。但接着他们中有几个人开始窘迫地环顾四周。穿褐色服装的女人(她的脸顿时象刚才一样变阴暗了)跑向他们，听完一个低声的请求后，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这些男人局促地交换了位置。

穿褐色服装的女人恢复了微笑，回到门口。这次她不必点头或示意了。另一群列队进来的人完全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很自然，很有纪律，举止几乎象专业演员一样优美：这群人全是十岁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地交叉排列着。男孩们穿着深蓝色裤子、白衬衫，折起来的红领巾的一角搭在背上，另外两个角围着脖子上打了个结；女孩们穿着深蓝色短

裙、白衬衣，脖子上同样系着红领巾；每个孩子都拿着一小束玫瑰花。正象我说的那样，他们信心十足地行进，没有在椅子那里分成两队，而是沿着台子散开。然后他们停下来，脸向左转，站在那里正对着母亲们和观众。

又停了一会儿，最后一个单独的人出现在门口，径直朝台上覆盖着红布的长桌走去。他是个中年男人，头上没一根头发。他挺直着背，庄严地走着；他身穿一件黑色西服，夹着一个鲜红色的公事包。走到桌子中间，他停下来，转向观众，一边朝他们微微鞠躬，露出一张病态的发胖的脸，挂在脖子上的一根红、白、蓝三色的宽绶带，绶带末端缀着一个大金质勋章，悬在他的腹部附近，当他俯身向前时便上下摆动。

突然（没有作任何宣布）站在台前的一个男孩开始大声演说起来。他说春天已经到了，所有的妈妈和爸爸都充满欢乐，整个大地欢欣鼓舞。他继续用这个语调讲着，直到一个女孩打断他，并按着同样的方式演讲，就是说，话语不太清楚，但全是“妈妈”、“爸爸”和“春天”之类的字眼。她也采用了“玫瑰”这个词。接着她被另一个男孩打断，那个男孩又被另一个女孩打断，尽管他们没有任何在吵架的迹象；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大抵相同的话。比如，一个男孩宣称，儿童是和平。他后面的那个女孩说，儿童是花朵。接着这些孩子同时齐步上前，伸出拿着花束的那只手。由于有八个孩子，八个成半圆形坐着的女人，所以每个女人都得到了一束花。然后孩子们回到台前的位置，不再吭声。

现在轮到台上那个站在孩子们上方的男人了，他打开红

色公事包，开始读起来。他也讲到春天，讲到花朵，讲到妈妈和爸爸，但他还讲到爱情，讲到爱情怎样结果，突然他的词汇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出现了象职责，责任，国家，公民之类的字眼，妈妈和爸爸变成了母亲和父亲，接着他列举了国家对他们（母亲们和父亲们）的一切恩情，提醒他们，作为报答，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国家的模范公民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他指着搁在桌子一端一个厚厚的皮面本子，号召所有在场的父母在父母登记簿上签名，以此进一步证实他们愿意这样做的决心。

这时，穿褐色服装的女人走到最靠近登记簿的那个母亲身边，拍拍她的肩膀。那个母亲抬起头来，女人接过她的婴儿。然后母亲站起身，走到桌子跟前。脖子上挂着绶带的男人翻开登记簿，递给那个母亲一支笔。那母亲签了字，回到座位上，穿褐色服装的女人把婴儿交还她。接着她的丈夫走到桌旁签了字；然后穿褐色服装的女人接过下一个母亲的孩子，打发她去桌旁；接着她的丈夫签了字，然后是下一个母亲，下一个丈夫，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他们全都签了字。尔后簧风琴的曲调再次在会堂里飘荡，周围的观众都冲到母亲们和父亲们身边，跟他们握手。我也走上前去（仿佛想与某个人握手），这时，那个脖子上挂着绶带的人突然叫着我的名字，问我是否认出了他。

当然我没有认出他来，尽管他讲话时我一直都在瞧着他。为了避免以否定回答他那含糊得令人不快的问题，我问他一向好吗。还可以，他说，忽然我完全认出了他：科瓦里克，我的一个老同学；他的相貌已被那张多肉的臉弄得模糊

不清，好一阵我才重新想起他原来的面貌。不管怎样，科瓦里克一直是个不太起眼的学生：既不假正经，也不流气；不是特别亲近人，但也绝不是不合群；学习成绩不过平平——总之，不引人注意。由于他原来搭在前额上的头发已经脱落，我也就有了一个没有立刻认出他的好借口。

他问我在哪里干什么，那些母亲中间是否有我的亲戚。我回答说没有，我来这里是由于闲着无聊和好奇。他心满意足地微笑起来，开始向我解释，市议会为了使世俗仪式充满庄严，做了大量工作，接着他带着谦虚的骄傲补充说，作为负责民政事务的官员，他可能得到了一些荣誉，甚至已受到了区一级的嘉奖。我问他，我刚才看见的是不是一个洗礼仪式。他告诉我，那不是个洗礼仪式，那是一个欢迎新公民诞生的仪式。显然他很高兴有机会详细阐述这个题目。他说，有两个大的对立阵营：天主教会及其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仪式，我们的民政机关及其面临着取代这个上千年古老仪式的必要性的自己的新的仪式。他说：直到我们的世俗仪式比得上教会仪式的庄严和美时，人们才会停止去教堂为孩子洗礼或结婚。

我告诉他这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表示同意，并说他很高兴象他那样的民政官员终于从我们的艺术家们那里得到了一点支持，艺术家们现在应该看清他们的职责，给我们的人民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葬礼、婚礼和洗礼仪式（说到这里，他立刻纠正为“欢迎新公民诞生的仪式”）。就拿那些少先队员刚才朗诵的诗歌来说吧，他说：它们实在太美了。我点了点头，问道，难道没有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使人们放弃宗教仪

式，也就是说，给予他们拒绝一切仪式的选择自由。

他说，人们决不会放弃他们的婚礼和葬礼。不管怎样，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强调了“我们的”这个词，好象要让我明白，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几年他也加入了党），如果不利用这些仪式使人民更靠近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政府，那将是一大缺憾。

我问我的老同学，他怎样对付那些不愿参加他这个仪式的人，是否有这样的人。他告诉我，当然有这样的人，既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觉悟，愿意接受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他们不参加，他们将不断接到邀请，他们中大多数人迟早会在一两周后来的。我问他，出席仪式是不是强制性的。不，不是强制性的，他带着微笑回答，但是市议会把出席仪式作为评价人们的公民感和对政府的态度的一個检验标准，最后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来了。

假若这样的话，我说，市议会对待它的信徒比教会还要严厉。科瓦里克笑着说，正是这么回事。然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说，很遗憾，我时间比较紧，因为我得去接一个乘公共汽车来的人。他问我见没见到“那帮哥们”（他指的是我们的同学）。我告诉他，很遗憾，我没有见到，不过我很高兴至少有幸见到了他，因为我一旦有了孩子需要施洗，我将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他大笑起来，友好地在我肩上给了一拳。我们握手告别，然后我走出去又到了广场，不知道怎样打发剩下的一刻钟。

一刻钟并不算太长。我穿过广场，经过理发店，透过窗户朝里窥望（我很清楚露西不可能在那里，要早些时候才会

在里面)，然后伫立在公共汽车站前面，想着海伦娜：她那掩在一层厚厚的脂粉下面的脸庞，显然是染过的红头发；一点也不苗条的身材，尽管保留了使一个女人成为女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比例。我想起那些使她既让人反感又叫人迷恋的富于刺激性的特点：她的声音，响亮得令人不快；她那粗鲁笨拙的姿势，暴露出想继续引人注意的可悲的用心……

我一生中只见过海伦娜三次，因此很难使她的形象固定在我的脑子里。每当我试图追忆她的形象时，她的一两个特征就特别显著地突出出来，以至于她总是变成她本人的一幅漫画。但不论我的想象是多么不精确，它还是一——正是靠它的变形——抓住了海伦娜的一个基本特征，某种隐藏在她外表下面的东西。

我无法摆脱海伦娜肌肉松弛的形象，它不仅显露出她的母性和她的年龄的特征，而且更显露出她真实的欲望的特征：性爱的牺牲品。它果真是出于她的本质，抑或仅是我自己对她的态度的一种征候？谁说得上来？公共汽车就要到了，我渴望见到一个与我的幻想制造出来的解释完全吻合的海伦娜。我闪进一幢楼房的门洞，希望观察她一会儿，看看她是如何无助地四处张望，然后突然怀疑起她这趟旅行是不是白来了。

当大公共汽车快速驶进广场时，海伦娜头一个下了车。她穿着一件蓝灰色的意大利塑料雨衣，这种当时在外汇商店走俏的雨衣使穿上它的人显得年轻，精神。这雨衣（领子翻上去，腰带紧束）也使海伦娜生色不少。她环视了一下广场，朝前走了几步，检查被汽车挡住的地方，接着，根本没有站

在那里无望地等待，而是立刻转过身，朝我住的那家旅馆的方向走去，她要订一个房间过夜。

我再一次意识到，我的想象只不过给我提供了一个她的

电台播放我们的研究要来采访我时，我马上联想到了我过去的那位朋友，想知道他们共同的姓是否仅仅是一个偶合，然而我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如果我不高兴他们把她派到我这里来，那完全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不喜欢新闻记者。他们大多是浅薄，轻浮，满口术语的人。海伦娜在电台工作而不是在报社工作只能更加激起我的反感。在我看来，报纸还有一个令人慰藉的特点：它们摺制造噪音。它们叫人生厌，但它们却很安静；它们可以被不在一边，扔进废纸篓里。无线电广播叫人生厌，但却没有那种令人慰藉的特点；在咖啡店，饭馆，火车上，甚至私人住宅里，它都时时烦扰着我们，以至于居民们已变得假若没有不断的听觉消遣就不能生存下去了。

而且海伦娜谈话的方式也激怒了我。我能看出，在踏进研究院之前，她已把她的报道想好了，只需要从我这里得到几件事实和数据，几个例子；来证明她的陈腐论点。我尽量使事情变得对她很棘手；我故意用复杂混乱的句子谈话，极力扰乱她事先想好的看法。在一个问题上，她险些听懂了我的话，于是我便拉起近乎，转移她的目标；我告诉她，她的红发显得多么引人注目（尽管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并问她觉得在电台的工作怎么样，她喜欢读些什么书。我一边继续把话谈完，一边思量，姓名的一致未必就是一个偶合。在这位夸夸其谈，高谈阔论，盛气凌人的女人与我记忆中那位盛气凌人，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的男人之间似乎有一种亲属间的相似之处。于是我以谈话中已有的那种轻浮的、近乎调情的语气问起她的丈夫。这个话题恰到好处；仅仅问了几个问

题，我就毫不怀疑地验明了他。可以说，我当时并没有象后来那样想到要深入了解她。完全没有。她一进房间我就产生的反感只能因这个发现而加剧。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找一个借口中断这次采访，把她交给研究院的另一个成员；我头脑里甚至浮现出微笑着把她赶出门外的快意情景，但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接着，就在我感到再也不能忍受之际，海伦娜被我非常亲昵的问题和话语激得兴奋起来（没有意识到它们纯粹是为了调查），以几个惯常的女性姿势使我丧失了戒备，我的仇恨突然呈现出一种新的模样：在她那电台记者的滑稽面罩后面，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能够尽女人职责的具体女人。正是泽曼尼克应得的那种女人，我略带鄙夷地在心里对自己说，非常适合的惩罚；但接着我就改变了看法：我这样快就对她产生的极度轻蔑过于主观，过于勉强；实际上，她曾经肯定很漂亮，没有任何理由断定巴威尔·泽曼尼克已经不再喜欢把她作为一个女人使用。我继续用开玩笑的口吻谈话，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我内心的想法。某种东西在告诉我，要尽量找出我的采访者的女性的一面，使我们自动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假若一个女人居间调停，情爱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就可以被置于仇恨之上——诸如好奇心，接近某人的欲望，跨过亲密门槛的强烈渴求之类的特性。我处在近乎狂喜的状态中，想象着泽曼尼克，海伦娜，以及他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尽情地放纵我的仇恨（有礼貌的，差不多是温柔的仇恨），对海伦娜外表的仇恨，对她红头发的仇恨，对她蓝眼

睛的仇恨，对她短而硬的眼睫毛的仇恨，对她圆脸庞的仇恨，对她性感的、张开的鼻孔的仇恨，对她两颗门牙之间的缺隙的仇恨，对她成熟多肉的躯体的仇恨。我象男人们观察他们所爱的女人那样观察她；我带着似乎要把她的一切铭刻在记忆中的意图观察她。为了掩饰我对她突然产生的兴趣背后的深仇积怨，我使我的语调显得益发轻松愉快，这使她相应地变得更加女人气。我不断想着，她的嘴，她的乳房，她的眼睛，她的头发，都属于泽曼尼克，我在内心拨弄它们，抓住它们，掂量它们——试验它们是否能被我的拳头捏碎，或被墙壁碰碎——然后再仔细检查它们，先用泽曼尼克的眼光，然后用我自己的眼光。

也许我的确有过一个短暂而毫不实际的柏拉图式的幻想，把她从我们戏谑的真空地带驱赶到卧室的交战区域。但那仅仅是在头脑中一闪而过，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一种幻想。海伦娜宣布，她感谢我给她提供的情况，不愿再占用我更多的时间。我们道了再见，我很高兴看见她离去。那种古怪的得意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由衷的反感，一想到刚才竟用如此亲密的关心和热诚对待她(尽管是伪装的)，我就感到很不舒服。

要不是海伦娜几天后打电话来，问她是不是可以来见我，那次会面本来会毫无结果的。也许她真的需要我过目一下她写的东西，但当时我便确定无疑地认为那是一个借口，她的语气更多地是表现出我们谈话的亲密、轻松的方面而不是它的业务方面。我自己很快就采用了这种语气，并一直保持下去。我们在一家咖啡店见了面，我为了挑衅而完全回避这次

采访的话题，一有机会就贬低她的职业兴趣；我瞧着她失去了镇静，为了占上风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邀请她同我一道去乡间。她表示反对，提醒我她是一个已婚妇女。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给我带来更大的愉悦了。我玩味着她令人愉快的拒绝，拿它取乐，用它开玩笑，不断地提及它。最后她唯一能使我放弃这个话题的办法就是接受我的邀请。打那时起，一切便都完全按照计划进展。我所制订的这个计划背后掩藏着十五年的仇恨，不知道为什么，我坚信这个计划会顺利实现。

是的，事情正在按照计划进展。我提起海伦娜放在接待台的小旅行箱，然后我们一起上楼去她的房间。这个房间与我的房间一样实在叫人丧气，就连海伦娜具有把事物描述得比原样还好的罕见才能，也不得不承认这房间毫无吸引力。我告诉她别烦恼，我们会设法对付的。她投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然后说，她想梳洗一番，我说，好吧，我在门厅等你。

当她下楼时（在她没有扣上的雨衣里面穿着裙子和粉红色毛衣），我再次被她优雅的样子打动了。我告诉她，我们去人民之家吃午饭，那儿的饭菜很差，但却是本地最好的。她说，既然我是本地人，她将完全听我支配，不作任何反抗。

（她似乎在仔细斟酌词语的双关含义，表现出一种可笑而又可喜的努力。）我们取道清晨我曾徒劳地寻求一顿象样的早餐所走过的路线，海伦娜不断地强调，能了解我的家乡她是多么幸福。但尽管她实际上是第一次来这里，她却从没有环顾一下周围，或者询问这幢建筑物或那幢建筑物是什么，也

没有表现出一点她正在参观一个陌生城市的样子。我不知道她缺乏兴趣是由于造成对外界的正常好奇心衰退的那种精神萎缩，还是由于她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无暇顾及外界；我倾向于赞成第二种假设。

我们又经过了鼠疫纪念碑：圣徒托着云，云上天使，天使托着第二朵云，第二朵云上第二个天使；天空比刚才更蓝了；海伦娜脱掉雨衣，把它搭在手臂上，谈论说天气真暖和；温暖增强了灰尘弥漫的空间感；矗立在广场上的纪念碑就象一片脱落的天空找不到归路；我心想，我们也落进了这个有着公园和饭馆，空寂得古怪的广场，无可挽回地掉下来了，我们也从某种东西上脱落了，当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象尘世本身一样卑下之时，我们却在浪费时间企图在思想和言语上攀往高处。

是的，我被深刻认识到我自己的卑下所打动；它让我深感吃惊；但更叫我吃惊的是它并没有使我觉得恐惧，我怀着一种愉快的感觉接受了它，不，应该说是欢乐的，轻松的感觉；走在我身边的这位女人正在让她自己投入一个结局未定的下午冒险，她的动机丝毫不比我的动机高尚，这一确定无疑的事实增强了我的愉快感。

人民之家开着门，由于才十一点三刻，饭馆里还空空无人。桌子已摆好，每张椅子面前有一个摆着一副刀叉的汤碗，调羹放在拭嘴纸上。我们坐下来；拿起餐具和拭嘴纸，放在我们的盘子边，然后等待着。几分钟后，一位服务员出现在厨房门口。他用疲倦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餐厅，然后转身准备回到厨房。

“服务员！”我喊道。

他转过身，朝我们桌子的方向走了几步。“你们是不是想要点什么？”他问，仍离着十五或二十呎远。“我们想要点吃的。”我说。“十二点才开饭。”他回答，又转身想回到厨房。“服务员！”我又喊道。他回过身。“请问，”我不得不大声喊叫，因为他离得很远，“你们有伏特加吗？”“伏特加？没有。”“呃，那么你们有什么？”“裸麦酒，”他远远地叫道，“还有朗姆酒。”“就这些吗？”我喊道，“那给我们拿两杯裸麦酒。”

“我甚至还没有问过你喝不喝裸麦酒。”我对海伦娜说。

海伦娜笑了，“我不能说习惯裸麦酒。”

“没关系。”我说，“你会习惯的。你现在在摩拉维亚，裸麦酒是这里的人最喜爱的饮料。”

“唷，那太不寻常了！”海伦娜高兴地说，“没有什么比你们的普通酒吧更让我喜欢的了，就是长途驾驶员和建筑工人去那里吃便饭和喝酒的那种酒吧。”

“那么你喜欢在啤酒里加点朗姆酒啰。”

“嗯，并不是很喜欢。”她说。

“可你喜欢与这些人在一起。”

“噢，是的。”她说，“我不能忍受那些时髦的场所，一打服务员围着你转，给你端上一道又一道的菜……”

“不错。没有比简陋的饭馆更妙的了，那里的服务员看都不愿看你一眼，烟雾和恶臭使你不能呼吸。而裸麦酒——没有任何象它这样的饮料。我当学生时从来不喝其它饮料。从来买不起其它饮料。”

“我也喜欢简单的饭菜，象土豆油煎饼，洋葱油炸肥香

肠……”

我早已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怀疑一切的人，所以每当有人开始列举他的好恶，我都无法把他的话当真，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只把它作为这个人自我形象的一个表露来接受。我一点也不相信海伦娜在污秽的、通风差的下等酒吧间比在干净的、通风好的饭馆里呼吸得更适意，也不相信她更喜欢劣酒和便宜、油腻的食物而不是名菜佳肴。如果说她的话真有什么价值，那是因为这些话显露了她对一种特殊姿态的偏爱，一种早已过时，不合时宜的姿态，一种可以追溯到那些革命激情年头的姿态，那时任何“普通的”、“卑贱的”、“简单的”、“粗俗的”东西都受到赞美，而任何“精美的”或“高雅的”东西，任何与彬彬有礼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遭到贬低。海伦娜的姿态把我带回到我的青年时代；海伦娜的样子使我回忆起泽曼尼克。我一大早的顾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开始全神贯注起来。

服务员用盘子给我们端来两杯裸麦酒，放在我们面前，并留下一张纸（无疑是复写本的最后一张副单），上面写着当天的菜肴，字迹模糊不清，几乎难以辨认。

我举起酒杯，说：“向裸麦酒致敬——纯味的、普通的裸麦酒！”

她大笑起来，跟我碰杯，说：“我一直都向往那种朴实直爽的人。不装腔作势。真挚坦率。”

我俩都饮了一大口。“这种人很少见。”我说。

“但他们确实存在。”海伦娜说，“你就是一个。”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

“可你是的。”

我再一次对人把现实变成愿望或理想的相似东西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感到惊愕，不过我很快就认可了海伦娜对我性格的曲解。

“谁知道？也许是吧。”我说，“直爽朴实。但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你要什么东西就要什么东西，毫不羞愧地去追求它。人们都是规矩的奴隶。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应该作这种人或那种人，他们就极力去做到，以至于到死的那天，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过去是谁，现在是谁。这使得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人。首先，一个人必须要有保持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被你迷住了，海伦娜，我需要你，不管你结婚还是没有结婚。我不能用别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情，也不能把它埋在心里不说出来。”

说出这番话是件很尴尬的事，但我还是不得不说出来。征服一个女人的心要遵循其自身不可更改的法则，用合乎情理的理由来使她相信的一切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聪明的做法是确定她的基本的自我形象（她的基本原则、理想、信念），并设法（借助于花言巧语，不合情理的虚夸之辞，等等）在她的自我形象与她所期望的行为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譬如，海伦娜向往“朴实”、“直爽”、“坦率”——这些理想根源于从前一个时期发展而来的清教主义，并在她头脑中与对一个“纯洁”、“清白”、有高度原则、高度道德的男人的概念混在一起。但是，由于海伦娜的原则世界不是基于仔细的思考，而是（象大多数人一样）基于一个逻辑的联想，所以运用一点粗野的蛊惑，将“真挚坦率的男人”的概念与毫无

拘谨、毫无道德及通奸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从而防止那个所期望的行为（也即通奸）与她内心的理想发生创伤性的冲突，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一个男人可以向一个女人要求任何东西，但他必须尽可能使她的行为与她内心深处的自我欺骗和谐一致，除非他希望自己显得象个畜生。

这期间，人们一直在陆续进入饭馆，不一会儿多数桌子都被占据了。那个服务员现在又出现了，挨桌记下人们所点的菜。我把菜单递给海伦娜。她说我更了解摩拉维亚菜，于是把菜单又递还给我。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了解摩拉维亚菜，因为这张菜单上的种类与所有饭馆的菜单上的种类完全一样，只有几样标准的菜可供选择，全都不诱人，因此很难从中挑选出合意的菜。我还在发愁地注视着那张脏污的菜单，这时服务员走过来，挺不耐烦地问我点什么菜。

“稍等一下。”我说。

“一刻钟以前你就想点菜，现在还没有打定主意。”等我抬起头时，他已经走了。

还算幸运，他很快就转来了，我们大胆地点了牛肉卷，再来了两杯裸麦酒，这次还要了苏打饮料。

海伦娜精神饱满地咀嚼着，一边评论说，同我坐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她在歌舞团唱这个地区的歌时就经常向往的地方，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她最喜欢用的词）。她知道与我在一起她感到如此幸福这是不对的，她说，但她没有办法，她毫无意志，就是这么回事。我告诉她，没有比对自己的感情感到羞耻更应受指责的了。

我们出来时，鼠疫受难者纪念碑再次面对着我们。它看上去很可笑。“瞧，海伦娜，”我指着纪念碑说，“瞧那些圣徒，往着天堂爬。天堂关心他们什么！天堂才不知道他们存在哩，这些有翅膀的乡巴佬！”

“真的，”海伦娜说。新鲜空气增强了酒的作用。“他们干什么一定要保留它们，那些神圣的雕塑？他们干吗不建造一些赞美生活的东西而不是所有那些神秘主义？”她还有足够的自我控制补充说，“还是我仅仅在说空话？是不是？喂，是不是？”

“不，你没有，海伦娜。你绝对正确。生活是美好的，我们怎样赞美它都不过分。”

“对，”海伦娜说，“不论人们说什么，生活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要知道是谁让我恼火，就是那些煞风景的悲观主义者；我有许多可抱怨的，可你从我这听不到一点嘀咕；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既然生活能提供给我象今天这样的一天，啊，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这座陌生的新城镇，以及与你一道在这儿……”

我让她杂乱地说下去，每当她停顿时就插一句鼓励的话。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科斯特卡所住的那幢楼房前面。

“我们在哪儿？”海伦娜说。

“在这个城里找不到一个象样的公共场所，”我说，“但我知道一个私人的小场所。我们上去吧。”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海伦娜跟在我后面抗议道。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摩拉维亚小旅馆。见过这样的小旅馆吗？”

“没有。”海伦娜说。

我打开科斯特卡的房间门，然后我们走了进去。

3

看见所谓的“小旅馆”实际上只是一套借来的寓所，海伦娜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要求任何解释。事实上，在跨过门槛的那一瞬间，她就似乎决心从调情的游戏转入到一个有明确意义的行动，并且相信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生活本身。她在科斯特卡的房子中间站住，半转身朝着我，我从她的眼神可以断定，她在等待我走到她身边，吻她，把她搂在怀里。此刻，她是我梦想中的那个海伦娜，毫不防备，任我摆布。

我走到她跟前；她抬起脸朝向我；可是我没有吻她，而是微笑着把手指放在她穿着蓝色雨衣的肩上。她明白了这意思，解开雨衣的钮扣。我把雨衣带到过厅，将它挂起来。不，既然一切都准备停当（我的欲望和她的屈服），我不打算仓促行动，以免领略不到我所想象的各种不同的效果。我开始谈些无关紧要的话；我请她坐下；我指给她看各种各样的家具摆设；我打开科斯特卡给我看过的那个放有伏特加的食橱，装出感到很惊异的样子；我旋开瓶盖，把两个小玻璃杯放在咖啡桌上，然后斟满酒。

“我会喝醉的。”她说

“我们都会喝醉的。”我说（但我很清楚我不会喝醉，我会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喝醉，因为我想要使我的记忆保持完整）。

她没有笑；她仍然很严肃；她呷了一口酒，说：“你知道，

卢德维克，如果你认为我只是那种感到厌倦，到外面放纵一次的已婚妇女，我会非常不愉快的。我决不是一个不懂世故的人。我知道你有过许多女人，是她们教会了你不要认真对待她们。但是我会很不愉快的……”

“我也会不愉快。”我说，“如果你只是那种感到厌倦，到外面放纵一次，以便摆脱丈夫的已婚妇女。如果你就是这样的女人，我们在这里的约会对我来说将是毫无意义的。”

“真的吗？”海伦娜说。

“真的，海伦娜。你说得对，我有过许多女人，她们教会了我把一个女人换成另一个女人这算不了什么，可遇见你却是完全不同的事。”

“你不是口头说说而已吧？”

“不，我说的是心里话。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立刻知道你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

“要是你没有这样感觉就不会这样说，对吗？”

“当然不会。我不善于在女人面前隐藏我的真实感觉。那是一件她们从来就没有教会我的事。不，我不是在撒谎，海伦娜，无论这件事看上去多么难以置信：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甚至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在等待。只知道我一定会得到你。这是命运。”

“天哪。”海伦娜闭上眼睛说。她的脸上突然起了一些红晕，也许是由于酒的缘故，也许是由于激动；她愈来愈成为我梦想中的那个海伦娜：毫不防备，任我摆布。

“要是你知道该多好，卢德维克。我也正是这样感觉的。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决不是一时的幻想。这也正是我非常害

怕的。我是一个已婚女人，我知道我对你的感觉是真实的，你是我的真实，我对此无能为力。”

“你也是我的真实，海伦娜。”我说。

她独自坐在长沙发上，把她那对视而不见的大眼睛对准我，而我则坐在椅子上贪婪地打量她。我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慢慢地把她的裙子往上拉到长袜顶端，吊袜带现了出来，在那双肥胖的大腿上它们显得多么可悲可怜。海伦娜对我的抚摸没有作出反应；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但愿你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我。我怎样生活。我一直是在怎样生活。”

“那么你一直是在怎样生活的呢？”

她苦笑了一下。

突然，我担心她会象所有不忠的妻子那样举出陈腐的理由，就在她的婚姻即将成为我的牺牲品时，通过诋毁她的婚姻而使我失去它的价值。“看在上帝的面上，别给我讲你的婚姻是怎样不幸，你的丈夫是怎样不理解你。”

“那不是我想说的。”海伦娜说，我的诘难使她慌张起来，“尽管……”

“尽管这正是你一直在想的。所有女人与一个男人单独在一起时总是沿着这些思路想问题的。但是，所有的谎言正是从这里开始，你想坚持真实，海伦娜，是不是？你肯定爱过你的丈夫；你不是那种没有爱情就献出自己身子的女人。”

“是的。”海伦娜轻声地说。

“你的丈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她耸了耸肩，微笑着说：“就是一个丈夫而已。”

“你们互相认识有多久了？”

“作夫妻有十三年了，在结婚前几年认识的。”

“那时你肯定是个学生。”

“是的，读大学一年级。”

她想把裙子拉下来，可我抓住她的手阻止她。“他呢？”我继续问，“你在哪儿认识他的？”

“在一个民间歌舞团。”

“一个民间歌舞团？那么你丈夫唱歌？”

“是的，我们都唱。”

“你们在一个民间歌舞团认识的……对初恋来说是一个美好的背景。”

“是的。”

“整个那段时期都是美好的。”

“你也对那段时期记得很清楚吗？”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你丈夫是你的第一个恋人吗？”

“我不愿在此时想到我丈夫。”她说。

“我想了解你，海伦娜。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对你了解得愈多，你就会愈属于我。在他之前你有没有别人？”

“有的。”她点点头说。

想到海伦娜曾有过别的男人，我感到一种失望。这似乎削弱了她对巴威尔·泽曼尼克的感情。“那是不是很认真的？”我问。

她摇摇头：“无聊得好奇。”

“那么你丈夫是你第一个真正的恋人啰？”

她点了点头，“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那时象什么样子？”我平静地问。

“你干吗想要知道？”

“我想要你的整个心灵，整个过去都属于我。”我抚弄着她的头发。

如果一个女人不愿对情人谈起她的丈夫，那很少是出于圆滑或真正的礼节，而仅仅是因为担心她所说的话会伤害情人。一旦情人消除了这种担心，她会感激他，并感到一种新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她就会有话可谈了。因为话题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对妻子来说，丈夫是最让人满意的话题，只有谈起这个话题她们才感到自信，只有在这个话题上她们才是专家，而人们对有机会显耀自己的专长总是很高兴的。因此，当我向海伦娜保证谈论她的丈夫不会使我烦恼时，她马上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巴威尔·泽曼尼克，变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毫不费力地就把他们之间最隐秘的事讲了出来，她讲了很久，讲得很详细，她是怎样爱上他（那个直着背的金发青年），当他成了歌舞团的政委时，她是怎样崇敬他，她和所有认识的女孩是怎样爱慕他，（他的谈吐风度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的爱情是怎样与那个时代的精神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她也说了几句捍卫那个时代精神的话（我们怎么会知道斯大林曾命令把忠诚的共产党员枪毙呢？）哦，并不是因为她想把话题转到政治，而是因为她感到自己牵涉在内。她如此捍卫她的青年时期，与那个时代认同（仿佛它曾经是她家，从那以后她已失去了这个家），看上去几乎象是一个

挑战；就仿佛她在说，占有我吧，但有一个条件：让我保持我的本来面目，把我的信念作为我的一部分来接受。在一个肉体而不是精神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情形下，大谈什么信念的确反常得可以，它表明这个女人由于她的信念而遭受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创伤：她不是担心人们怀疑她没有任何信念，就是（现在看来海伦娜更可能是这种情况）对这些信念暗暗抱有怀疑，希望把恢复她的确信押在她眼中某件无可置疑的重要事上：性爱（也许怀着胆怯的、无意识的自信，认为她的情人更关心的是做爱而不是讨论信念）。但我并不觉得海伦娜的挑战有什么不好；它使我更接近了我的激情的关键。

“你看见这个了吗？”她问，指着用一根短链系在她手表上的一个小银垂饰。我俯上前去看了看，海伦娜解释说，这个雕刻品是代表克里姆林宫的。“它是巴威尔给我的礼物。”接着她把整个故事告诉了我：许多年以前，一个害相思病的俄国姑娘把它送给了一个叫萨沙的俄国小伙子，他在大战中去参加战斗，战争快结束时他来到布拉格，保卫这座城市免遭毁灭，但它却给他带来了毁灭。红军在巴威尔和他父母居住的那幢大房子的顶楼设立了一个小医院，那个负了致命伤的萨沙中尉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日子。巴威尔成了他的朋友，连续几天守在他的身边。在他临死之前，萨沙把那个克里姆林宫装饰品送给了巴威尔，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用一根细绳把它挂在脖子上。巴威尔把它看作是他最珍贵的纪念品。有一次，当时他们还没结婚，海伦娜和巴威尔吵了架，正在考虑结束他们的关系，但后来巴威尔来了，把那个小玩意（珍贵的纪念品）作为和好的赠品送给她，打那时候起，

海伦娜从来没有把它取下来过，她把它看作是一个讯息（我问她是什么讯息，她回答说：“欢乐的讯息”），一个要一直带到终点线的接力棒。

她面对我坐着（我可以看见吊袜带吊在上面的那种流行的黑色松紧短裤），她的脸仍在发红（由于酒，也许还由于此刻的激动），但她的面目已经暂时消失在另一个人的形象后面：海伦娜讲的这个经过三次托付的装饰品的故事突然（一下子）使巴威尔·泽曼尼克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根本不相信那个红军战士萨沙的存在；即使他存在过，他的真实生命也会在巴威尔·泽曼尼克冠冕堂皇的姿态后面消失得无影无踪，泽曼尼克靠这个姿态把萨沙变成了他的个人传奇中的一个角色，一个神圣的人物，一个感伤的工具，一个多愁善感的理由，一个宗教的人工制品，而他的妻子（显然比他更坚定）将终其一生狂热地、不顾一切地去崇拜这个制品。我感觉到巴威尔·泽曼尼克的精神（一心想出风头的精神）就在这个房间里，和我们在一起；一刹那间，我好象又身处十五年前的那个场面中：自然科学部的大礼堂，泽曼尼克坐在礼堂前面台上的一张长桌旁，一侧坐着一位穿着难看的毛衣，留着辫子的圆脸胖姑娘，另一侧坐着一位代表区委会的年轻小伙子。台子后面挂着一个大黑板，左边是镶有镜框的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画像。我坐在桌子对面的阶梯座位上，同一个人，十五年以后正用当时的眼睛看着泽曼尼克，注视着他宣布现在开始讨论“扬同志的问题”，然后说，“我将给你们念两名共产党员的信。”于是他停了停，拿起一本小册子，用手指梳理一下他那长长的波浪形头发，开始用一

种迷人的，几乎是温柔的声调朗读起来。

“死亡，你真是姗姗来迟。可我曾经希望把我们的会面推迟到许多年之后。继续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多多地活，多多地爱，多多地唱和多多地在这个世上漫游……”我听出这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参加了战斗。我爱你们，善良的人们，当你们回报我的爱时，我感到欣喜，当你们不理解我时，我感到痛苦。……”这篇秘密地写于监狱，战后印行了上百万册，无线电大肆广播，学校作为必读书学习的文字，是那个时代的经典著作。泽曼尼克大声朗读了其中最著名的，人人都熟记的段落。“但愿悲哀永远不要玷污我的名字。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姐妹们，是给你的，我的古斯达，是给你们，同志们，是给每一个我所爱的人……”墙上伏契克的画像是马克斯·萨宾斯基的作品，他是新艺术派的大师，擅长画讽喻、丰满的女人，蝴蝶，以及一切可爱的东西；战后，据说同志们拜访了萨宾斯基，请求他照着一张照片画一幅伏契克的画像，于是萨宾斯基以非常优美的线条和无与伦比的趣味画了一幅他的侧面像，以至于使他看上去几乎象处女一般——热情而纯洁——并且非常楚楚动人，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更喜欢萨宾斯基这幅杰出的画像而不喜欢他们记忆中那张真实的脸。这期间，泽曼尼克继续念着，礼堂里的人全都静默无声，聚精会神。桌旁那位胖姑娘的目光一刻也舍不得离开他。接着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有力，差不多带有威胁了；他已经念到有关叛徒米瑞克的段落：“想想吧，他以前决不是一个懦夫，在西班牙前线的枪林弹雨中他没有逃跑，在法

国集中营的严酷考验中他也没有屈服。现在他却在盖世太保的鞭笞下吓得脸色发白，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出卖同志。如果打几下就动摇了勇气，那么他的勇气是多么薄弱。他的信念也是同样薄弱……当他一开始考虑到自己时，他就失去了一切。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他牺牲了同志们的生命。他胆怯了，并且由于胆怯而背叛了他们……”挂在墙上的伏契克的脸如同挂在我们国家许多公共场所的那张脸一样，它的表情，那种恋爱中的年轻姑娘的容光焕发的表情，是那样楚楚动人，不禁使我为自己的罪过，也为自己的外貌感到自卑。泽曼尼克继续念：“他们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塔？但他们不能夺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善良的人们，你们能够想象，假如我们在所有这些苦难之后再次相逢，在一个自由的生活中，一个因自由和创造变得美好的生活中再次相逢，我们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当我们终于实现了我们曾渴望的、我们曾为之奋斗而现在我要为之献身的一切，我们将过上怎样的生活？”读完最后这几句悲怆的句子，泽曼尼克停顿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写的一封信。现在我要给你们再读一封信。”他大声读出我的明信片那三行可笑而又可怕的简短句子。当他再次停顿下来时，礼堂里一片肃静，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沉默呀，沉默。富有灵感、善于吸引观众的泽曼尼克，此时故意让沉默持续下去。终于，他要我自己陈述这件事。我知道我已无法辩护：如果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理由都没有任何效果，那么今天当泽曼尼克拿我的明信片与伏契克的痛苦的绝对标准相比后，它们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效果呢。当然，我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站起来申诉。我再一次解释这封信只是说着玩的，并谴责它非常不妥和拙劣，谈了我的个人主义和理智主义，我与人民的脱离，甚至揭露了我的自满情绪，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我能说的唯一对我有利的的话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忠于党，决不是党的敌人。接下来开始讨论。同志们指责我自相矛盾；他们问我，一个承认是玩世不恭的人怎么可能忠于党；一位女同学提醒我曾说过一些淫秽的话，质问我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应该这样讲话；其他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一些抽象的评论，然后把我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引用；他们似乎一致认为我的自我批评是肤浅的，不诚恳的。接着，坐在泽曼尼克旁边那个梳辫子的姑娘说，“请问，你认为那些被盖世太保折磨致死的同志们对你那些话会怎么反应？”（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意识到他们全都在装作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一言不发。她又问了一遍，逼迫我回答。“我不知道。”我说。“再好好想一想，”她一再坚持，“你是知道这个答案的。”她的目的是要我通过牺牲的同志们那想象中的嘴唇对我自己作出严厉的判决，可是我却感到一种狂怒涌上心头，一阵预料不到的、从未有过的狂怒，出于对这许多天来的自我批评的反抗，我回答说：“他们面对死亡毫不畏缩。他们并不心胸狭窄。如果他们读了我的明信片，他们很可能会哈哈大笑。”

梳辫子的姑娘本来给我提供了一个至少能挽救了点什么的机会。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去理解同志们的批评的程度，认同它，接受它，从而获得他们的几分理解。但我出乎意料的答案转眼间就把我排除在他们的思维范围之外；我拒绝扮演在上百次的会议中，上百次的惩戒活动中，以及不久以后

在上百次的法庭审讯中被扮演的那种角色：即被告的角色指控自己，并且凭着他自我指控的热情（他与原告的完全一致）来恳求宽恕。

会堂又重新出现了肃静。接着泽曼尼克讲话了。他说，在我的反党言论中他找不到一点幽默的成份。他再次提到伏契克的话。并且说，在关键时刻动摇不定和怀疑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转为背叛行为，党是一个堡垒，它决不容忍自己堡垒里的叛徒。他说我的回答显然证明我没有明白一件事，我不仅不该留在党内，而且不应享受工人阶级为我的教育所花的资金。他提议把我驱逐出党，并且开除我的学籍。礼堂里的人都举起他们的手，于是泽曼尼克要我交出党证，离开会场。

我站起来，把党证放在泽曼尼克面前的桌上。泽曼尼克没有看我一眼；他再没有见过我。可是现在，我看见他妻子正坐在我面前，醉眼朦胧，脸色通红，裙子拉到腰际。她那松紧短裤的黑色标志着她大腿的开始，正是这双大腿的张开和合拢为泽曼尼克的十年生活提供了节奏和律动。把手放在那双大腿上，我就好象控制了那个生活。我盯着海伦娜的脸，盯着她那双在我抚摸下半闭着的眼睛。

4

“把你衣服脱掉，海伦娜。”我平静地说。

当从长沙发上站起来时，裙边重新滑落到膝盖上。她直盯着我的眼睛，一言不发（或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她开始解裙子侧面的钮扣。等钮扣一解开，裙子便从她的大腿滑落到地板上；她左脚跨出裙子，然后用右脚把裙子挑到手

中，把它搭在椅子上。她穿着毛衣和内衣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毛衣拉过头顶，扔到裙子上面。

“别看。”她说。

“我想看着你。”我说。

“我脱衣服时不想要你看着我。”

我走到她身边，从她的两侧腋窝下搂住她，让手滑到她的臀部；在她有点汗湿的丝绸内衣下，我可以感觉到她身躯的柔软曲线。她仰着头，嘴唇习惯地（恶习）半张开等着接吻。但是我不想吻她；我想看着她，尽量长久地看着她。

“把衣服脱掉，海伦娜。”我又说了一遍，然后走开去脱我的外衣。

“光线太亮了。”她说。

“这光线正好。”我说，把外衣挂在椅背上。

她把内衣拉过头顶，将它扔在毛衣和裙子上面；她解开长袜，让它们从腿上脱下来；但她没有把长袜扔在椅子上，而是走过去，小心地把它们搁好；然后她挺起胸脯，把手伸到背后，几秒钟后，她绷紧的肩头松弛了，向前下垂，胸罩也随着肩膀下垂，从乳房上滑落下来；乳房被她的手臂挤在一块，庞大，丰满，雪白，自然也很沉甸甸。

“把衣服脱掉，海伦娜。”我最后一次重复道。她一边直视着我的眼睛，一边脱掉紧紧贴住她大腿的黑色松紧短裤，把它搭在那堆衣服上。她一丝不挂。

我仔细地观看这个场面的每一细节。我对寻求与一个女人（即任何女人）的片刻狂欢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占有一个迥然相异的、隐秘的天地，并在一个下午，一次做爱的过

程中完成它，在做爱时我将不仅是一个处在肉欲激情的痛苦中的男人，我将是一个怀着高度警惕看守着他的逃亡猎物的男人。

到此刻为止，我只是用眼睛占有海伦娜。在她急欲开始热烈的爱抚，把她的身躯从我冷冷的凝视下隐藏起来时，我却保持着距离。我差不多能感觉到她嘴唇的湿度，她舌头的欲火难耐。又一秒钟，然后又一秒钟，我朝她走去。站在房子中央两张高高堆着我们衣服的椅子之间，我们互相搂在一起。

“卢德维克，卢德维克，卢德维克……”她喁喁道。我把她带到长沙发前。“来呀，”她说，“你来呀，你来呀。”

肉体之爱很少与精神之爱结合。当肉体（以它古老的、普遍的、永远不变的动作）与另一肉体结合在一起时，精神实际上在做什么？想一想在那些年代里它所产生的那些美妙的观点吧，这些观点必然要证明精神比永无终结、千篇一律的肉体生活优越得多！想一想精神对肉体的蔑视吧，后者（与它的配对一起）给精神提供了比它自身还要猥邪一千倍的幻想素材！或者反过来：想一想精神在贬低肉体中所得到的乐趣吧，它一方面听任肉体做推拉游戏，一方面却在自由驰骋它那宽广的游思：一盘特别引起争论的象棋布局，一顿难忘的饭，一本新书……

两个陌生肉体的结合并不是特别罕见。甚至精神的结合偶尔也会发生。千载难逢的是肉体与其精神在共同的激情中的结合。

那么当我的肉体在同海伦娜做爱时，我的精神在做什

么？

我的精神已把一个女人的肉体记住了。它对这个肉体漠不关心。它知道只有作为被一个此刻不在场的第三者象这样看过和爱过的肉体，这个肉体对它才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它试图通过那位第三者的眼睛来审视这个肉体；这就是为什么它要尽量成为那位第三者的媒介；裸光的躯体，弯着的膝盖，腹部和胸脯的曲线——只有当我的眼睛变成那个第三者的眼睛时，这一切才具有意义；这时我的精神才能加入他那迥然相异的注视，与他合为一体；它不仅占有那个弯着的膝盖，那个腹部和胸脯的曲线，而且还用那个第三者的眼光来占有它们。

不但我的精神成了那个不在场的第三者的媒介，而且它还命令我的肉体成为他的肉体的媒介，然后它站到后面，观看两个扭动的肉体，两夫妇的搏斗，直到它突然命令我的肉体恢复自身，干预这对夫妇的性交，冷酷无情地毁掉它。

海伦娜的脖子上凸起一道蓝色的静脉血管，浑身震动了一下；她把头扭到一边，用牙齿咬住枕头。

然后她喃喃叫着我的名字，眼神恳求稍缓片刻。

可是我的精神命令我坚持下去；把她从快乐赶到快乐；强迫她做各种姿势，不让那个隐藏起来、不在场的第三者停止观看；不许她喘一口气，不，要让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震动，在震动时她是真实可信的，在震动时她决不会做假，凭借这个震动，她在那个不在场的第三者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象一张邮票，一个印记，一个密码，一个符号。窃取密码，窃取玉玺就是这样：劫掠巴威尔·泽曼尼克神圣的寝

室；彻底搜索它，把它洗劫一空！

我看着海伦娜的脸由于怪相而变得发红、难看；我把手放在她脸上：我把手放在她脸上仿佛那张脸是一个被翻转来翻转去，被揍过来揉过去的东西，我觉得她的脸正是以这些条件来迎接我的手；好象一个渴望被翻过来揍过去的东西。我把她的头翻转到一边，然后翻转到另一边；我把它来回翻转了几次，突然这动作变成了一个耳光；第二下；第三下。海伦娜开始啜泣和呻吟，但不是由于疼痛，而是由于激动；她的下巴使劲抬起来够我，于是我不停地打她；接着我看见她的乳房也在使劲朝上抬，于是我便（弓在她上面）打她的胳膊，她的两肋，她的乳房……

一切都结束了，包括我那优美的劫掠动作。她斜伏在长沙发上，疲倦不堪。我可以看见她背上的褐色胎记，以及胎记下边的屁股上被我打红的斑纹。

我站起身，摇摇晃晃地穿过房间，打开浴室的门，走了进去；我拧开冷水龙头，冲洗脸手和身子。我抬起头来照了照镜子；我面带微笑，当这微笑一显露出来，立刻就转成了大笑，一阵突如其来的大笑。然后我用毛巾擦干身子，坐在浴盆边上。我想单独待一会儿，品尝突然独处所带来的少有的愉快，陶醉在快乐之中。

是的，我感到满足，也许甚至感到非常满足；由于沉浸在我的胜利中，我不需要接下来的那些时刻。

然后我回到房间。

海伦娜不再趴着；她已侧过身来，正望着我。“到我这里来，亲爱的。”她说。我没有理睬她的邀请，而是走到放着我

衣服的椅子跟前，捡起我的衬衣。

“别穿上衣服，”海伦娜恳求道，朝我伸出一只手臂，她重复说，“到我这里来。”

我只有一个愿望：省掉这难堪的时刻，或除此之外，使这一时刻变成完全消遣，无关紧要，轻松快活，微不足道；我想避免再接触她的身躯；我害怕她会做出千娇百媚的样子，但我同样害怕她会诉诸演戏，大吵大闹；因此我放弃了衬衣，坐在她身旁。真可怕：她偎依着我，把头搁在我腿上；她不停地吻我；不一会儿我的腿就湿了；结果不是她的吻：她抬起头来时，我看见她脸上泪湿了。她擦去眼泪，说：“别烦恼，亲爱的。要是我哭，请别烦恼。”她偎得更近，用手接住我，突然啜泣起来。

“怎么啦？”我说。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傻瓜，没什么。”接着开始热烈地吻我的脸和全身。“我在恋爱。”她说，见我没有反应，她继续自言自语，“你愿意，你就嘲笑吧，我不在乎。我在恋爱。在恋爱！”我仍然一声不响，她加了一句，“而且幸福。”然后她指着桌上未喝完的酒瓶，“喝点伏特加怎么样？”

我不想喝也不想让海伦娜喝；我担心再消耗酒会导致延长这个下午的活动的危险（这些活动的成功是依它们的完成和结束而定）。

“亲爱的，请。”她仍指着桌子，“别生气。”她抱歉地补充说，“我只是高兴而已。我想要高兴……”

“想高兴你无需伏特加。”我说。

“别生气。我只是想喝一点。”

我能怎么办呢？我给她倒了一杯伏特加。“你的确不想再喝一点吗？”她问。我摇摇头。她举杯一饮而尽，说：“让它就放在那里吧。”我把瓶子和杯子搁在长沙发旁边的地板上。

她很快就从暂时的疲倦中恢复过来；她突然成了一个想高兴和快活，并让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的小女孩。显然她觉得光着身子（她只戴着手表，那个克里姆林宫的缩样在表链上悬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为了舒服她试了几种姿势，双腿交叉压在身下，坐成土耳其式，然后又把双腿伸直，支着一只肘，最后翻转身趴着，把脸贴在我的腿上。她尽可能用各种方式告诉我她是多么幸福，同时一直不停地吻我。我觉得，我表现出了很强的自制力，因为她的湿嘴不愿满足于我的肩膀和脸，似乎决心要达到我的嘴（我厌恶含着涎水的接吻，除非欲火使我忘情）。

接着她告诉我她以前还从来不知道这样的事；我说（纯粹为了找话说）她是在夸张。她以她所珍视的一切发誓，在爱情上她从来不撒谎，我没有理由怀疑她。为了证明这一点，她说，她从一开始就确信无疑了；肉体有一个永不会错的直觉；噢，自然，我的聪明和劲头（是的，劲头，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在我身上发现这一点的）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也知道（尽管直到现在她才敢说出来）我们两人的肉体在瞬息间已经签订了那种人的肉体在一生中只签订一次的秘密契约。“这就是我所以如此幸福的原因。现在你明白了吧？”她把腿从长沙发上摆下来，俯身去拿酒瓶，给自己又倒了一杯。“我能怎么办呢？”她一饮而尽后微笑着说，“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喝，我只好独自喝！”

尽管我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但我不否认海伦娜的话使我愉快；它们进一步证实，我的冒险取得了成功，我有理由感到满意。多半因为我不太知道该怎样作出反应，又不想显得过于冷淡，所以我指出她谈到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经历时是在夸张；难道不是她自己告诉过我她丈夫是她一生中真正的情人吗？

海伦娜随即陷入了沉思（她坐在长沙发上，脚放在地板上，腿稍微分开，肘支在腿上，右手拿着空杯子），然后平静地说：“的确。”

也许她认为她刚享受过的那种强烈的感情经历使她受到一个同样强烈的真诚的限制。“的确。”她重复道，接着又补充说，为了今天的奇迹（这个词她用来描述我们的做爱）而贬低某种曾经有过的东西，这也许是错误的。她又喝了一杯，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生活中那些最有影响的经历是不可能比较的；对一个女人来说，二十岁时的爱情与三十岁时的爱情是完全不同的；她希望我明白她的意思：不仅在心理上不同，而且在肉体上也不同。

接着（不合逻辑地跳跃）她宣称，实际上在我和她丈夫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她不能很确切地指出哪点相似；我长得一点也不象他，但她不可能错；她有一个永不会错的直觉，能够使她看到人们内心深处，他们的外表后面。

“我很想知道我和你丈夫哪一点相似。”我说。

她要我别生气；是我首先提到这个话题；是我要求过她给我讲他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她才敢谈他。但如果我想知道全部真实，她愿意告诉我，在她一生中只有两次被人如此强

烈、如此完全彻底地吸引住——被她的丈夫和我。我们两个的共同点是，她说，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活力，从我俩身上都发出一种快乐，青春永驻和青春力量的快乐。

海伦娜在企图讲清楚我与巴威尔·泽曼尼克的相似之处时，使用的词汇也许相当含糊，但无可否认她看到和感觉到了这个相似，并顽强地坚持己见。我说不上来她使我震惊，还是叫我生气，但听到她的看法如此荒唐我却感到惊异。我走到椅子跟前，开始穿衣服。

“我说错话了吗，亲爱的？”她问，觉察到我不高兴。她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她开始抚摸我的脸，恳求我不要生她的气；她试图阻止我穿衣服（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她把我的裤子和衬衣视为她的敌人）。接着她极力让我相信，她真的爱我，决不是在滥用这个词；她会设法证明这一点；当我问到她丈夫时她立刻就知道谈论他是毫无意义的；她不想要任何男人，任何陌生人插在我们中间；是的，陌生人，因为她丈夫对她来说早已成了一个陌生人。“我已有三年没有和他生活在一起了，傻瓜。我们没有离婚的唯一原因是小兹德娜。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我们实际上是陌生人。他不过是我的过去，遥远的过去而已。”

“这是真的？”我问。

“千真万确。”她说。

“你在说谎。我不相信你。”我说。

“我不是在说谎。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但不是象男人和妻子那样。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真正生活在一起了。”

她看上去就象一个凄楚可怜的情妇。她一再向我保证她

讲的是真话，她没有在企图欺骗我，我没有必要嫉妒她丈夫；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即使今天她也没有做什么不忠的事，因为没有任何人需要她的忠诚；我不必烦恼；我们的做爱不仅美好，而且纯洁。

突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她看出了这点，变得从容了一些，马上缠着要我告诉她我相信她，要我大声告诉她；然后她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并极力要我也倒一杯（我拒绝了）；她吻我；这使我汗毛直竖，但我不能转过脸去不看她；我被她那愚蠢的蓝眼睛和她的裸体（依旧生气勃勃，劲道十足）吸引住了。

可是现在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她的裸体了；这是被剥夺了的裸体，被剥夺了魅力的裸体，在此之前这个裸体还一直伴随着时代的一切过错，我觉得我在其中看见了海伦娜的婚姻、她的过去和现在的凝聚，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她的裸体有吸引力。既然她现在赤裸着站在我面前，没有丈夫，没有夫妇之间的联结，就她自身，那么她缺乏魅力的肉体就失去了刺激我的能力；它也成了它自身——一个缺乏魅力的肉体而已。

海伦娜不再知道我是怎样看她的；她愈来愈醉，愈来愈满足；她很高兴，我相信了她的爱情声明，但她不太知道该怎样表达她的高兴；她突然在收音机前蹲下（背朝着我），打开收音机，开始调波段；她找到爵士音乐，于是站起来，眼睛闪闪发亮；她笨拙地模仿了一下扭摆舞的起伏动作（我恐惧地盯着她的乳房左右飞舞）。“这样对吗？”她笑道，“我从来没有跳过这些新舞蹈，你注意到没有？”她又笑起来，声

音很大，并伸着手臂朝我走来；她要我同她一道跳；她对我的拒绝感到很生气；她说她不会跳这些舞，可是她愿意学，教会她跳这些舞是我的职责；她希望由于我而重新变得年轻，她要我向她保证她仍然年轻（我照办了）。她注意到我穿着衣服而她却光着身子；她大笑起来；在她看来这简直妙不可言；她问，住在这儿的那个人有没有穿衣镜，她想看看我们象什么样子。没有镜子，只有正面装着玻璃的书橱；她试图从玻璃里辨认出我们，但是影像不很清晰；她走近书橱，一看见那些书名就又大笑起来：《圣经》，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帕斯卡^①的《致外省人书》，胡斯的著作；她取出《圣经》，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随意地翻开书，开始用牧师的声调读起来。她问我她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牧师。我说她很适合读《圣经》，但现在她该穿上衣服了，因为科斯特卡先生随时都会回来。“现在是几点钟？”她问。“六点半。”我说。“骗子！”她大叫，抓住我的左手腕，看一眼手表，“还有一刻钟才到六点！你想摆脱我！”

我巴望她离开，巴望她那太物质性的肉体丧失物质形态，融化，变成小溪流走，或者蒸发，飞出窗外——可是它还在那里，这是一个并非我从什么人那里偷来的肉体，我在这个肉体上没能报复任何人，没能毁掉任何人，这是一个被抛弃的、被它的搭档遗弃的肉体，一个我原打算利用可它反而利用了我的肉体，这个肉体此刻正在厚颜无耻地庆祝它的胜利，狂欢作乐。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要结束我那异乎寻常的受折磨是我力所不及的；她一直到快六点半时才开始穿衣服。在戴胸罩时，她注意到我在她手臂上打的一块红痕；她拍拍它，说她将把它作为一个纪念品带着，直到她再见到我；她马上纠正自己：在她身上的这个纪念品远没有消失之前，她肯定会见到我！她就这样站在那里面对着我（脚上穿着一只长袜，另一只拿在手上），要我答应，在那之前我们将见面；我点点头；但这还不够：我得答应在耶之前我们将见很多次面。

她用了很长时间穿衣服。七点前几分钟她才离开。

5

我打开窗子，渴望一阵微风把这个倒霉的下午的一切记忆、把气味和情感的所有痕迹通通吹走。接着我迅速把瓶子拿开，把长沙发上的垫子弄直，当我觉得她的一切痕迹都已经消失时，我一屁股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迫不及待地等待科斯特卡，期待着他那充满男子气概的嗓音（我渴望听见男人深沉的声音），他那修长瘦削的身材和扁平的胸膛，他那平静的谈话方式，既古怪又聪明，期待着他能告诉我有关露西的任何情况。与海伦娜形成对照，露西是那样令人愉快地精神的，抽象的，远离一切冲突，紧张和戏剧性，然而对我的生活又有那样大的影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她影响了我的生活，就象占星家认为星球的运动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一样；当我舒适地坐在椅子上时（在仍在消除海伦娜的气味的打开的窗户下），我突然觉得我明白了露西为什么要在这两天一下子出现的原因：是为了破坏我的复仇，为了把我来

这儿的目的是变得虚无缥缈，因为露西，我深深爱着而最后一刻却从我身边莫名其妙跑掉的露西，是逃跑女神，是徒劳追求的女神，是虚无缥缈的女神；她的手仍然捧着我的头。

第六章 科斯特卡

1

我们已经有多多年没见面了，实际上我们一生中只见过几次面。但说来也奇怪，在我想象中我的确经常见到卢德维克·扬，我自言自语时总把他看作是我的主要对手。我已经非常习惯了他的无形的存在，以至于昨天偶然碰到活生生的他时我简直猝不及防。

我把卢德维克称作我的对手。我有权这样做吗？每次遇见他我似乎都碰巧处在一个无望的境遇，每次都是他帮助我摆脱了困境。然而在我们表面的联盟下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不和的深渊。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我一样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点。显然他把我们表面的一致放在比我们内在的冲突更为重要的地位。他对表面的敌手一直冷酷无情，而对内在的不和却很宽容。我不是这样。我与他完全相反。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

卢德维克。我爱他，正如我们爱我们的对手一样。

2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七年，在那个年代震荡着所有高等学院的一次激烈的会议上。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我们都感觉到了这点，包括我本人，因此在所有的讨论、辩论和投票中我都站在共产党少数派一边。

许多基督教徒——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反对我。他们认为我是叛徒，因为我把自己的命运与一场将无神论刻在盾牌上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今天当我碰到这些人时，他们料定过去十五年已足以证明我的道路走错了。但是我只能让他们失望。迄今为止我丝毫也没有改变我的观点。

共产主义当然是无神论。然而只有那些不愿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的基督教徒们才会因无神论而指责共产主义^①。我说“基督教徒们”。可他们到底是谁呢？瞧瞧周围，我看见的只不过是一些完全象异教徒一样生活的伪基督教徒。作一名基督教徒意味着过完全不同的生活。意味着走基督走过的路，效仿基督。意味着放弃个人利益，舒适和权力，面对着穷人，被蹂躏的人以及受苦受难的人。这是教会在做的事吗？我父亲是一个劳动者。虽然经常失业，但他从没有失去对上帝的谦卑信仰。他不断将他虔诚的脸转向上帝，但教会却从没有把脸转向他。因此在他最亲近的人中间他仍是孤独

^① 《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教导门徒不要批评别人，免得自己被批评。他说：“朋友眼中的一根小刺，你就看得一清二楚，自己眼中有根大梁，却没有留神注意。”

的，在教会里仍是孤独的，只有他的上帝和他在一起，直到他最后生病去世。

教会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被蹂躏被压迫的人祈求正义的运动。教会不愿为他们工作，也不愿与他们一道在人间创造一个天国。它们站在压迫者一边，使工人阶级的运动丧失了上帝。现在它们却指责这个运动不信上帝。这些法利赛人^①！是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无神论的，然而它不正是对每一个基督教徒的神圣审判的一个昭示吗？不正是对我们对于穷苦大众缺乏同情的一个谴责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对教会成员的减少感到震惊吗？我应该对学校里教的那些反宗教宣传感到震惊吗？多么愚蠢！真正的宗教不需要世俗权力的认可。世俗的反对只会加强宗教信仰。

或者因为我们使社会主义成了无神论，我就应该同它作斗争吗？那更愚蠢！我只能痛惜致使社会主义离开上帝的那个悲剧性错误。我可以试着阐明那个错误，并极力纠正它。

可是，为什么要惊恐，基督徒兄弟们？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发生的，我经常寻思，上帝是否在有意给人类一个昭示，人是不可能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不受惩罚的，没有他的参与，即使最公正的世俗制度也是注定要失败和腐朽的。

我记得在那些年头，这里的人们认为他们离天堂只有几步之遥。他们多么骄傲，这制度就是他们的天堂，他们不需

^① 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标榜墨守传统礼仪，基督教《圣经》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要上帝的帮助就可以到达天堂。然而突然间它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3

总之，在二月政变之前，我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却一直在做对共产党人有利的事。他们喜欢听我阐述福音的社会内容，抨击旧世界及其私有财产和普遍战争的腐朽，论证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密切关系。毕竟，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尽可能地吸引最广泛的支持，因此他们也极力争取宗教信仰徒。然而，政变后不久，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作为大学的一名讲师，我袒护了几个由于父母的政治观点而将被开除的学生。由于我的抗议，我与行政当局发生了冲突。于是突然间人们开始提出怀疑，一个具有如此坚定的基督教信念的人是否能够教育社会主义青年。看来我似乎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接着我听到一个名叫卢德维克·扬的学生在一次全体党员的会议上为我辩护。他声言，如果忘记我在政变前对党做的贡献，那将是卑鄙的忘恩负义。当他们提出我的基督教信仰时，他说，它们肯定只是我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我还年轻，随着年龄增长我就会放弃这个阶段。

我去见他，感谢他为我辩护。然而，我不想欺骗他，我明确表示我不象他想的那么年轻，根本不要指望我会“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放弃”我的信仰。很快我们就对上帝的存在，有限和无限，笛卡尔对宗教的看法，斯宾诺莎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地位，以及许多其它问题进行了辩论，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都不一致。最后我问卢德维克，他现在是否后悔曾为我

辩护，既然他已看出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他回答说，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除了个人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我在大学里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结果我们的生活走上了相似的道路。我们谈话后三、四个月，扬被开除了党籍和学籍，六个月后我也离开了大学。我是被赶出来的？被驱逐出来的？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对我和我的信念的怀疑又重新出现。我的一些同事暗示我最好还是按照无神论的路线作一次公开声明。在课堂上我遇到一些不愉快的场面，一些爱寻衅的党员学生企图侮辱我的信仰。显然已经在盛传我即将离去。但我也得说，我在学院里有几个党员朋友，他们仍然因我在二月革命前的立场而尊敬我。也许我稍微做出一点要为自己辩护的表示，他们就会来帮助我。但我不愿做那种表示。

4

“跟我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们立刻撒下渔网，渔船、房子和家庭，跟从了他。“接受了我派给他的工作，却不全心全意去做的人，不配进天国。”^①

如果我们听到基督的呼吁，我们就必须无条件地遵循它。尽管福音里的这番话也许很亲切，但在现代听起来却象神话。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一旦我们撒下渔网，我们将往何处去？我们将跟从谁？

然而，只要我们留神倾听，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上，发出

^① 《新约·路加福音》第九章。

那个呼吁的声音也能传到我们耳中。它不是象一封挂号信通过邮递传来。它是经过乔装而来。它很少把自己打扮成某种很激进和迷人的东西。“不是你所选择之行为，而是违背你意志，你头脑，你愿望降临你身上之行为；此即你必践之路，我于彼处呼唤你，至彼处你便成为主的门徒，此乃你的机会，此乃主所践之路。”马丁·路德^① 写道。

我有许多理由留恋我在大学的职位。这个职位相对来说是舒适的，我有大量时间从事我自己的研究，而且有望把它作为终身职业，并最终当上教授。但同时我又为自己对它的留恋感到不安。看到大批人才，教师和学生，都被迫离开了大学，我越发感到不安。我为自己对一个舒适生活的留恋感到不安，这种生活的平静和安全使我与那些命运坎坷的同胞越来越疏远。我意识到大学里那些反对我的声音是一个呼吁。我听见有人在对我呼唤，在警告我提防一个会束缚我的头脑，我的信仰和我的良心的舒适的职业。

当然，和我有一个五岁孩子的妻子，尽力劝我为自己辩护，坚持我在大学的职位。她关心我们的儿子和家庭的未来。别的她什么都不关心。当我瞧着她那已显老相的脸时，她对明天和来年的忧虑，她对所有明天和所有来年的无穷无尽的可叹的忧虑使我感到不安。这些忧虑所暗含的责任使我感到不安。在我心里，我听见耶稣的话：“因此不要为明天担忧；明天自有明天的忧愁。当天的苦恼就够受的了。”^②

我的敌人巴望我会因懊悔而痛苦，而事实上我却感到一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领袖。

② 《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

种出乎意料的愉快。他们认为我会觉得我的自由受到了限制，而事实上我却发现了自由的真正意义。我意识到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哪里都有他的位置，凡是耶稣去过的地方，换句话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他的位置。

最初的不安和后悔过去之后，我决定迎面反击我的敌人的恶意。我把他们加于我身上的中伤作为一个译成电码的呼吁来接受。

5

共产党人以一种明显的宗教态度认为，一个在党面前有罪的人只要与工人阶级一道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就可以获得赦免。在二月政变后的那些年月，许多知识分子都去了矿井，工厂、建筑工地和国营农场，在那里经过一段神秘的涤罪后——有时很长，有时不那么长——他们又可以被允许回到办公室、学校，以及其它公职部门。

当我向大学行政部门提出辞职而不是申请一个研究职位时，当我真的要求把我安排到一个国营农场去当技术顾问时，我的那些党员同事们，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按照他们的信念而不是我的信念来解释这一举动，即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自我批评的榜样。他们全都赞扬这一举动，并帮我在西波希米亚一个国营农场找到一份好工作，那里有一个正派的场长和一个优美的环境。他们写了一封异乎寻常的赞扬我的介绍信，把我打发上路。

在新的环境里我的确很愉快。我感到了新生。这个国营农场设在一个地处僻远、人口稀少的边境村庄，战后德国人

就是从这里被驱逐出去的。村子周围群山环绕，大部分山都是光秃秃的牧场。一些狭长、散落的村庄的屋舍点缀在广阔的山谷间。不时从乡间卷过的薄雾在我和这块安身之地中间形成一道帘幕。世界就象处在创世的第五天，那一天上帝似乎还没有决定是否把它交给人类。

这里的人也似乎更接近那种原始状态。他们面对着大自然——一望无边的牧场，成群的牛羊。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自在。不久我就提出了几个建议，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个多山乡间的一草一木，如何采用化学肥料，贮藏干草的新方法，草药试验田、温室。场长很感谢我的建议，我也感谢他让我能够靠有用的工作来谋生。

6

一九五一年。九月间还挺凉，但十月中旬气候却突然变暖起来，那个秋天的天气真是好极了，一直持续到十一月里。沿山坡晒干的干草堆把芳香散发到很远的土地。鲜活的草地上，藏红花在草丛里闪烁。就在这时候，关于那个逃亡姑娘的传言开始流传开来。

一天，附近村子的一群男孩去到一块刚收割的地里，正在吵吵闹闹的当儿，他们看见一个姑娘从草堆里爬出来，头发乱蓬蓬的，浑身沾满干草，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姑娘。她吓坏了，四处环顾，然后突然冲进树林里，等他们醒悟过来，准备追踪她时，她已经无踪无影了。

同一村子的一个农妇讲述了一个类似的经历。一天下午，她正在院子里忙活，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了一个穿着破旧外

套、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眼睛望着地上，问她要一片干面包，“你要到哪儿去，姑娘？”那个女人问她。姑娘回答说她还要走很远的路。“步行？”“我的钱丢了。”她回答。那个女人不再问了，给了她面包和牛奶。

最后我们的羊倌报告说，有一天在山上，他把一块黄油面包和一罐牛奶放在一棵树桩旁边，然后去赶羊，等他转来时，面包和罐子都神秘地消失了。

孩子们立刻利用了这些传说，他们丰富的想象力给这些传说增添了许多虚构。只要有人丢失了东西，他们马上就把这看作是她存在的证据。他们声称，一天晚上就在村子外面的池塘里，他们看见她在洗澡，尽管这已经是十一月初，此时的水是很冷的。还有一次，他们听见远处某个地方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唱歌。成年人说山上的一个村舍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太大，但孩子们知道这是谁。这是那个在山顶上飘游，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儿的逃亡者。

一天傍晚，孩子们在树林附近用马铃薯叶子生起一堆火，把马铃薯扔进灼热的灰里。当他们朝树林里望去时，一个女孩大叫起来，说她看见那个逃亡者正在背后的阴影处窥视他们。一个男孩拾起一块土坷垃，朝女孩指的方向猛掷过去。奇怪的是，没有叫声传出来。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发生了。孩子们开始对着那个男孩吼叫，险些要揍他。

不管怎样，那块土坷垃在孩子们心中激起了热爱那位姑娘的感情。就在那天，他们在灰烬旁边留下一小堆烤熟的马铃薯，用灰把它们盖住以便保持热度，并把一根折断的冷杉树枝插在上面。他们甚至给那个姑娘起了一个名字。在一张从

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上，他们用铅笔写了几个大字：飘游的仙女，这是给你的。他们把那张纸放在马铃薯堆旁边，用一块土坷垃压住。然后他们走开，藏在周围的树丛里，等待那个胆怯的人影出现。夜幕降临，仍然没人来。最后孩子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躲藏处，各自回家去。但在拂晓时他们又回到他们的岗位。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马铃薯不见了，那张便条和树枝也一道不见了。

孩子们享受着溺爱他们的仙女的乐趣。他们给她留下牛奶、面包、马铃薯和信。但他们从来不把他们的礼物在同一个地方放两次。他们避免在一个固定的地点陈列食物，因为那样就好象是在给乞丐准备的。他们在同她玩一场游戏。一个藏珍宝的游戏。从留放第一堆马铃薯的那个地点开始，他们愈来愈远地离开村子，移到田野里。他们把他们的珍宝留在树桩边，大岩石下，岔路附近，野玫瑰丛旁。他们从未对任何人泄露过藏礼物的所在。他们从未破坏过微妙的游戏规则，从未埋伏着等候姑娘，也从未试图去惊吓她。他们允许她始终不露面。

7

然而，这个童话故事很快就结束了。一天，我们农场的场长和地方议会的主席深入到乡间去察看一些被废弃的村舍，看看它们是否可以用作远离村庄干活的农场工人过夜的住房。在路上他们遭到阵雨袭击，那雨刹那间就变为倾盆大雨。他们发现附近一丛矮冷杉树边缘有一间灰色的草棚：一个牲口棚。他们跑过去，打开门——门仅仅用一个木桩顶住

——然后爬到里面。光线从打开的门和棚顶的缝隙透进来。他们看清有一堆铺平的干草，于是四肢展开躺在草上，倾听雨点落在棚顶的声音，呼吸着令人陶醉的气味，天南海北地聊起来。主席的手抚弄着身后的草壁，突然，他在干草捆中摸到一个硬东西。这是一个小提箱。一个用硬橡皮制作的难看廉价的旧提箱。我不知道这两个男人对着那件神秘的东西沉思了多久。我所知道的是，他们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四件姑娘的衣服，都是新的，而且很漂亮。我听说，这些漂亮的东西与土里土气的箱子形成了奇特的对比，因此他们立即怀疑到盗窃案。在衣服下面他们发现几件女式内衣，内衣里面有一扎用蓝色缎带捆住的信。我甚至不知道场长和主席是否读了那些信。我只知道他们从那些信获悉了箱子主人的名字：露西·塞贝特卡。

他们正在沉思这个意外的发现时，主席在干草里又发现了一样东西：一个有缺口的旧罐子。正是羊信这两周来每晚都要在酒店里反复讲述的那个神秘失踪的蓝色搪瓷的牛奶罐。

接下来，这件事就只是自然而然地发展了。主席藏在树林里等候她，场长回到村里，派本地警察前来支援。黄昏时分，姑娘回到她那芬芳的闺房。他们让她进去，让她把门关上，等了半分钟，然后跟在后面进去了。

8

那两个在牲口棚里诱捕露西的人都是那种社会的中坚。主席原来是个贫穷的长工，现在是有六个孩子的慈父。那个

警察是一个长着大胡子，质朴粗笨，性情温厚的人。他俩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

可是，当我听到他们是怎样捉住她时，我却感到某种奇怪地近乎痛苦的感情。甚至现在当我一想到场长和主席彻底搜查她的提箱，摆弄她私生活中最个人的物件，她的隐私的微妙秘密，窥探他们无权窥探的事，我心中就禁不住一阵刺痛。

每当我想到她那个干草搭成的窝，那唯一的一道门被两个彪形大汉堵住而无法逃跑的情景，同样强烈的痛苦就会在我心中产生。

后来，当我对露西了解得更多时，我吃惊地意识到这两个令人痛苦的情景赋予了我所需要的洞察力，去把握她命运的本质。这两个情景都是玷污的象征。

9

那晚露西没有睡在牲口棚里。她睡在从前是店铺现在是警察办公室里的一张铁床上。第二天她的案子提交地方议会审理。他们获悉她以前在俄斯特拉发生活和工作。她之所以逃走是因为她再也不能忍受那个地方了。当他们还想从她嘴里掏出一些更具体的情况时，他们却碰到了固执的沉默。

她为什么选择到这里来，到西波希米亚来？她的父母住在赫布，她说。那么她为什么不回到他们身边去？离赫布还很远她就下了火车，因为在路途中她开始害怕起来。她的父亲除了打她什么都没干过。

地方议会主席通知她，由于她没有正当的解职书就离开

了俄斯特拉发，他们将不得不把她遣送回去。露西对他们说，她将在第一站就下火车。他们对着她吼了一阵，但当他们看见这样做无济于事时，就问她是否应该把她送回家，送回赫布。她拼命地摇头。他们再次试图对她严厉，但最后主席出于宽厚的性情放弃了把她送走的主张。“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她问可不可以允许她留在此地干活。他们耸耸肩膀说，他们要问问国营农场。

场长正在不断地同劳动力缺乏作斗争。他当场就接受了地方议会的建议。然后他通知我，很快我就会得到已要求很久的在温室干活的助手。当天，议会主席把我介绍给了露西。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底，几周的明媚阳光以后，秋天已开始显出它的阴晦面。天下着蒙蒙细雨。她站在那里，身穿一件褐色外套，手里提着提箱，低着头，眼里露出茫然的神情。主席提着那个蓝罐子站在她旁边，郑重其事地宣布：“如果你曾做过什么错事，我们原谅你。我们信任你。我们本来可以把你送回俄斯特拉发，但我们却让你留下来了。工人阶级到处都需要诚实的男人和妇女。不要使我们失望。”

然后他去办公室送交羊信的罐子，我把露西带到温室，把她介绍给将和她一道工作的两个姑娘，给她解释她需要干什么活。

10

当我回忆那些日子时，露西使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尽管我仍然能清晰地辨认出议会主席的身影。昨天你坐在我对

面时，卢德维克，我不想使你不快。既然你又以我最熟悉的样子，一个形象和幽灵坐在我对面，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那位希望为处在不幸中的同类创造一个天堂的从前的长工，那位高尚地谈论原谅、信任和工人阶级的诚实质朴的热心人，比你更接近我的内心和灵魂，尽管他从未为我做过什么特别的事。

你过去常说，社会主义是从欧洲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土壤中，一种非宗教和反宗教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否则社会主义便不可理解。但是你当真能坚持认为，不信仰物质至上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吗？你真的认为信仰上帝的人就不能使工厂国有化吗？

我完全相信，起源于耶稣教诲的思想体系会更加自然地导致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当我想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那些最富激情的共产党人——例如，把露西交给我照料的那个地方议会主席——他们似乎更象宗教的热情信徒而不是拥护福尔特尔^①哲学的怀疑主义者。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六年的革命时代与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共同信仰的时代。凡是与这个时代一道前进的人都体验了类似宗教的感情：他为了赞同某种更高的、超个人的东西而放弃了自我、自身和私生活。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最初是非宗教的，但如今赋予它们的意义已经与福音和圣训的意义相似。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神圣的思想体系，因而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不可侵犯的。

^① 福尔特尔(1694—1778)，法国讽刺家、哲学家、剧作家及历史学家。

正在消逝或者已经消逝的时代具有某种伟大的宗教运动的精神。它未能把宗教的自我启示进行到底，真是一大遗憾。它有宗教的态度和感情，可内里却一直是空洞的，不信神的。当时我还相信上帝会宽恕，会让人们知道自己，最终会证实这个伟大的非宗教信仰是正当的。我白白地等待了。

因为这个时代最后背叛了自己，背叛了它的宗教精神，仅仅因为它没能够理解自身而发誓效忠于理性主义，并为它的理性主义遗产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两千年来理性主义的怀疑论一直侵蚀着基督教。侵蚀它却没有能毁灭它。但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它自己的创造，在几十年里就将被毁灭。它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卢德维克。而你非常清楚这点。

11

只要人们能够逃到童话故事的范围，他们就会有崇高，同情和诗意。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哎，他们却很可能充满谨慎、疑惑和怀疑。他们正是这样对待露西的。当她一离开孩子们的仙境，恢复一个真实的姑娘的外形——一个工友，一个同屋——她立刻就成了一种带有恶意的好奇心的对象，这种恶意是人们留给从天堂里逐出的天使和从童话里逐出的仙女的。

事实上，她虽然少言寡语也无济于事。大约一个月后，她的档案从俄斯特拉发送到农场。档案告知我们，她最初在赫布当学徒美容师。由于受到道德方面的指控，她在一个教养院待了一年，她就是从那里去了俄斯特拉发。在俄斯特拉发，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优秀工人。她在宿舍的行为堪称模

范。奇怪的是，对她的唯一指责是在她逃离之前不久，她曾因在墓地偷花而被抓住。

档案上记载的情况太少，不仅没有揭示出露西的神秘，反而使它更加令人困惑。

我答应场长要照顾好她。我发现她叫人好奇。她干活井井有条，全神贯注。她的腴腆是一种镇静自如的腴腆。她一点也没表现出一个在树林里单独生活了几周的姑娘身上会有的那种怪癖行为。她一再告诉我，在农场她很幸福，她不愿意离开这里。由于她性情温和，而且总是愿意让人，因此逐渐赢得了与她一道工作的姑娘的好感。然而，在她的沉默里总象是有点什么，暴露出她悲苦的一生和一颗受了伤害的灵魂。我希望她会向我吐露秘密，但我也知道她一生中经历的盘查和讯问够多了，以至于会使我采取的任何方法听上去都象是盘问。因此我没有使她为难，而是谈论起自己。我每天都跟她谈话。我告诉她我在农场栽培草药的计划。我告诉她过去乡下人怎样用各种草药的熬汁和溶液给自己治病。我给她讲起地榆，乡下人用它来治疗霍乱和鼠疫，讲起虎耳草或称破石灵，这种草药的确可以粉碎肾结石和胆结石。露西听得聚精会神。她喜欢草药。但她真象圣徒一样单纯！她对草药一无所知，要她说出一两种草药的名字，她都颇为费力。

冬天快到了，露西除了那几件漂亮的夏装外没有别的衣服穿。我帮助她安排她的工资。我劝她买了一件雨衣和一件毛线衫，以后又买了靴子、睡衣、长袜、一件新大衣……

一天，我问她信不信上帝。她的回答我觉得很独特。她既没说信也没说不信。她耸耸肩说：“我不知道。”我问她是

否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她说她知道。但她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与圣诞节有联系。完全是云里雾里，几个偶然的概念毫无感觉地搅在一起。直到那时，露西既不懂什么是信仰也不懂什么是怀疑。我突然感到一阵晕头转向，就象一个情人发现还没有其他男人躯体先于他进入他所爱的人的体内时必然产生的感觉。“你要我给你讲讲他吗？”我问，她点点头。那时节，群山和牧场已披上了皑皑白雪。我讲着。露西倾听着……

12

她细嫩的肩上已承受得太多。她需要有人帮助她，可是没有人帮她。宗教提供的帮助非常简单。露西：放弃自己吧。献出自己，卸下压在你肩上的重担。在你的给予中你会得到解脱。我知道你从未把自己献给任何人。你一直害怕所有的人。但是有上帝。把你自己献给他吧。你将会感到轻松一些。

放弃自己意味着撇开你过去的的生活。把它从你的灵魂里根除。忏悔吧。告诉我，露西，你为什么要从俄斯特拉发逃走？是不是因为公墓里的那些花？

有一点。

你到底为什么要拿那些花？

她一直很抑郁，所以她把那些花拿来插在宿舍房间里的花瓶里。她也摘野地里的花，但俄斯特拉发是一个阴郁污秽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野生的东西留下来——到处是垃圾堆、栅栏、空地，东一簇西一簇覆盖着煤灰的灌木丛。只有公墓

里有美丽的花。崇高的花，庄严的花。唐菖蒲、玫瑰、百合，还有菊花，它们有丰满的花朵和易损坏的花瓣……

他们是怎样捉住你的？

她喜欢去公墓，常去那里。不仅是为了拿走花，而且也是为了那里的美丽和宁静。宁静对她是一种安慰。每一个坟墓都象一个私人的小花园，她喜欢在一个个的坟墓前呆上片刻，仔细观看墓碑上黯淡的碑文。为了不被打扰，她常模仿那些扫墓者，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个墓碑前跪下。一次她喜欢上一个刚垒起的坟墓。棺材几天前才被埋在那里。坟上的土是松的，上面还铺着花圈，坟前一个花瓶里，插着一束非常美丽的玫瑰。跪在一棵友好的垂柳的苍穹下，露西内心溢满了不可言喻的狂喜。正在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和他的夫人来到坟前。也许这是一个儿子或兄弟的坟墓，谁知道。他们看见一个陌生姑娘跪在墓旁，便吃惊地站在那里。她会是谁呢？她的出现肯定使他们产生了某种不祥的感觉，也许是一个家族秘密，一个未知的亲戚，或是被死者抛弃的情人……他们怕打扰她，便站在远处观望。他们看见她站起身，拿了那束几天前他们放在那里的美丽的玫瑰，转身离开。于是他们追上她。你是谁？他们问。她感到受了屈辱，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几个词。最后他们才知道这位姑娘根本不认识死者。他们叫来一个工作人员。他们要求看她的身份证。他们冲她大叫大嚷，告诉她没有比盗窃死人更可恶的了。那个工作人员进一步证实公墓里的花并不是第一次被窃。他们叫来一位警察，又从头盘问她。她坦白了一切。

“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耶稣说^①。坟上的鲜花属于活人。你虽然不知道上帝，露西，可是你却渴望他。你在尘世鲜花的美中窥见了非尘世的启示。你需要那些花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心灵的寂寞。他们抓住你，羞辱你。但这就是你从那个阴郁污秽的城市逃走的唯一原因吗？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摇了摇头。

有人伤害了你。

她点点头。

告诉我这事，露西。

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泡歪歪斜斜令人厌恶地吊在天花板上。靠墙有一张床，床上方是一幅画，画着一个穿蓝色长袍的、跪着的英俊男人。那是客西马尼园^②，但露西并不知道这点。她与一个男人去了那个房间，她拼命搏斗，大声叫喊。他企图强奸她，扯下她的衣服，可是她挣脱了他，然后跑掉了。

他是谁，露西？

一个士兵。

你爱他吗？

不，她不爱他。

① 《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

② 客西马尼园：耶路撒冷附近橄榄山的花园，耶稣被捕的当夜曾在此祈祷。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去那个除了一盏电灯泡和一张床外什么都没有的房间呢？

正是心灵的寂寞把她拉到他身边。这个可怜的姑娘找到的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二等兵。

但有件事我仍不明白，露西。既然你与他一道去了那个房间，那个只有一张床的房间，后来你为什么又要跑掉？

因为他象别的男人一样下流邪恶。

别的男人，露西？你指的是谁？

她沉默了。

在那个士兵之前你还认识谁？告诉我，露西！讲实话！

14

他们六个和她一个。他们六个的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她本人是十六岁。他们自称是一个团伙，提到它就肃然敬畏，仿佛那是一个异教教派。那天的主要活动是入会式。他们带来几瓶廉价酒。她盲目顺从地加入了他们的狂饮。这个场面为她提供了发泄她对父母的单恋的机会。他们喝酒她也喝酒，他们大笑她也大笑。然后他们命令她脱光衣服。她还从未当他们面脱过衣服。她正在犹豫时，他们的头目已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她才意识到那个命令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的，于是驯顺地服从了。她信任他们，甚至信任他们的粗野。他们是她的保护者。她不能想象如果失去他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她的父亲，他们是她的母亲。他们喝呀，笑呀，又给她下了一道命令。她伸直腿。她很害怕，她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她还是照办了。接着她尖叫起来，血从她身上涌出。

男孩们大声狂叫，举起他们的酒杯，把发泡的劣等酒倒在头目的背上，倒遍她的全身，倒在他俩的大腿之间，含混地叫着洗礼式和入会式的用语，然后头目从她身上站起来，下一个团伙成员上前取代了他，就这样按照年龄顺序轮下去，一直轮到他们中最小的一个，他和露西一样只有十六岁，露西再也受不了啦，她忍受不了这疼痛，她只想休息，只想单独待一会儿，由于他最小，所以她才敢把他推开。但是，正因为他最小，他决不愿受到羞辱。他毕竟是团伙的一个成员，一个羽毛长全的成员！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狠狠地掴她耳光，团伙中没有一个人支持她。在他们看来，他完全是正当的，他只是在要求得到他应得的东西。泪水从她脸上流下来，但是她没有勇气再进行反抗，只好第六次伸开她的腿……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露西？

在其中一个男孩的家里，他的父母上夜班去了。他家有一个厨房和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一张长沙发和一张床，门上方挂着一幅装框的刺绣，绣着“上帝赐予我们一个快乐的家”。床上方是一个身穿蓝色睡衣，怀抱一个小孩的漂亮女人的画片。

圣母玛丽亚？

她不知道。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哦，然后这件事便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或者是在同一个房间，或者是在别的男孩的家，有时也在野外。这似乎已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

你喜欢这样，露西？

不，她不喜欢。从那次起，他们对她更坏，甚至更粗野，可是没有任何办法，无路可逃。

这件事是怎样结束的呢，露西？

一天夜里，警察闯进一间空荡荡的寓所，把他们全都带走了。这个团伙干了一些盗窃的勾当。虽然露西对此一无所知，但人人皆知她与那个团伙混在一起，人人也皆知她把一个年轻姑娘能给的一切都给了那伙人。她是全赫布的耻辱，在家里他们把她打得遍体鳞伤。那几个男孩被判了不同的刑，而她则被送到一个教养院。她在那里待了一年——一直到她满十七岁。她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回家。所以她最后去了那个阴郁污秽的城市。

15

前天，当卢德维克在电话里向我透露他认识露西时，我很吃了一惊。幸运的是，他认识露西的时间不太长。他显然与露西同宿舍的一个姑娘有过泛泛之交。昨天他再次向我打听她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早就觉得需要卸下这个重担，可是一直没有发现我可以把此事信托的人。卢德维克对我怀有某种感情，同时又很远离我的生活，更不用说露西的生活。因此我不必担心露西的秘密被人知道。

不，除了卢德维克，我从没有把露西向我吐露的秘密对任何人重复过一个字。当然，尽管农场的人都从她的档案里知道她曾经去过教养院，偷过公墓里的花。他们待她很好，可是他们却不断使她想起她的过去。场长称她是“坟墓小盗贼”，尽管他是在开玩笑，可这却使她过去的罪孽继续存在。

露西不断地自觉有罪。她最需要的是完全赦罪。是的，卢德维克，她需要赦罪，她需要经受对你来说是那样陌生、那样不可理解的那种神秘的涤罪仪式。

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由自己提出赦罪，也没有力量这样做。一旦产生罪孽，他们就缺乏消灭罪孽的力量。他们需要外部的帮助。祛除罪孽的正当性，驱逐它，把它从时光中抹去，换句话说，为了把事情化了，需要一个神秘的超自然的行为。只有上帝——因为他不受人间法律的约束，因为他是自由的，因为他能创造奇迹——可以洗清罪孽，把它化了，赦免罪人。人只有以神的赦罪为基础才能赦免他的同类。

你不可能同意赦罪，卢德维克。你不可能宽恕，因为你不敢相信。你摆脱不了那次所有的手都举起来反对你，一致毁掉你的生活的全体会议。你从未原谅那些人。你不仅把他们作为个人，而且还似乎把他们看成是人类的缩影。你从未原谅人类。打那时起，你就一直不信任它，鄙视它。哦，我能理解为什么。可是并不会改变这一事实：你对同类的普遍蔑视是可怕的，有罪的。它已经成为你的诅咒。因为生活在一个无人得到宽恕，所有赎罪皆不可能的世界里，就是生活在地狱里。你就生活在地狱里，卢德维克，我可怜你。

16

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甚至做爱时情人们的激情。对露西来说，那些激情描绘了一个败坏和罪恶的领域。她把它们与那帮青少年和那个一再要求的士兵的兽性的面孔联系在一起。我能够如此清晰地看见那位士兵，以

至于我觉得我认识他。他把最陈腐、最使人发腻的情话与一个因兵营栅栏而同女工隔绝的男人的野蛮行为混在一起。露西突然发现那些温柔的话不过是一个野蛮兽性的躯体的虚假的掩盖物。爱情的整个世界在她眼前崩塌，掉进一个令人厌恶和憎恨的陷阱。

败坏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不得不从这里开始。一个沿着海岸行走，伸出手臂挥舞提灯的人很可能是一个怪人。可是在夜里，当海浪把船引入歧途时，这个人却是一个救星。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一个真空地带。行为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当它处在事物的特定位置中才有好坏之分。露西，甚至性爱本身也不存在好坏。假若你的爱与上帝创造的秩序和谐一致，假若它是真正的爱，那么你的性爱就是好的，会使你幸福。因为上帝规定“一个男人要离开他的父母，要依恋他的妻子；他们两人要合为一体。”^①

我每天都对露西讲。我一天天使她恢复信心，她已得到了宽恕，没有理由再折磨自己，松开她心灵的紧身衣，服从于上帝安排的秩序的时间已到，在上帝安排的秩序里，所有的一切，包括性爱，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就这样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

接着，春天的最初那些日子来到了。山坡上的苹果树开始开花，那些树冠看上去就象在微风中摇晃的铃铛。我闭上眼睛，倾听它们柔和的音调。当我睁开眼睛时，看见露西穿着她那件蓝色工作服，手里拿着锄头。她正在朝山谷下了望，

① 见《旧约·创世纪》第二章。

露着微笑。

我观察她的微笑，如饥似渴地研究它。这可能吗？直到那时为止，她的灵魂一直都在不停地逃离过去和未来。她一直对所有的东西害怕。过去和未来都是危险的漩涡。她拼命抓住现在，而现在不过是一个有漏洞的救生艇，充其量是一个不安全的避难所。

可是她突然微笑了。没有明显的理由。犹如晴天霹雳。她的微笑告诉我，她已开始满怀信心地望着未来。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在海上漂流了数月突然望见陆地的海员。我感到幸福。靠在一棵歪扭的苹果树桩上，我重新把眼睛闭上片刻。我听见白色树冠上的微风和柔和的铃声，我听见鸟儿的鸣叫，在我闭上的眼前，我听见鸟儿的歌声变成无数盏提灯，被看不见的手带往一个隆重的典礼。虽然我看不见那些手但我能听见尖声尖气的声音，我知道他们是孩子，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蓦然我觉得一只手在抚摸我的脸颊。接着一个声音说：“你真好，科斯特卡先生……”我没有睁开眼睛。我没有移动那只手。我仍然把鸟声当成无数盏灯，我仍然听见苹果树的铃声。接着我听见那个声音更微弱地加了一句：“我爱你。”

也许我应该让事情不再继续发展，应该离开，既然我已尽了自己的责任。但是我还来不及控制自己，就让一阵令人眩晕的虚弱控制了我。在这片开阔乡间叫人可怜的小苹果树丛中只有我们两人，我把露西搂在怀中，我们一起倒进大自然的树荫里。

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当我从她的微笑中看到她重新恢复的平静的灵魂，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本来应该离开，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结局只能是坏的。我们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农场。露西喜气洋洋，容光焕发。她就象我们周围逐渐转入夏日的春天一样。然而我却一点也不快活。我身旁这个庄严而柔和的春天使我恐惧。既然我已把它唤醒，它就把它所有的花朵朝向我开放。但这些花朵并不属于我，我在布拉格有妻子和儿子，他们正在耐心地等待我难得一次的回家探望。

我不希望中断与露西的关系，唯恐会伤害她，可是我又不敢继续这样下去，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种权利。尽管我渴望她，可我还是害怕她的爱，不知道对此该怎么办。我尽了最大努力才保持住我们从前谈话的那种自然的语调。我的疑虑已经楔入我俩之间。我感到我给予露西的精神上的帮助已经露出它的原形。从一见到她我就渴望她的肉体。我是一个穿着牧师长袍的诱奸者。我所有关于耶稣和上帝的谈论都不外是最世俗欲望的一个掩盖。我觉得在我屈从于性欲的那一瞬间，我就亵渎了最初意图的纯洁，在上帝面前被剥夺了一切功绩。

然而，当我一得出这个结论时，我就做了一个极厌恶的表情。多么虚荣！多么傲慢！希望得到尊敬！想使上帝满意！人对上帝的功绩是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露西爱我，她的健康依靠我的爱！如果我为了拯救自己的纯洁而使她重

新陷入绝望，上帝会不会更加蔑视我？即使我的爱是有罪的又有什么关系？哪一个更重要：露西的生命还是我的纯洁？这将是我的罪孽，不是吗？我将是承受它的人，为它而遭受痛苦的人！

接下来有一天，外部世界介入进来，打断了我的反省。主管当局决定强行提出对场长的政治诬告。当事情变得很明显，场长将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时，他们企图声称他周围都是可疑分子，以此来加强他们的指控。我想必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说是因对国家怀有敌对观点而被开除出大学，除此之外还是一名牧师。场长极力证明我不是牧师，也不是被大学开除的，但是他愈抗议就愈暴露了我们的友谊，愈害了他自己。我的处境岌岌可危。

非正义吗，卢德维克？是的，只要一听到这类的事你就会用这个词。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非正义。假若没有任何东西在监督人类的事，假若行为的意义只是由那些行为者所赋予的，那么“非正义”这个概念就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我就可以援引在我忠心耿耿工作的那个国营农场多少被抛掉的这个非正义。如果我站出来反对一切非正义，为争取我微不足道的人权而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战斗，这甚至也可能是符合逻辑的。

可是，事情往往是这样，事件的意义与那些盲目的发起者所赋予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它们往往是来自上天的乔装的旨意，而那些事件的发起者不过是一个更高意志的不知情的使者，他们甚至没有料到那个更高意志的存在。

我相信这儿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我接受了农场正在发

展的事态。我甚至感觉得到了解脱。我从这些事态中看到一条清楚的指令：趁还来得及之前离开露西。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你的努力成果不属于你。你的道路通向别处。

结果，我采取了两年前在自然科学部所采取的同样行动。我向眼泪汪汪、郁郁不乐的露西告别，迎向即将来临的灾难。我是自动提出离开农场的。场长的确表示了一下反对，但是我看得出他只是出于面子才这样做，而在内心却很高兴看见我走。

所不同的是，这次我的自愿离开没有造成任何印象。没有二月革命前的党员朋友们用忠告和恭维的介绍来点缀我的路途。我离开农场时人们都抱着这种看法，在这个国家他不适合干任何有意义的事。于是我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18

一九五六年的一个秋日，在布拉格至布拉迪斯拉发快车的餐厅里，我五年来第一次见到了卢德维克。我正前往东摩拉维亚的一个工厂建筑工地。卢德维克刚结束了他在俄斯特拉发矿井的合同工作，去布拉格申请恢复他的学业。现在他正准备回故乡摩拉维亚。我们差点没有认出对方。当我们互相认出后，我们都对对方的生活道路竟是这种结局感到惊异。

我还记得，卢德维克，当你听到我是怎样离开大学，以及导致我成为一名砌砖工人的那个国营农场发生的阴谋诡计时，你眼中流露出同情。我感谢你的同情。你非常气愤。你谈到非正义，谈到为非作歹，谈到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你

也斥责我：为什么我不为自己辩护，为什么我没有斗争就屈服了？我们决不当自愿离开任何地方，你说。让我们的对头自己去干苦活！为他们减轻良心负担有什么意义？

你是矿工，我是砌砖工人。我们的生活经历如此相似，可我们俩却又如此不同。我宽恕，你不饶恕；我谦卑，你骄傲。外在是那样相似，内在却相去那样遥远！

对我们之间内在的分裂你远没有我了解得深。当你详细给我讲述你为什么被开除出党时，你想当然地认为我会站在你一边，对同志们的偏执行为表示同样愤慨，他们惩罚你仅仅因为你拿他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开玩笑。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不安？你非常诚恳地问。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在日内瓦，在加尔文的话就是法律的时期，有一个与你相似的男孩，一个总是喜欢开玩笑的聪明的男孩。一天，他们发现在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对耶稣基督和福音嘲笑讽刺的话。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不安？那位与你相似的男孩肯定也这样想。他没做什么错事。那只是一个玩笑。他心中一点没有仇恨。不尊重，无感情，是的，但没有仇恨。可他们还是把他处死了。

请不要认为我赞成他们的残忍。我只是想说，凡是决意要改变世界的伟大运动都是绝不能容忍被嘲笑或被轻视的。嘲笑是一种锈，它腐蚀所有它接触的东西。

以你自己为例，卢德维克。他们把你开除出党，开除出大学，让你在政治犯中间服兵役，然后让你在矿井又干了两三年。而你呢？你愤怒得咬牙切齿，深信你遭受了天大的非正义。这种非正义的感觉至今仍然决定你走的每一步。我不明

白你！你怎么能讲非正义呢？他们把你送到处罚共产主义敌人的惩戒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就是非正义吗？它不是更象一个绝好机会吗？想一想你本来可以在敌人中间完成的事业！难道有比这更伟大的使命吗？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不也是“象送羊进狼群一样”吗，“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正如耶稣所说，“我来不是要叫义人悔改，而是要叫罪人悔改……”^①而你却不愿意到罪人和病人中间去！

你会争辩说，我的比喻是站不住脚的，耶稣把他的门徒送到“狼群中”是带着他的祝福，而你却先是被逐出教会，打入地狱，然后又被作为一个敌人送到敌人中，象一只狼送到狼群中，象一个罪人送到罪人中。

你的意思是说你否认自己曾经是一个罪人？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在你的同类眼中你一点也没有罪？你凭什么这样骄傲？一个献身于他的信仰的人是谦卑的，必须谦卑地忍受最不公平的惩罚。蒙受耻辱者将被提升。忏悔者将被洗清罪孽。那些被冤屈的人因此而得到考验他们忠诚的机会。假若你对你的同类变得怀恨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放在你肩上的重担太沉重，那么你的信仰就不坚定，你没有经受住考验。

我不能同意你对党的抱怨，卢德维克，因为我知道世上伟大的行为只有靠一群谦卑地献身于一个更高的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才能完成。你的忠诚，卢德维克，离无限相距太远。你的信仰是脆弱的。否则，你怎么会除了你自己和你那

^① 以上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章。

可怜的理由外拒绝一切其它的衡量标准呢？

我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卢德维克。我知道你为我，为许多受到现行政权这样或那样伤害的人所作的事。我知道你利用你与一些高层人士在二月革命前的关系和你现在的地位来调停，说情，干预。我为此更加喜欢你。但是让我最后一次告诉你：窥视你的灵魂深处！你那些善行的最深刻动机不是爱。而是仇恨！恨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那些在礼堂里举手反对过你的人！由于你的灵魂不知道上帝，它也就不知道宽恕。你渴望报应。你认为那些以前伤害过你的人就是那些现在伤害别人的人，于是你进行你的复仇。是的，复仇！在你每一个行动中我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可是，除了更大的仇恨，一连串的仇恨，仇恨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生活在地狱里，卢德维克，我再说一遍，在地狱里，而我可怜你。

19

要是卢德维克听到我的独白，他很可能称我是忘恩负义的人。我明白他给过我很大帮助。五六年的那一次，当我们在火车上相遇时，他对我当时过的那种生活十分忧虑，立刻开始想法为我找我会喜欢和满意的工作。他的速度和效率使我感到惊讶。他不失时机地拜访了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希望那位朋友能够在本地中学帮我找一份教自然科学的工作。他胆子真大。当时反宗教宣传还在猛烈进行，根本不可能招用一名基督教徒作中学教师。卢德维克的朋友也是这样想，不过他还是提出了另一个主意：当地医院的病毒学科。这八年来我一直在那里工作，在老鼠和兔子身上培养病毒和细菌。

事情就是这样。要不是卢德维克，我不会生活在这里。不论是我还是露西都不会生活在这里。

我离开农场几年以后，她结了婚。她不能继续留在农场，因为她的丈夫想到城里工作，尽管他们不太清楚要在哪里定居。最后她说服他搬到这里，搬到我生活的这个城镇。

我从未收到过比这更贵重的礼物，更大的报酬。我的小羊羔，我的小鸽子。我曾用心灵治愈和培育过的孩子回到了我身边。她过去对我一无所求，现在仍然对我一无所求。她有一个丈夫，但她还是想靠近我。她需要我。她需要不时听到我的声音。在星期天礼拜式上看见我。在街上遇见我。她迁到这里来时我很高兴。这使我意识到我不再年轻，我比我想象的要老，露西也许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成就。

这是不是太少了点，卢德维克？一点也不少。它对我来说足够了，我很幸福。我很幸福。我很幸福……

20

哎，我是多么自欺欺人！我是多么费尽心机使自己相信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在不信教的人面前是多么炫耀我的信仰！

是的，我的确使露西皈依了教会。我使她平静下来，治愈了她的创伤。我消除了她对性欲的厌恶。然后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是的，可我对她做了什么善事呢？

她的婚姻结果并不幸福。她的丈夫是一个野兽。他公开对她不忠，据说还经常打她。露西从未对我提起一个字。她知道这会引起我痛苦。她把她的生活说成非常幸福。但是我

们住在同一个城镇，在这里没有什么秘密能保持很久。

哎，我是多么自欺欺人！我把针对国营农场场长的政治阴谋解释成上帝的旨意。然而在所有的声音中我怎么能肯定辨认出了上帝的声音呢？假若我听到的声音仅仅是我自己怯懦的声音又该怎么办呢？

在布拉格我有妻子和儿子，不是吗？的确，我并不太爱他们，但我也不可能与他们分手。我害怕陷进一个我不能自拔的处境。我害怕露西的爱，不知道如何处理它。我害怕卷入纠纷。

我把自己树成拯救灵魂的天使，而实际上我不过是她的另一个引诱者而已。我爱过她一次，就只有一次，然后就转身离开了。我表现得象是我在赐予她宽恕，而实际上她才应该宽恕我。我离开时她绝望地哭泣，几年后她来了，在我的城镇居住下来。她跟我讲话。求教我就象求教一个朋友。她已经原谅了我。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在我的生活中这种事并不常发生，即这位姑娘爱我。她的生活掌握在我手中。我可以给她幸福。然而我却逃开了。没有人象我这样伤害过她。

莫非我试图充作神的呼吁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想逃避我作人的职责吗？我害怕女人。害怕她们的温情。害怕她们的不断出现。当时我对与露西一道生活感到恐惧，就象现在我一想到要不断地走进邻近城镇那个教师两间一套的房子就感到恐惧一样。

十五年前我自愿从大学辞职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我不爱我的妻子。她比我大六岁。我无法再忍受她的声音，她

的面孔，以及家里那个单调的、滴答滴答的钟。我无法跟她生活在一起，可是我也不能使她遭受离婚的打击，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从来没有做过伤害我的事。接着我突然听到了上天拯救我的呼吁声。我听见耶稣在呼召我抛弃我的渔网^①。

告诉我，上帝，这是真的吗？我真的如此可怜而又可笑吗？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让我恢复信心！对我讲话，上帝！再大声点！在这片嘈杂的声音中我似乎听不见你的声音！

① 《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得烈两个渔夫作他的门徒。

第七章 卢德维克 雅罗

斯拉夫 海伦娜

1

那天晚上很迟我才从科斯特卡的住处回到旅馆，我决定天一亮就动身回布拉格：既然我那倒霉的使命已经结束，我就没有什么必要再呆在家乡。倒霉的是，我的思想一片混乱，直到半夜还在床上(吱嘎作响的床)辗转反侧，没有合眼；当我终于睡着后，仍然不断地醒过来，直到天亮才沉沉入睡。结果我到九点钟才起床，此时早班公共汽车和火车都已经开走了。当我意识到我不得不等到下午两点去布拉格的下一班车时，我懊恼极了：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遇到船只失事的人。突然间我非常想望布拉格，想望我的工作，我房间的书桌和我的书，可是我也只好咬咬牙，下楼到餐厅吃早饭。

由于害怕碰见海伦娜，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她不在那里(就是说她已经出去到附近村子里乱转，肩上挎着一个录

音机，用话筒和愚蠢的问题纠缠过路人)，但餐厅里已经挤满了人，沸沸扬扬，烟雾腾腾，人们在坐着喝啤酒、浓咖啡，和法国白兰地。令我懊恼的是，我又一次发现我的家乡竟不愿给我提供一顿象样的早餐。

我走到街上，蔚蓝的天空，轻柔的云絮，渐渐增加的温度，微微扬起的灰尘，伸向宽敞平坦的广场的大街，塔尖（对，正是那个看上去象戴着古代头盔的士兵的塔尖）——这一切都流露出一种无聊的忧郁。远处，我能听见一支摩拉维亚挽歌醉醺醺的低沉的声音（对怀乡病、大平原、古代枪骑兵的诅咒），突然，我好象看见露西就在我面前，露西和那些古代事件，多么象那首节奏拖得很长的歌，直接对着我的心讲话，这颗心被无数女人跨过（象一个大平原）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象在宽敞平坦的广场上扬起而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落在鹅卵石之间，然后又扬起，随一阵大风吹走的灰尘。

我跨过那些满是灰尘的鹅卵石，沉重的空虚充塞着我的生活：露西，虚无缥缈的女神，先是让我失去了她，然后昨天又使我精心策划的复仇变得毫无意义，现在甚至把我对她的回忆也变成一件十分可笑的事。变成一个怪诞的幻觉。科斯特卡讲的故事清楚地表明，所有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怀念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露西是谁。

我一直把露西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传说和一个神话，从中得到安慰，但现在我意识到在我富于诗意的幻想后面隐藏着一个毫无诗意的现实；我并不了解她；我并不知道她的真实面目，她的内在和外在。我所能看见的（在我年轻人的自我中心中）仅仅是她与我直接有关的那些方面（我的孤

独，我的监禁，我对温柔和爱的渴望)；对我来说她只不过是与我的处境密切相关；超出那个具体处境的一切，她本身的一切，便完全没有被我看见。由于她只是与一个处境密切相关，难怪当那个处境变了(当另一个处境出现，当然自己老了，变了)，我的露西也就随之消失了，她留下来的只是没有被我看见，与我无关，超出我范围的一切。因而，也难怪十五年后我没有认出她来。在我眼里(除了在与我有关的范围内，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留意她)，她早已是一个不同的人，一个陌生人。

十五年来我失败的预示一直在追踪我；现在它终于赶上了我。那个古怪的科斯特卡(我从来没有把他完全当回事)对她来说更重要，为她做过更多的事，对她更了解，爱她爱得更好(我说更好，而不是更爱她，因为我爱情的力量决不可能小于他)：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却对我什么也没讲；他使她幸福，我却使她不幸；他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我却失去了机会。为了占有我如此渴望的那个肉体，我需要做的只是理解她，逐渐认识她，爱她，不仅为了她对我所具有的意义，而且为了她与我无直接关系的一切，属于她的而且只属于她的一切。可是我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结果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她。一阵愤怒掠过心头；我生自己的气，生我那时的年龄的气，那个荒谬、抒情的年龄，在那个年龄，一个人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谜，因此不能解开他自身以外的谜，在那个年龄，其他人(无论他多么爱他们)不过是活的镜子，他在其中惊奇地发现自己感觉，自己情绪，自己价值的影象。是的，十五年来我一直把露西看成是保存了我那个岁月的影

象的一面镜子！

我回忆起那个暗淡的房间，那张孤单单的床，那盏透过脏玻璃照进来的街灯；我回忆起露西疯狂的反抗。真是一个拙劣的玩笑：我以为她是个处女，而她拼命搏斗就是因为她不是个处女，害怕突然暴露真相。但是还有另一个解释（与科斯特卡对她的看法一致）：她最初的性经验是那样残酷，他们使她充满了对性行为的厌恶，使性爱丧失了其他人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使它完全变得没有感情和爱情；半是孩子，半是妓女，她认为肉体是丑陋的而爱情是精神的；灵魂与肉体在无声、顽强的战斗中进行着交战。

这个解释（似乎如此象通俗剧，可又似乎如此有理）使我想起了肉体与灵魂之间许多令人可叹的不和（我很熟悉这种不和，以及它的许多形式），我想起（因为可悲总是与可笑处在不断的角逐中）一个曾使我捧腹大笑的故事。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非常风骚的女人（我曾充分利用过她这一点），与一位物理学家订了婚，决心要使他成为她的第一个恋人，可是为了确信这是真正的爱情（与她经历过的无数风流韵事相反），她拒绝他的一切肉体亲昵，直到婚礼晚上。夜间在公园里散步，她顶多不过紧握住他的手，在街灯下吻他，由此使她的灵魂不受肉体阻碍，能够直上云霄，享受它在那里感到的眩晕。但他们结婚后仅一周她就提出离婚，强烈地抱怨他毁掉了她一生的爱情，原来他完全是一个不中用的、阳痿的恋人。

远处摩拉维亚歌曲低沉的声音此刻与这个故事的怪诞回味，与广场的灰尘和冷清，与我的沮丧情绪（肚子里咕咕作

响的饥饿加剧了我的沮丧)混合在一起。我正好停在一个饮食店附近，可是当我想把门推开时，门一动也不动。“他们今天都在过节。”一个过路人告诉我。“国王们的骑马？”“对。那边有一个看台。”

我咒骂了一声，但是也无可奈何；我朝歌声的方向走去，饥饿的痛苦引导我走向我一直希望避开的那个民间节日。

2

筋疲力尽。从一大早起就筋疲力尽。仿佛我整夜都在外面狂欢宴饮。可我整夜都在睡觉，如果辗转反侧也称得上睡觉的话。吃早饭时我拚命克制住打呵欠。不一会儿，人们开始陆续到来。弗拉吉米尔的朋友们和一些闹闹嚷嚷的旁观者。然后一个合作社的小伙子给弗拉吉米尔牵来了马。在人群中居然还出现了卡拉塞克，区议会的文化顾问。这两年来我们一直不和。他穿着一件黑色西服，显得很严肃。同他一道来的还有一位举止优美的女人，布拉格的一位电台记者。我将做他们的向导，他说。那个女人想把有关骑马活动的采访录下来。

不，谢谢你！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我不想扮演蠢货。那个记者继续说，见到我本人她是多么激动，当然卡拉塞克也插进来：同他们一道去是我的政治责任。这个蠢货。我几乎想任性胡来了。我告诉他们，我儿子是今天的国王，在他做准备时我想在场。但这时乌娜斯塔在我背后给了我一下。为儿子做准备是她的任务，她说。我干吗不走开，去帮他们录音。

所以我最后只好照办。那个电台的女人在区议会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大本营。除了录音机，她还带来一个为她跑腿的年轻小伙子。她除了笑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说话。最后她把话筒放到嘴唇边，向卡拉塞克问了第一个问题。

卡拉塞克轻轻咳了一声，然后讲起来。扶持民间艺术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主要部分。区议会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它为什么得到了大力支持。他希望大家成功，皆大欢喜。他感谢所有参加的人，热情的组织者和热情的学生们，他衷心感谢他们。

筋疲力尽。筋疲力尽。那些老一套的话。那些十五年来老一套的话。今天从卡拉塞克的嘴里说出来，而这个人对民间艺术根本无所谓。民间艺术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骗人的玩意儿。他又可以借此显示他是多么积极，紧跟指导路线，自吹自擂。他对“国王们的骑马”没有尽过任何力，还把我们的预算削减到最低程度，然而得到荣誉的却是他。本地文化的老爷。一个连小提琴和吉它都分不清的从前的送货少年。

那个记者把话筒放回嘴边。我对今年“国王们的骑马”满意吗？我真想当面嘲笑她。骑马还没有开始哩！可是她反而嘲笑起我来。我对民俗有那么多经验，她说。我肯定知道这次活动的结果如何。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事先就知道一切。他们完全知道未来。未来已经发生了，现在只是在为他们重新展现一遍。

我有点想告诉她我的真实想法。这次骑马将比往年糟。民间艺术一年年失去支持者。当局也失去了兴趣。它已经名存实亡。电台里不断播出的民间音乐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所

有那些民间管弦乐器和民歌歌舞团演唱的与其说是民间音乐还不如说是歌剧、小歌剧或流行曲调。民间乐器有指挥，总谱和乐谱架！交响乐式的管弦乐曲！真是褻渎！你如此喜爱的音乐，我亲爱的女士，不过是有一层民间曲调薄薄外表的古老浪漫主义而已。民间艺术已经死亡，是的，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

这就是我想对着话筒吼出的话。可最后我却说了完全不同的话。“国王们的骑马”辉煌壮丽。民间艺术的力量。色彩缤纷。我很欢喜。我感谢所有参加的人，热情的组织者和热情的学生们，我衷心感谢他们。

我为说了他们要我说的话而感到羞耻。难道我竟是那样胆怯吗？训练得那样听话吗？那样筋疲力尽吗？

我很高兴这事终于了结啦，于是匆匆退出。我急着想回家去。院子里有许多人，有的只是在闲荡，有的正在给马装饰蝴蝶结和飘带。我想看看弗拉吉米尔怎样在做准备。我走进去，但是他们在里面给他穿衣服的那个起居室的门闭上了。我敲门，喊叫。这里没你的事，乌娜斯塔在里面回答。正在给国王穿衣。让我进去，该死的！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这违背传统，她在里面答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传统，在国王穿衣时不让父亲在场，但是我不想反驳她。我在她的声音中察觉出一种兴趣，这使我感到高兴。他们对我的世界感兴趣我很高兴。我那可怜的成了孤儿的世界。

于是我回到院子，与正在给马装饰的人闲聊。这是一匹大驮马。耐心而又沉静。

接着我听见门外大街上传来的嘈杂声。紧接着是一些喊

叫声和咚咚的鼓声。我的时刻到了。我激动万分。我打开门走出去。“国王们的骑马”被引导到房子前面。马匹都装饰着饰带和飘带。年轻的骑手们穿着鲜艳的民间服装，就象二十年前一样。二十年前他们来这里接我。他们请求我父亲把他的儿子给他们做国王。

大门旁边坐着两个侍从，化装成女人，但手中拿着马刀。他们在等候弗拉吉米尔，一整天他们都将伴随他，保卫他。一个年轻人从乐队中骑着马出来，正好停在我面前，他朗诵道：

汝等听着，汝等听着，大家全都听着！
慈善的父亲，我们特来向你问候致意，
请求你同意让你的儿子做我们的国王！

接着他许诺他们将好好照看国王。他们将引导他安全地穿过敌人的军队。他们决不会把他交到敌人手中。他们渴望着战斗。汝等听着，汝等听着！

我往后看。在我们房子的阴影中，一个人影跨坐在一匹装饰得十分漂亮的马上。他穿着一件褶袖的女人服装，他的脸被色彩鲜艳的飘带遮住。那是国王。弗拉吉米尔。蓦然间我忘记了疲倦和沮丧，感到非常惬意。老国王正在把年轻国王送到人世间。我走到他跟前，踮起脚尽量靠近他掩藏着的脸，悄声说：“祝你好运，弗拉吉米尔！”他没有反应。没有动一下。他不可以的，乌娜斯塔带着微笑对我说。他到晚上才许说一句话。

我用了不到一刻钟就到达了村子（在我年轻时，村子与城镇之间还隔着一块田野，可现在它们已经几乎连在一起了）；刚才我在城里听到的歌声（在那里歌声听上去是那样遥远，那样悲哀），此刻从系在房子和电线杆上的喇叭里高声播出来（我永远都是个傻瓜，听到那个想象中迷醉的怀旧声音，我的眼睛竟然情不自禁地模糊起来，它其实不过是个复制品，对区议会技术力量的恭维和一对沙沙作响的78转/分的录音带！）。就在离村中心不远处，为这个盛大场面竖起了一个凯旋门，凯旋门顶端用红色花体字母装饰成一个巨大的欢迎字样；人群密集，大多数人穿着平常的衣服，几个怪老头却穿出了他们的民间服装：长统靴，白色亚麻布裤子，绣花衬衫。街道在这里扩展成一块村子草地：在道路和最近的那排屋舍之间的一大片草坪；点缀着草坪的树木间摆起了几个摊子（也是为了这个盛大场面），卖啤酒、果汁水、花生、巧克力、姜饼、芥末香肠、奶油饼干。其中一个小摊属于那家饮食店，正在供应牛奶、干酪、黄油、酸奶和奶酪；没有一个小摊出售烈酒，但我觉得几乎所有人都象喝醉了似的；人们不断在小摊周围拥来拥去，互相挡路，呆呆地看着；不时还有人突然唱起来，但总是唱个开头就没有了（并且还象喝醉酒似地挥舞着手臂）；一首歌曲的两三节立刻就被人群的喧闹声和喇叭播出的无敌的民歌声淹没了。地上扔满了（尽管时间还早，骑马尚未开始）硬板纸做的啤酒杯和硬板纸做的、沾满芥末的盘子。

供应牛奶和酸奶的摊子由于不卖酒，生意很差，我不必等候就买到一杯牛奶和一个卷饼，然后走到人群稀少的地方，去静静地饮我的牛奶。就在这时，我听到草地另一端传来一阵骚动：“国王们的骑马”来了。

草地上到处都是插着小公鸡羽毛的小黑帽，袖子全部卷起来的白衬衫，红毛线缀缝的蓝背心，马具上飘动的彩色纸饰带；不一会儿，喇叭里的音乐和嗡嗡声又杂入了新的声音，马嘶声和骑手们的歌声：

汝等听着，汝等听着，大家全都听着，
从山岭到溪谷，从近处到远方，
听一听今年降灵节发生的事！
我们有一个贫穷而正直的国王，
那天盗贼从他的荒地上
抢走了足足一千头牲畜……

耳闻目睹是一片乌烟瘴气；一切都不协调：喇叭里的民歌与马背上的民歌，色彩鲜艳的服装和马匹与观众们做工很差、难看的褐色和灰色的衣服，身着骑服的骑手们不自然的自发动作，与组织者们不自然的过分管事——他们戴着红臂章在马匹和人群中跑来跑去，企图控制住混乱，可这决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是因为观众不守秩序（很幸运，他们人数并不太多），而是因为道路没有禁止车辆通行；虽然在队伍的两头都布置有组织者打信号叫车辆慢下来，但小汽车，卡车和轰轰的摩托车仍旧在骑马行列中曲折穿行，惊吓马匹

和骑手。

老实说，我想避开这种（或那种）民俗活动的原因与我
现在目睹的情景毫无关系：对这样的乏味我是有准备的，对
真正的民间艺术与媚俗的这种褻渎的结合我是有准备的，对
愚蠢的演说者虚夸的讲演我是有准备的，是的，对大话和虚
伪我是有最坏的准备的，但是我没有料到这一切是如此低
劣，几乎令人悲哀和感伤；它遍及一切：可怜巴巴的小摊，
稀少而不守秩序、漫不经心的人群，日常交通与不合时宜的
仪式之间的战斗，逡巡不前的马匹，沙哑的喇叭老是机械地、
固执地吼着那两首民歌，完全压倒（与摩托车的轰叫混在
一起）年轻骑手们的声音，这些骑手尖叫着他们的诗句，脖
子上青筋暴露。

我扔掉杯子。现在骑马活动已经为草地上的观众表演完
了，开始了穿过村子的几小时长的游行。我对这一切太熟悉
了：战争的最后一年，我自己就当过一个小侍从骑在马上（穿
着女人的礼服，佩带着马刀），行进在国王雅罗斯拉夫身旁。
我并不想沉湎于感伤的回忆中，可是（也许是被骑马活动的
低劣所震惊），我觉得用不着对它的做作转过背去；我慢慢
跟在队伍后面，队伍现在已经散开，覆盖了道路。队伍中央
是三名骑手：国王，身旁的两个穿着女人服装、拿着马刀
的小侍从；他们周围是王室护卫队或大臣们。队伍中其余的人
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在街道两侧骑马行进；这些骑手的角
色也有明确限定：有掌旗手（他们炫示着旗帜，把旗杆插在
鞋子里，以至于绣花旗帜在马的两侧飘扬），有信使（在每
家房前吟诵写成诗歌形式的讯息；贫穷而正直的国王被人从

他的空保险箱里抢走了三千块银子，从他的荒地里抢走了一千头牲畜），最后还有募捐人（他们唯一的任务是为争取捐献而叫喊“为了国王，我的善良的女人，为了国王！”并伸出竹篮去接受捐献）。

4

谢谢你，卢德维克，我认识你只有八天，可我从未象爱你那样爱过别人，我爱你，信任你，我用不着思量，我就是信任你，因为即使我的头脑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情或灵魂，但肉体不可能假装，肉体比灵魂更诚实，我的肉体知道，它从未经历过象昨天那样的情景，情欲，爱慕，残忍，愉快，疼痛，我的肉体从未梦想过象这样的情景，我们的肉体昨天发了誓，现在我们的头只得遵守，我认识你只有八天，卢德维克，我感谢你。

我也感谢你来得正是时候，感谢你救了我。今天的天气真美好，天空明媚灿烂，我容光焕发，今天早晨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去了国王和他双亲居住的房子，录下了召集仪式，可他来了，他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他已经到了，我没料到这么快就从布拉迪斯拉发到了这里，我没料到他是那样残忍，想想吧，卢德维克，他把她也带来了，这个无赖！

我真傻，直到最后还认为我们的婚姻没有完全破裂，认为它还可以挽救，我真傻，为了那个腐朽的婚姻竟然差点牺牲你，差点取消我们在这里的约会，我真傻，我差点被他的甜言蜜语骗了，他告诉我，他从布拉迪斯拉发回去时将中途

在这里下车找我，他有许多话要同我谈，就我们两个，可现在他却带来了那个孩子，那个还在吃奶孩子，那个二十二岁，比我小十三岁的小姑娘，因生得太早而输掉那就太丢脸了，我感到无望，真想大叫大嚷，可是我不能嚷，我得微笑，有礼貌地同她握手，啊，我是多么感谢你，卢德维克，你给了我力量。

当我们单独呆在一起时，他说现在我们有机会把事情谈明了，就我们三人，这是最体面的方式，体面，体面，我知道他开始谈到体面时是什么意思，两年来他一直想得到离婚，他知道与我单独在一起他不会成功，他指望这种面对面的会面会使我震动，他认为我会羞于显得象个泼妇，我会垮掉，主动让步。我多么恨这个男人，当我正在执行一个公务时，当我需要平静和集中精力时，他却镇静自如地把刀戳进我的肋间，至少他应该对我的工作表示一点尊重，一点体谅吧，可是不，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受欺负、受侮辱的总是我，失败的总是我，噢，这一次不同了，此刻你在我身后，你和你的爱，此刻我仍然觉得你在我体内，在我身上，那些年轻英俊的骑手都在我周围欢呼喊叫，我几乎觉得他们在叫喊，我有你，有生活，有光明的未来，顿时我心里充满了骄傲，一种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的骄傲，我极力给了他一个甜蜜的微笑，然后说，我没有必要与你们一道去布拉格，我不想打扰你们，何况我有电台的汽车，至于你想谈妥的协议，我们可以马上解决，我正要把你介绍给那个我打算和他共同生活的男人，我肯定我们会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

也许这样做太轻率了，好吧，即使轻率又怎么样，为了

那个极度骄傲的瞬间，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值得的，他突然做出一副谄媚样子，显然他如释重负，但也有点惊恐，担心我说的不是真话，他要我再说一遍，这次我把你的全名告诉了他，卢德维克·扬，我对他说得非常明白，别担心，相信我，我答应不阻拦我们的离婚，别担心，我不再需要你，即使你要我我也不会要你。但是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他说，我淡然一笑说，我不怀疑这一点。

5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乐队吹奏单簧管时，我们常常绞尽脑汁想弄清“国王们的骑马”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据传说，当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①打了败仗，逃离波希米亚时，国王与他的马队被迫在这里，在摩拉维亚乡间躲避捷克追兵，靠乞讨度日。据说“国王们的骑马”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历史事件，但是只要简单查一查原始资料就会清楚，骑马的传统远远早于匈牙利国王的不幸遭遇。那么这个传统起源于何处，它的含义是什么？也许它可以追溯到非基督教时期幸存下来的一种通行的仪式，通过这种仪式，男孩子被承认已长大成人？那么国王和他的小侍从为什么要穿女人的服装呢？是表示一支伪装的军队（不管是马蒂亚斯的还是更早时期的一支军队）引导着首领穿过敌人的领土，还是一个幸存下来的古代非基督教的迷信，按照这个迷信，男扮女装可以避免妖魔鬼怪的伤害？那么为什么国王在整个骑马中不许说一句话呢？为什

^① 马蒂亚斯(1557—16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11年曾为匈牙利国王兼波希米亚国王。

么只有一个国王却要把它称作是“国王们的骑马”呢？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含义？无人知晓。有许许多多假设——没有一个被证实。“国王们的骑马”是一个神秘的仪式；无人知道它的含义，它的意蕴，但正如埃及象形文字对那些看不懂它们的人（他们仅仅把它们看成是奇异的草图）来说是最美的，因此“国王们的骑马”对我们来说同样是很美的，至少部分是因为它想传达的意蕴早已不为人知，留下的只是更加鲜明突出的动作，色彩和话语。

结果使我大为惊异，我最初怀着疑虑跟在“国王们的骑马”散漫的启程后面，但我的疑虑很快就消失了，我发现自己被从一家到另一家缓缓行进的、色彩鲜艳的人马吸引住了；不仅如此，几分钟前用一种刺耳的女人声音垄断无线电广播的喇叭现在也已经沉默了，唯一能听见的声音（除了偶尔传来的车辆的隆隆声，而我早已学会了不听这些声音）是那些信使的奇异的音乐。

我真想站在适当的位置，闭上眼睛，倾听：在这里，在一个摩拉维亚村子的中心，我感到听见了真正最原始的诗歌，那种我决不可能从收音机或电视里，甚至舞台上听到的诗歌，象有韵律和仪式的一种预示，介于讲演和歌曲之间的一种思维产物的诗歌，其韵律发出一种具有魔力的精神，正是那种起源于古希腊圆形剧场的精神的诗歌。这是一种庄严的、复调的音乐：每一个信使都用单调的声音朗诵他的诗，但每一个都有独特的音调，因此所有声音杂乱地形成了和声；而且，这些小伙子并不是同时朗诵；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房前开始朗诵；所以这些声音全来自不同的方

向、不同的时刻，结果使人联想到一个丰富多样的轮唱；一个声音刚结束，另一个又接着唱下去，而第三个正准备以自己的声调加入进来。

“国王们的骑马”沿着大街移动（不断被车辆阻断），直到最后到达一个预定的岔路口才分开，右翼继续朝前走，左翼拐进一条小街。第一幢房子是一幢黄色的小屋，有栅栏和鲜花艳丽的花园。信使们的即兴演唱富有灵感：这幢农舍有一台漂亮的水泵；女主人有一个儿子真是健壮；农舍前面确实有一个绿色的水泵，那个矮矮胖胖、四十岁的女主人听到对她儿子的形容后高兴得笑起来，把捐献物给了那位正在叫着“为了国王，我善良的女人，为了国王！”的骑手（募捐人）。这位募捐人刚把捐献物丢进系在马鞍上的篮子里，另一个信使又对那女人叫道，她的身材多么娟秀，可他更喜欢她的美酒，然后他用一只手做成杯状，头朝后仰，假装痛饮了一口。所有观看的人都大笑起来，那位女人既窘迫又愉快，跑进屋子，很快就转回来（她准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和杯子，给每一个骑手饮了一口。

国王的扈从在喝酒和开玩笑时，国王本人和两名小侍从却庄重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几步开外，也许在喧闹的军队面前保持尊严和孤傲是国王的职责。两名小侍从的马立在国王的马旁，近得连他们的靴子都相触在一起（马的胸部戴着用许多小镜子和各种颜色的糖装饰的华丽的心形物；它们的前额上披着纸玫瑰，鬃毛上编着彩色绉纸带）。这三位沉默不语的骑手都穿着宽裙子，浆硬的皱褶衣袖；小侍从头上戴着装饰华丽的女帽，国王头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银色冠冕，上面

挂着三条长而宽的飘带，两边是蓝色，中间是红色，完全把他的脸遮住了，使他看上去既神秘又富神启。

我为这个恪守礼仪的三位一体所迷醉；二十年前我也曾象他们一样跨坐在花团锦簇的马上，但因为我当时是从里面去看“骑马”，所以什么也没看见；只有现在我才能真正看见了它，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国王（几步开外）坐得那样笔直，就象一个受到保卫的塑像；也许，我突然想到，也许他根本不是一个国王，也许他是一个女的；也许他是露西王后来向我显示她的真正面目，因为她的真正面目实际上就是她隐藏的面目。

与此同时，我想到科斯特卡真是个怪人，他把冥思和幻想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可以相信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是真实的，但仍然有些疑点；当然，他的确了解露西，他甚至可能了解她许多事，可有一件重要的事实他不知道：那位在借来的矿工房间里企图对她施暴的士兵——露西的的确确爱他；我怎么可能相信露西摘花是出于某种模糊的宗教渴望，我记得她是为我而摘的；如果她对科斯特卡隐瞒了这一事实，隐瞒了摘花的真相和我们整整半年甜蜜的爱情，那么她只是想要保持这个秘密，甚至不让他知道；她迁到此地也不全是因为他；也许只是巧合，但也许也是因为我；她毕竟知道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感觉到，第一次强奸的故事是真实的，可是我现在怀疑某些细节；故事的一些部分被一个受到罪孽念头刺激的男人的夸张心理所渲染了，另一些部分则被只可能源于一个醉心于仰望天堂的男人的忧郁所渲染了；很清楚：科斯特卡的故事既有真实又有虚构，在旧的故事上添加了一个

新的传说（也许更接近真实，更美丽，更深刻）。

望着戴面罩的国王，我看见露西骑着马（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庄严地（并且嘲弄地）通过我的生活。接着（对某种外部刺激的反应）我的目光微微移向一边，与一个男人的目光相遇，这人显然已看了我很久，并且微笑着。“喂。”他说，倒霉的是他还朝我来。“喂，”我说。他伸出手，我握了握。然后他转身招呼一位姑娘，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她。“你在等什么？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姑娘（个子太高了一点，但挺漂亮，黑头发，黑眼睛）走上前，自我介绍说她叫布罗日小姐。她把手伸给我，我作了自我介绍，加了一句“很高兴见到你。”“有好多年了，伙计。”那男人快活地说。正是泽曼尼克。

6

筋疲力尽，筋疲力尽。我似乎不能恢复疲倦。骑马队伍与国王一道出发去村庄草地，我吃力地跟在他们后面，做着深呼吸以克服我的疲劳。我几次停下来与走出家门观望的邻居们攀谈。我突然觉得自己正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旅行和冒险的日子已一去不返。我无望地被束缚在我居注的这两三条街上。

我到达草地时，骑马队伍已经开始沿着长长的大街出发。我正准备再次跟在队伍后面缓缓而行，这时我看见了卢德维克。他独自站在道路旁边的草坪上，沉思地望着骑手们。该死的卢德维克！但愿他滚蛋，从我的生活中滚远点！他一直在回避我。好吧，今天我可要回避他。我转过身，决定在一

棵苹果树下的长凳上休息一下，听听信使们的声音。

于是我便坐在那里，倾听和观望。骑马队伍渐渐走远了。它可怜兮兮地靠着道路两边行进，好让川流不息的小汽车、摩托车通过。一群人慢吞吞地跟在后面。可怜兮兮的一小群人。来看“骑马”的人每年愈来愈少。尽管今年卢德维克来了。他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你滚蛋吧，卢德维克！现在已经太迟了。对一切来说都太迟了。你是一个凶兆。一个不祥的先兆。特别是现在。当我的弗拉吉米尔作国王时。

我朝别处望去。草坪上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人：在小摊旁，在餐馆门口。他们大多数都已喝醉。醉鬼是民间节日最忠诚的支持者。唯一留下来的支持者。民间活动给了他们的喝酒一个难得的高尚的借口。

接着皮切塞克老人走来，在我身旁坐下。它不象从前了，他说。我表示同意。的确不象从前了。几十年前，几百年前，骑马活动一定是多么壮观！尽管远没有今天的骑马活动那样花哨。今天的骑马活动半是媚俗，半是化装舞会。马的胸部佩着华丽的心形装饰物！在百货商店买的一卷卷纸饰带！服装总是色彩鲜艳，但从前的服装却很朴素，马的脖子上和胸脯上只有鲜红色的彩带，国王也只戴一个朴素的面罩，而不是戴花哨的饰带面具。尽管在他牙齿之间也有一朵玫瑰。为了不让他说话。

你说得对，老伙计，从前要好得多。人们不必去追着年轻人，恳求他们参加。人们也不必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开会，争论谁来负责组织，谁来接受收入。“国王们的骑马”就象一道源泉从村庄生活的中心汨汨涌出。它从一个村庄疾驰到另

一个村庄，为国王收集施舍。有时它会遇上另一支骑马队伍，于是就会有一场战斗。双方都拚命地保卫他们的国王。刀光剑影，鲜血流淌。如果一支骑马队伍的成员俘虏了对方的国王，国王父亲就会付钱让他们喝得不省人事。

你说得对，老伙计，太对了。甚至我当国王那个时候，在占领期间，“骑马”也与今天不一样。是的，甚至战后它还多少有点价值。我们那时认为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世界。人们将恢复民间习俗。“国王们的骑马”将再次从他们生活的深处汨汨涌出。我们要实现这一切。我们组织了一个又一个的民间节日。但是一个源泉是不可能被组织的。如果它不涌出，它就不存在。瞧瞧我们是怎样不得不挤出我们的歌，我们的“骑马”，我们的一切。它们是最后的几滴水，正是最后的几滴水。

啊，骑马队伍已经看不见了。它可能已拐进了某条小街。但我们仍能听见信使的声音。他们的祈求极其动人。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纪。很久以前。然后我睁开眼睛，对自己说，弗拉吉米尔当了国王是多么好啊！一个濒临灭亡的王国，但这是一个最壮丽的王国，一个可以指望我忠诚不渝的王国。

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有人向我打招呼。是库茨基。我好久没见到他了。他走路很困难，拄了一根拐杖。我从来就不喜欢他，但今天我却为他的衰老感到难过。“你到哪儿去？”我问。他说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出来活动一下。“你觉得‘骑马’怎么样？”我问他。“瞧都没瞧一眼。”他挥挥手说。“为什么不瞧瞧？”我问。他又挥挥手不予答复，突然我明白他为什么不去

观看骑马了：卢德维克在观众中。库茨基比我更不想再碰见他。

“我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我说，“我的儿子参加了，但至少我也不想慢吞吞地跟在后面。”“你的儿子？你是说弗拉吉米尔？”“是的。”我说，“他是国王。”“真有趣。”库茨基说。“你是什么意思？”我问。“非常有趣。”他说，他的眼睛发亮了。“那是为什么？”我又问。“因为弗拉吉米尔跟米沃什在一起。”库茨基说。我不知道米沃什是谁。他告诉我，米沃什是他的外孙，他女儿的儿子。“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说，“我刚才还看见他，看见他骑在马上走了！”“噢，我也看见了他。”库茨基说，“米沃什骑着摩托车把他带到我家去了。”“荒唐。”我说，可我还是禁不住问：“他们要到哪儿去？”“要是你不知道，”他说，“我是不会告诉你的。”说完他就走掉了。

7

我绝对没有料到会遇见泽曼尼克（海伦娜曾告诉我他要到下午才会来找她），感到整桩事太令人不愉快。可是我能怎么办？他就在这里，站在我面前，与从前一模一样：头发象过去一样淡黄，尽管不是象从前那样把长卷发朝后梳，而是剪短了，时髦地搭在前额上；他仍然站得笔直，脖子朝后弯着；他仍然快活，踌躇满志，无懈可击，仍然享受着天使们的青睐，此刻显然正享受着—一个妙龄女郎的青睐，她的美顿时使我痛苦地想起了昨天下午与我在一起的那个不完美的躯体。

由于希望我们的相遇早点结束，我极力对他连珠炮般的

陈腐问题报以同样陈腐的答复：他反复地说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又说在相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我们竟然在“这个被上帝抛弃的小地方”相遇真叫人吃惊；我告诉他，我出生在这里，于是他向我道歉，说既然如此，他敢肯定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这个地方；布罗日小姐笑起来，我完全没有反应，反而说在这里遇见他我并不吃惊，因为，假如我没记错的话，他一直喜欢民间仪式；布罗日小姐又笑起来，说他们不是为“国王们的骑马”而来的；我问她是不是不喜欢“国王们的骑马”；她说它引不起她的兴趣；我问她为什么；她耸耸肩，于是泽曼尼克说：“得啦，卢德维克，时代已经变了。”

这时，骑马队伍已经走到另一家，两名骑手正在竭力控制变得烦躁不安的马。一名骑手冲另一位叫嚷，指责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马；“笨蛋”和“蠢货”的叫骂声十分滑稽地与喜庆的仪式混杂在一起。“要是马脱缰了那才妙啦！”布罗日小姐说。听到这个想法泽曼尼克纵声大笑起来，可是没多久骑手们就设法使马安静下来了，汝等听着，汝等听着的声音又重新响起来，队伍平静、庄严地通过村庄。

当我们一道跟在那些响亮的声音后面，沿着两旁都是鲜花盛开的花园的一条小街走去时，我一直在搜寻一个恰当而自然的借口向泽曼尼克道别；同时我不得不尽责地走在他那漂亮的女伴身旁，继续谈话；我得知他们今天早晨从布拉迪斯拉发来，那里的天气与这里一样晴朗；我得知他们是乘泽曼尼克的小汽车来的，刚离开布拉迪斯拉发他们就不得不换火花塞；我还得知布罗日小姐是泽曼尼克的学生。我从海伦娜那里知道他在大学教马列主义，可是我还是问他，他的领

域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哲学（我发现这个专门术语很有意思；几年前他会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可近几年它已不吃香了，尤其在青年中间，对泽曼尼克来说，随大流一直都是他的主要标准，因此他用心良苦地把他的马克思主义隐藏在更普通的术语后面）。可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很惊奇，你的领域是生物学；我这番话不明言地暗示这一事实：大学里许多马克思主义教员基本上都是非专业人员，他们与其说是作为学者还不如说是作为宣传员进入这一领域的。这时，布罗日小姐插进来声称，尽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教员的脑子里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政治小册子，可是巴威尔却截然不同。巴威尔自己不可能把这意思表达得更好；他温和地表示反对，从而既显示了他的谦虚，又鼓励了这位妙龄女郎进一步称赞他。于是我了解到泽曼尼克是最受欢迎的教员之一，他的学生崇拜他，其原因同他使行政部门感到不安的原因一样：即他总是说心里话，他勇敢，他支持青年人。由于泽曼尼克不断表示温和的抗议，我了解到泽曼尼克在近几年进行的各种斗争的细节：由于他拒绝坚持呆板过时的课程，想把当代哲学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介绍给学生，他们声称他企图偷偷传播“敌对的意识形态”，甚至想解除他的公职；他救了一个他们正准备开除的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孩子气地胡闹，与一个警察发生争吵，校长（泽曼尼克的敌人）希望把此事说成是一个政治上的不执行行为；此后女学生们举行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测验，选出她们最喜欢的教员，结果他轻而易举地获胜。此时，泽曼尼克已不再竭力阻拦这番滔滔不绝的赞扬，我对布罗日小姐说（带着讽刺的口吻，哎，但又太闪烁其辞，使她

难以理解)，我明白她的意思，因为据我所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泽曼尼克就一直颇受大家爱戴和欢迎。布罗日小姐激动地点头：她一点也不惊讶。既然巴威尔是这样一位出色的讲演家，可以把他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得啦，那又怎么样呢？”泽曼尼克笑道，“即使我在辩论中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还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抨击我。”

最后这句话里那种骄横的自鸣得意使我确信，泽曼尼克一点也没变；然而，这句话的内涵却使我寒彻骨髓：泽曼尼克似乎已与他从前的观点一刀两断了，假若发生一场政治性的冲突，我将发现自己站在他一边，无论愿意与否。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这是我最没有料到的事；虽然他的转向决不是不可思议的；相反，这是很平常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整个国家实际上也正在逐渐这样做。问题在于我并没指望泽曼尼克会转向：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僵硬不化，要是我给予他一点变化的权利，我就不是人。

有的人声称要爱人类，而有的人反对说，我们只可能爱单独的人，也就是说，爱这个人或那个人。我赞同第二种观点，并愿意补充一点，对爱适用的对恨也适用。人是渴望平衡的东西；他使压在他背上的罪恶的重量与他仇恨的重量相平衡。但是，试试把你的仇恨只集中在抽象观念上——非正义、盲从、残酷——或者，如果你走得更远，发现人的本质就值得你仇恨，试试去仇恨人类！在那个秤盘上的仇恨超过了人的能力，因此人能减轻他的忿怒的唯一办法（尽管他意识到自己有限的力量）就是把忿怒集中在一个个人身上。

这就是使我感到寒彻骨髓的原因。突然我想到他可能马

上就会把话题转到他的变化上（在我看来，他似乎怯生生地渴望夸耀他的变化），并为此请求我的原谅。这正是使我如此可怖的事。我对他说什么呢？我怎么回答呢？我怎么解释我不能与他和解呢？我怎么解释这将意味着我本来就不稳定的内心平衡的结束呢？我怎么解释这将使我内心秤盘的一端翘上空中呢？我怎么解释我用我的仇恨来平衡我年轻时承担的罪恶的重量呢？我怎么解释我把他看作是我所知道的一切罪恶的化身呢？我怎么解释我需要恨他呢？

8

马匹挨挨挤挤地进了狭窄的街道。我看得见国王，但离得很远。他坐在马上，与别人相隔一定距离，但他的两名小侍从守在他两旁。我弄糊涂了。的确，他的背和弗拉吉米尔一样有点弯。当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几乎对一切漠不关心时，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的背。但是，他真的是弗拉吉米尔吗？也很可能是别的人。

我慢慢地靠近他。我只想认出他来。我不是熟悉他的一举一动吗？我不是爱他吗？爱不是具有直觉吗？

现在我就在他旁边。我完全可以叫他。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这没有用。国王不准说话。

接着，骑马队伍又走向下一家。现在我要认出他来了！马只要迈一步就会迫使他动一动，这一动就会暴露他。当马向前走时，国王的背的确有点拱着，可是他的动作没有给我任何暗示，表明藏在面罩后面的人究竟是谁，交叉在他脸上鲜艳夺目的饰带仍然令人失望地不透明。

当骑马队伍又经过了几家房子（我们和其它几个旁观者还留连在周围），我们开始转向别的话题：布罗日小姐已从泽曼尼克谈到她自己，滔滔不绝地讲她如何喜欢沿途免费搭车的旅行，她谈及这件事时是那样热情洋溢（尽管并不是很自然的），我立刻看出我免不了要聆听一番她这一代的宣言了。一想到所谓一代人的思想（群体的自大）我就很反感。布罗日小姐充分发表了她那惹人恼火的主张（这种主张我已从那代人口中听到过无数次）：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让那些要求免费搭车的人搭车（自由思想者，冒险家，人道主义者），另一种是不让那些要求免费搭车的人搭车（自我中心的社会主义布尔乔亚）。于是我戏谑地称她是“公路的教条主义者”。她傲慢地回答，她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修正主义者，既不是宗派主义者，也不是机会主义者，这些词全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它们只属于我们，与他们完全格格不入。

“你看见了？”泽曼尼克说，“他们不一样。幸运的是，他们不一样。甚至他们的词汇也不一样。他们不关心我们的成功，不关心我们的失败。你不会相信吧，在人学考试中，当我们向他们问起清洗时，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斯大林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他们大多不知道布拉格有过的政治审讯！”

“我不认为这是幸事；我认为这是可怕的。”我说。

“的确，这说明不了多少他们所受的教育，但是想一想

吧，他们的思想是多么解放。他们对我们的世界漠不关心。拒绝它，并且拒绝它赞成的一切。”

“一种盲目屈服于另一种盲目。”

“我不这样看。我觉得他们给人印象很深。他们喜爱他们的躯体，我们却忽视我们的躯体。他们喜欢旅游，我们却呆在原地不动。他们喜欢冒险，我们却把所有的时间耗在会议上。他们喜欢爵士乐，我们却满足于对民间音乐的拙劣模仿。他们对自己感兴趣，我们却想拯救世界，而我们的救世主观念却差点毁灭了它。也许拯救世界的倒是他们和他们的自我主义。”

10

这可能吗？国王！这个被缤纷彩带遮住的笔挺的形体！多少次我看见他这样，把他想象成这样？我最亲密的幻想！既然这个幻想已经实现，所有的亲密也就消失了。它突然成了一个着色的幼虫，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假若不是在我的王国里，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还有什么亲密可言呢？

我的儿子。离我最近的人。我就站在他面前，可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如果我连这都不知道，那我还知道什么呢？如果连这个都不能肯定，尘世间还有什么肯定留给我呢？

11

当泽曼尼克在颂扬年轻一代时，我却在注视布罗日小姐，妩媚而又令人愉快，我悲哀地得出结论，一想到她不属于我，

心中既嫉妒又惋惜。她走在泽曼尼克身旁，不停地谈话，时时挽住他的胳膊，信任地望着他。这使我再次想到（正如随着时光流逝我愈来愈经常想到的），自从露西离开我后，我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值得我爱和尊敬的姑娘。生活尽情地嘲弄了我。它派遣一个男人的情妇来提醒我的失败，而就在昨天我还认为这个男人已在一场荒诞的性的战斗中被我击败了。

我愈喜欢布罗日小姐，就愈意识到她与她的同时代人的观点是多么相同，在他们看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全都属于一个混乱的整体，被同样的难以理解的术语，同样的过分政治化的思想，同样的忧虑（这些忧虑他们认为是胆怯或畏惧）。同样的来自一个黑暗而遥远年代的不平常经历所败坏。

此刻我才开始明白，我和泽曼尼克之间的相似并不限于泽曼尼克已经改变了他的观点，使它们与我的观点更加一致；这个相似要深得多，把我们的命运包容成一个整体：在布罗日小姐和她的同时代人眼里，即使我们在互相攻诘时我们也是相似的。我突然觉得，如果我勉强（我一定会感到勉强！）告诉布罗日小姐我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她会认为这很遥远，而且过于文学味（在许多拙劣的小说中被多次描写过的一个主题），我们俩的结果都不会妙；我的看法和他的看法，我的态度和他的态度——在她看来都一样违背常情。我看见我们的分歧，它迄今一直历历在目，现在却沉入了有治愈功能的时间之水中，如所周知，时间能够消除各个时代之间的差异，更不用说两个微不足道的个人了。但是我竭力抵制时间的和平馈赠；我不是生活在无穷无尽中，我被锁在我贫乏的三十七年里，并且不想割断这根链条（象泽曼尼克那样靠仓

促接受年轻一代的思想来割断这根链条)；不，我不愿抛弃我的命运，否认我的三十七年，即使它们毫无意义，转瞬即逝，此刻正在被遗忘，已经被遗忘。

倘若泽曼尼克故作亲密地靠过来，打算谈谈过去的事，请求和解，我会拒绝的；是的，即使布罗日小姐从中调停，即使她所有的同时代人，以及时间本身代为说情，我也会拒绝的。

12

筋疲力尽。突然我想甩手不管这件事了。走开去，不再为它担忧。我对这个物质的世界厌倦了。我不理解它们。它们捉弄我。我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感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道路，玫瑰花丛，逃兵，吟游诗人，母亲。

但最后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不得不控制自己。我必须将我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分歧要当地了结。我必须弄清一切谎言和欺骗的真相。

有谁可以问呢？骑手吗？使我自己成为笑柄吗？我回想起早晨。给国王穿衣。随即我知道该去哪儿了。

13

我们有一个贫穷而正直的国王，骑手们吟诵着又经过几家人家，我们尽责地慢慢跟在后面，马的臀部装饰着华丽的彩带，在我们眼前跳动着蓝色、粉红色、绿色和紫色。突然，泽曼尼克指着骑手们的方向，说：“瞧，海伦娜在那儿！”我朝他指的方向望去，但只看见色彩鲜艳的马匹躯体。泽曼尼克

又指着说：“就在那儿！”于是我看见了她——她半掩在一匹马后面——我觉得自己脸红了：泽曼尼克把她指给我看的那种方式（不是称“我的妻子，”而是称“海伦娜”），表明他知道我们认识。

海伦娜正站在人行道边，她伸出的手上举着话筒；话筒线接到一个收录机上，收录机挂在一个身穿工装裤、皮夹克，戴着耳机的小伙子肩上。我们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泽曼尼克突然而又不经意地说，海伦娜是个出色的女人：她不但仍然显得很奇特，而且很有头脑；我们如此合得来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异。

我感到我的面颊在发烧：泽曼尼克说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攻击我；他只是想表示殷勤。布罗日小姐也一样，她意味深长的目光洋溢着明白，同感，甚至共谋。我毫不怀疑我处在什么境地。

泽曼尼克继续取笑他的妻子，竭力想表明（用各种暗示和影射）他知道内情，可是决不反对，因为只要涉及到海伦娜的私生活他总是宽宏大量的；为了使这番话听上去更加随便，他指着那个强壮的技术员说，那边那个小伙子（“他戴着那副耳机是不是显得象个巨大的甲虫？”）已经危险地爱上海伦娜有两年了，我最好提防着他点。布罗日小姐笑着问，他两年前有多大。十七岁，泽曼尼克说，可以恋爱了。然后他开玩笑地补充说，海伦娜决不是一个摇篮强盗，她有她的标准，可是是一个小伙子却喜欢这样——他愈受到挫折，他的脾气就愈大，他肯定会来个迅捷的上勾拳。对此布罗日小姐回答说（用聊天的态度），我看上去似乎能对付他。

“对此我可没有这么肯定。”泽曼尼克带着微笑说。

“别忘了我在矿井干过。我还留下了一些肌肉。”我只是想使谈话继续下去；我没想到我已超出了开玩笑的范围。

“你在矿井干过？”布罗日小姐问。

“这些二十岁的小伙子。”泽曼尼克一味说下去，“当他们成群结伙在街上逛荡时，他们简直危险极了。如果他们不喜欢你的模样，你就得倒霉啦。”

“多长时间？”布罗日小姐问。

“五年。”我说。

“什么时候？”

“九年以前。”

“噢，那可是古代史了。”她说，“我敢说你的肌肉现在已经完全松软了。”她也想开点自己的小玩笑。碰巧，我刚好也正在想我的肌肉一点也不松软，事实上我体格健壮，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这位淡黄色头发的同伴揍成肉酱，而最重要也最沮丧的是，如果我决心要算清我的旧债，我除了依靠我的肌肉外便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

我再次想象泽曼尼克笑容满面地转向我，请求我让过去的事过去吧。我意识到我受了欺骗：泽曼尼克请求宽恕不仅仗恃他改变了观点，不仅仗恃时间，不仅仗恃布罗日小姐和她的同时代人，而且仗恃海伦娜（是的，此刻他们全站在他一边！），因为原谅我的通奸不过是一个要我原谅他的贿赂而已。

我在想象中细细观看他的脸，一张过于自信可以勒索他的顾客的人脸，我真想对准他的鼻子猛击一拳，这样我就能

真正地看见：骑手们还在周围拥来拥去，大喊大叫；太阳金光灿烂；布罗日小姐仍在继续谈论着什么，我狂怒的眼睛只见鲜血从他脸上淌下来。

是的，这个场面我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他请求我原谅他，我真的会做出什么来呢？

我惊恐地意识到，我肯定什么也不会做。

这期间，我们已走向海伦娜和她的技术员，技术员正把耳机移开。“你们已见过面了？”她问，看见我和泽曼尼克在一起她很吃惊。

“喔，我们已认识多年了。”泽曼尼克说。

“你是什么意思？”现在她更吃惊了。

“我们在大学就认识了，”泽曼尼克说，“我们是同学。”我心中暗想，我们已到达了通向那块臭名昭著的(处死刑的)地方的最后一座桥，在那里他将请求我的原谅。

“天哪，真巧！”海伦娜说。

“偶然的事经常都在发生。”那个技术员说，以便提醒大家他的存在。

“噢，对了，我还没有介绍你们两位。”海伦娜对我说，“这是金德雷。”

我同金德雷(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小伙子)握了握手，泽曼尼克对海伦娜说：“我和布罗日小姐原打算带你与我们一道回去，但是现在我看，你宁愿与卢德维克一道回去，所以……”

“你想和我们一道走？”穿工装裤的小伙子问，听上去不象是在邀请。

“你这里有小汽车吗？”泽曼尼克问我。

“我没有小汽车。”我回答。

“那么你可以与他们一道走。”他说。

“可是我每小时开八十公里。”穿工装裤的小伙子说，“所以，如果那使你担心……”

“金德雷！”海伦娜严厉地说。

“你可以跟我们一道走。”泽曼尼克说，“但是我想你的新朋友一定优于你的老朋友。”他如此漫不经心地称我是他的朋友，以至于我肯定不光彩的休战即将来临；更糟的是，他不再说话，似乎在犹豫要不要把我带到一边去进行一场私下谈话（我垂下头，准备洗耳恭听），但是我错了。泽曼尼克看了看他的手表。“我们的时间的确很紧。我们原打算在五点以前赶回布拉格。我想我们只好告别了。Ciao，^① 海伦娜。”他握握她的手。“Ciao。”他对健壮的技术员和我说，然后也握握我们的手。当布罗日小姐跟我们一一握了手后，他们就手挽着手，走了。

他们走了。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泽曼尼克——背挺着，淡黄色的头仰着（得胜的），身旁是褐发女郎；她——从背后看也很美丽，轻快的步子，可爱极了；我几乎是痛苦地喜欢她，因为她那正在离去的美对我是那样冷漠，正如泽曼尼克一样，正如我整个的过去一样，我来这里是为了替我的过去报仇，可我的过去却从我身边不知不觉地溜走了，对待我就象一个陌生人一样。

这一切耻辱和愧怍使我感到闷气。我只想消失，独自走

^① 意大利语：再见。

开，抹去这桩肮脏的事件，这个愚蠢的玩笑，抹去海伦娜和泽曼尼克，抹去前天、昨天和今天，把这件事彻底抹去，不留下一点痕迹。“我想与海伦娜同志单独谈一谈，你不介意吧？”我问那个强壮的技术员。

我把海伦娜带到一边，可她却抢先告诉我一些话，关于泽曼尼克和他情人的事，为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而混乱不清的道歉；但是我才不在乎哩；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逃开，逃开她和这桩事；把这一切都丢在我后面。我没有权利再继续欺骗海伦娜；她和她对我的尊重是完全无辜的，而我却表现得很可鄙：我把她仅仅当成一个物体，一块我企图（但失败了）朝另一个人投去的石头。想到我的复仇遭到可笑的失败我就感到闷气，我下决心——尽管已迟了，但还没有迟到无可挽回——结束这件事。试图解释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因为告诉她真话会伤害她，而且她也不能理解。我只能强调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再三重复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我不会再和她见面，我不爱她，她应该明白。

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得多：她脸色变得苍白，浑身开始颤抖，不愿相信我的话，也不放我走；我经受了一番小小的折磨才挣脱开她，匆匆逃走了。

14

到处是马匹和饰带，我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后来金德雷走上前，拉起我的手。紧紧握住它，问我出了什么事，哪里不舒服，我让他握住我的手，对他说，没什么，金德雷，真的没什么，我的声音听上去象是另一个人的声音，尖锐而

不自然，然后我开始很快地谈到我们还需要录些什么，我们要录祈祷，我们要录两次采访，我还要录解说词，很诧异我竟能不停地谈论我不可能关心的事，他则沉默地站在我旁边，紧捏着我的手指。

他以前从来没有触碰过我，他太羞怯，可是人人都知道他爱上了我，此刻他正站在我旁边，紧捏着我的手指，而我却在不停地谈着我并不关心的计划，心里只想着卢德维克。可是，说来也奇怪，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我在金德雷眼里象什么样子，经受了这样的震惊之后，我可能显得很丑怪，也许不是这样，毕竟我没有哭，只是有点烦恼……

听着，金德雷，让我单独呆一会儿，我要去写解说词，然后我们立刻就可以把它录下来，他不愿放我走，不断问我出了什么事，但是我摆脱开，径直朝区议会走去，我们在那借了一个房间，我终于单独呆在一个空房间里了，我倒在椅子上，把头搁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我头痛极了。我打开手提包，瞧瞧有没有治头痛的东西，尽管我实在不知道我干吗要费事，我知道我没有药，但我随即想起金德雷总是随身带着一整套备用药品，他的大衣就挂在衣钩上，我在他的口袋里乱翻，我确实找到了一小瓶止痛药，止头痛，牙疼，神经疼和神经炎，虽然它没有说可以治心灵上的痛苦，但至少可以治我的头疼。

我在隔壁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水龙头，把一个装芥末的旧瓶子装满水，服了两片药。两片就够了，可以消除我的头疼，尽管不能解决其它问题，除非我把整瓶药吞下去，大量的药就会有毒，金德雷的瓶子几乎是满的，也许足够了。

这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却不断浮现在脑际，迫使我思考我干吗还活着，继续活下去有什么意义，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事实，我根本没这样想，我几乎什么也没想，我只是试图想象自己已不再活着，突然我感到快乐极了，快乐得奇怪，我差点大笑起来，也许我真的笑了一下。

我又把一片药放在舌头上，我真的没有打算要毒死自己，我只是紧紧握住瓶子，喃喃自语：“我的死握在我自己手中。”我不由地想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就象一步步走向一个深渊，不是跳下去，只是往下看。我把杯子装满水，服下这片药，回到我们的房间，窗户开着，汝等听着，汝等听着，从山岭到溪谷，从近处到远方的声音还在远处某个地方飘荡，不过这声音同小汽车，卡车和那些可怕的摩托车的喧嚣声混杂在一起，它们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所有我一直信任的东西，为之而活着的东西都淹没了。这些喧嚣声叫人难以忍受，这些微弱的声音叫人难以忍受，我关上窗户，又一次感到心灵上那久久持续的疼痛。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巴威尔从来没有象你卢德维克那样伤害过我，一刹那间，我原谅了巴威尔，我理解了他，他的情焰燃烧得很快，他不断地需要新牧场，新听众，他也伤害过我，但此刻借着这个痛苦，我不带怨恨地看待他，象一位母亲那样，是的，他是个爱炫耀的人，一个小丑，我可以嘲笑他这些年想用掉我的企图，好吧，再见吧，还是再见的好，巴威尔，但是卢德维克，我却一点也不理解你，你戴着面具来到我身旁，先是使我复活，然后又把我扔回去，我不能原谅的人是你，我诅咒的人是你，我恳求你回来，回来

吧，行行好。

天哪，也许这只是一场可怕的误会，也许当你们单独在一起时巴威尔对你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问过你，我恳求过你解释你为什么不再爱我，我不愿放你走，我把你拉回来四次，可是你不愿意听，一切都结束了，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完了，结束了，永远结束了，不可挽回，那么，好吧，我终于同意了，我的声音变得尖锐而软弱，象是另一个人在讲话，一个还没进入青春期的姑娘在讲话，我祝你旅途愉快，我用那个尖锐的声音说，真可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你旅途愉快，这句话不断地冒出来，我祝你旅途愉快……

也许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肯定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也许你认为我只是又一个在外面寻求艳遇的已婚妇女，你为什么就不能明白：你是我的命运，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也许你将在这里发现我，被盖着一张白床单准备抬去埋葬，那时你会明白你杀害了一个你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或者，你来了，啊，上帝，我还活着，你仍然能够救我，你将跪在我身边，我抚摸着你的手，你的头发，我会原谅你，原谅你的一切……

15

我的确没有别的办法：我不得不结束这个悲哀的插曲，这个拙劣的玩笑，它不满足于独自存在，可怕地繁衍出愈来愈多的愚蠢的玩笑；我不仅想抹掉这一整天，这实际上纯粹是由于起身迟了，没有赶上火车的偶然所致，而且还想抹掉导致这一天的一切，对海伦娜愚蠢的性征服，现在在我看

来，也是由错误造成的。

我如此慌慌忙忙，就好象听见海伦娜的脚步声就在我后面，我不知道，即使有可能，即使我可以从我的生活中抹去这几天荒废的日子，那又有什么好处，既然我的整个生活经历都是由错误造成的：那个偶然的事件，那个明信片上荒唐拙劣的玩笑？使我恐惧的是，我意识到这些由错误造成的事件与由理智和必然造成的事件完全一样真实。

要能消除我的整个生活经历我将会是多么幸福！可是，当导致我的不幸经历的错误不完全是我的错误时，我有什么力量做到这点呢？事实上，是谁犯了把我的愚蠢玩笑当真的错误？是谁犯了逮捕和处死亚历克夏父亲的错误（尽管早已恢复了名誉，但毕竟还是死了）？这些错误太频繁了，太普遍了，不可能把它们仅仅看作是例外，是事物秩序中的“脱轨”；它们就是事物的秩序。是谁犯下了这些错误？历史本身吗？神圣的、合理的历史吗？为什么要把它们称作是历史的错误？假若历史开玩笑怎么办？一瞬间我意识到，要取消我的玩笑我是多么无力：我自己以及我的一生都被作为一个整体卷进了一个更大的（包罗一切的）、绝对不能撤回的玩笑之中。

朝村子草地望去（现在那里一片寂静，骑马队伍正在村子的另一头巡行），我注意到酒店门旁边支着一个大招牌，上面用红字写着：今天下午四点，一个辛巴隆乐队将在露天饭馆举行音乐会。既然我乘坐的公共汽车差不多还有两小时才会发车，既然该吃点东西了，于是我便走了进去。

一步步走向深渊，俯在栏杆上朝下凝望，真诱人，我但愿这样做能给我带来安慰与和谐，我但愿在下面，假如没有别的地方就在下面，在深渊的底部，我们能找到对方，守在一起，没有误会，没有诽谤，没有老年，没有悲哀，永远守在一起。我回到另一个房间，胃里只有四片药，算不了什么，离深渊还有很长的路程，甚至还没有走到栏杆边。我把剩下的药片倒在手心上。这时我听见走廊上一道门开了，我吓了一跳，把药片塞进嘴里，尽力吞下它们，但药片一下子吞得太多，把我的喉咙擦得很痛，甚至我用水把它们强迫吞下去后我的喉咙还在作痛。

来人是金德雷，他问我解说词写得怎样了，突然我成了另一个人，不再是无依无靠了，不再是尖锐、生硬的嗓音了，我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噢，金德雷，我很高兴你来了，你愿意帮我个忙吗？他的脸上飞起红晕，说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看见我脸色好了一点他很高兴。是的，我现在感觉很好，你能等一会儿吗？我还得写一张便条，于是我坐下来，找到一张纸，写道：最亲爱的卢德维克，我用整个身心爱过你；现在我的肉体 and 灵魂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永别了，我爱你。海伦娜。我甚至没有再读一遍我写的东西，金德雷就坐在我对面，注视着我的每个动作。但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很快地把纸折起来，但找不到一张信封，金德雷，你有没有信封？

没有丝毫迟疑，金德雷走到桌旁的柜子边，把它打开，

开始在里面翻寻，要是在别的时候，我会责备他乱翻别人的东西，可此刻我需要一张信封，要快，他给我的信封上印有区议会的字样，我把信塞进去，封好它，在正面写上卢德维克·扬。金德雷，你还记得刚才与我，与我丈夫和那位姑娘站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的，那个黑皮肤的男人，我得留在这里，我要你去找他；把这封信交给他。

他又拉住我的手，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怎样解释我的激动，对于实际发生的事他不可能有所察觉，他只可能感觉我遇上了某种麻烦，他再次紧紧握住我的手，突然，他弯下身，把我搂在怀里，把他的嘴唇紧紧贴在我的嘴唇上，我试图阻止他，但他紧紧搂住我，接着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是我吻的最后一个男人，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吻，突然我感到不顾一切，我回应他的拥抱，紧紧搂住他，张开嘴唇，感觉他的舌头在我的舌头上，他的手在我的身上，一种绝对自由的眩晕感，一种什么也不再在乎的感觉攫住了我，因为我已被所有的人抛弃，我的世界已经崩溃，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象被我们赶出广播电台的那个姑娘一样自由，她和我的处境相同，我的世界已经粉碎，我永远不可能把它重新拼凑在一起，我不再有任何理由要忠贞，或者说不再有任何人需要我忠贞，我完全自由，正如那个电台的姑娘，那个每夜睡在不同的床上的破鞋，假如我继续活下去，我会干同样的事，我感觉金德雷的舌头在我的嘴里，我是自由的，我知道我可以同他做爱，我想同他做爱，随便在哪里都行，在桌子上或者在光光的地板上，就现在，马上，最后一次做爱，临死之前。这时，金德雷突然匆

匆站起身，骄傲地微笑，说他要走了，马上就会回来。

17

服务员疾速穿过烟雾腾腾、挤满了人的小房间，用一只手托着一个堆满许多菜碟的大盘子，我只来得及瞥见上面有牛肉香肠肉排和土豆沙拉（显然这就是星期天唯一的菜），另一只手为自己开路，穿过人群和五六张桌子，走到过道里。我跟随其后，看见过道尽头有道门开着，走进去是一个花园，那里也有人在吃饭。就在后面，在一棵椴树下，我发现一张空桌；我走过去坐下。

动人的汝等听着，汝等听着的声音仍在村庄的屋顶上飘荡，可是这声音来自很远的地方，当它飘到酒店花园时，听上去几乎就象是虚幻的。这个想象中的幻觉使我感到，我周围的一切都不属于现在，这全是过去的一部分，一个十五年或二十年前的过去，汝等听着，汝等听着，露西，泽曼尼克全属于这个过去的一部分；而海伦娜仅仅是我想朝这个过去扔去的一块石头。这三天不过是一场影子跳舞罢了。

什么？就只有这三天吗？我整个的一生似乎都充满了阴影，目前也并不享有殊荣。我看见一个移动的过道（代表时间）和一个正朝着与移动的过道相反的方向奔跑的男人（代表我）；但过道移动得比我快，因而渐渐载着我离开了我要奔向的目标；这个目标（奇异的目标，位于错误的方向！）是政治审讯的过去，举手表决的礼堂的过去，恐怖的过去，惩戒营和露西的过去，这个过去仍然使我着魔，这个过去我仍然想竭力探求，阐明，这个过去仍然阻碍我象一个正常人那

样去生活，阻碍我朝前着。

并且还有一个我试图用来连接使我如此着迷的过去的结合物，复仇的结合，不幸的是，复仇，如我这几天来所发现的，就象我倒退的跑一样徒劳。是的，那天泽曼尼克在大礼堂里朗诵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时——那才是我应该走到他面前，对准他鼻子猛击一拳的时刻，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才是我复仇的时刻。当复仇被搁置，它就变成了一个幻觉，一个个人的使命，一个逐日撤回它的人物表的神话，这些人物在复仇的神话里依然故我，而在现实中（过道永远不停地向前移动），他们却彻底改变了，今天另一个扬站在另一个泽曼尼克面前，他还欠我的那一击已经无法恢复和重建了，已经永远永远失去了。

当我在盘子里切开那一大块牛肉香肠肉排时，我听见汝等听着，汝等听着的曲调在村子的屋顶上方微弱而悲切地飘荡；我想象着那个戴着面罩的国王和他的扈从，心想，人们的姿态如此难以相互了解，这是多么悲哀啊。

多少世纪以来，年轻人一直都象今天这样从摩拉维亚村子骑马出发，去传达一些奇怪的讯息，怀着使人感动的忠诚详细地解说这些讯息中难以理解的词语。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刻，一群人说了一些重要的话，今天他们又在后代身上复活了，就象又聋又哑的讲演者用优雅和难懂的手势长篇大论地演说一样。他们的讯息永远不会得到阐释，不仅因为没有任何答案，而且因为处在一个新旧讯息大量聚集，它们的声音相互抵销的时代，人们缺乏聆听的耐心。迄今为止，历史不过是还未遗忘的事物的涓涓细流，被引向已被遗忘的事物

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新的时代将会产生，这些时代个人有限的记忆将无法理解；数百年，数千年将因此而湮没，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是悲惨的：人将失去一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历史——深不可测，不可思议——将退缩成一些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成百上千的聋哑骑手将出发去向那些遥远的后代传达它们的信息，而他们中将无人有时间聆听。

我坐在花园饭馆的一个角落里，面对着一个空盘子，一点没意识到已经吃完了东西，沉思着我也（就在这一刻）被卷进了那个巨大的不可避免的遗忘中。服务员走过来，拿起我的盘子，用餐巾拂去桌布上的面包屑。一阵沮丧兜上心头，与其说是因为这一天徒劳无益，不如说是因为连它的徒劳无益都不会保留下来；它将随着这张桌子，我头上嗡嗡叫的苍蝇，散落在桌布上的椴树花的黄色花粉，以及我生活的这个社会目前特有的那种怠惰的服务一道被遗忘；社会自身也将被遗忘，那些缠住我，耗尽我，那些我一直枉费心机企图牢记，纠正，矫正的一切错误和不公平都将被遗忘，因为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不可能被倒转。

是的，我突然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多数人情愿用加倍的虚假信念来欺骗自己；他们相信永恒的记忆（记住人，事，行为，民族），相信纠正（纠正行为，错误，罪行，不公平）。两者都是虚假的。事实搁在天平的另一头：一切都将遗忘，没有什么会被纠正。一切纠正（复仇和宽恕）都将被忘却所接管。没有人会洗雪冤屈；一切冤屈都将被遗忘。

我再次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将

被遗忘：这棵椴树，这些坐在桌旁的人和这家饭馆。饭馆从街上看毫无吸引力，可是在花园里却迷人地长满了攀缘而上的藤蔓。我的目光落在通往过道的门上，刚好记住了正在消失的服务员（负担过度的心脏现在差不多被遗弃了，再一次成了平静的隐藏处），当黑暗刚把他吞没，就出现了一个穿皮甲克、工装裤的小伙子。他走进花园，四下张望；他的目光一落到我身上，就直奔我的方向而来；愣了一愣我才意识到他便是海伦娜的健壮的技术员。

每当一个表露爱而又未被爱的女人威胁说要回击时，我总是觉得很伤脑筋，所以当那个小伙子把信封（“泽曼尼克太太写的”）递给我时，我的第一个冲动是延迟读信。我要他坐下；他坐下了（支着一只肘，心满意足地眯眼望着那棵浸浴在阳光中的椴树）。我将信封搁在桌上，然后说：“喝一点怎么样？”

他耸了耸肩膀；我提议喝伏特加，可他说不，他还得开车，开车前喝酒是严格禁止的；然而他不介意看着，如果我愿意喝的话。我根本不愿意喝，但既然信封就摆在我面前，我又不愿打开它；任何替代物似乎都是受欢迎的。服务员碰巧经过，我要他给我拿一杯伏特加。

“告诉我，海伦娜想要干什么？”我说。

“我怎么知道？”他回答，“请读信吧。”

“是不是紧急事？”我问。

“你以为她要我记住它，以防我遭到袭击吗？”他说。

我拾起信封（上面印有区议会的公函字样）然后又把它放回到桌布上，由于没有什么更好的话可说，只好说道：

“很遗憾，你不与我一道喝一杯。”

“这是为了你本人的安全。”他说。这个暗示很清楚：他想利用我们的私下面谈，讲明这趟旅途的情况以及他与海伦娜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的脸（小而苍白，长满雀斑，有一个短短的翘鼻子）把他内心的想法全都反映了出来；也许使这张脸如此透明的是它那不可救药的幼稚（我说不可救药是因为这张异乎寻常的小脸就连岁月也不能使它变得更加成熟；换句话说，就象一张老年人的娃娃脸）。他幼稚的模样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可怕的祸根，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伪装它（就象——噢，那种无休止的影子跳舞！——那个娃娃指挥官）；靠他的服装（他的皮甲克宽肩合身，做工考究）和他的举止（他很自信，有点粗鲁，只要有可能就尽量显得漠然和冷淡）。不幸的是，他不断暴露出自己：他稍一激动脸就会发红，声音就会变得嘶哑。一见面我就注意到了这点。总之，他不能控制他的面部和身体表情。显然他想向我表示，他一点也不在乎我是否与他们一道去布拉格，可是当我向他保证我将留在后面时，他的两眼顿时明显地发亮了。

当服务员把两杯伏特加放在桌上时，小伙子抬起手说，不，那好吧，他将来一杯。“我不想让你独自喝，”他说，“祝你健康。”他补充说，举起杯子。

“也祝你健康！”我说。我们碰了杯。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得知小伙子打算两小时后动身，因为海伦娜想听一遍他们录的材料，把她的解说词加在必要的地方。这意味着明天就可以播出。我问他与海伦娜一道工

作是什么样子。他的脸红了，说海伦娜熟悉她的业务，可是对她的工作人员却过分严厉；她总是情愿加班加点，似乎没考虑到有些人急着想回家。我问他是不是也急着想回家。不，他说，他过得很好。接着，趁我提起海伦娜这个话题的机会，他漫不经心地问：“你是在哪里认识她的？”我告诉他，他紧接着问：“她的确了不起，是不是？”

我一提到海伦娜，他便愈加想表现出志得意满的神情，我再次把他这种表现归之于他想装装样子的欲望；既然他对海伦娜的极度爱慕无疑已是众所周知的事，那他就得尽力避免给人留下不幸的单相思者的耻辱印象。所以，尽管我完全没有认真地看待他的自信，可这还是减轻了面前这封信的重负，终于我把它拿起来，打开它：“肉体 and 灵魂……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永别了……”

我抬起头来，看见服务员在花园的另一头，于是大喊道：“服务员！”服务员点点头，但是不愿改变他的绕行线路，而是消失在过道里。

“快。一刻也别耽搁。”我告诉小伙子。我站起身，急急忙忙穿过花园；小伙子跟在后面。我们走完过道，正要穿过餐厅，这时服务员追上了我们。

“肉排，汤，两杯伏特加。”我口述道。

“怎么啦？”小伙子怯生生地问。

我把钱付给服务员，要小伙子赶快带我到海伦娜那里去。我们疾步动身了。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有多远？”我反问。

他指了指我们前面的一段路，我立刻跑起来；他也跟着跑起来，我们很快就到了区议会房子。这是一幢平房建筑，刷着白石灰，大门和两扇窗户对着大街。我们径自走进去，来到一间阴沉沉的办公室，在一扇窗户下，配置着两张背靠背的办公桌；收录机打开放在一张桌子上；两旁是一本拍纸簿和一个手提包（是的，是海伦娜的）；两张桌子边都有椅子，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金属帽架。上面挂着两件外衣：海伦娜的蓝雨衣和一件肮脏的男式军用雨衣。

“就是这里。”小伙子说。

“她就在这里把信交给你的吗？”

“是的。”

至少在此刻，办公室里显得绝望的空。“海伦娜。”我喊叫；我的声音听上去如此焦急和忧惧。这使我颇为惊愕。没有任何回答。“海伦娜。”我又喊道。

“你认为她是……”

“看来象是这样。”我说。

“信上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我说，“他们给了你们其它房间没有？”

“没有。”他说。

“会不会在旅馆？”

“今天早晨我们就结了帐。”

“那她应该在这里。”我说，于是他也开始用焦急、嘶哑的声音喊叫：“海伦娜！”

我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另一个办公室：办公桌，字纸篓，三把椅子，橱柜，帽架（这个帽架与第一间办公室的帽

架一样：一根金属棒竖在三脚腿上，顶端伸出去三根金属支架；因为上面没挂有衣服，它看上去象个人，象个孤儿；它的金属裸体和滑稽地抬起的手臂使我充满了焦虑）；除了桌子下方有一扇窗户外，墙壁上空荡荡的；没有别的门通出去；这两间办公室显然是这幢房子唯一的房间。

我们回到第一间房子；我拿起拍纸簿，翻看它；我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描述“国王们的骑马”的仓促潦草的记录（根据我能辨认出的几个短语判断），没有进一步的临别赠言。我打开手提包：手帕、皮夹子、口红、带镜的小粉盒、两只零散香烟、打火机；没有装药片或药剂的瓶子。我拚命思索海伦娜会干什么，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毒药；但如果毒药是答案，那么就应该有瓶子。我走到帽架跟前，翻寻她的雨衣口袋：它们是空的。

“阁楼上呢？”小伙子不耐烦地说，显然他已得出结论，尽管我对房间的搜索才开始，但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奔到门厅，看见有两道门：一道门有一块毛玻璃，可以依稀看见后院；我们打开另一道门，发现一个不祥的楼梯；石梯上铺了一层灰尘和煤灰。我们奔上楼梯，立刻就没人了黑暗：唯一的光线，阴郁、灰暗，来自天窗（天窗玻璃布满灰尘）。我们只能看清各种零星什物的轮廓（盒子，园艺工具，锄头，铁锹，耙子，大堆挫刀，一把拆散的旧椅子）；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被绊一下。

我想喊叫“海伦娜！”可是非常害怕，害怕接着而来的沉默。小伙子也没有喊叫。我们把这个地方翻了个底朝天，一声不响地搜寻每一个角落，可是我能感觉到我俩都很焦虑不

安。事实上，正是我们的沉默使得这一切如此可怕；它表示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承认我们已不再期望得到回答，我们只是在寻找一具尸体，吊着的或是俯卧的。

我们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我们又回到办公室。我再次搜寻房间里的一切：办公桌，椅子，炫耀着海伦娜雨衣的那个帽架；然后我到另一个房间：办公桌，椅子，橱柜，另一个帽架，它的臂绝望地伸出去。小伙子喊道（毫无缘由）“海伦娜！”而我（毫无缘由）打开橱柜，露出一架架的卷宗，文具用品，粘胶纸，尺子。

“一定还有别的地方！”我说，“盥洗室！或地下室！”我们再次走到门厅；小伙子打开通向院子的门。院坝很小，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兔箱；院坝的另一边有一个果园，一些果树点缀着未修剪的草坪（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注意到这个果园是多么漂亮：绿色的树枝间露出斑驳的蓝天，树桩屈曲不齐，黄灿灿的向阳花在树桩周围闪烁）；接着在果园的尽头，在一棵苹果树诗一般的树荫下，我看见一间木板的乡下户外厕所。我立即朝它跑去。

用一根大钉子钉在狭窄的门框上的旋转木门闩（把门闩转到水平位置上可以使门从外面关上）笔直地竖着。我把手指伸进门框和门之间的缝隙里，轻轻地揪了一下，判断出门从里面闩上了；这只能意味着：海伦娜在里面。“海伦娜，海伦娜。”我小声地喊叫。没有任何回答，只有苹果树枝触碰到小木屋的木板墙上发出的瑟瑟声。

反闩上的厕所里静得叫我想到了最坏的方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门撞开，而做这件事的只能是我。我把手指伸进门框

和门之间的缝隙，使劲一推。这门不是被钩扣住，而是象乡间常见的那样，只是被一根细绳拴住，所以立刻就大打开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在恶臭的厕所里，木制的座位上，坐着海伦娜。她面色苍白，但还活着。她惊骇地抬眼望着我，本能地使劲拉裙子，但尽管她用了最大的力，也未能把裙子拉到大腿中部，她双手抓住裙边，两腿紧紧夹拢。“我的天哪，出去！”她痛苦地叫着。

“怎么啦？”我冲她喊道，“你服了什么？”

“出去！别管我！”

这时，那小伙子出现在我背后，海伦娜叫道，“走开，金德雷！走开！”她拾起身，伸手去关门，可是我横在她和门之间，使得她踉跄地后退，一屁股又坐在木制座位的圆孔上。

她立刻重新跳起身，绝望地向我猛扑过来（只有绝望才能使她产生这种力量，因为在她刚经历了那一切后，她只剩下了一点力气）。她用双手抓住我的短上衣的翻领，用尽全力猛推我；我们两人最后扭斗到门槛上。“你这个畜生，你！你这个畜生！”她尖叫着（如果她那衰弱声音的狂嘶可以称为尖叫的话），拚命摇我；接着，突然间，她松开手，开始穿过草坪，朝院子的方向跑去。她打算逃走，可是没有成功：她慌忙仓促地离开厕所，还没来得及整理好她的穿着，她的裤衩（昨天我就知道了那条短裤，那条还可用作吊袜带带子的松紧短裤）仍缠在她的膝盖上，妨碍她前进（她的外衣也掉了下来，她的丝袜沿小腿褶起，从裙子下面可以看见袜子的黑色上边，以及系在袜子上的吊袜带）；她迈了几小步，或者说是跳了几下（她穿着高跟鞋），可是还不到十步就跌

倒了(跌倒在洒满阳光的草上,一棵树的树枝下,一棵高大、炫丽的向日葵旁边);我拉住她的手臂,想帮她站起来;她甩开我,当我再次向她弯下身去时,她开始发狂地捶打,我挨了好几下才抓住她把她拉起来,象紧身衣一样用手箍住她。“畜生,畜生,畜生,畜生!”她恶毒地嘘声咒骂,用空着的手在我背上连续捶打,当我尽量柔声地说:“镇静点,海伦娜”时,她朝我的脸上啐口水。

我没有松手,说:“我不会放走你,除非你告诉我你服了什么。”

“滚开,滚开,滚开!”她发狂地重复道,突然她安静下来,停止了一切反抗,然后说:“让我走。”声音与刚才完全不同,虚弱而疲乏,我松开了手;使我大为惊恐的是,我看见她的脸极度痛苦地痉挛着,她的上下颚紧紧闭住,她的眼睛呆呆地凝视着空间,她的身躯微微向前倾斜。

“怎么啦?”我问;她一声不吭地转过身,朝厕所走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走路的姿势,她被羁绊的脚缓慢、踉跄的步子;只有几码远的路,可她不止一次地被迫停下来,这期间,我意识到(从她身体抽搐的样子判断)她正在与她受了伤害的内脏进行一场战斗;她终于走到厕所,抓住门(门仍然大开着),然后进去把门关上。

好一会儿,我呆呆地站在我把她从地上拉起来的那个地方,突然从厕所传来一声痛苦的大声呻吟,我后退了一两步。这时我才意识到那小伙子还在这里。“你留在原地。”我告诉他,“我去找医生。”

我跑进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电话机,它就搁在最近的那

张办公桌上。我找了半天电话簿；一本也看不到；我想拉开放电话机的那张桌子的中间抽屉，但抽屉被锁上了，两边的抽屉也都上了锁；另一张桌子的抽屉也是锁上的。我走进隔壁房间，那里的办公桌只有一个抽屉，尽管没有上锁，但里面除了几张照片和一把裁纸刀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且开始感到困乏（既然我知道海伦娜还活着，不会有致命危险）；在屋子中间站了一会儿，发愣地盯着帽架（瘦骨嶙峋的金属帽架举着它的手，象一个士兵准备投降）。然后我打开橱柜（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事可做）；在一摞宗卷上是青绿色封面的布尔诺及周围地区的电话簿；我把它拿到电话机旁，找到医院的号码。我拨了号码，听到最初的几声讯号，这时小伙子冲进了房间。

“不用费事打电话了！这件事全过去了！”他对我叫道。

我没有明白过来。

他走上前，从我手中夺下听筒，把它放回去。“这件事全过去了，我告诉你！”

我要他解释他这话的意思。

“根本不是毒药！”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帽架前；他把手伸进那件男式军用雨衣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打开它，倒过来；瓶子是空的。

“你是说她服用的就是这个？”我问。

他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

“她告诉了我。”

“这是你的？”

他点点头。我从他手中拿过瓶子。标签上写着“止痛药”。

“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大剂量的止痛药可能有害吗？”我冲他叫道。

“里面没有任何止痛药。”他说。

“那么里面是什么？”

“轻泻剂。”他锐声说。

见他的鬼：在这样的时候他竟敢拿我开玩笑；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再也不能忍受他的傲慢；我需要个直截了当的回答。

由于我提高了嗓门，他也把嗓门提高：“瞧，我已告诉你瓶里装的是轻泻药。难道人人都得要知道我的肠子是乱糟糟的吗？”于是我明白了，我认为是一个愚蠢玩笑的，实际上是事实。

望着他，望着他通红的脸，他的狮子鼻（大得正好能容纳下众多的雀斑），我完全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阿斯坦林瓶子是为了掩饰他那荒唐可笑的肠胃失调，正如工装裤和皮甲克是为了掩饰他那荒唐可笑的娃娃脸一样；他为自己和拖在他身后无休无止的青春期的青春而感到羞愧；正是在这时我喜欢上了他，他的羞怯感（那种青春期的贵族气）救了海伦娜的命，使我免却了许多不眠之夜。我带着一种惶惑的感激之情盯着他那突出的耳朵。是的，他救了海伦娜的命；但却使她付出了几乎难以忍受的羞辱代价；这是显而易见的，就象这羞辱不会适合任何目的，毫无意义，显得完全不公平的事实一样明显；可它也是一连串不可改正的链环中又一个不可改正的链环；我知道我有罪，感到一种迫切（尽管模糊）

的愿望，要跑到她身边去，跑去把她从她的羞辱中拔出来，在她的面前表示卑下和谦卑，对这场毫无意义的残忍事件承担一切指责和责任。

“你干吗这样看着我？”小伙子咆哮道。我从他身旁走过，没有睬他，进入门厅，转身朝后门的方向走去。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他问我，从后面抓住我短上衣的肩，想把我拉回去；我们四目对视了片刻；然后我抓住他的手腕，将他的手从我肩上挪开。他走过我身旁，站到门前。我朝他走去，打算把挡道的他推开，他闪身朝我胸膛击了一拳。

这一拳软弱无力，可是他跳开去，接着又跳回来，幼稚地模仿着拳击手的姿势。他的神情混杂着恐惧和鲁莽的勇气。

“她一点也不需要你！”他冲我叫嚷。我纹丝不动。忽然我想到他也许是对的：我无能改正不可改正的事。见我站在那里毫无防御的意思，他朝前迈了一步，嚷道：“她受不了你的厚颜无耻！她才不在乎你他妈的会怎么样哩！她对我说了！她才不在乎哩！”

神经紧张可以使一个人哭，也可以使一个人笑；小伙子最后几句话的实在感使我的嘴角开始抽动。这使他怒不可遏；这次他从正面朝我扑来，我设法躲开了连续的袭击。接着他再一次跳开去，象拳击手一样举起他的拳头，可这次拳头遮住了他的脸，只看得见拳头后面那对特大的粉红色耳朵。

“够了。”我说，“我这就走。”

“胆小鬼！”他在我后面喊道，“懦夫！我知道是你搞的鬼！我饶不了你，你这个杂种！”

我来到街上。街上冷冷清清，通常游行或节日之后的街

上才可能是这样：一丝微风卷起灰尘，沿着平地把它挟带走，没有一个人，就象我头脑里没有任何思想一样……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我手里还拿着那个空瓶子；我瞧着它；它已经完全用旧了；显然它长期被作为那个小伙子轻泻剂的伪装。

这瓶子使我想起另外两个瓶子，那两个装有亚历克夏的巴比妥酸盐；它们使我意识到这小伙子实际上并没有救海伦娜的命；即使瓶子里是止痛药，那也不过是使她肠胃不适罢了，尤其我和这个小伙子就近在咫尺；在离死亡门槛相当安全的距离处，海伦娜的绝望跟生命了清了帐。

18

她正站在厨房里的火炉旁，背对着我。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弗拉吉米尔呢？”她身也不转地回答：“你自己看见了他。干吗还问？”“你在撒谎，”我说，“今天早晨，弗拉吉米尔坐在小库茨基的摩托车后面走掉了。我正是来告诉你，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你早上为什么如此看重那愚蠢的女记者。我知道为什么不许我进去看给国王穿衣。我知道国王为什么甚至在骑马开始前就保持沉默。你们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我的振振有辞使她愣了片刻，但她很快就回过神来，试图以攻为守。这是一场古怪的进攻。古怪是因为两个对手并没有面对面站着。她背对着我，而她的鼻子却对着咕咕作响的汤。她没有抬高嗓门。她的声音差不多是冷漠的。仿佛在说，她告诉我的事是其他所有人多年来已知道的事，只因为我如此愚钝，又持有如此荒唐的观点，她才不得不对我做解

释。如果我需要的就是这个，那好。弗拉吉米尔从来就不想当国王，从一开始就不想当。乌娜斯塔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有一个时期，小伙子们自己就可以组织整个骑马活动。而现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在这件事中都要插一手，甚至包括党的区委。人们再也不能独自动一下指头。一切都是由上面操办。小伙子们本来挑选了他们自己的国王。可上面却把弗拉吉米尔推荐给他们，好让他的父亲满意，他们不得不赞同。然而弗拉吉米尔却对由于父亲的缘故而被挑选出来感到羞耻。没有人喜欢那些倚仗权势的人。

“你是说弗拉吉米尔为我感到羞耻？”“他不想倚仗你的权势。”她重复道。“这就是他所以如此接近库茨基家的原因吗？那些低能儿？那些小资产阶级？”我问。“正是如此。”乌娜斯塔说，“米沃什由于他爷爷的缘故不能上大学。只因为他爷爷曾拥有一个建筑公司。弗拉吉米尔却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因为你是他父亲。这对他是很难堪的。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生平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他们欺骗了我。整个期间他们一直在冷冷地观察我变得愈来愈激动。瞧着我把自己搞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傻瓜。他们先是冷冷地欺骗我，然后又冷冷地打量我，“难道你们真的必须这样欺骗我吗？”

乌娜斯塔把盐撒在面条里，然后说，“我总是把事情变得很复杂。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一个梦想家。他们不想剥夺我的理想，可是弗拉吉米尔却不一样。他不喜欢我的唱歌和高喊。这使他厌烦，厌烦得想哭。我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弗拉吉米尔具有现代观念。他象她的父亲。那是一个知道什么是进步的人。在村子里他第一个有了拖拉机。那是在

战前。后来他们夺走了他的一切。自从田地归入合作社后，它们的产量就只有从前的一半了。

“我对你们的田地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弗拉吉米尔去哪儿了。他到布尔诺看摩托车比赛去了。承认吧。”

她背朝我站着，一边说话一边搅动面条。弗拉吉米尔长得就象他的外祖父。他有他的下巴和眼睛。不管怎样，弗拉吉米尔不关心“国王们的骑马”。是的，如果我真想知道的话，他是看比赛去了。他此刻正在观看比赛。那又怎么样呢？他感兴趣的是摩托车而不是那些用饰带蒙住眼睛的老马。为什么不行呢？弗拉吉米尔是现代人，当代人。

摩托车，六弦琴，摩托车，六弦琴。一个愚蠢的，格格不入的世界。“现代人和当代人是什么意思？”我问。

她背对我站着，搅动着面条，回答说，我甚至不让她把我们的住房现代化。为买一个现代落地灯我都要大惊小怪！我也不喜欢现代的灯光装置。大家都认为落地灯很漂亮。如今人们要买的正是这种灯。

“够了。”我对她说。但无法阻止她。她已经变得非常兴奋。她的背对着我。她那小小的，恶意的，瘦棱棱的背。正是这个给我印象最深。这个背。这个没有眼睛的背。这个洋洋自得，自鸣得意，象砖墙一样的背。我想叫她住口。把她扳过来面对我。可是我觉得她如此可憎，我甚至不想触碰她。我决定用别的方式使她转过来。我打开橱柜，取出一个盘子，把它摔在地上。她的话只说了一半就停下来。但是她并没有转过身。又一个盘子，接二连三的盘子。她仍然背对着我。朝前弯着身子。我从她的背看出她害怕了。是的，她害怕

了，可她却更加固执。她不愿意让步。她不再搅动面条，而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手中紧紧握住木勺，紧握住它仿佛它可以救她似的。我恨她，而她也恨我。她没有动弹，我的眼光也没有离开她。我只是不停地把橱柜架上的东西一个又一个地扔在地上。我恨她，我恨她的整个厨房。她的现代式的厨房，以及这些现代橱柜，现代盘子，现代杯子。

我没有感到不安。看到满地破碎的瓷器，散乱的坛坛罐罐，我只是显得平静，悲伤和疲乏不堪。我把整个家都摔在地上了。我曾爱过这个家，并把它视为一个庇护所。我曾在这个家忍受过穷人女儿温柔的支配。我曾使这个家充满了民间故事，歌声和愉快。就在这些椅子上我们曾坐着吃饭。啊，这些平静的家宴每日每天目睹了那位易上当的养家糊口者被蒙蔽，被欺骗。我拾起一张又一张的椅子，把它们腿折断。我把它们摔在罐子和破碎的瓷器旁的地板上。然后我把厨房桌子掀翻在那些东西上面。乌娜斯塔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炉子旁，背对着我。

我走出厨房，进到我的房间。房间天花板上有一个红色球形灯罩，有一个现代式落地灯，和一个难看的现代式床。我的小提琴放在黑盒子里，搁在簧风琴上。我把它拿起来。四点钟我们要在露天饭店举行一场音乐会。现在才一点钟。我可以到哪儿去呢？

我听见厨房里的啜泣声。乌娜斯塔正在哭。她的啜泣凄凄切切，我心中隐隐感到一丝后悔。为什么十分钟 前她不哭？那样也许我还能真的使自己再次相信这个古老的穷人女儿的幻觉。然而现在已经太迟了。

我离开了家。祈求声还在村子屋顶上空飘荡。我们有一个贫穷而正直的国王。我可以到哪儿去呢？街道属于“国王们的骑马”，家属于乌娜斯塔，酒店属于醉鬼。我属于哪里呢？一个已过壮年而被抛弃的国王。一个贫穷而诚实的国王。一个没有继承人的国王。最后一个国王。

幸运的是，村子外面有一些田野。一条道路。十分钟就到了摩拉瓦河。我躺在河岸上。我把小提琴盒子垫在头下。我在那里躺了很久。一小时，也许是两小时。思索着我是怎样来到这条道路的尽头。日复一日，突然之间，到了。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总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相信它们的彼此和谐。这是一个错觉。此刻我已被逐出其中的一个世界。真实的世界。现在只有那个虚构的世界留给我。然而我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即使他们期望我在那里。即使那个逃兵在召唤我，为我准备好了一匹马和一个红面罩。是的，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准我揭下我的面罩，并且坚持要由他告诉我一切！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国王的脸必须蒙上面罩！不是为了防止他被人看见，而是为了防止他看！

我不能想象自己站起来走路。我不能想象自己迈出一步。他们在期待我四点钟去。可是我没有力气站起身到那里去。我喜欢这里。靠着河边。这里河水静静地流着，从远古以来就如此。河水静静地流着，我愿静静地躺在这里，在这里躺很久，很久。

后来有人叫我的名字。是卢德维克。我预料到又一个打击。并不是我害怕。现在已没有什么能使我震动的了。

他在我身旁坐下 问我去不去参加下午的演出。“你不至于说你打算去吧。”我说。“我要去。”他说。“你来就是为了这个？”“不。”他说，“我不是为这个而来。但事物总是与我们预料的不同。”“是的。”我说，“是很不同。”“我在田野里漫步了一小时。我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现你。”“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现你。”“我想请你帮个忙。”他说，没有看着我的眼睛。就象乌娜斯塔一样。他不能看着我的眼睛。但是我不在乎他这样。我觉得他这样反而使人感到安慰。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冷漠。这种冷漠使我感到温暖和慰藉。“我想请你帮个忙。”他说，“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让我参加今天下午的演奏。”

19

还有几小时下班车才会发车，在内心的驱使下，我悄悄离开村子，来到田野，尽量想把这一天所有的思想从头脑里逐出。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能感觉到那小伙子的拳头揍在我嘴唇上的那块地方正在肿胀，露西的影子再次出来提醒我，我为自己报仇雪冤的一切努力反而导致我伤害了别人。我试图把这个想法从我脑子里完全逐出去：这件事我想了许多遍才把它理解透彻；我极力使自己的头脑成为一片空白，只容纳骑手们的呼喊（现在几乎听不见了），让这些呼喊把我带出自己，带出我尴尬的生活经历，提供一点解脱。

我取道那些环绕村庄的小路，最后来到了摩拉瓦河岸，顺流而行；在河对岸前景处有几只鹅，后景处是一片林地，两处之间只有田野。接着我看见一个人躺在前面的草丛里。走近后，我认出是谁了：他仰天躺着，凝视着天空，把他的

小提琴盒子当作枕头（四处都是田野，平坦而疏远，仿佛它们已存在了许多世纪，只有几个新修的铁塔和高压线破坏了这个格局）。从他面前通过是很容易的事：他被天空深深吸引住了，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但这次我不想回避他；我极力回避的是我自己，我自己和我那些固执的思想；于是我走向他，叫他的名字。他抬起头来，那眼里的胆怯和恐惧使我震动，我注意到（许多年来我是第一次就近看他）曾经使他已经很高的个子又增加了一两吋的浓密头发，现在只剩下了稀稀拉拉的几根；除了几缕可怜兮兮的头发，他的头顶已经秃了；那些不见的头发使我想起我已多年没见他了，我突然感到后悔，这么长时间没有同他联系，一直在回避他（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骑手们的呼喊），我对他产生了一种负疚的爱。他躺在我面前，支着一只肘，显得又大又笨，而他的小提琴盒子却显得又小又黑，象一个婴儿的棺材。我知道他的乐队（曾经也是我的乐队）将在下午演出，于是我问他是否可以加入他们。

我不假思索就提出了这个请求（言语似乎先于思想）；但尽管这个请求很轻率，却与我此时的心境相符合；此刻，我对遗失在多年前的一个世界充满了悲哀的爱的感情，这是一个遥远而古老的世界，在那里骑手们偕同他们戴面罩的国王绕村庄行进，在那里人们穿着白色的百褶裙在街上唱歌，这个世界使我和我的家，我的母亲（我被绑架的母亲），我的青春的意象融合在一起；一整天，爱一直在我内心默默地生长，现在它突然爆发出来，险些化作眼泪；我爱那个失去的世界，恳求它给我提供避难所。

但是凭什么呢？就在前天我不是还不睬雅罗斯拉夫，因为在我心目中他体现了可恨的民间音乐吗？就在今天早晨我不是还怀着厌恶指责过民间节日吗？是什么突然之间推倒了那些障碍，那些十五年来阻止我品味我在辛巴隆乐队度过的青春的回忆，阻止我经常愉快地回家的障碍呢？难道是因为几小时前泽曼尼克讥笑过“国王们的骑马”的缘故吗？难道是他给我灌输了对民歌的厌恶而现在又是他清洗了我的厌恶感吗？我真的只是罗盘的指针，而他却是天箭座星座吗？我真的是如此不光彩地依靠他吗？不，使我能恢复对民俗、民歌和辛巴隆乐队这个世界热爱的不仅是因为泽曼尼克的嘲笑；我能重新爱它的主要原因是，今天早晨我出乎意料地发现它坍塌了；不仅坍塌了，而且被遗弃了；被夸夸其谈和大叫大嚷抛弃了，被政治宣传和社会乌托邦抛弃了，被一群群文化官员和我同时代人的虚假热情抛弃了，甚至被泽曼尼克抛弃了；正是这种被遗弃的状态使这个世界纯净了；它清洗了这个世界，就象一个即将断气的躯体受到清洗一样；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最后的美照亮了这个世界；这个被遗弃的状态已把它还给了我。

演出定在露天饭馆举行，不久前我就在那里吃过中饭，读过海伦娜的便条；当我和雅罗斯拉夫到达那里时，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已坐在桌旁（耐心地等待音乐会开始），还有几个数目约等的醉鬼摇摇晃晃地在桌子中间穿来穿去；在后面那棵亭亭冠盖的椴树下摆了几张椅子，一把包裹着灰色帆布的低音提琴靠着树桩；一个身穿白色打褶衬衣的男人正在默默地用木槌敲着辛巴隆琴弦；其余的乐手站在附近，雅罗斯

拉夫把他们介绍给我：第二小提琴手是本地医院的医生；低音提琴手是区议会管文化事务的视察员；单簧管手（他同意把他的乐器借给我，跟我轮流演奏）是小学教师；辛巴隆琴手是工厂的经济计划员。他是我唯一还记得的人：除了他和雅罗斯拉夫，乐队里全是新人。雅罗斯拉夫非常有礼节地把我介绍给听众，说我是乐队的一名老战士，创建乐队的成员之一，今天是荣誉单簧管手，于是我们在树下就坐，开始演奏。

虽然我的手已经多年没握过单簧管，但我们开始演奏的这首歌正是我从前最喜爱的一首，尤其是在其他人对我啧啧赞叹，不相信我已多年没演奏过之后，我很快就克服了最初的怯场：这时，那个服务员（正是几小时前我匆匆忙忙把钱付给他的那一个）拖来一张小桌，把它放在树下，为我们摆了一坛酒和六个杯子；我们不时呷上一口。奏完几首歌后，我朝那位教师点点头，他接过单簧管，再次告诉我他认为我演奏得太好了；我非常高兴，靠着树桩，观看乐队继续演奏，一种早已忘却的友谊感直透我的周身，在这个可怖的一天结束之际，我感谢它那令人安慰的出现。突然，露西浮现在我面前，我想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先是出现在理发店，然后又出现在科斯特卡的故事里，他那真实和虚构混合的故事里：这是因为她想告诉我她的命运（一个被强奸者的命运）与我的命运非常相似；尽管我们没能相互理解，失去了对方，但我们的生活经历却是不可分的，缠绕在一起的，相同的，因为二者都是备受蹂躏的经历；正如露西遭到了性爱的蹂躏，从而被剥夺了生活中最基本的价值，我也同样被剥夺了我最初想以此而生活的那些价值，那些最初纯洁而清白的价

值：是的，清白：性爱，尽管对露西来说可能是备受蹂躏的，但仍然是清白无辜的，正如我们地区的民歌以及演奏它们的这个乐队是清白无辜的一样，这个地区本身，尽管我开始渐渐恨它，伏契克，尽管我不能忍受他的画像，“同志”这个词，虽然我总觉得它含有威胁，还有“未来”这个词，以及许多其它词，都是清白无辜的。这个过失在别处，它如此之大，以致它的阴影笼罩了一大片广阔的区域，笼罩了清白事物（以及清白词汇）的世界，正在蹂躏它们。我们，露西和我，生活在一个备受蹂躏的世界里；由于我们缺乏同情那些遭到蹂躏的东西的能力，我们便转过身去不睬它们，在此过程中既伤害了它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露西，我的露西，我爱得如此深而又如此拙劣的露西，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就是为此而来的吗？来为一个被蹂躏的世界辩护的吗？

当歌曲又结束时，那位教师把单簧管递给我，说他今天就到此为止，我吹奏得比他好，我应该尽可能多吹一会儿，因为谁知道我什么时候再会回来。为了引起雅罗斯拉夫的关注，我说我会很高兴尽快找一个机会回来看望他们。雅罗斯拉夫问我是不是说的真话。绝对是真话，我说，于是我们开始演奏下一首歌曲。雅罗斯拉夫早已丢开他的椅子，头朝后倾，小提琴——违反所有规则——靠在他的胸脯上，一边演奏一边走来走去；我和第二小提琴手也不时站起来，尤其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发挥我们的即兴演奏时。在这极度冒险的时刻，当我们的创造性、精确性，以及对乐队的感情经受考验时，雅罗斯拉夫成了我们大家的主心骨，我对这位隐藏在巨人般的躯体内令人着迷的乐手充满了赞美之情。雅罗

斯拉夫也（实际上比别人更加）代表了我生活中遭到蹂躏的价值；他曾经从我这里被夺走，而我（在我是极大的损害和耻辱）却把他放走了；我最忠实，最正直，最清白的朋友。

这期间，听众中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一开始就带着热情倾听我们演奏的人只占了一半座位，另一半空座位大都被一群年轻人（也许是来自村里，更可能是来自城里）占据了，他们要了啤酒和白酒（大呼小叫），很快，当酒精一产生作用，他们就控制不住地急欲被人看见，被人听见，被人认出。结果，气氛完全改变了，变得更加喧闹，更加紧张（小伙子们摇摇晃晃地在桌子中间穿来穿去，互相喊叫，对他们的女朋友喊叫）；我突然意识到我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上，而是一直斜视着桌子，怀着公开的敌意观察那些青春的面孔。瞧着这些长发的小家伙唾沫横飞，满嘴胡言，大肆炫耀，我突然觉得我对那个不成熟的最后堡垒的旧恨又复活了，我看见自己周围是一伙三流演员，戴着愚钝的男人气和傲慢的残忍的面具；尽管这些面具掩盖了其它更具人性的脸孔，但我并没有从这个想法中得到多少安慰，因为真正的恐惧在于，这些戴面具的脸孔是那样狂热地忠于面具的残酷和粗俗。

显然雅罗斯拉夫也和我情绪相同，因为他突然放下小提琴，说我不想为新来的听众演奏了。他建议我们离开，取道一条穿过田野的小径，就象我们很久以前常做的那样；这是一个晴朗的天，夕阳很快就将落下，但夜晚将很温暖，星星将会出来，我们可以奔向某一处野玫瑰丛，只为我们自己演奏，为我们自己的欣赏演奏，就象我们以前常做的那样；

我们已经养成了只在预定的场合演奏的习惯(愚蠢的习惯)，他对这一切已经受够了。

起初大家都表示赞同，几乎显得如释重负：他们也觉得他们对民间音乐的激情应该有一个更加亲切的环境。但这时那位低音提琴手（文化事务的视察员）指出，我们已答应要演奏到九点；区议会的同志们期待着我们，饭馆的经理也期待着我们；事情已经这样安排了；我们得履行我们的职责；否则，节日的整个安排都会塌掉；我们可以在别的时候去田野里演奏。

正在这时，连在一棵棵树上的电线上的灯突然间一齐亮了；由于天还没有黑，甚至还没到黄昏，这些灯一点也没发出光，只是象大颗冻结的泪珠，不愿被拭去，可也不会落下的苍白色的泪珠，挂在逐渐暗淡下来的场所里；它们突然给人带来一种说不出的忧郁，这忧郁似乎无人能抗拒。雅罗斯拉夫再次请求我们（几乎是央求我们）不要再演奏了，漫步到田野中，去到野玫瑰丛那里，去为它们的欢乐演奏，但突然他做了一个听天由命的手势，把小提琴重新靠在他的胸膛，开始演奏起来。

这次，我们没让自己的注意力被听众分散，而是更加聚精会神地演奏；周围的环境变得愈冷淡、愈粗野，我们就愈感到象是一个荒岛，愈变得是在为自己演奏，到最后我们设法忘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创造出一系列神奇的音乐；就象在海底的一间玻璃屋里与那些醉鬼隔开。

“即使高山是纸和墨水，即使星星是书记，即使整个世界都帮助他们思索，他们也不能起草我情人的真正遗嘱。”雅罗

斯拉夫唱道，没有把小提琴从胸脯上拿开，我在这些歌曲里（在歌曲玻璃屋里）感到愉快，在这里悲伤不是调侃，笑声不是嘲弄，爱情不是可笑，仇恨不是羞怯，在这里人们用他们的整个肉体 and 灵魂去爱（是的，露西，肉体 and 灵魂），在这里人们因欢乐而跳舞，因绝望而跳进多瑙河，在这里爱情仍然是爱情，痛苦仍然是痛苦，价值摆脱了蹂躏；在这些歌曲里，我感到自由自在，我感到我源于它们，它们的世界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迹，这是我的家，如果我曾经背叛过它，我只是由此使得它更加成为我自己的（因为还有什么声音比我们曾伤害过的家的声音更哀怨的呢？）；然而我也同样意识到，我的家不属于这个世界（尽管如果它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它是什么样的家呢？）我们所唱所奏的一切仅仅是一个回忆，一个纪念物，一个对某种不复存在的东西的形象上的再创造，我感到故乡的坚实的土地正在我脚下沉没下去，感到我自己正在陷落，手中拿着单簧管，陷落到已往岁月和世纪的深渊，深不可测的深渊（在那里爱情就是爱情，痛苦就是痛苦），我惊异地对自己说，我唯一真正的家就是这降落，这彻底的、急切的陷落，我沉溺于它，品味着这种感觉上的眩晕。

我朝雅罗斯拉夫望去，想看看是否只有我一人处在极度亢奋中，我注意到（他的脸被挂在椴树上的一盏灯笼照亮）他的脸色十分苍白；我注意到他已停止唱歌，把嘴唇紧紧咬住；他忧虑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恐惧的神情；他开始拉错音符；他握小提琴的那只手在慢慢往下滑。突然，他停止演奏，一屁股倒在椅子上。“怎么啦？”我问，在他身旁跪下，汗水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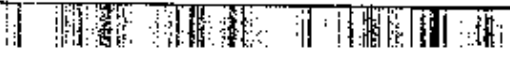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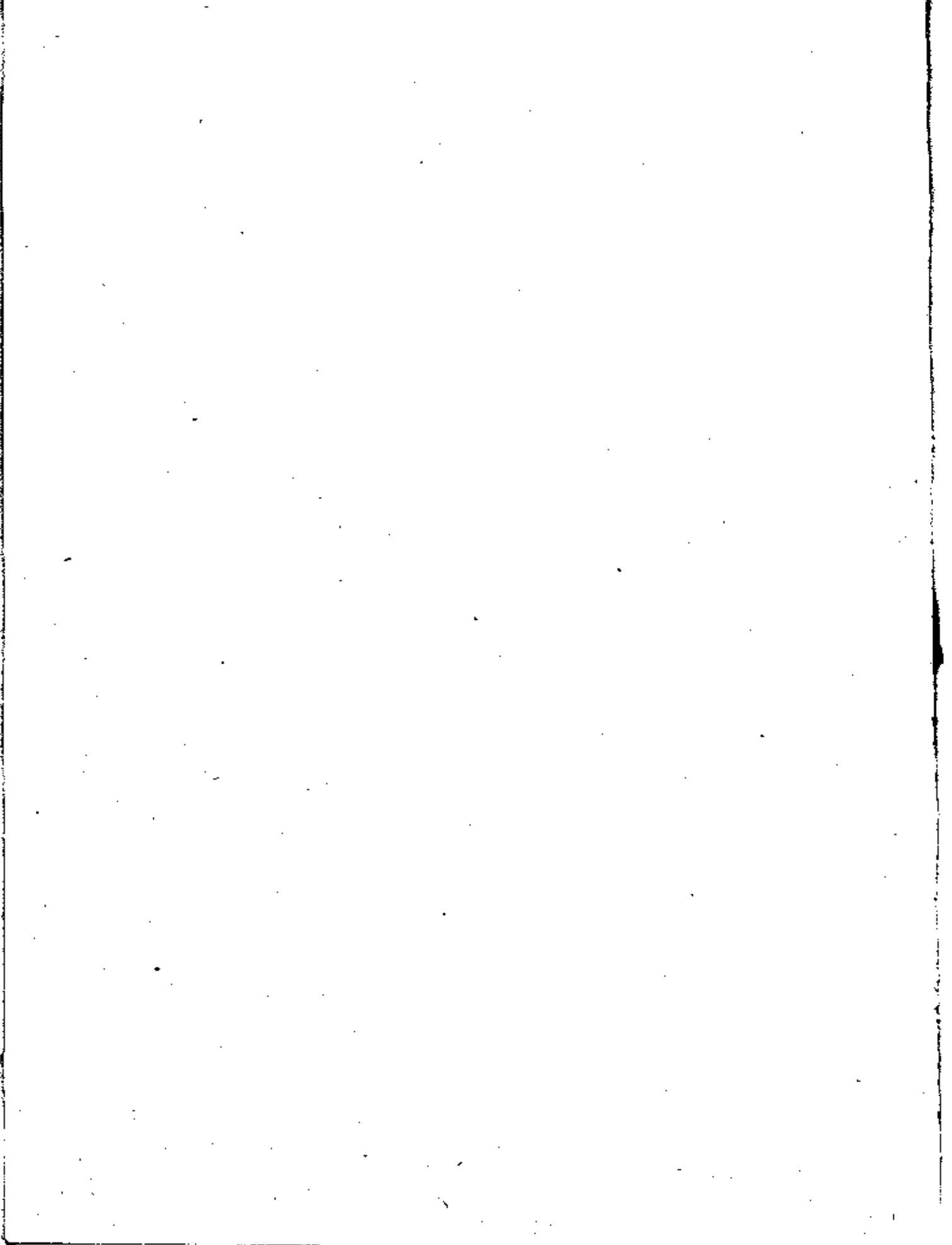
他脸上淌下来，他把左手臂抬到肩膀高。“痛得要命。”他说。其他的人仍然沉浸在音乐的魅力中，辛巴隆琴手本能地趁单簧管和首席小提琴退出的机会，开始独奏起来，只有第二小提琴和低音提琴在伴奏。但是我立刻走到第二小提琴手身边（我记得雅罗斯拉夫曾介绍说他是一个医生），叫他去雅罗斯拉夫那里。辛巴隆琴和低音提琴在继续演奏，第二小提琴手握住雅罗斯拉夫的左手腕，仿佛握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翻开雅罗斯拉夫的眼睑，朝他的眼睛里窥望；最后他摸摸他汗珠粒粒的前额。“是不是你的心脏痛？”他问。“手臂和心脏都痛。”雅罗斯拉夫说；他脸色发青。这时低音提琴手已经注意到我们，他把琴靠着树，朝我们走来。于是现在只有辛巴隆琴手在独自演奏了，他根本没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全身心沉醉在他的独奏里。“我这就去给医院打电话。”第二小提琴手说。“是什么病？”我轻轻地问。“脉搏实际上已经听不见了，出冷汗。如果以前有过这症状，那么就是冠心病。”“啊，上帝！”我说。“别着急，他会恢复的。”他说，然后匆匆朝房子奔去，用力挤过人群，那些人已经醉得没有注意到音乐已停止，他们一心专注在自己身上，专注在他们的啤酒，他们的胡言乱语和他们的辱骂上，在花园的另一角，辱骂已变成了一场斗殴。

辛巴隆琴手终于停止了演奏，我们全都围着雅罗斯拉夫站着，他抬眼看着我说，这都是因为我们刚才留下来才发生的，他本来不想留下来，他本想到田野上去，尤其是我既然已经来了，尤其是我既然已经回来了，在满天星光下演奏那该是多么美好。“别激动。”我对他说，“你现在需要的是安

。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的却是，虽然他可能会恢复过来，如第二小提琴手所断言的那样，但他却将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种没有激情奉献，没有自办音乐会的生活，一种在死神窥视下的生活，我不禁想到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在他生前就已结束，而雅罗斯拉夫的命运已告结束了。我万分悲伤地抚摸着他的秃头和几根哀痛地企图遮住头顶的长发，大为震动地意识到，我这趟回家本来是为了向我的敌人泽曼尼克报仇，可结果却以我的朋友雅罗斯拉夫受到打击而结束（是的，此刻我可以想象自己把他抱在怀中，抱着他，搂着他，尽管他又大又重，抱着我自己隐匿的罪过；我可以想见自己抱着他穿过冷漠的人群，一边走一边哭）。

我们围着他站了约十分钟，这时第二小提琴手回来了，做手势要我们把他扶起来，从胳膊下架住他，我们扶着他穿过那群酒醉喧闹的年轻人，来到街上，一辆亮着前灯的白色救护车已等在那里。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完稿



译 后 记

《玩笑》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著。这部作品写于1965年，两年后才得以发表，是作者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在短期内便再版了两次，随即又译成了好几种文字。但它在中国出版，却相隔了二十多年。时光的流逝在中国，好象总是慢那么一拍。

中国读者知道昆德拉的名字，只是近两年的事。他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父亲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二次大战后他曾一度加入过捷共，其时他尚在大学读书。他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终选择了文学和电影的道路。六十年代他在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任教。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他失去了在大学的职位，他的作品也遭到禁止，遂于1975年流亡法国，一直到现在。昆德拉是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而以小说最负盛名，小说中，一般又以他移居国外后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其代表作。这部小说前年已有了中文

译本。但在他的本国，人们推崇的却是这部描写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怀疑时代和这时代里人的道德精神的《玩笑》。这自然因为它是作者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在其祖国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但更是因为它发表于“布拉格之春”前夕，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反响，因而已成为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就艺术上讲，《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进一步采用了作者那种音乐对位式的手法，视界更为开阔，思考也愈加深邃。但过多的理性思辨，于情绪上总不免有点抽象，不如他写《玩笑》时身当其境的那样凝炼，给人以深长的回味。且在《玩笑》中，他后期作品中关于媚俗、遗忘和错位的主题，音乐化的结构，幽默的风格等，都已显露了出来，表现出他创作上的成熟。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捷克六十年代政治风云到来的前夕，但故事情节本身却每每回溯到五十年代。书中最精采、最感人的段落便是对矿区惩戒营生活的那段描写。据说出书前，编辑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提出要删掉这一段，但由于作者的坚持，到底还是以完整的面目问了世。五十年代是一个崇高而又残酷的时代，在历史的名义下，人们艰难地穿过炼狱之门，经受种种的考验。整个社会分成了两种人，改造别人的人和被别人改造的人。书中描写的那群惩戒营里的苦役犯，尽管他们的经历和个性各个不同，但最终的命运都是一样。为了赎罪，这些新社会的罪人们不得被迫戴上黑色徽章，把自我消释在清一色的异类标志中，在监督劳动和强迫学习中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状况尤其显示出那时代的特征，对人的尊严的极端蔑视。他们是苦役者，是时代车轮的润滑油，有了他们，轮子才会转起来。他们的命运是被蹂躏的命运。

苦役者的生活是沉重的，同时又是顽强的。人的欲望偏偏在石缝中也要扭曲地冒出来，所以有一点女人的色彩是很自然的事。苦役者都是些正常的人，被剥夺了正常的生活，他们不可能太放恣，却也不会那么浪漫。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女人，这本是和他们的非人道的生活相适应的，所以，他们与女人之间虽然不尽是肉欲的关系，却也难得有美丽而悱恻的爱。卢德维克和露西是一对生活遭到蹂躏的青年，他们本应在萍水相逢相濡以沫中获得爱的支撑，共同走完人生惨淡的路，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不能沟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只有一个交叉点。对卢德维克来说，长期的失去自由使他对女性既怀有感情上的需求，更渴望女性的肉体，要是换一个女人，这本来也很在情在理的，但他遇到的女人却不是别人，而是在这方面有过辛酸经历的露西，他不愿费时去理解她的内心，最终既伤害了她，也伤害了自己。

政治与性爱是昆德拉的两个主要题材，尽管这性爱往往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借以获得自我感的一种手段，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性爱似乎来得太容易了，生活究竟还是轻松了一点，因为人生至少还有可逃的一面。然而露西却是昆德拉小说中少见的道德纯洁的女性，她屡遭凌辱，对肉体的爱有着单纯的厌恶，对她来说，爱情是崇高的，性欲却是丑恶的，两者绝然不能相容。她从公墓中偷花去献给关在兵营里的情人的情景，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亮光。他们爱情的失败是由于卢德维克对爱的态度。象昆德拉所有小说中描写的一样，这样的爱已不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攀住一点实在的东西，在占有中获得自我的确立，这种虚幻的自由感遂造成了灵与肉

的分离。在现代人的两性关系中，那种落难公子与风尘妓女的缠绵爱情早已成为一个虚妄的神话，留给他们的只是肉体与肉体之间可笑的搏斗。爱丧失了爱的崇高性，显露出现代人灵魂的贫乏来。

围绕着卢德维克的复仇，构成了全书的主线。象露西这样的人生活中不是没有，但她是太理想了，太纯洁了，因而也就有点太虚无缥缈了。相比之下，倒是卢德维克与海伦娜的关系更具有现代人的意味。卢德维克原是学生会的干事，属于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由于一个无意识的政治性的玩笑，他的命运陡然发生了变化，他被开除党籍和学籍，放逐到矿区去挖煤。十五年后，他偶然遇到了当年整他的人的妻子海伦娜，为了复仇，他便决心勾引她，等到他终于如愿以偿时，他方才知那个整他的人早已另有新欢，搭上了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姑娘，巴不得将他的妻子转让出去。这个颇似阿Q式的复仇与失败便是《玩笑》一书的主旨：最初他想以玩笑来复仇，结果却掉进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本属合乎逻辑的行为，却引出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结局。如果说这是命运，那么就是一个更深的命运。往事如烟，卢德维克苦苦追索的过去早已永远成为过去，他所面对的已是另一个别人，另一个自己，回顾过去就象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玩笑罩住了他一生的命运，也罩住了那时代所有人的命运。正如昆德拉在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个人命运和历史运动是连在一起的。而只要开头有了一个玩笑，就会衍生出下

一个玩笑，一连串的笑。这种感觉虽然是很难堪，然而又是何等的幽默。有意思的是，卡夫卡和昆德拉两人都是生长在捷克的作家，又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卡夫卡表现的是现代西方社会的荒诞，昆德拉表现的则是另一个社会的荒诞：在生活的秋千上，人们怀着某种虚幻的愿望，极力想荡到命运的高处，可最终还是荡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种虚幻愿望的徒劳无功，正是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可笑。昆德拉的小说便大都以此为名，如《可笑的爱》，《玩笑》和《笑忘书》等，而他的作品也往往以幽默的笔调，写出现代人的沉重中有轻松，严肃中有滑稽，绝不落善善恶恶的言筌。因为他的感受是独特的，所以他的作品便有根，没有那种貌似深刻背后的媚俗。

昆德拉的幽默是一种形而上的幽默。现实在他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存在；他关注的不是人物行动的内在动机，而是行动的结果；不是人的心灵而是人的处境。因为在这日益社会化和历史化的世界，人的个性已变得愈来愈微不足道，人们的存在已失去了任何主体性，而异化为客体：自我的不能确立，人格的丧失，行为的盲目。因此，没有比现代人的这种生存更富有喜剧性的了，他们总是在走火入魔中瞎打瞎冲，可结果却往往阴差阳错，适得其反。正是这种人生的错位感构成了昆德拉的幽默，构成了他小说中大多数人的命运。《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雅库布自以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政治，在他最后遇见凯米蕾时，他才感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生活在别处》里，投身于新时代的雅罗米尔自以为象历代的诗人一样登上了历史舞台，可结果却扮演了一个出卖情人的卑微角色；而在《玩笑》中一心想要复仇的卢德维

克，却撞上了一个更加尴尬的结局。他们也只能这样。个人的命运是可笑的，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可笑的。人生的错位导致了价值的错位，一切价值都遭到了蹂躏，真实的东西已不复存在；爱情不再是爱情，悲伤也不再是悲伤，人们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了。所以在昆德拉的小说中，总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失去，在结束：理想，信念，激情……

全书还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的是摩拉维亚的民俗活动。其中第四章第七章对民俗的阐述，称得上是一篇精采的文化史论文。但对习惯于情节一致性的我们看来，这样的描写总不免有点过于枝蔓。作者的意图却很明白，主题的统一性才是他的注意所在。未来既然是不可靠的，人们总还有过去，还有在若干世纪中活过来的古老的记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人与人的隔绝和孤独，温馨的乡村集体生活和古老风俗，婚礼，收割，节日，翻草时节的歌舞活动，全都随之趋于湮灭。社会主义重新建立起了一种新的集体生活，把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大力扶持民俗活动，所不同的是，在一个什么都要被组织起来的社会，民间活动也是不能例外的。民歌变成了政治歌曲，民间舞蹈变成了青年团的集体舞，所有的传统活动不再是自发的了，而是由上面安排策划。民间歌舞从来都是艺术的源泉，然而，“一个源泉是不可能被组织的，如果它不涌出，它就不存在。”被组织起来的文化终究是虚假的，僵化的，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它活泼泼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变成虚应故事的过场。因而当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时，卢德维克和他的同伴不无悲哀地发现，不仅未来，而且过去也

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一个既无未来又无过去的现在，历史在这方面又开了一个玩笑。

昆德拉本人曾极力声称这不是一部政治揭露小说，而是一个爱情故事。这倒不是出于矫饰。从民族的心理来看，捷克人是欧洲大陆上最古老的一支斯拉夫人，地处东西欧之间任人宰割蹂躏的历史形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态度，经受过西欧启蒙主义精神的洗礼更使他们成为一个理智多于激情，微笑多于眼泪的民族。他们对生活也有担当，但却并不把苦难绝对化，而是在忍受中透出达观，玩笑中显出灵性。从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中，也能看出这一民族心理和文学传统来。

所以读昆德拉的作品，会有一种睿智的感觉。虽然同属斯拉夫人，但在他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俄罗斯灵魂的那种神秘沉重，当然更没有东方智者的那种飘逸和超脱，而是源于十八世纪西方的理智主义和怀疑主义，对人的本性的深刻认识以及随之产生的游戏态度。这是一种健全和节制的心智，崇奉思想独立，奉行快乐即善的原则，什么都不可能确定，什么都值得怀疑。人就是人，他不可能超越自身。因为有合理的欲望，他的行为便说不上怎么好，但也说不上怎么坏。卢德维克不能忘记所有的同事和朋友举手赞成开除他党籍和学籍的一幕，他相信如果需要，他们每个人，包括那些惩戒营的难友，也都会举手赞成绞死他的，毫不犹豫。这种对人性的看法固然可怕，但也使有理性的人得以泰然置之，保持着人生的距离。由于对人性看得透，所以昆德拉的作品中，除了《玩笑》中的露西，全是些不那么绝对的人物。即使对于作

品中的“正面人物”，他也要用另一个人物的眼光，去剥出他的可笑的一面，在幽默中显出一种可怕的冷静。这样就使他的作品排除了任何理想和崇高的因素，上升为对存在的本质思考，尽管这思考本身在他也许仍然是值得怀疑的。不但如此，昆德拉甚至连小说形式本身的严肃也不相信，他把自己的作品就称为“通俗笑剧”，对形式本身采用一种轻松的手法。但这种态度与我们时下某些人的“玩文学”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一次谈话中，他说：“我的野心是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为了“把我们的悲剧揭示在它们可怕的无意义中。”与卡夫卡一样，昆德拉所处理的同样是二十世纪的重大主题：世界的荒谬性。时代是那么沉重，现代人站在舞台上，摆出一副悲壮的样子，可是观众却发现他们的悲剧是荒谬可笑的，于是便产生了哑然失笑的幽默感。在充满苦难的现代社会，人类丧失了悲剧，丧失了他们精神上的最后停泊之地。这样，昆德拉就与卡夫卡梦魇般的沉重划清了界线，从另一个角度对当代重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文学思考。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跻身于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列了。

当《玩笑》中的卢德维克发现过去整他的人，如今已改变了观点，变得比他还要新派，而年轻一代又把他们都看作是过时和可笑的人物，被同样一个来自黑暗而遥远年代的经历所异化时，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残酷了。“一种盲目屈服于另一种盲目。”今天我们称之为所谓时代潮流的许多东西，说到底也不过和过去的狂热虔诚一样，是一样的虚假，一样的媚俗，一样的愚昧罢了。但历史就是

这样，任何时代的悲剧最终都将被后人付之一笑，过去的苦难在现代人眼中更将是不可理喻。这便是昆德拉的“终极悖论”。有一天，当我们民族经历的苦难也同样被时间所掩盖，被人们所遗忘时，那些精神的丝缕依旧牵着已逝的时光的人们，竭力想探求、阐明那段历史的人们，会不会也将发现他们同样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之中，感觉到无处发泄和依托的悲哀？

深沉的感伤与冷峻的怀疑构成了昆德拉的玩笑，在这世纪末的黄昏，我们似乎听见了他和他的人物发出的苦得发涩的笑声。

译 者

1989年2月于南京